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编

人 民 出 版 社

INSTITUTI I STUDIMEVE MARKSISTE - LENINISTE
PRANË KQ TË PPSH
HISTORIA
E PARTISË SË PUNËS
TË SHQIPËRISË
SHËTËPIA BOTONJËSE «NAIM FRASHËRI»
TIRANË, 1969

根据阿尔巴尼亚“纳伊姆·弗拉舍里”出版社1969年版译出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1年10月第1版
197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1001·218 每册 1.15 元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是
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编
写并根据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出版的。

目 录

序 言.....	1
----------	---

第 一 章

为建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而斗争

(一九二九至一九四一年)

一、工人运动的兴起。二十世纪头二十五年内 民主和反帝运动的高涨.....	7
阿尔巴尼亚——半封建的农业国(8)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在阿尔巴尼亚的影响(10) 一九二四年六月革命(11)	
二、共产主义运动的诞生.....	14
索古政权下的社会经济贫困状况(15) 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17) 阿尔巴尼亚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20) 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最初一些工人组织(22) 共产主义者参加反对索古的民主运动(24)	
三、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九年间共产主义运动的扩大和 反对法西斯威胁的斗争.....	26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27) 共产主义者站在壮大着的革命运动的前列(28) 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报刊(31) 共产主义组织的扩展。斯库台共产主义小组(32) 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路线(36) 为在阿尔巴尼亚执行新路线而努力(38) 科尔察小组和斯库台小组意见分歧的尖锐化(40) 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斗争(43)	

四、成立共产党是在民族解放斗争条件下的历史需要·····	45
法西斯占领制度的建立(45) 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始。提到了日程上的问题；共产主义者的联合(48) 恩维尔·霍查(51) 联合道路上的新困难。“青年”小组(52) 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和人民对法西斯侵略邻国人民的态度(54) 共产主义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团结(56)	
五、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成立·····	61
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63) 民族解放战争的政治路线(66)	

第 二 章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是解放国家和建立 人民政权的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

一、建立党的组织。为团结和动员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战争而努力·····	70
初步的组织措施(71) 首要任务是联系群众(72)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积极分子会议(77)	
二、粉碎取消主义派别思潮，建立党内团结·····	80
党的非常代表会议(81)	
三、民族解放阵线的建立。人民政权的诞生和武装斗争的扩大·····	84
《人民之声报》(85) 佩萨代表会议(86) 民族解放会议(88) 游击支队(89)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对“国民阵线”的态度(92)	
四、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总起义的方针·····	96

敌人的政治危机加深(96)	提到日程上的问题——组织总
起义(99)	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104)
五、组织民族解放军和人民总起义	106
粉碎发罗拉州派别组织(107)	总司令部的成立(109)
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人民革命军队(111)	揭露
“国民阵线”的假爱国主义(114)	谴责穆基协议(116)
民族解放会议——唯一的人民政权(119)	
六、加强反对新的占领者——德国占领者和	
消灭反动派的斗争	121
意大利投降和我国被德国纳粹分子占领后的新形势(121)	
消灭国内反动派是胜利地进行反对占领者的斗争的条件(124)	不允许对民族解放战争事业进行任何外来干涉(127)
首先是加强政权和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128)	
七、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粉碎敌人	
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间的冬季计划的英勇斗	
争的组织者	131
敌人冬季攻势的破产(131)	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政治
路线正确性的重大考验(136)	
八、人民民主新国家的建立	140
粉碎敌人的新阴谋(141)	佩尔梅特代表大会。人民民主
国家的建立(143)	
九、阿尔巴尼亚的完全解放。人民革命的胜利	148
敌人六月攻势的破产(149)	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发动
总攻，国内外反动派的计划被粉碎(150)	人民民主制基
础的巩固(152)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对阿尔巴尼亚共产
党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155)	
十、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的总结和胜利的原因	162

第 三 章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为重建国家和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八年)

- 一、保卫和加强人民民主政权170
- 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170)
- 管理国家方面的困难(173) 中心问题是保卫和巩固人民政权(175) 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178) 对外政策(180)
- 二、动员群众重建国家。初步的社会经济改造182
- 依靠国内的力量(182) 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产生(184)
- 为消灭旧的土地关系而斗争(187)
- 三、巩固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的
人民民主国家189
- 人民决心坚持走党指引的道路(189) 宣布成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192)
- 四、党关于深入开展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
机会主义表现的消除194
-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194) 深入进行社会经济改造(197) 为重新审查培拉特全会而提出的论点(202) 为使党内生活正常化而努力(204) 阶级斗争的尖锐化(205)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初步成果(209)
- 五、粉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敌对干涉。
揭露科奇·佐治集团的反党活动214
-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对南斯拉夫干涉的抵制(215) 揭露南斯拉夫领导反马克思主义反阿尔巴尼亚的计划(220)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粉碎南斯拉夫的干涉和科奇·佐治的敌对活动(225)

第 四 章

党为把阿尔巴尼亚从落后的农业国 变成农业工业国而斗争

(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五年)

- 一、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党和国家生活中的历史转折点230
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根本方针(230) 人民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民主化(233)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章程(234)
- 二、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联系 ...237
党的征购和供应政策(239) 为克服在贯彻新的征购和供应制度中遇到的困难而斗争(241) 粉碎国外和国内敌人的计划(245)
- 三、为维护和加强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为完成两年计划而斗争248
消除歪曲和践踏党的路线的现象(248)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249)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两年计划的完成(252) 反对与阶级敌人调和的现象(253) 为使农业摆脱落后状态而努力(256)
- 四、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把阿尔巴尼亚变为农业工业国的任务258
第一个五年计划指示(258) 改进党的政治领导方法(261) 一手拿镐，一手拿枪(263)
- 五、为缩小工农业之间的不平衡和改善生活条件而斗争264
工农业不平衡的原因(264) 有利于发展农业和增进劳动人民福利的措施(266)
- 六、加强思想工作和粉碎修正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企图269

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水平(270) 党保持警惕,防止修正主义渗透(272)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278)

第 五 章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建成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斗争

(一九五六至一九六〇年)

一、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加速农业集体化的方针281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方针(281) 修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路线的企图失败了(285) 党继续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的决心(287) 第二个五年计划指示(289)

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291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的蠢动(291)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革命的国际主义立场(294)

三、党为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关系和为实现

第二个五年计划而斗争302

为大规模进行农业集体化而努力(302) 动员群众挖掘内部潜力(304) 农业集体化的基本完成(306) 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310)

四、对苏联领导的修正主义观点和分裂主义

活动的批判312

国际修正主义的进一步泛滥(312) 为揭露和粉碎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314)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316)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决抵抗苏联领导的攻击(318)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批判(320)

第 六 章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封锁的条件下为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

(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五年)

- 一、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方针331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331) 为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333)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示(336) 不反对修正主义,就不能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就不能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337)
- 二、党为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任务而斗争。粉碎修正主义者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敌对企图342
厉行节约(342)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面对苏联修正主义领导的疯狂攻击(344)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苏联修正主义领导的公开斗争(346) 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中,人民在党周围的钢铁般的团结(350)
- 三、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任务354
为农业的集约化而努力(355) 根本改善农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356)
- 四、加强党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组织和思想工作。胜利地执行经济任务359
进一步从组织上加强党(359) 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是党的基本任务(362) 为共产主义教育服务的文学艺术(368)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370)
- 五、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揭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蛊惑宣传和伎俩而斗争372
从思想上和政治上粉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历史赋予的必要任务(373) 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377) 对苏联新

领导人不承担任何幻想。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382)

第 七 章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党和整个国家 生活的进一步革命化而斗争

一、深入贯彻群众路线	389
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树立革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390)	
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和贯彻党的教导的革命干劲(394)	
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进一步 促进党和国家生活革命化的任务	399
在各个领域里不断开展和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400) 进 一步加强党和提高党的领导作用(410) 第四个五年计划指 示(414) 把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提到更高 的阶段(417)	
三、思想文化革命中一个新的质的飞跃	423
两个主要环节:贯彻执行党的革命原则和准则,反对官僚主 义的政治、思想斗争(424) 处处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 之上的运动(428) 反对宗教、宗教偏见和落后习俗的运动 (433) 彻底解放妇女的运动(437) 学校革命化运动(442)	
四、人民在党的周围的钢铁般的团结是争取新胜利 的保证	448
基本结论	451
注 释	476

序 言

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以来的时期，是阿尔巴尼亚人民悠久历史上最光辉的时期。这一时期，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变化，取得了极其重要的伟大胜利，这些胜利消除了压迫和剥削，并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迅速地、不断地发展。

阿尔巴尼亚人民能取得这些胜利，首先应归功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正确领导。随着党的成立，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就在反对法西斯占领者和本国卖国贼的斗争烈火中，从自己内部产生了坚决彻底地捍卫人民利益、能使人民获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全国性的革命领导。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唯一可靠的指南。它始终高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朽思想的战斗旗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是它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是它英明远见的源泉，是它克服困难和障碍、以坚定不移的信心去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和任务的勇气和决心的源泉。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功地解决了自己面临的伟大任务，因为它紧紧依靠人民。它继承了人民爱国革命的优良传统。在反对外来压迫和社会压迫的斗争中，阿尔巴尼亚人民十分强烈地表现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奴役和压迫制度的深仇大恨、对争取进步事业的强烈愿望和不屈意志、对胜利的毫不动摇的信心、在力量悬殊的对敌斗争中的无比英雄气概、对朋友和同志的真诚的爱戴和慷

慨精神，对敌人和卖国贼的毫不调和的立场。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和未来，为了挽救人民和民族免于灭亡，他们曾不得不同许多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阿尔巴尼亚人民对敌人所进行的抵抗和斗争，始终具有人民性和解放性；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人民的爱国进步传统和丰富的历史经验，是党开展活动的非常牢固的依靠。党继承了这种传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观点总结了这种长期的经验，并使它体现在自己的革命活动中。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人民的高尚的道德品质突出地表现出来了，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命力提高了，他们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已成为解放祖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强大动力。

党把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同反对剥削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剥削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了，并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对祖国的热爱同对人民政权、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与忠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光耀照耀下，根据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经验，紧紧依靠诞生和培育了自己的人民，在忠心为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的崇高理想的指引下，能够制定和始终执行一条正确的总路线，达到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掌握住方向的成熟的地步。它一贯光荣地履行了对本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义务。

党成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唯一的领导力量。它组织和领导了阿尔巴尼亚人民最光荣的胜利斗争——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它组织和领导了对遭到战争破坏的祖国进行恢复的工作，组织和领导了阿尔巴尼亚社会、经济和文化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历史，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政党

的历史，它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和解决着下述主要问题：

消除对外国帝国主义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一切依赖，确保完全的民族独立；

使人民革命从反帝民主阶段不间断地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

锤炼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和全国其他人民群众的联盟，把这些群众团结在以党为核心的并在党的唯一领导下的统一战线中；

建立、巩固和不断完善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的人民民主政权；

消除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方面的长期落后状态，越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从半封建的落后状态过渡到社会主义；

建立和发展作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社会主义工业；

实现农业集体化，发展农业，实现农业机械化；

把地主、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予以消灭，消灭人对人的剥削，在城乡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为经济和文化各部门培养新干部，培养社会主义知识分子；

对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教育，用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武装他们；不断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中开展革命；

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不受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敌对企图和活动的侵犯；

在平等、尊重民族独立与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和互利的基础上，建立阿尔巴尼亚同其他国家的新关系；

维护党的队伍在思想和组织上的磐石般的团结；

建立和始终不渝地维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工人党之间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兄弟关系，维护党的独立，使它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大国沙文主义野心和阴谋的侵犯。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正以毫不动摇的信心，坚定地领导阿尔巴

尼亚人民沿着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前进，解决有关在政治、社会经济、思想和文化各个方面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有关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列宁主义彻底战胜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的重大而复杂的问题。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历史，是根据阿尔巴尼亚的条件和具体的国际环境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习这一历史，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思想方面提高党员和全国所有劳动人民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历史有助于工人、农民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丰富他们对社会发展和政治斗争的知识，丰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经验，正确地估计和解决当前的任务，认识未来的发展方向。学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历史，有助于提高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的政治警惕性，增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后战胜现代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信心。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出版自己的历史，给我国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提供了锐利的、强大的政治思想武器。他们将理所当然地对此感到自豪。党史将给他们打开新的辉煌视野和远景。它将进一步用党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共产党员和人民，更好地锻炼和鼓舞他们去进行斗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夺取一切堡垒，在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方面取得新的伟大胜利。”〔1〕

*

*

*

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试图简要地、系统地、完整地说明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历史和斗争过程，说明党在取得胜利和不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说明党的政策和革命活动所取得的光辉成就。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历史包括三个主要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工人运动的兴起和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开始,直到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成立(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第二个时期包括党为组织和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法西斯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民族解放战争、为争取人民革命的胜利所进行的活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第三个时期是处于人民政权和国家全部生活领导地位的党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时期。

第 一 章

为建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而斗争

(一九二九至一九四一年)

一、工人运动的兴起。二十 世纪头二十五年内民主 和反帝运动的高涨

奥托曼对阿尔巴尼亚的统治，持续了近五个世纪。这是实行军事封建制度、残酷的民族压迫、沉重的封建剥削、频繁的破坏性战争和文教事业十分落后的时期。但同时也是阿尔巴尼亚人民为民族自由和独立、为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进步、为社会正义而顽强斗争的时期。这一斗争成了导致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宣布独立的决定性因素。

宣布独立和建立新的国家，是对阿尔巴尼亚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但地主和资产阶级统治了这个国家，曾经浴血奋战的人民并没有摆脱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此外，独立了的阿尔巴尼亚处在对它推行沙文主义政策的资产阶级邻国的包围之中。帝国主义国家伙同这些邻国不仅瓜分了阿尔巴尼亚，于一九一三年从阿尔巴尼亚的躯体上割去了一半的领土，而且也没有放弃把阿尔巴尼亚从巴尔干政治地图上完全勾销或把阿尔巴尼亚置于它们控制之下的企图。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在宣布独立时是一个落后的农
半封建的农业国 业国。资本主义关系虽已开始在城市发展起来，

在农村也开始略有发展，但总的说来，这种关系还处在初级阶段。在平原地区和部分山区，庄园制已盛行起来，但是在山区、特别是在北方山区的社会生活中，尚有宗法制的残余。

佃农受着地主的敲骨吸髓的剥削。在农村人口中占多数的贫农的状况，也并不见得好些。这些占有小块土地的人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贫困使他们不断陷于地主、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的魔爪中。破产的农民成为雇工——雇佣农业工人。一部分人由于在城市找不到出卖劳动力的市场只得流亡国外。土地分配不合理，地主、教堂和国家进行残酷剥削，使用原始的农具和原始的耕作方法——这就是农民群众十分贫困和全国经常发生饥荒的原因。

城市一般都很小，并且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不发达。城市的内部生活，还保留着中世纪的残迹。在城市中，小手工业生产占统治地位，但在斯库台、培拉特、爱尔巴桑、科尔察等主要城市，在十九世纪就有了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平均每个工场雇佣工人十至十五人。随着商品生产的增长和市场关系的扩大，商业资产阶级由于剥削家庭手工业者的雇佣劳动，他们自己又是土地所有者，因而积累了大量资本。但是，一般说来，他们没有对工业进行投资。所以在刚刚诞生的年轻的阿尔巴尼亚国家里，只有二十五个小型工厂，这些工厂主要从事某些农产品的加工。这是一些拥有少量工人的原始企业，工人人数总共才一百五十人左右。

在宣布独立后的头十年内，工业的发展速度是非常缓慢的。新建了约五十个工厂和作坊。但最大的工厂也不超过三十个工人。盐场、锯木厂和建筑企业的工人较多。还有几十名工人在外国承租者开办的塞莱尼察(发罗拉)沥青矿里劳动。

资本主义企业里的大部分工人是季节工。劳动完毕后，他们

就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工厂和矿山的工人也都出身于手工业者或农民。他们还没有成为一个具有阶级政治觉悟的阶级。

工人受到资本主义企业主的残酷剥削。劳动日长达十小时，许多时候达十四小时之多，但工资却很低，使工人难以维持自己和全家的生活。而且这样的工资也是没有保证的。廉价的劳动力不断增加，使资本主义企业主能降低工资，或者肆意延期数月才发工资。没有关于劳动保护的任何法律，企业主不采取保证工人安全的任何措施。

除工厂工人外，还有受雇于手工业作坊和商人的广大学徒。对他们的剥削更重，因为这种剥削同中世纪的形式和方法交织在一起。大部分学徒是少年或青年。他们除了在作坊和商店劳动外，还要为他们的主人干其他一系列勤杂工作。由于很小的差错，他们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早在二十世纪初，学徒就已开始进行比较有组织的斗争，反对手工业作坊主和商人对他们的剥削。但是，主要在斯库台开展的这一运动，具有地方性和自发性。这里所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一般都遭到了歪曲，往往蜕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最初的工人组织具有互助会的性质，更多的是发扬工人之间的团结精神，而不是进行反对剥削的斗争。参加这些组织的，也有个体手工业者，因为他们在反对商业资产阶级、反对手工工场主和维护小生产的斗争中，需要学徒的支持。但这些组织没有维持很久。

在外国统治的条件下，工人运动还有显著的爱国主义性质。

紧接一九一二年宣布独立之后发生的事件，不允许阿尔巴尼亚国家沿着正常的道路发展。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的国内政治斗争和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帝国主义国家和邻国的沙文主义者创造了实现他们对阿尔巴尼亚的野心的有利时机。阿尔巴尼亚成了各交战国的政治军事利益发生冲突的战

场。协约国方面的帝国主义国家决定通过一九一五年四月达成的秘密协议，取消阿尔巴尼亚的独立，瓜分它的领土。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直到战争结束时，还占领着我国的全部领土。

外国的占领和军事行动，给阿尔巴尼亚人民造成了无数的灾难。国家的经济遭到了破坏。许多村庄被抢劫和烧毁。饥荒遍及全国。流行病造成了一部分人的死亡。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当被压迫和被蔑视的阿尔巴尼亚
及其在阿尔巴尼亚的影响 人民正在遭受苦难，当他们的权利遭
到帝国主义者的残暴蹂躏时，一个伟大的事件震撼了世界——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旧历十月二十五日），俄国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上升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帜。

十月革命为在苏维埃俄国消灭一切人对人的剥削、消灭一切形式的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争取社会主义新制度的胜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资本主义覆灭和社会主义制度取得胜利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附属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时代。

伟大十月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胜利。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更加朝气蓬勃地开始了胜利进军。

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共和国对各国革命运动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们向全世界劳动群众指明了未来的道路，以自己的范例鼓

舞了他们，促进了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空前高涨。

十月革命在阿尔巴尼亚也引起了反响。十月革命思想和苏维埃政府所奉行的政策，对于争取民族解放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运动的高涨、对于民主革命运动的扩大都产生了影响。

苏维埃政府把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秘密条约公布于众，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根据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公布的这些条约中，包括一九一五年四月伦敦秘密条约。根据这个条约，阿尔巴尼亚将为意大利、塞尔维亚、黑山和希腊所瓜分。这一条约的内容立即为阿尔巴尼亚所获悉。在阿尔巴尼亚人民中，激起了强大的怒潮。为确保自由、独立、领土完整和反对伦敦条约的反帝解放运动，广泛开展起来了。一九二〇年一月召开的卢什涅全国反帝大会和同年夏季爆发的、终于把意大利帝国主义占领者赶出了阿尔巴尼亚的英勇的发罗拉之战，证明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证明了列宁主义的反帝政策的影响。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欧洲革命普遍高涨的条件下，在阿尔巴尼亚工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队伍当中，开始广泛流传关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的消息，他们对苏维埃俄国的同情增强了。列宁的名字成了“人类崇高原则”的象征，成了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新社会的象征。介绍苏联和共产主义的第一批小册子开始从国外传进来。这些小册子在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小范围内传阅。十月革命的思想在城市贫苦群众中得到了传播；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性后果和当权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府的反人民政策，这些群众正处于十分困难的经济状况。

一九二四年六月革命 在赶走外国帝国主义者和邻国沙文主义者的军队以后，争取建立民主制度、特别是争取解决土地问题的斗争，就提到了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首位。

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其中包括工人在内，都参加了这一斗争。

工人阶级不仅还没有达到能建立政党的思想和政治成熟阶段，而且连工会组织也没有能建立起来。所以一般说来，工人运动未能克服初期的弱点。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年间新成立的协会，带有救济性质，是手工业者和工人组成的，并且始终是不稳定的。有的工厂和矿山的工人也开始同学徒一起行动起来。但他们的罢工总是自发的，所提出的是纯经济要求。除客观原因外，统治阶级不断地进行反社会主义活动，也是工人运动的障碍，这种活动在十月革命后达到了更大的规模。

工人运动已同席卷全国的广泛的人民运动汇合起来了。这一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身受地主、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农民与城市贫苦群众。全国四面八方都向政府和议会提出抗议，要求取消什一税、高额粮食进口税。一九二三年三月，科尔察数千市民和农民要求保证给人民供应粮食和打开粮食投机商的仓库。发罗拉州的约三千市民和农民，对政府的反人民政策提出了抗议，袭击了投机商的仓库，取出了粮食，无偿地进行分配。

受压迫的贫苦农民要求土地。争取土地的斗争很激烈，在很多情况下，它表现为公开的袭击，用暴力夺取地主和国家的土地。土地问题在苏维埃俄国的解决，也对反封建斗争的激化产生了影响。在象阿尔巴尼亚这样的落后的农业国里，布尔什维主义首先被理解为无偿地没收地主财产，把地主的土地无偿地分配给农民。但农民的这些根本要求没有得到领导民主运动的各个资产阶级政治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赋予土地改革以狭隘的含义。他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调和农民和地主的利益，在不触动地主阶级的情况下“改善”农民的状况。主要由小商人、小厂主组成的阿尔巴尼亚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也是土地占有者。他们作为阶级，不主张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他们是作为反对索古集团企图建立独裁

统治、反对地主主宰国家政治生活的派别参加民主运动的。

主要联合在“团结”协会中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促进和组织民主运动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他们大部分来自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协会团结和组织了青年，特别是那些在民主革命运动中表现非常突出的学生。这一组织和其他民主分子有力地支持了农民对土地的根本要求，活跃了国家的政治生活，提出了需要解决的最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运动的发展，使一九二四年春出现了革命形势。民主运动的领导者之一阿佛尼·卢斯德米被地主反动派杀害，成了武装起义的号角。

五月爆发的起义，以一九二四年六月十日革命势力取得胜利而告终。上台的是以范·诺里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

政府宣布的纲领，包含着一系列旨在使国家走上资产阶级民主发展道路的任务和改革。在政治方面，规定要通过自由的和直接的选举建立民主制，根本改造国家机关、民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在社会经济方面，提出要根除封建主义，使农民摆脱地主的剥削，对税收制度作有利于人民的改革，为外资输入提供方便，鼓励和保护本国资本。要求把教育建立在民族的和现代化的基础上。在外交方面，政府将奉行同所有国家、特别是同邻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

广大人民群众支持这一纲领，并要求予以彻底执行。另一方面，这一纲领遭到了国内地主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疯狂反对。同时，群众的革命热情也使本国资产阶级头目感到恐惧，这些头目同地主和帝国主义者靠拢，共同反对贯彻这一纲领，对新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完全动摇了，执行了阶级调和政策，表明它无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它没有依靠群众，没有为贯彻所宣布的纲领而斗争。这就使它脱离了拥护它上台的人民群

众。面对政府所表现的突出的无能和动摇，在激进民主界中产生和流传着一种主张：让人民群众自己去清算地主和清算资产阶级的不坚定的头目，选举由农民和工人代表组成的新议会。但这种主张没有实现。

政府的反帝立场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来源于政府纲领的民主性。政府拒绝使国家奴隶式地屈从法西斯意大利，拒绝南斯拉夫和希腊对阿尔巴尼亚领土的沙文主义要求。它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在外交方面，政府在英、美帝国主义的壓力面前也动摇了。

帝国主义者和邻国的反动政府掀起了反对阿尔巴尼亚民主运动的高潮。在他们的支持下，国内的地主和其他反动派准备对革命进行镇压。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阿赫梅特·索古率领的、主要从南斯拉夫回来的阿尔巴尼亚反革命军队，在帝国主义者以及塞尔维亚的和白匪的反动军队的直接支持下，进入地拉那，推翻了范·诺里政府。索古政权在阿尔巴尼亚建立起来了。

六月革命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开始的各国人民的强大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和积极因素。而它获得胜利是在欧洲反动势力和法西斯势力已转入进攻、革命运动开始进入低潮的时候。正是在这一时期，阿尔巴尼亚成了巴尔干的革命策源地。六月革命胜利的意义超出了国界。欧洲的共产主义者和民主界都对它特别关注，正确地评价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性。季米特洛夫认为，这次革命遭到镇压，意味着巴尔干革命运动的一个根据地的消灭和巴尔干反动派的阵线的扩大。

二、共产主义运动的诞生

一九二五年一月，索古集团宣布成立以阿赫梅特·索古为总

统的共和国。一九二八年九月，共和国改为君主国，索古宣布自己是阿尔巴尼亚人的国王。

索古政权下的社会 索古政权自始至终是地主和反动资产阶级经济贫困状况 级的残暴的、反民主的独裁制度。

索古政权在国内的依靠是全国的反动势力：地主、大商业资产阶级、农村资产阶级、山区宗族首领。这些势力就是这一政权在它存在的十五年内的社会基础。

索古一贯推行反人民、反民族的对内对外政策。他的独裁统治，保护了封建关系的残余不受触动，增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建立了掠夺人民群众的一整套制度。索古的独裁统治阻碍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国家处于落后和愚昧的状态。

索古取缔了一切民主制度和自由，禁止建立政党和政治组织，镇压了一切争取自由表达思想和组织起来的尝试。他以恐怖手段进行统治，打着反共旗号，反对一切进步思想。

这一政权的镇压机器腐败不堪。它特别依靠雇佣武装部队——宪兵队和警察。军队具有完全反人民的性质；保持这支军队，完全是为了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防止劳动群众起来造反。全部武装力量都是由外国人，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组织和指挥的。

索古集团感到自己的政权并不稳固，因而要求帝国主义国家给予支持。开始时，他们为酬谢南斯拉夫政府的支持，向它赠送了一块阿尔巴尼亚领土；后来，他们又与意大利和英国相勾结，意大利和英国是对整个巴尔干，特别是对开发阿尔巴尼亚地下资源最感兴趣的两个帝国主义大国。

索古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门户开放”政策。这种政策逐步地集中表现在同法西斯意大利保持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方

面，而法西斯意大利千方百计地企图把阿尔巴尼亚完全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这种关系为法西斯殖民地化开辟了道路。意大利财团建立了“阿尔巴尼亚国民银行”和“阿尔巴尼亚经济开发公司”，作为对我国实行经济奴役和政治奴役的有力手段。它们控制了全国最重要的矿山、大部分公共建设工程、海关和几乎全部对外贸易。意大利资本还渗入到了轻工业部门。一九三八年，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的基本投资，达二亿八千万金法郎，而年度预算只略略超过二千八百万金法郎。罗马政府给索古集团提供高利贷款，也是为了达到掠夺的目的，国王及其同伙首先用这些高利贷款来使个人发财致富。这样，意大利资本就成了阿尔巴尼亚国民经济的真正主宰者。它把我国变成了倾销工业品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伴随为意大利资本的渗入开辟道路的经济协定而来的，是许多政治条约，如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间签订的地拉那条约，这些条约给了意大利以直至用武器保护索古政权不受来自国内或国外任何袭击的权利。这些条约把索古集团拴在法西斯意大利的战车上。这样，阿尔巴尼亚就逐渐沦为意大利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

外国资本渗入阿尔巴尼亚，造成了国家经济的单一性。意大利的殖民主义政策，大量的封建残余，缺乏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这些都是使国家实际上没有工业的原因。一九三八年，阿尔巴尼亚约有三百个小厂和作坊，其中大部分是加工农产品的，特别是磨面、榨油和加工烟叶。几乎半数这样的工厂和作坊拥有的工人不到十人。这些工厂、作坊和矿山的工人共达七千五百人左右。这时，工人阶级已增加到一万五千人左右，但他们仍然是分散的，并且同原始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相当一部分工人是手工业和商业部门的学徒。大批的人失业和没有任何关于劳动的法律，使国家机关支持的资本主义公司和资本主义企业主得以无情地剥削工人。在有阿尔巴尼亚工人和外国工人的企业里，阿尔巴

尼亚人受到极端的歧视。对于同等的劳动，意大利工人所拿的工资比阿尔巴尼亚工人多几倍。

在农业方面，资本主义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地主的大地产的进一步被分割和小农的不断破产，富农的力量日益强大。但是，富农也并没有成为发达的农业资产阶级。在国营农场以及在意大利资本主义公司通过剥夺几十个农户的土地而建立起来的农场，资本主义关系特别盛行。这些农场有数千雇工。

在索古统治时期，阿尔巴尼亚仍然是欧洲最落后的农业国。一九三八年，参加物质生产的百分之八十七左右的人口是从事农业的，只有百分之十三的人口分布在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工业和手工业产值只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九点八，来自工业部门的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四点五。以商业部门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还没有成为阿尔巴尼亚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形式。税收沉重，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破产。贫困和苦难笼罩着全国。

经济上的落后，带来了文化上的严重落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学校很少，根本没有高等教育和文化科学机构。对人民的健康毫不关心。造成大量死亡的疾病不断威胁着人民的健康。

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 索古政权推行的反人民、反民族的政策，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为解决反帝民主任务的斗争，又提到日程上来了。由于索古在全国实行恐怖统治，掀起民主运动新高潮的条件是十分困难的。尽管这样，反对索古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反对索古的民主力量坚持以各种形式进行斗争。

现在，民主力量的反抗特别表现在农民和工人的革命行动中。很多地区的农民起来反对企图把他们从庄园赶走或侵占他们土地

的地主的暴力行为，反对苛捐杂税。这一斗争有时变成同索古宪兵队的流血冲突。

工人阶级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他们的队伍由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参加而壮大起来。他们中很多人在用外国（意大利）资金兴建的公共建筑工程中劳动。这些工人受到承包公司的残酷剥削，从一九二五年起，他们就起来反抗不公正的行为，提出抗议，不断举行罢工，要求及时发给工资，因为过去发工资一拖就是一个，甚至几个月。一九二七年，英国石油租让公司的工人和塞莱尼察的矿工也同他们一起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索古宪兵队的干涉，往往迫使工人还没有赢得自己的权利就去复工。

在这些年代里，还成立了一些工人组织。这样的组织有：纪诺卡斯特的“工人联盟”（一九二五年），地拉那缝纫工人的“进步”协会（一九二七年）和科尔察的“缝纫工人联盟”（一九二七年）。这是一些学徒组织的协会，其宗旨是为了发扬团结精神，组织工人互助，限制行会残余，解决学徒和业主之间的冲突，等等。科尔察的“联盟”还接受手工业师傅加入自己的行列，并具有调和师徒利害关系的倾向。在组织工人运动方面，这样的协会不可能起到、也没有起到什么重要的作用。

农民、工人的斗争，一开始就具有反对索古的内容，因为索古政权开动军事警察机器，用武力镇压一切争取哪怕是略微改善群众困境的运动。但是由于没有一个革命的领导，所以这一斗争是没有组织的，是时起时伏的。

民主力量的运动、工人运动的活跃和对现行制度的普遍不满，已经为开展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在工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中传阅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文献是在外国学习或工作、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努力传播这种思想的阿尔巴尼亚人从国外带回来的。

一九二八年，先进分子、工人和手工业者在科尔察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支部。支部的成员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没有经过很好的培养，但他们认识到了组织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性，认为这是成功地开展工人运动和人民群众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的必要条件。

在短时期内，在科尔察还成立了其他一些支部。这就有必要改组工作。为此，一九二九年六月召开了各共产主义支部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建立了以手工业者米哈尔·拉科为首的领导委员会。会上决定要着手建立新的支部。支部将通过教育小组来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会议还决定，支部要通过各种合法的工人协会同群众和工人运动保持联系。为此，提出了成立革命工人协会的任务，这种协会将为实现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而斗争。

一九二九年六月会议，标志着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和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始。在委员会的领导下，科尔察共产主义运动活跃起来了。在一个短短的时期内，市内就有八个支部、共四十名成员进行活动。每个支部领导三、四个教育小组。

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是阿尔巴尼亚工人阶级的第一个革命政治组织。但它仅仅迈出了第一步。小组还很薄弱，组织得不好，没有经验。支部成员和同情者所学习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献并不全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也有托洛茨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材料，这些材料在读者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其中最流行的是希腊托派知识分子组织的“文库马克思主义”出版物。科尔察小组中有些成员接受了“文库马克思主义”观点。其中之一就是尼科·佐泽，他是领导委员会成员。他们仅仅在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千方百计地反对在实际中运用这些原理。

科尔察小组是在资本主义开始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时候成

立的；这次危机在阿尔巴尼亚也引起了毁灭性的经济后果。地主、资本家竭力把危机的全部负担转嫁到农民和工人身上。农产品价格的降低，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困境。这就迫使很多农民背井离乡，到城市去谋生。销售商品的困难增加，造成了很多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破产。同时，很多作坊和工厂也中断或缩减了生产。所有这一切，使失业人数大大增加，工资下降。因此，工人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掀起的罢工运动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一九二九年，利布拉什德建筑工人，申津石场工人，克鲁亚—布莱尔公路建筑工人等，都举行了罢工。一九三〇年一月，地拉那建筑工人同资本主义企业主进行了搏斗。夏天，斯库台的伐乌—代耶建筑工地工人，普克铜矿勘探工人，卡瓦亚水渠建筑工人，卢比克附近的桥梁建筑工地的工人，台佩莱纳附近的西那纳依桥建筑工人，在渔船和沿海运输船只上工作的海员等，都举行了罢工。

经济状况普遍恶化和人民中贫苦阶层遭到饥荒，进一步加深了对现行制度的不满。

工人运动的壮大，给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扩大活动范围、联系群众提供了良好时机。但是由于该小组在思想上、组织上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它仍然置身于这一运动之外。在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阿里·凯尔曼第的帮助下，小组在自己的工作中有了重要的转变。

阿尔巴尼亚的共产 在国外也为组织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努力。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通过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对于组织那些在六月革命遭到镇压和索古建立独裁统治以后被迫流亡国外的阿尔巴尼亚革命民主主义者，给予了宝贵的帮助。

从一九二四年事件中吸取的教训，使阿尔巴尼亚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般都能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对抗性的世界力量活

动的国际舞台上正确地确定自己的政治方向。阿尔巴尼亚革命民主主义者注视着他们称为“各国被压迫人民的天然的保卫者”的苏联，注视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九二五年三月，他们在维也纳（奥地利）建立了一个叫做“全国革命委员会”的民主组织，而一批革命青年，即“团结”协会过去的一些成员，都到苏联去了。他们当中一部分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人，进入共产国际举办的政治学校和训练班学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武装自己。一九二八年八月，他们在苏联成立了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小组，中心设在莫斯科。同年召开的巴尔干第八次共产主义代表会议，指示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要为在阿尔巴尼亚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组织和团结最先进的工农分子”进行长期的、细致的准备工作，以便将来建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2〕}

在苏联成立的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小组制定了自己的章程，并为共产国际所批准。根据这一章程，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为建立作为共产国际阿尔巴尼亚支部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而努力。

小组立即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后，“全国革命委员会”改称此名）中建立了共产主义党团，该党团为保持本组织和本组织的机关刊物《民族自由》的革命精神进行了努力。

在执行章程方面，在苏联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在阿尔巴尼亚国内进行具体的革命工作，帮助开展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一九三〇年抱着这一目的回国的共产主义者当中，著名的有阿里·凯尔曼第。

阿里·凯尔曼第回国后，就为在阿尔巴尼亚建立新的秘密共产主义小组而着手工作。他在地拉那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支部，在缝纫工人的“进步”协会中建立了共产主义党团。在他的倡议下，在发罗拉、克鲁亚和爱尔巴桑也建立了共产主义支部。这些支部一般都很小、不稳定。它们的成员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教师、职

员、军人和手工业者，他们在思想和政治上没有经过很好的锻炼。

阿里·凯尔曼第还同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了联系。这个小组的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把自己关在小圈子内，它的队伍中的反马克思主义分子开始从内部进行破坏，使它的活动陷于瘫痪。

阿里·凯尔曼第帮助科尔察小组摆脱了这种状况。他指示科尔察小组要把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要积极参加工人和手工业者的公开协会，并把这些协会变成革命的组织，扩大在其他城市的、特别是在工人集中的地方的活动，翻译马克思主义读物，这些读物将有助于提高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水平。虽然阿里·凯尔曼第被索古当局先后流放到不同城市，但他仍然尽量同各共产主义组织保持联系，给它们以一切帮助。一九三二年，他被流放到科尔察，这就使他能同那里的共产主义小组直接合作。阿里·凯尔曼第一九三二年七月在领导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给小组指出了更加明确的远景。这时，科尔察小组接受了更健全的政治组织纲领。因此，它的活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共产主义者领导的 共产主义者已经行动起来，开展最有效
最初一些工人组织 的群众工作。经济危机的继续，为这一工作
创造了有利条件。工人罢工此伏彼起。建筑
工人继续站在罢工运动的最前列。因此，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自然首先注意这种工人。在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的倡导下，一九三三年九月成立了科尔察“劳动”协会。参加这个协会的不仅有工人，而且还有遭受资本主义企业主剥削的各种建筑工匠。“劳动”协会受共产主义党团领导。会长是科尔察小组委员会的成员皮洛·皮里斯特里。在短时期内，协会的队伍就扩大到了五百人左右。他们的工作没有季节性，这是该组织的稳固的基础。为了避免遭受宪

兵队的迫害，经过政府批准的“劳动”协会章程，把该协会说成是不参与政治的救济协会。但它的真正纲领是在共产主义者的半公开的会议上通过的。按照这一纲领，“劳动”协会是一个保卫工人权利，同时为反对索古政权、争取自由和民主而斗争的革命组织。

这一初步成绩，鼓舞了科尔察小组的共产主义者去扩大自己的活动。按照“劳动”协会的榜样，并在共产主义者的倡导下，一九三四年成立了鞋业工人、缝纫工人和司机等工会组织。

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还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富有爱国进步思想的市内中学生当中。学生中最革命的分子也组成了一个共产主义支部。

但是小组继续局限在科尔察市内。它同其他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很薄弱，或者根本没有。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决定把共产主义活动扩大到全国其他城市。但是在这方面没有取得显著的成绩。

随着科尔察小组革命活动的扩大，它内部的思想斗争也变得激烈起来了。托派分子疯狂地反对阿里·凯尔曼第执行的路线，反对小组中坚定的成员。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阻挠共产主义者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尼科·佐泽企图篡夺小组的领导权，并迫使小组领导接受托洛茨基主义观点。为了使自己的敌对活动合法化，尼科·佐泽大肆散布他从希腊“文库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搬来的“干部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共产主义者不应该进行活动，不应该深入群众、组织群众，而应该把自己关在支部里，单搞理论教育。

科尔察小组如果不狠狠地打击托洛茨基分子尼科·佐泽，就不可能有效地开展活动。因此，领导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把他开除出领导委员会，但保留他的小组成员资格。这一不彻底的措施，使他和一些“文库马克思主义者”能在小组和工人协会中加紧

进行敌对分裂活动。只是由于那些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进行了大量的解释工作,才使尼科·佐泽差不多完全陷于孤立。

共产主义者参加 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发展到反对索古的民主运动 了许多城市。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在地拉那、斯库台、费里、发罗拉、爱尔巴桑和纪诺卡斯特,都成立了新的共产主义组织。但这些组织也不是由工人组成,都很小,一般说来,都是彼此分散进行活动的。它们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但它们的宣传是有限的,断断续续的,而且脱离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在新成立的组织中,特别是在地拉那,还有一些共产主义者军官。

在阿尔巴尼亚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其原因,正如阿里·凯尔曼第当时所写的,

“一方面,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现行制度的斗争具有生气勃勃和不可调和的性质,另一方面,其他方面的政客采取了背叛、动摇和消极态度”。^[3]

在这种情况下,在各共产主义组织之间建立牢固的联系,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对索古反人民反民族政策后果深有感受的工人、农民、军人和青年中间组织反对索古、反对帝国主义的广泛民主运动,就能保证共产主义运动的加强。

以组织反封建、反法西斯运动为目标的民族解放委员会,虽然通过刊物和传单进行了良好的宣传工作,但它仍然是一个政治流亡者的组织,没有发展到阿尔巴尼亚国内。在索古政权压迫下进行秘密工作,是会有牺牲的,而该组织的领导人却对此没有充分准备。另一方面,阿尔巴尼亚国内的共产主义者,一般说来由于思想境界狭小,而认识不到开展广泛的反帝民主运动的迫切必要性。只是由于对索古政权的痛恨和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才使共产主义

者、特别是地拉那的组织踊跃参加了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的反索古运动。

一九三四年，阿尔巴尼亚同意大利的关系大大恶化了。罗马政府为了尽快把阿尔巴尼亚变成它的半殖民地，为了施加压力迫使索古投降，派遣海军舰艇来到都拉斯。索古在意大利的压力面前屈膝投降，促进了反索古运动的高涨。一九三四年四月，一个由过去的军官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集团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它的宗旨是推翻索古君主政体，建立共和制度，消除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的干涉。这一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军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企图利用运动为法西斯效劳的法西斯意大利间谍也混进了这个组织。地拉那共产主义组织和一些以反索古战士著称的共产主义者军官，都同这个秘密组织联合起来了。

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会议上也研究了参加这个秘密组织的问题。它决定利用这一机会为反索古的民主运动服务，如果爆发起义，它将作为具有特殊纲领的独立力量参加。这一纲领规定：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废除同法西斯意大利签订的一切奴役性条约；取消垄断组织和租让权；对政治犯实行大赦。但科尔察小组没有动员起来扩大反索古运动，并对运动施加自己的影响。它采取了等待的态度，想等到起义胜利后，在小组对群众影响较大的科尔察市夺取政权以后，再来为实现自己的纲领而奋斗。

一九三五年三月从苏联回国的共产主义者里查·泽罗瓦也对扩大反索古运动的队伍作出了贡献。他努力引导斯科克拉巴里和马拉卡斯特尔的农民参加运动。

索古政府对运动有所觉察，并开始采取措施。运动的领导者不得不提前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四日在费里举行起义。但起义很快就被政府军镇压下去了。缺乏组织性和过早地开始起义，严重破坏了行动计划。里查·泽罗瓦领导的起义者也没有达到目的。

里查·泽罗瓦在战斗中被索古的宪兵队打死了，他相信，正如他在家信中所写的，只有推翻了剥削阶级，人民才能获得自由。

费里的起义失败了。它的这种结局是预料之中的，因为它没有一个革命的健全的领导，缺乏组织性，因为它脱离了城乡人民群众，他们对起义没有作好准备。反索古的资产阶级反对派表明，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来组织和领导一场广泛的人民运动。此外，一些法西斯反动分子混进了这个运动，他们企图把这个运动当作在阿尔巴尼亚实现法西斯意大利计划的手段。参加运动的共产主义者虽然坚决要把运动进行到底，但没有能够领导运动，没有对运动进行全面的准备，没有为运动制定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所有这一切，使起义最后成为一场小规模民变。尽管这样，它表现了对地主、资产阶级压迫制度的愤恨和不满。它是有政治意义的，它的影响超出了阿尔巴尼亚的国界。国内外民主舆论都起来反对索古在镇压起义后采取的恐怖措施。另一方面，正如阿里·凯尔曼第所写的，起义是对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的“战斗的洗礼和试金石”。他接着写道：“他们光荣地经受了这种考验，表明自己不愧为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者的兄弟。”〔4〕

三、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九年间 共产主义运动的扩大和 反对法西斯威胁的斗争

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是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发生巨变的年代。对于苏联来说，这是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时期。苏联人民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先进集体化农业的工业大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苏联的胜利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另一方面，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间的深刻的经济危机，从根本上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大大加剧了从内部侵蚀着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为了摆脱困境，很多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开始支持传播法西斯主义和建立法西斯制度，即财政资本的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的恐怖专政。一九三三年纳粹分子上台后，德国成了非常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法西斯分子疯狂地反对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狂热地准备发动侵略战争。一九三二年军国主义日本进攻中国和一九三五年法西斯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进一步增加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

世界正面临着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没有对这种危险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反而帮助了法西斯国家的军国主义化，它们以臭名昭著的“不干涉”政策纵容法西斯侵略，企图把侵略矛头指向苏联。

只有苏联政府和各国共产党全力为制止侵略者而进行了斗争。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法西斯的威胁造成的新局势向世界各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任务。一九三五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强调指出，必须更广泛地开展反对资本和法西斯进攻的斗争。关于这个问题，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是：争取建立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从而保证工人行动的一致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和深入到广大工人群众中去，各国共产党就必须克服如宗派传统的残余等一系列弱点，改变往往是抽象的宣传鼓动方法，使之尽量具体化，并与群众的直接需要和日常利益联系起来。代表大会号召各国人民动员起来，援助正在为争取独立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而战斗的国家。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贯彻这些决议,给共产党人开辟了道路,使他们能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前列,并成为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和反帝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

这些决议提醒各国人民注意法西斯的威胁,向他们指明了为阻止法西斯上台而应采取的措施。这些决议对于所有国家,特别是对于象阿尔巴尼亚这样的直接受到法西斯威胁的国家,具有重大的意义。

共产主义者站在壮大的革命运动的前列 法西斯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的压力和索古的屈膝投降,导致了一九三六年三月意阿条约的签订,这些条约是使国家进一步向法西斯意大利屈服的一个重大步骤。

在这种情况下,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索古政权的同时,反对法西斯奴役者的斗争在阿尔巴尼亚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阿尔巴尼亚资产阶级虽然同意大利垄断资本之间存在着经济矛盾,但它同索古政权紧密地勾结在一起,不能领导捍卫国家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费里起义失败后继续反对索古政权和反对向意大利屈服的资产阶级民主势力,由于缺乏坚定性和组织性,再也不可能领导反索古、反法西斯的运动了。

现在,共产主义者是唯一能领导人民群众为争取民主权利、为捍卫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革命力量。

费里起义震撼了索古政权,使它的政策威信扫地。正如阿里·凯尔曼第所写的,国王不得不“开始玩弄蛊惑人心的手法,以便争取时间,在遭到打击以后取得喘息的机会,准备向人民发动第二次进攻”。一九三五年十月,索古组成了“自由主义的”新政府,新政府

许下了关于实行改革的哗众取宠的诺言。

新政府的政策的目的是巩固索古政权，但共产主义者却利用它所宣布的、虽然是十分有限的自由，采取新的步骤进一步组织工人阶级，并扩大自己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一九三五年秋天，全国最重要的工人中心，由意大利租让公司（在阿尔巴尼亚开办的意大利石油公司）管理的库乔瓦（即现在的斯大林城），开始行动起来。石油开采部门和辅助部门的阿尔巴尼亚工人有一千六百人左右。早在一九三四年年中，在共产主义者的倡导下，在库乔瓦组织了一个秘密核心，准备成立石油工人工会。一九三五年十月，这一核心成立了“劳动”协会。起初，协会拥有近七百工人，一年以后，就超过了一千五百人。十一月，协会得到了政府的承认。虽然为了避免来自政府方面的障碍，章程规定“劳动”协会的成立是为了“维护尊严，维护会员的利益，并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对会员进行帮助”，但协会很快变成了一个反索古、反法西斯的革命工人组织。

库乔瓦“劳动”协会在还没有得到官方批准时，就向政府和议会提出了请愿书，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求采取改善住宿、饮食和卫生条件的措施，要求采取一些社会保险措施。工人们还要求外国企业主不得强迫工人采用法西斯的敬礼方式。在政府派往库乔瓦的代表拒绝工人的要求以后，工人们就以短时间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向政府代表表示抗议。在政府的支持下，意大利石油公司开除了协会的领导人和其他积极分子。它怀着公开的反阿尔巴尼亚的目的，竟宣布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独立节为劳动日。这一天，“劳动”协会组织了把主要锋芒指向意大利法西斯的强大示威游行。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科尔察私营企业职员联盟”的成立，扩大了根据共产主义者的倡议成立的并在他们领导下的各个组织的队

伍。联盟团结了商业、饭店、面包房、银行等部门的职工。该联盟由于没有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认，所以半公开地进行活动。

共产主义者站在工人运动和人民反索古运动的最前列，一九三六年，这些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同年一月，库乔瓦“劳动”协会决定通过罢工来实现自己的要求。在发罗拉的冷泉敷设输油管的四百名工人首先宣布罢工。接着，库乔瓦发电厂工人举行罢工，到二月十一日，就形成了总罢工。为了镇压罢工，政府调去了由内务部长亲自率领的大批宪兵部队，逮捕了六十名最进步的工人，把其他三百名工人从库乔瓦调到了其他城市。三天后，总罢工被宪兵镇压下去了。“劳动”协会实际上不存在了。

总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工人的革命学校。另一方面，它使政府不得不要求企业主创造较为适宜的劳动条件，尽管这是形式上的。

除罢工运动外，反饥饿和反索古政权的强大人民运动正在扩大到全国其他地区。一九三五年秋，饥荒严重到了顶点。成千上万的人面临着饿死的威胁。失业大军大大增加。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城乡贫苦群众的不满和愤慨，首先是针对粮食投机商的；同这些投机商相勾结的，也有政府高级官吏。由于工业生产的竞争而面临破产的手工业者，在这一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的斗争受到企图维持小生产和阻止工厂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幻想的影响。尽管这种要求是空想的，但手工业者的运动，实质上是反对笼罩全国的贫困现象的运动。

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善于利用已造成的局势，领导人民群众，并使他们的斗争具有政治性。建筑工人的“劳动”协会、鞋业工人协会和缝纫工人协会等组织中的共产主义党团开始积极进行活动，组织运动，使运动更加群众化、更加团结，并把运动的矛头指向索

古政权。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科尔察爆发了反对索古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游行作为“反饥饿示威”载入了史册。同宪兵队的流血搏斗，并没有妨碍工人和手工业者当天下午举行新的示威游行；中学生也同这些工人和手工业者联合起来。同宪兵队的搏斗更加激烈了。

科尔察的反饥饿示威是共产主义者组织和领导的第一个群众性的反索古活动。虽然它遭到了镇压，但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在统治当局和统治阶级中造成了一片惊慌。另一方面，它以自己的榜样鼓舞了其他地区的人民群众。在纪诺卡斯特、萨兰达、莱斯科维克、比利什特、波格拉迪茨和培拉特也都举行了反饥饿示威。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发罗拉、同年十月在爱尔巴桑爆发的群众示威，也表现了人民群众对索古政权的不满。

一九三六年九月，阿里·凯尔曼第被索古政府驱逐出祖国。行前，他在纪诺卡斯特会见了刚刚回到阿尔巴尼亚的、以积极的共产主义战士著称的恩维尔·霍查。

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报刊

一九三六年的事件证明，共产主义者在群众中的影响扩大了，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讲，这些成绩还是十分有限的。共产主义者只通过个人宣传进行政治工作，揭露索古政权及其反人民、反民族的政策。索古的严格的书刊检查，不允许他们在报刊上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尽管这样，他们的具有民主进步精神的文章，还是能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发表。民族解放委员会中的共产主义党团于一九三四和一九三五年出版了两个小册子，说明了索古政权的腐败不堪，揭露了索古政权的反动性。在这两个小册子中，提出了阿尔巴尼亚人民运动的新纲领，纲领规定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武装起义，推翻索古政权，建立人民共和国。里昂（法国）阿尔巴尼亚共

产主义者小组开始出版反索古和反法西斯的战斗报纸《人民报》，该报后来为《萨赞报》所代替。但这些报刊在阿尔巴尼亚传播很少，主要局限在范围狭小的知识界。

为了在国内广泛传播民主的、反封建的和反帝的思想，共产主义者就必须采用新的工作方式。共产主义者开始成功地利用各种文化艺术协会。斯库台中学学生一九二九年成立的“阿尔巴尼亚信义”协会和科尔察“劳动”协会的戏剧小组，通过具有爱国、民主、反帝精神的戏剧演出受到了欢迎。此外，各共产主义组织还着手出版公开刊物，使之成为它们和全国进步分子的讲坛。地拉那和科尔察组织的共产主义者立即利用了“自由主义”政府上台后所出现的局势，出版了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反响的刊物。

其中，一九三六年四月在科尔察创刊的《新世界》杂志，存在的时间最长。虽然由于书刊检查而在文章中使用了伊索的语言，但它仍然是共产主义者手中对现行制度和阿尔巴尼亚社会的弊端进行批判的强大武器。它对法西斯反动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以民主革命精神阐述了人民面临的根本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并号召阿尔巴尼亚民主舆论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斗争。《新世界》杂志成了民主青年和知识分子最热爱的刊物，它用热爱劳动人民、痛恨全国剥削阶级的精神教育他们。

共产主义组织的扩展。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的革命事件，**斯库台共产主义小组**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成就。但这些事件同时也暴露了在组织工人运动和反索古运动方面存在的一系列缺点。在这种情况下，首要的任务是要使共产主义运动扩展到全国，在各组织之间建立更加牢固的联系，协调各组织的活动。

为此，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成立了新的

领导委员会，负责在全国各州开展活动。该委员会的目的，是要成为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核心。但它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只在培拉特和地拉那成立了科尔察小组的新组织，在地拉那还成立了印刷工人协会。领导委员会在全国各州所进行的工作是浮在表面的、断断续续的。吸收新成员，不是在对新成员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是危害共产主义运动的反马克思主义分子能混进组织中的原因。

在这一时期，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的重要发源地正在斯库台形成。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在那里建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扩大了自己的活动。建立了新的支部和同情者小组。**斯库台共产主义小组**扩展到了地拉那、爱尔巴桑、纪诺卡斯特、科尔察等地。为了领导各个组织，一九三七年在斯库台和地拉那成立了州委会。组长是一个理论观点错误、政治上极为糊涂的知识分子泽弗·马拉。

小组在群众中的活动局限在学生和手工业者当中，局限在某些工人集中的地方。小组的重要成绩是在斯库台、地拉那建立了青年组织，在地拉那建立了木工协会。

斯库台小组没有一条明确而固定的政治路线，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在它的队伍中没有健全的纪律和保密制度。支部一般由三个人组成，主要是对它的成员进行理论教育。为达到这种目的所采用的读物，包括一系列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有助于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但是，和其他小组一样，在斯库台小组所属的组织中也流传着托洛茨基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读物。

在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道路上出现了托派造成的严重障碍。一九三七年初，安德烈·齐西（化名“火焰”）从雅典回到阿尔巴尼亚，他自称是在希腊成立的、据说已被共产国际承认的所谓“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主席！事实上，他是一九三六年

在雅典成立的被称为“火焰”小组的一个托派小组的首领。安德烈·齐西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阿尔巴尼亚各共产主义小组并入他的“党”内，并强迫各共产主义小组接受他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科尔察小组没有承认“火焰”的“党”，并表明，只有“火焰”小组接受科尔察小组的纲领，才准备与它合作。这时，安德烈·齐西同派别分子尼科·佐泽建立了联系，同他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他们两人勾结起来反对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

在地拉那，阿里斯蒂德·钱德罗开始了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敌对活动。在形式上他参加了科尔察小组。由于小组的领导人没有进行监督，他所干的勾当就没有被揭露。他在地拉那以小组的名义收罗了一些成员，并向这些成员灌输他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一九三七年，这些人完全蜕化成了托派集团。

在这一时期，斯库台共产主义小组为同科尔察小组建立联系进行了初步的努力。它在一九三七年给科尔察共产主义者的信中，要求他们这些较有经验的人在组织问题上给予帮助。科尔察小组准备给予帮助，但遭到了尼科·佐泽的破坏。他冒充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通知斯库台小组说，在希腊已成立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其“中央委员会”即将回到阿尔巴尼亚。尼科·佐泽指责科尔察小组的领导人阿里·凯尔曼第是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者。尼科·佐泽的观点在斯库台小组的那些思想模糊的领导人中找到了适宜的土壤。泽弗·马拉和尼科·佐泽实际上成了小组的主要领导者。两个主要的共产主义小组之间的接近和合作被破坏了。

分裂活动给共产主义运动、从而也给整个民主革命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这种情况下，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新的反动政府上台后掀起了疯狂的反共运动。这届政府对共产主义者和所有进步分子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它解散了工人协

会，禁止成立新的协会，只允许建立在政府当局直接监督下的法西斯式的工人团体。进步报刊被取缔了，对国内出版的和来自国外的各种书籍、报刊进行严格的检查。一九三七年，索古逮捕了大部分共产主义者军官。

另一方面，索古政府允许法西斯主义在阿尔巴尼亚广泛传播。墨索里尼的特使已着手按照法西斯的样式组织阿尔巴尼亚青年。他们在科尔察成立了由阿尔巴尼亚法西斯分子组成的“行动委员会”，在全国建立了一个广泛的间谍网，任务是为意大利完全奴役我国作好准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天主教反动神甫执行了特殊的使命。

索古毫无保留地支持一九三六年在西班牙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承认了佛朗哥法西斯政府。

索古的极端反动的亲法西斯政策，引起了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对国家独立的命运的极大忧虑。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法西斯对阿尔巴尼亚和各国人民造成的威胁。在这方面，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也直接给予了帮助。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认为，西班牙人民的正义斗争也是维护阿尔巴尼亚利益的斗争。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和反法西斯战士决心作为志愿军前往西班牙，特别有力地表现了他们对法西斯的痛恨和他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早在一九三六年，各共产主义小组就派遣自己的成员前往西班牙，同西班牙人民并肩战斗。阿尔巴尼亚志愿军中有：穆罕默德·谢胡、阿西姆·沃克希、西缪·戈果卓托、拉米兹·瓦尔瓦里察、泽弗·霍蒂、穆萨·弗拉达里等人，他们在国际纵队中英勇地进行了反法西斯斗争。其中很多人在战场上牺牲了，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成员德尼·科诺米在踏上西班牙国土之前，就被法西斯杀害了。

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路线 在法西斯对阿尔巴尼亚的威胁增长的情况下，各共产主义小组不仅必须紧密合作，而且还必须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来改组自己的全部工作。

国外的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为执行共产国际的新路线作了初步的努力。根据设在巴黎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共产主义党团的倡议，一九三六年三月建立了阿尔巴尼亚各流亡政治组织的“民主阵线”。但是，在这一阵线中，“民族同盟”所代表的反索古流亡资产阶级保守派，已在政治上蜕化变质，不能进行爱国革命活动。结果，“民主阵线”在短时间内就解散了。

由于没有一个被正式承认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党，所以国内各共产主义小组还没有同共产国际建立正式联系。尽管如此，共产国际经常从阿里·凯尔曼第和在法国的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那里了解到阿尔巴尼亚各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情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国外活动的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举行会议，阿里·凯尔曼第在会上作了报告。这次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巴尔干支部的倡议在莫斯科举行的，目的是为了分析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并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规定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阿里·凯尔曼第要求为组织和建立共产党而加紧工作。在这方面的措施，就是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一个组织中心，这个中心将依靠现有的各小组，首先是依靠科尔察小组。这个中心的任务，是“加强和领导现有的各共产主义小组，组织阿尔巴尼亚全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召开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成立大会”〔5〕。阿里·凯尔曼第认为，必须有一个领导工会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的独立的共产主义组织。必须在共产主义者的倡议和领导下建立一个具有民主和反法西斯性质的集中的秘密组织，以便反对索古政权和意大利帝国主义，

争取成立民主共和国，废除同法西斯意大利签订的奴役性条约。在这一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人民阵线。

会议在对报告进行讨论以后，通过了决议，这些决议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些决议，将在阿尔巴尼亚建立具有民主和反法西斯性质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将由共产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来领导。这个委员会的共产主义核心小组由在国内工作的五人组成。这个组织将是建立人民阵线的支柱。关于各共产主义组织的问题，共产国际是从下述事实出发的：旧支部脱离群众，把自己关在小圈子内，因而不能执行新的路线。所以支部及其领导机构必须暂时解散，通过在合法的协会中进行工作，在群众中打下巩固的基础以后，按照党的原则进行改组。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联系应该是个人联系。在党成立以前，中央委员会的共产主义核心小组行使共产主义组织中心的职能。共产主义者的最低纲领，也就是新组织的政治纲领，它包括两项主要任务：根据人民群众最基本的要求，（一）维护民族权利，（二）维护民权利。为了捍卫民族独立，新的组织将同所有那些主张反对法西斯奴役的阶级、社会阶层和个人进行合作。共产主义者将出版秘密刊物宣传新路线。

阿里·凯尔曼第和科乔·塔什科受委托把这些指示送到阿尔巴尼亚。阿里·凯尔曼第到法国去办理回国的入境手续。在法国，他为在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和流亡者中贯彻新路线进行了广泛的活动。他特别重视揭露民族解放委员会共产主义党团成员拉扎尔·丰多企图破坏在法国的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的全部工作的敌对活动。拉扎尔·丰多破坏派遣阿尔巴尼亚志愿军去西班牙反对法西斯的工作，最后，他公开跳出来反对苏联，为布哈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遭到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惩处的其他敌人进行辩护。他作为共产主义的叛徒，作为内奸和帝国主义的间

谍，受到了惩处，被开除出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

疾病使阿里·凯尔曼第不能回国完成他所肩负的使命。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一日，他在巴黎逝世。

为在阿尔巴尼亚执行新路线而努力 科尔察小组一九三七年秋天首先获悉了共产国际的新指示。这个小组的领导人虽然对解散各共产主义支部和委员会的指示有所保留，开始时对执行这一指示犹豫不决，但经过研究以后，接受了新路线，并把它作为自己进一步开展活动的纲领。小组决定了它参加中央委员会共产主义核心小组的代表。它决定执行新指示，扩大在各合法组织中的群众工作，如手工业者协会、街道委员会、市政会议、商会理事会、入伍前军训小组、校外青年协会、合法的报刊等。

在全国其他共产主义组织中宣传新路线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斯库台小组领导人的反对。泽弗·马拉和尼科·佐泽不接受新路线，并且声称，他们原则上主张社会革命，但不主张民族革命；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但不愿同民族主义者合作；他们主张等时机到来采取直接行动，而不主张采取迟缓的间接行动，等等。

阿里斯蒂德·钱德罗领导的地拉那托派组织也反对新路线，他象泽弗·马拉一样，认为同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合作、建立人民阵线，就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

为了向共产主义者做好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解释工作，揭露托派分子，把坚定的共产主义力量团结到一个统一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里来，就必须进行坚定顽强的工作。但那些给自己提出了这种任务的人，在困难面前退却了。将要成立的新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共产主义核心小组，从来没有起到核心的作用。它的成员不是具有牺牲精神的人。带来新指示和执行这些新指示的主要负责人

科乔·塔什科表明，他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没有贯彻这些指示的能力。

科尔察小组继续局限在本市范围内。一九三八年三月，它解散了支部。这在把支部看成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集体研究工人运动问题的最适宜的形式 的共产主义者当中，造成了某种混乱和涣散状态。尽管这样，无论在支部解散之前还是以后，小组的共产主义者都为在科尔察执行新路线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重大成就。他们领导了城市民主运动，在人民群众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人民群众把共产主义者看成是人民利益最坚定的保卫者。街道委员会、商会理事会、校外组织“科尔察青年”等的选举，特别是市政会议的选举，都表明了这点。共产主义者在新的市政会议选举中提出了也有进步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民主派联盟候选人名单。共产主义者在六月选举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民主派联盟提出的名单获得了百分之八十六的选票，战胜了以“通用电力公司”资本家集团为后台的名单，虽然后者在选举中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并得到了国家机关的大力支持。共产主义者以自己的工作，使广大选民摆脱了直到当时还存在着在政治方面的沉闷和漠不关心状态，使他们踊跃参加政治生活。共产主义者领导下的科尔察新的市政会议，采取了全国市政会议实践中前所未有的系列民主措施。它公开举行会议，使选民能监督它的活动，它清洗了市政会议行政机关中的反动官吏，并用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予以代替。它运用市政会议的一部分基金在经济上帮助穷人，在市内贫民区修筑道路、敷设水管等。它对“通用电力公司”进行了起诉，以便废除它通过贿赂等手段取得的供电特权。

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的都拉斯分部所提出的民主派联盟名单，也于同年七月在该市举行的市政会议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在纪诺卡斯特和贝京，民主派联盟提出的名单也取得了同样的胜利。

科尔察小组和斯库台 科尔察小组特别重视对威胁着国家自由和独立的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这

一斗争是共产主义者的基本战略任务。

小组为了教育自己的成员和宣传新路线，于一九三七年秋天开始出版秘密机关刊物《前进》杂志，揭露作为剥削、压迫、战争制度的法西斯主义，揭穿了在阿尔巴尼亚发起法西斯运动的那些人及其维护者——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贷者作为人民敌人的真面目。该杂志就国家面临着的法西斯威胁向共产主义者提出了警告，并号召他们动员人民起来反对这种威胁。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不仅仅局限于开展广泛的反法西斯运动的宣传，而且还采取了直接的行动。一九三八年，共产主义者在科尔察市街道上同在阿尔巴尼亚活动的“法西斯委员会”成员进行了搏斗。他们使按照意大利法西斯制度组织青年的企图遭到了失败。

在国内问题上，科尔察小组执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依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前进》杂志上从理论上说明了共产主义者必须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者必须领导群众为满足最基本的政治要求 and 经济要求而进行日常斗争，必须建立人民阵线，动员群众投入反对法西斯威胁的斗争。在这一基础上，科尔察小组还提出了最低纲领，规定：（一）争取人民民族权利，反对帝国主义；（二）争取人民民主权利，反对违反国民宪章的行为和在阿尔巴尼亚扶植法西斯主义的企图；（三）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四）争取人民的基本经济权利。

《前进》杂志指出，在象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里，不仅有社会问题，而且还有民族问题；这后一个问题已上升到了第一位，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的民族运动可以、而且应该为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服务；工人阶级是唯一能领导群众和忠实捍卫群众利益的阶级。《前进》杂志强调说，如果只局限于工人阶级，只靠工人

阶级的力量进行斗争，而不动员全国的力量，那就是一种危险的冒险行为。

科尔察小组的机关刊物写道：

“我们务必在人们集中的一切地方，在国家机关、学校、俱乐部、宗教团体、妇女组织等单位进行工作……我们的公开纲领和策略，为在国家允许的或国家建立的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我们不得不间接地进行活动，这仅仅是因为我们要聚集力量直接地进行活动。人民就是力量；没有人民群众，我们就只不过是一小部分人……”〔6〕

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十分重视席卷了社会各阶层的反对意大利帝国主义的运动，认为这一运动是建立人民阵线的巩固基础。

由于执行了这条路线，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这只是在市内。在阿尔巴尼亚，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对于在阿尔巴尼亚这样落后的农业国建立人民阵线所应依靠的基础，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的理解是十分狭隘的。它在宣传要从工人阶级扩大到其他的人民阶层去的同时，对农村、对工农联盟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工作，而没有这个联盟，是不可能建立人民阵线的。

斯库台小组并没有从共产主义者在科尔察、都拉斯等地各机关干事会选举中取得的成就中吸取应有的教益。这个小组的主要领导人不但不努力团结全国的共产主义者，扩大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反而走上了分裂和反对接受了新路线的小组的道路。在这场斗争中，斯库台小组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出版的秘密机关刊物《绿皮公报》尤其起了消极作用。在这一公报中，刊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一些著作的节录，关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材料，揭露索古政权、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推行的奴役政

策的材料等。这些文章对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要的、积极的贡献。但另一方面，斯库台共产主义小组力图通过《绿皮公报》从理论上论证它所执行的路线，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论点，在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基本问题上采取了泽弗·马拉和尼科·佐泽强加给它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

斯库台小组领导人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源于他们对社会各阶级和阶层在阿尔巴尼亚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对意大利法西斯的奴役政策在阿尔巴尼亚所造成的形势所持的错误看法。他们说，在阿尔巴尼亚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全国人口中最革命的是手工业者；当无产阶级随着本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形成并能高举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时，农民才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他们认为，由于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以不可能进行真正的阶级斗争，因而还没有具备进行革命的条件。共产主义运动在阿尔巴尼亚的产生，也不是由于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的斗争的必然需要，而是外部影响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这一运动已经产生，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教育和培养干部，以备将来在人民群众中开展广泛的宣传，把无产阶级吸引到自己周围，掌握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权。他们打算以这种在理论上受到教育和培养的干部来建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

斯库台小组的领导人不懂得在阿尔巴尼亚和世界上所发生的政治上的变化，不能根据这种情况制定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他们拒绝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人民阵线的指示，并为此辩解说，这是因为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阶级没有分化，没有无产阶级，没有共产党，没有其他政党，普遍愚昧无知等等。斯库台小组的领导人并不反对建立民主的、反帝的、反法西斯的制度，但他们要把主要力量用来争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民主制。因此，他们要走建立巴尔干社会主义联邦的道路。这些观点增加了小组成员的

思想混乱。

两个小组之间在根据本国具体历史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产生的思想政治分歧加剧了。这一斗争还扩大到了组织方面，变成了无原则的斗争。

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斗争

这时，意大利法西斯对阿尔巴尼亚的侵略危险正在日益增加。一九三九年一月，法西斯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签署了对阿尔巴尼亚实行军事占领的计划。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人认为，建立反对意大利帝国主义的广泛阵线的有利条件已经具备。他们努力说服其他小组的共产主义者和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但是这种努力没有坚持下去，失败了。

另一方面，索古根本无意抵抗意大利的侵略，更谈不上与共产主义者共同进行抵抗了。直到最后时刻，他还希望同意大利法西斯达成协议，对意大利法西斯作出新的让步，以保住王位。同时，他对共产主义者进行了残酷迫害。索古宪兵队发现和逮捕了斯库台小组的大部分成员。该小组的领导者泽弗·马拉和尼科·佐泽在索古一九三九年一月进行的侦讯和审判面前屈膝投降了，供出了自己的同志，供出了本小组的活动和科尔察小组的一部分成员。七十五人出庭受审，被控告为企图用武力推翻现政权。十八岁的共产主义者捷玛尔·斯塔法象他的很多同志一样，在法庭上表现了英雄气概。他说，他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将拯救受压迫的工人群众。法庭对五十二人判处了不同的徒刑。

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这主要是由于保密不严和认为向警察和法庭供出自己的同事不是什么严重错误的斯库台共产主义小组头目的背叛行为造成的。他们竟把这说成

是使同志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接受考验的手段。

国际形势越来越恶化。法西斯国家加紧准备战争。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德国占领了奥地利，一九三九年三月，西方国家在慕尼黑投降后，希特勒德国又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这时在西班牙，法西斯军队镇压了西班牙共和派的力量。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法西斯意大利最后决定对阿尔巴尼亚实行军事占领。索古千方百计地企图掩盖阿尔巴尼亚和意大利关系中形成的紧张局势。尽管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四月初就已获悉法西斯的阴谋。汹涌的怒潮席卷了全国。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虽然人数很少，但成了各地强大的反法西斯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在地拉那和其他城市，在共产主义者和爱国的民族主义者的倡导下，建立了反法西斯侵略志愿军招募站。被监禁和流放的共产主义者要求政府把他们派到反侵略的第一线去。但是，组织人民抗战的工作，遭到了索古及其集团的破坏。阿尔巴尼亚人民已经发动起来，决心为保卫自由和独立而战斗，但他们没有武器，他们被统治阶级、政府和国王出卖了，他们没有外部的援助和支持。在这种决定祖国命运的时刻，四分五裂和互相争斗的各共产主义小组，不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不可能动员人民对侵略者采取武装行动。

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意大利法西斯军队进攻阿尔巴尼亚。索古及其集团抛弃了国家，让它听天由命。意大利军事专家和亲法西斯的军官已使阿尔巴尼亚军队处于瘫痪状态，因而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溃散了。当时，许多爱国者小组手持武器，在都拉斯、萨兰达、申津、斯库台和发罗拉英勇地对侵略者进行了斗争。但是敌人以庞大兵力将这次抵抗镇压下去了。几天之内，法西斯占领了全国。但阿尔巴尼亚人民没有被征服。他们对意大利奴役者公开表示了无比的仇恨，从来没有承认过外国占领制度。

阿尔巴尼亚被占领，是意大利法西斯的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索古政权的反民族、反人民的投降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承认了这种占领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干涉”政策的必然结果。只有忠于自己维护那些受到法西斯威胁的国家的政策的苏联对这种侵略进行了谴责。愤怒和抗议的浪潮，席卷了阿尔巴尼亚在国外的各侨民区。全世界进步舆论也谴责了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的侵略。

四、成立共产党是在民族解放斗争条件下的历史需要

占领阿尔巴尼亚，是法西斯国家为称霸全世界而开始执行的总计划的一部分。英国、法国和美国接连让步的政策，更加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野心。英国和法国在公众舆论压力下于一九三九年开始同苏联的谈判，被这些国家用来作为掩盖它们企图同希特勒达成协议的烟幕。由于这个原因，苏联为了赢得若干时间，加强国防，不至于单独陷入对德和对日两条战线作战，于是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九月初，希特勒分子进攻波兰后，法西斯侵略的矛头也在指向英国和法国，面临法西斯侵略的英国和法国，向纳粹德国宣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两个主要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这是资本主义体系在总危机时期不可避免的矛盾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各国人民已经起来反对法西斯侵略和奴役。他们为维护自由和独立、为摆脱外国压迫所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反法西斯斗争。

法西斯占领制度的建立

随着阿尔巴尼亚被意大利所占领，就开始了阿尔巴尼亚人民遭受法西斯奴

役的苦难时期。意大利占领者保护了地主、资产阶级制度不受触动。另一方面，他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包括政治、经济和行政措施的庞大计划，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占领制度合法化和巩固起来，使我国意大利化，掠夺我国的财富，把我国变成他们在巴尔干和向东方扩大侵略的基地。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企图通过蛊惑人心的手法和武力达到这些目的。为了掩盖兼并行径，他们在地拉那召开了“立宪会议”，由立宪会议宣布阿尔巴尼亚同意大利成立“君合国”，把阿尔巴尼亚王冠送给了意大利国王维克托·恩马奴伊尔三世，选举了以大地主谢夫切特·维尔拉茨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傀儡政府。事实上，阿尔巴尼亚已成为建立了法西斯独裁制的意大利帝国的一个行省。意大利“总督府”代表国王行使全部国家权力，忠实执行罗马政府的指令。阿尔巴尼亚傀儡政府只不过是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和总督的旨意的单纯的传声筒而已。阿尔巴尼亚外交部已被封闭。它的职权归意大利外交部。其他各部事实上为意大利“顾问”所控制。阿尔巴尼亚武装部队成了帝国军队的一部分，属意大利司令部指挥。关于意大利公民和阿尔巴尼亚公民在阿尔巴尼亚享受“平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协定签订以后，成千上万的意大利移民(工人、农民、专家、教师、企业家、商人、官吏等)蜂踊而来。这些人同占领军一起构成一股力量，其目的之一就是使我国完全殖民地化、法西斯化。

意大利占领者一方面竭力保持阿尔巴尼亚国家在表面上的存在，另一方面，正式宣布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是“一块统一的领土”。意大利资本通行无阻地涌进阿尔巴尼亚，成为国家经济的全权主宰者，把我国完全变成了原料产地和它的独占市场。

意大利政府还开始进行狂热的准备，以便把阿尔巴尼亚变成它对巴尔干邻国进行侵略的军事基地。修筑新的战略公路、营房、

机场、工事等，都是为达到这一目的服务的。

墨索里尼政府在执行占领阿尔巴尼亚和把阿尔巴尼亚变成意大利的一个行省的政策时，得到了我国反动统治阶级的完全支持。早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法西斯意大利就在这些阶级和资产阶级政治流亡者中间，建立了死心塌地为意大利奴役阿尔巴尼亚人民效劳的强大的间谍机构。一般说来，阿尔巴尼亚地主也采取了这种立场。他们同保证他们享有阶级特权的外国统治者始终勾结在一起，把私人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地主作为政治腐败的传统体现者，把意大利法西斯看作自己阶级利益的保护者，所以他们不难抛弃索古，同意大利占领者紧密勾结，毫无保留地支持意大利占领者在阿尔巴尼亚的政策。同样的利害关系使宗族首领也投入了法西斯的怀抱。意大利占领者善于利用这些头目的愚昧和宗法制残余，迎合他们的野心，从而使他们变成法西斯在阿尔巴尼亚的盲目工具。

主要由大商业资产阶级构成的阿尔巴尼亚反动资产阶级也出卖了祖国的利益。他们早就放弃了保卫国家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变成了一支反革命的、反民族的力量。法西斯的占领促进了商业的发展。阿尔巴尼亚大商人同地主、高级法西斯官吏一道，成了意大利垄断资本对阿尔巴尼亚市场进行搜刮的中间人和同伙。很多经不起意大利工业竞争造成的困难而倒闭的本国工厂厂主，也转向商业，并聚集了雄厚的资本。这样，大资产阶级成了占领者的附庸。反动僧侣也成了法西斯的工具。阿尔巴尼亚反动派就是由这些阶级和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组成的，占领者把法西斯行政机关中的重要职位分给他们，企图通过这些入确保自己安安稳稳地统治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人民很快就感到了建立法西斯制度的后果。他们完全丧失了民族自由和独立。一开始就有数以百计的爱国者被关

进意大利监狱和流放营。法西斯建立了强大的警察机构，迫害“当局认为可疑的人”。职员被迫进行效忠于国王的宣誓，否则就要解职。法西斯法律在全国制造了一种恐怖不安的气氛。

另一方面，由于建设工程的扩大，特别是军工建设的扩大，暂时消灭了失业现象，由于市场充满了较过去便宜的意大利商品，最初几个月造成了一种经济状况得到改善的假象，但这种假象很快就消失了。由于意大利工业的大力竞争，手工业作坊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闭。手工业者普遍破产。阿尔巴尼亚工人不得不一天劳动十小时，而得到的工资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维持不了生活。被占领后，与意大利工人相比，阿尔巴尼亚工人受到更大的歧视。对阿尔巴尼亚工人既没有劳动保护，也没有安全措施。意大利企业只要认为劳动需要或有特殊情况，就有权延长工时。

占领者有计划的掠夺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强迫农民向资本主义公司廉价交售农产品，意大利银行对小农实行剥夺，强占成千上万公顷土地以满足军事需要，这一切加深了农民群众的贫困化。

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始。 丧失民族自由和独立，震动了阿尔巴尼亚人民，深深触动了他们热爱祖国和民族自豪的传统感情。对占领者的仇恨在日益增强。这种仇恨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破坏使阿尔巴尼亚人民意大利化、法西斯化的计划，反对登记加入法西斯党和其他法西斯组织，抵制占领当局颁布的法律等。特别是工人和学生，在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中表现得最突出。

在被占领的条件下，工人运动具有显著的反法西斯的政治性。工厂和大建筑工地，成了对资本主义剥削者和占领者进行斗争的中心。在各个城市中时常爆发罢工。通过罢工，工人不仅争取实

现经济要求，而且表示出对占领者的愤慨，破坏为占领者进行的生产。

中学成了轰轰烈烈的反法西斯运动的基地。在占领前，学生就突出地表现了爱国民主精神。在各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和领导下，他们成了反对索古政权、反对愚民政策、反对法西斯的坚定战士。此外，他们还是向群众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的桥梁。被占领后，首先强烈地表示对法西斯占领者的痛恨的有青年学生。他们反对和抵制传播法西斯文化，站在反法西斯示威游行和对法西斯进行抗议的前列，宣传战斗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这样，学生就成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的坚强支柱。

被占领后出现的新形势提出的基本任务是：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斗争，粉碎使我国意大利化和掠夺我国的法西斯计划，解放阿尔巴尼亚，赢得民族独立。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有一个革命的领导，这个领导将制定反法西斯斗争的政治纲领，动员和组织人民投入这场斗争。

当时还没有这样的领导。各共产主义小组是仅有的在那种严重的时刻考虑祖国和人民命运的政治组织。这些小组采取了反对占领制度的坚定立场。但分裂状态妨碍了它们制定共同的解放斗争路线，妨碍了它们联系人民群众、领导人民群众。

联合各小组和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的必要性，有力地提到日程上来了。解决这项任务不是轻而易举的。虽然大部分共产主义者现在都感觉到了联合的必要性，但是要消除特别为领导人所助长的意见分歧和分裂行为，仍需克服巨大的障碍。

但是，在联合共产主义力量和组织反法西斯斗争方面走了老路，即领导人之间进行谈判的道路。在这种谈判中，在斗争性质问题上的两条相反的路线，又进行了较量。科尔察小组的领导人一

贯主张组织由所有愿意反对外国占领者的阶级和社会阶层参加的民族解放战争。斯库台小组和其他尚未放弃宗派主义立场的那些组织的领导人，用他们的旧观点来看待新形势。他们认为，意大利占领后，阿尔巴尼亚正在走上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道路。因此，工人阶级的成长就会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基础！

科尔察小组和斯库台小组领导人之间的谈判，导致了一九三九年秋天一个所谓共同“中央委员会”的成立，每个小组各派等数成员即二人参加。这一协议只不过是“一种社会民主党式的妥协”^{〔7〕}而已。它没有规定把各小组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各小组仍然是分离的，各持己见，没有把反马克思主义分子从队伍中清除出去。斯库台小组的领导人仅仅同意开除托洛茨基分子尼科·佐泽。这种由上面进行的、建立在腐朽基础上的“联合”，完全是形式上的联合。

当各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人把整月整月的时间用来谈判时，全国人民的反法西斯运动正在扩大。共产主义者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在国家被占领后，他们的思想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各小组的普通成员越来越认识到，要实现联合，不能靠领导人之间的无效谈判，而要靠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共同斗争。这就使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意见分歧逐步退居次要地位。领导人在小组普通成员中的威信和影响下降了。共产主义者主动投入了反对外国占领者的斗争，成了解放斗争中的鼓动员。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国庆节时，在他们的领导下，在全国各主要城市爆发了群众性的反法西斯示威游行。示威游行是在这样的口号下进行的：“自由的阿尔巴尼亚万岁！”，“不自由，毋宁死！”。共产主义者是工人和青年学生反法西斯运动的鼓舞者和领导者。

“在同占领者和吉斯林分子的斗争和搏斗中，为了一个目的，即为了把国家从占领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团结起

来的各小组基层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彼此血肉相连，忘记了纠葛和仇恨；共产主义者的正确路线正在他们中间形成，他们要求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党，这是组织解放战争和领导这一战争的必要条件。”〔8〕

共产主义者在全国被占领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内在组织反法西斯运动方面取得的成就，激励了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去加强和扩大自己在全国其他地区的活动，消除仍然存在的严重障碍——地方主义。一九四〇年初，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在地拉那建立了一个分部。领导这个分部的就是恩维尔·霍查。

恩维尔·霍查 恩维尔·霍查一九〇八年十月十六日生于纪诺卡斯特市。他在国家处于十分危急的时期度过了自己的童年；那时，纷至沓来的外国占领者烧毁和破坏了许多地区，大肆屠杀人民，到处制造苦难。生活教育了他，使他痛恨祖国的敌人，年轻时就参加了一九二四年的民主运动。

恩维尔·霍查一九三〇年毕业于科尔察中学；在这所中学里，由于和同学们对危害学生的盗窃现象共同组织了一次抗议，他第一次遭到了索古当局的暴力压迫和监禁。

为了接受高等教育，他到了法国。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使恩维尔·霍查成为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者。在巴黎，他同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道报》编辑部建立了联系，为它撰稿，提供揭露阿尔巴尼亚索古政权的材料。

由于助学金中断，恩维尔·霍查不得不前往比利时，在阿尔巴尼亚驻布鲁塞尔领事馆工作了一些时候，同时继续学习。但索古在国外的侦探发现了他的反索古活动。他被解除了工作，被迫于一九三六年返回阿尔巴尼亚。

恩维尔·霍查这时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并且作为共产主

义者献身于人民解放斗争。一九三六年，他在纪诺卡斯特爱国者巴约·托波里墓前宣誓说，他和所有青年将“为一个更美好的阿尔巴尼亚”、“为祖国的昌盛”、“为民族的真正团结”而奋斗。这一誓言成了他的战斗纲领。

恩维尔·霍查起初以地拉那中学教师、后来以科尔察中学教师的身分在国内进行革命活动。他同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了联系，并成为该小组最积极的成员之一。他巧妙地运用学校讲坛，以民主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武装学生。他还成了校外组织“科尔察青年”的主要辅导员之一，成了为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不倦战士。

在法西斯占领前夕，恩维尔·霍查同小组的其他同志一道，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组织人民抵抗。在国家被占领以后，他继续进行了这种努力。他的革命活动被法西斯占领者发觉了，法西斯占领者以“反政府分子”的罪名解除了他的工作。根据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中心的决议，他被派往地拉那，其任务是在牢固的基础上扩大小组的活动，在首都和全国其他地区组织反法西斯运动。

以恩维尔·霍查为首的地拉那分部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了首都共产主义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的重要中心。

恩维尔·霍查重视各共产主义小组普通成员同法西斯进行斗争的决心，重视他们要把共产主义运动联合起来和建党的强烈愿望，耐心地英明地对他们进行了不倦的解释工作和组织工作。同时，他同那些痛恨法西斯占领者并决心同法西斯占领者进行斗争的爱国民族主义者建立了联系。

联合道路上的新困难。

正当联合各小组和建立一个统一的“青年”小组 共产党已成为必需的时候，在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上遇到了新的困难。在国

家被占领以前就开始在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内部形成的一个派别，从一九四〇年二月就开始作为一个单独的小组出现了。它后来称为“青年”小组。为反马克思主义分子的活动创造适宜土壤的因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和其他弱点，助长了这个新的小组的产生。

领导这个小组的是具有明显的托洛茨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分子阿纳斯塔斯·卢拉和萨迪克·普莱姆特。他们利用科尔察小组同它在地拉那的组织缺乏健全的联系这点，使他们网罗的分子相信，科尔察小组的领导没有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能力，该小组领导的思想观点和政治路线是错误的。他们通过吸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很快扩大了自己派别的队伍；一部分是从斯库台小组的领导人那里搬来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即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扎下了根子。“青年”小组在全国主要城市、甚至在科尔察也建立了分部；在科尔察，解散支部引起了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的不满，使他们迷失了方向，“青年”小组就利用了这一点。

“青年”小组开始明目张胆地违背“中央委员会”的共同决定。斯库台小组的领导人原以为这些派别分子是按照他们形式上所属的科尔察小组的指示办事的，因而指责科尔察小组不真诚、不忠实。他们以此为借口，退出了“中央委员会”，从而引起了它的解散。

一九三九年秋天的协议就这样被破坏了。不仅没有达到接近和联合的目的，反而加深了各小组之间的鸿沟。“青年”小组宣布要同科尔察小组进行公开斗争，并同斯库台小组建立了联系。各个小的共产主义组织逐步合并成了三个主要的共产主义小组。

“青年”小组的领导提出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纲领。他们认为，在阿尔巴尼亚没有无产阶级，不存在阶级斗争，因而也不具备建立共产党的基础；农民是保守的、反动的，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者。他们接受了关于教育和保存干部的托洛茨

基主义理论。他们认为，联系群众和做群众工作是有害的，因为这会使干部遭到危险！

这个小组的领导人的政治观点也完全是错误的，是有害于共产主义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的。象泽弗·马拉和尼科·佐泽一样，他们也认为，由于法西斯的占领，资本主义将得到发展，无产阶级将会壮大起来，阿尔巴尼亚工人和意大利工人的团结将会加强，这样，阶级斗争就会开展起来，就将为成立共产党创造条件，这个党将领导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他们不理解迫使苏联同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原因和缔结这一条约的目的，因而认为这一条约对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是有害的。

“青年”小组的领导人及其一部分追随者堕落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宗派。

“火焰”小组同时在阿尔巴尼亚国内建立组织，使“青年”小组成立后所造成的混乱更加严重了。托洛茨基分子安德烈·齐西曾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名义，对在雅典的希望回国拿起武器反对意大利侵略的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青年百般进行阻挠，后来，他为了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回到了阿尔巴尼亚。他在科尔察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在地拉那和发罗拉成立了“州委员会”。小组的全部工作集中在“教育”自己的成员方面。

安德烈·齐西发明了一种新“理论”，认为法西斯的堡垒应该从内部夺取，所以共产主义者应渗入到占领者的政治机构和行政机构中去，而不要公开进行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在贝德里·斯巴修的煽动下，某些共产主义者军官也接受了这种观点。

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和人民对法西斯侵略邻国人民的态度 当阿尔巴尼亚各小组中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正在反对法西斯和托派、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而斗争的时候，意大

利于一九四〇年六月参加希特勒德国方面作战。意大利法西斯还企图引诱阿尔巴尼亚人，让他们充当炮灰。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意大利军队从阿尔巴尼亚出发，对希腊发动了进攻。他们取得一些初步胜利后，在希腊军队的打击下被迫撤退，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从科尔察撤退，十二月初从纪诺卡斯特撤退。

意大利和希腊的战争给阿尔巴尼亚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和破坏。阿尔巴尼亚人民不仅没有支持法西斯对希腊的侵略，而且尽一切可能支援了兄弟希腊人民的解放战争。共产主义者开展了一个广泛的宣传运动，揭露法西斯的帝国主义阴谋，指出法西斯制度的腐朽性。他们号召那些被强拉入伍的阿尔巴尼亚士兵和警察从前线逃走，号召青年不要前往招兵站应征，而应逃往山区。共产主义者和反法西斯爱国者的工作，使法西斯对阿尔巴尼亚人进行军事动员和“民政动员”的计划彻底破产了。被意大利法西斯强行派往希腊前线的阿尔巴尼亚士兵拒绝作战，大量逃跑。在后方，破坏法西斯军事机器的活动也更加频繁了。希腊部队占领地区的人民把意大利法西斯看成共同的敌人，因而尽一切可能帮助希腊部队。但是希腊政府对阿尔巴尼亚人民采取了赤裸裸的沙文主义态度。它阻碍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在反对法西斯占领者斗争中实行战斗团结，力图实现大希腊资产阶级并吞科尔察和纪诺卡斯特的老计划。

科尔察共产主义者也遇到了希腊占领当局的这种敌对立场。意大利军队从这里撤走以后，共产主义者成立了“城防委员会”，并由小组的共产主义者和同情者组成了一支维持治安的小小的武装力量。“城防委员会”和希腊军事当局第一次接触时，就在希腊占领的性质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委员会拒绝了雅典的要求：把希腊军队的到来看成是“希腊的科尔察获得解放”。希腊人没有接受委员会的要求：建立几个高举本国国旗、同意大利占领者进行战斗的阿尔巴尼亚营。希腊人强迫委员会解散。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独立日，共产主义者在科尔察市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便提高人民的士气，并向希腊政府表明，科尔察象阿尔巴尼亚全国人民一样，痛恨意大利法西斯，但也不接受希腊沙文主义者对阿尔巴尼亚领土的要求。

希腊对南部地区的占领，没有持续很久。一九四一年春天发生的事件，完全改变了巴尔干的形势。希特勒德国在占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以后，派遣部队侵入芬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一九四一年四月，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几天之内，德国军队就占领了这些国家，并使意大利军队能够重新占领阿尔巴尼亚南部和侵入希腊。

在意大利和希腊战争期间，阿尔巴尼亚变成了战场，这一战争在这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人员的损失、物质上的巨大损失和占领者的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加强，使人民群众的处境大大恶化了。意大利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清楚地说明了意大利法西斯的腐朽性，并使它在阿尔巴尼亚人民面前威信完全扫地。

意大利扩大了它的占领区，建立了“大阿尔巴尼亚”，其中也包括一九一三年在伦敦举行的帝国主义国家大使会议划给塞尔维亚的一部分阿尔巴尼亚领土。为了确保在巴尔干的阵地，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占领者煽动巴尔干国家旧的民族纠纷和反动阶级的沙文主义情绪。但共产主义者和全国人民没有陷进法西斯蛊惑宣传的圈套。他们依据各国人民的自决权的原则，揭露了关于“大阿尔巴尼亚”的挑衅政策，遵循了同法西斯占领者加紧进行斗争、同邻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解放斗争中进行合作的道路。

共产主义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团结 在阿尔巴尼亚建立起来的法西斯制度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它进入了日益加深的政治危机时期，这种危机的表现之

一就是它无法镇压人民的反法西斯运动。一九四一年春，由爱国者穆斯里姆·佩萨领导的支队已开始进行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武装活动。为了报复该支队在三月和五月所采取的行动，占领者在佩萨进行了第一次扫荡。阿尔巴尼亚部队中开始发生大量逃跑的现象。五月，人民对外国压迫者的痛恨，表现在一次有意义的行动中。青年瓦西尔·拉奇在首都的中心，用手枪对来阿尔巴尼亚访问的意大利国王维克托·恩马奴伊尔三世进行了射击。

在阿尔巴尼亚，革命形势正在日益成熟。法西斯占领者增强了镇压措施。他们逮捕和监禁了数以千计的爱国者。其中一部分人，为逃避警察的迫害或征兵，逃进了深山，单独地，或者组成武装小组进行反对敌人的活动。

恩维尔·霍查和他的同志们肯定了佩萨爱国支队的意义，决定派遣共产主义者加入它的行列，使它具有组织性，提高它的战士的政治觉悟。恩维尔·霍查同穆斯里姆·佩萨会见时，穆斯里姆·佩萨高兴地接受了向支队派遣共产主义者的建议。

共产主义者上山组织和扩大民族解放运动，标志着他们的活动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共产主义者倡议并努力在全国其他地区也组织武装的反法西斯运动。

他们正在大规模地展开在人民群众中的宣传工作。除了个人的鼓动工作外，开始在城市散发、后来也在农村散发的传单、呼吁书，在共产主义者联系群众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其中一部分提出了一些有政治错误的口号：“为苏维埃阿尔巴尼亚而斗争”，“为共产主义阿尔巴尼亚而斗争”，“组织阿尔巴尼亚红军”，这些口号来源于对阿尔巴尼亚的形势的不正确的估计。

这时，运动的发展和共产主义者对联合的坚决要求，推动了科尔察小组和斯库台小组为建立合作而进行新的尝试。为了内部的和睦和协调反法西斯行动，双方建立了一个“仲裁委员会”，作为

过渡到完全联合的第一步。但这一尝试也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

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在地拉那的分部，在共产主义者和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当中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同他们建立了牢固的联系。恩维尔·霍查在使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尽快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党的热望的鼓舞下，并没有在“青年”小组和“火焰”小组分子的派别活动造成的新困难面前退却。他同斯库台小组杰出的活动家瓦西里·尚托和捷玛尔·斯塔法找到了共同的语言。恩维尔·霍查领导的地拉那分部逐渐成了阿尔巴尼亚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的真正组织中心。各小组中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都团结在这个分部的周围。他们是将要成立的共产党的基础。

正当阿尔巴尼亚人民对法西斯的抵抗日益增强，共产党人领导的强大民族解放运动在被法西斯占领的其他国家也已开始展开时，一个重要的事件根本改变了国际政治局势。希特勒德国利用被奴役国家和它的卫星国、同盟国的经济资源和人力，在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后，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背信弃义地对苏联发动了进攻。德帝国主义决定消灭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希特勒被在西欧和巴尔干轻易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妄图迅速打败苏联。

苏联人民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投入了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伟大卫国战争。这场正义战争开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阶段，加强了各国人民反对法西斯集团的斗争的反法西斯解放性质，奠定了把世界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团结在一条统一战线中的基础。

苏联和希特勒德国之间的战争，是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全世界被剥削群众，都希望苏联战胜国际法西斯反动派。被奴役国家的人民，理所当然地把苏联看成是将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进行到他们从法西斯占领者统治下

获得解放的主要保障。两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美国政府，面临着象希特勒德国这样的危险敌人，在要求建立强大反法西斯同盟的本国人民越来越大的压力下，同苏联结成了联盟。这样，希特勒企图孤立苏维埃国家的阴谋就失败了。这个伟大的反法西斯联盟的主力是苏联，没有苏联，就不可能战胜敌人。

法西斯对苏联人民的背信弃义的进攻和伟大卫国战争的开始，在阿尔巴尼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已向苏联宣战的意大利占领者和我国反动派被纳粹分子的初步胜利冲昏了头脑，当他们掀起狂热的反苏反共高潮时，阿尔巴尼亚广大爱国者对希特勒的侵略表示愤慨。

阿尔巴尼亚爱国者对苏联的热爱是有其历史原因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反对外国压迫者的长期斗争中，差不多总是孤军作战，没有同盟者。资本主义国家，要么对阿尔巴尼亚人民采取公开的敌视态度，要么装成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朋友”，以便暗中对他们进行伤害，把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只有苏联维护了阿尔巴尼亚的权利，谴责了危害阿尔巴尼亚的不公正的行为。随着苏联参加反法西斯战争，阿尔巴尼亚人民在自己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强大的、真诚的战友和同盟者，象其他被压迫人民一样，有了必然击溃法西斯集团的坚强保障。

恩维尔·霍查同志说：

“我们的斗争不是在苏联参战后才开始的，但是在苏联参战后，我国人民就感到自己的鲜血不会白流了。”⁽⁹⁾

在以苏联为先锋的各国人民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后出现的新形势下，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尽快地使阿尔巴尼亚人民具有政治领导，成立共产党，这是组织、领导和扩大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的基本条件。没有别的途径；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除共产主义者外，谁也担负不了这样的任务。各

小组坚定的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者非常理解这点。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之间虽有思想分歧,但是对祖国、对苏联的无限热爱使他们团结起来了。这是使他们接近和紧密合作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这样也就开始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现在

“……特别是在下面,比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各小组之间的无益争执给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巨大危害,感觉到迫切需要结束这种争执、为在阿尔巴尼亚实现运动的统一创造必要条件”。〔10〕

反法西斯斗争很快就大规模开展起来了,这一斗争将使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在反对占领者和本国卖国贼的战斗中,各小组的大部分成员彼此建立了联系。希特勒对苏联发动侵略后,斯库台小组的领导人也不能违背基层共产主义者要求进行斗争的愿望了,他们曾表示过这样的看法:“等苏联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主义者再投入战争”。现在,捷玛尔·斯塔法和瓦西里·尚托在斯库台共产主义小组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他们已开始同恩维尔·霍查相配合。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路线,已成为这一小组的占统治地位的路线。在这一时期给小组成员的指示中说:“你们,热爱自己国家的人们,到群众中去,取得他们的同情,同他们商量,使他们对武装的民族运动有所准备。”〔11〕

共同的政治路线使斯库台共产主义小组同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接近起来,并能于一九四一年八月达成关于合作和共同组织一系列反法西斯活动的协议。后来,“青年”小组也赞同这一协议,而“火焰”小组却不响应关于合作的呼吁。在各小组共同采取的反法西斯行动中,最重要的是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即法西斯“向罗马进军”的周年纪念日,在地拉那组织的大规模的反法西斯示威游行,首都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恩维尔·霍查是这次示威游行的主要组织者。法西斯进行了猖狂的反扑。受

到法西斯追踪的恩维尔·霍查，被迫转入地下。法西斯当局缺席判处了他的死刑。地拉那的示威游行是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团结的试金石。它表明了这种团结在反法西斯斗争的烈火中的力量和它对动员人民群众投入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大意义。

地拉那示威游行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八日在科尔察又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游行也是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是为了抗议法西斯在首都的大规模逮捕。它最后变成了同法西斯宪兵和警察的浴血搏斗。在搏斗中，科尔察小组的老成员科奇·巴科牺牲了。

这些示威游行的政治胜利，对全国公众舆论有着巨大的影响。它进一步提高了共产主义者在人民中的声誉。另一方面，这些示威游行的胜利使法西斯占领当局极为不安。法西斯分子明白，他们要对付的反对者正在壮大和加强，对他们的威胁越来越大。

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通过自己的斗争终于为建党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各共产主义小组内部，职业革命干部已成长起来，他们能够抛弃小组的分歧，坚决接受对法西斯占领者和本国卖国贼进行不妥协斗争的路线，并为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个基础上联合起来而斗争。这些干部以自己不倦的斗争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好了准备。

各小组共产主义者的反法西斯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一直占上风的宗派主义和小组习气。他们的这一斗争和共同的思想体系，成为各主要共产主义小组于一九四一年八月达成关于召开各小组代表会议的协议的决定性因素，这次会议将解决这些小组合并和成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问题。

五、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成立

各共产主义小组建党会议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八日至十四日

在地拉那秘密举行。十五人参加了会议。他们当中有恩维尔·霍查、捷玛尔·斯塔法、瓦西里·尚托、皮洛·皮里斯特里等。

会议一开始就在原则上解决了主要任务。十一月八日，作出了合并各小组和成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历史性决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每个小组活动的报告，指出了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就和缺点，讨论了党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多数代表表示决心要结束分裂局面，建设一个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具有巩固的团结的、有一条战斗政治路线的、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只有“青年”小组的主要领导人和代表阿纳斯塔斯·卢洛、萨迪克·普莱姆特竭力阻挠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敢公开反对合并共产主义小组，因为基层坚决要求实现这样的合并。但是，他们提出了他们小组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他叛徒的众所周知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并且为这种观点进行辩护。他们特别力图证明：“还没有产生无产阶级”，“农民具有反动性和保守性”，“缺乏经过培养的干部”，“公开的反法西斯宣传鼓动对干部会造成危险”，“依靠苏联的援助和支持是徒劳无益的”。他们企图以此造成一种概念：建立一个统一的共产党是形式主义的东西，这个党永远不能成为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领导者，永远不能领导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恩维尔·霍查在捷玛尔·斯塔法和其他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会议参加者的支持下，对这种取消主义论点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阿纳斯塔斯·卢洛和萨迪克·普莱姆特看到自己已被驳倒，便表面上同意服从多数，并保证执行会议的决议。

共产主义小组会议规定了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研究了党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总路线的基本问题。

选举了由七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为党的领导机构。虽然没有规定任何人为书记，但恩维尔·霍查受委托领导临时中央委

员会。

按照大家同意的条件，过去各小组的任何主要领导人（组长、副组长）都不得选进党的领导机构。这不是一项简单协议的结果，而是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各小组的领导人都有浓厚的小组习气，长期成为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党的巨大障碍，并已表明他们没有领导共产主义者和革命群众的能力。

党的思想基础 会议谴责了特别是由拉扎尔·丰多竭力在阿
和组织基础 尔巴尼亚散布的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揭露了“火焰”小组——它力图使自封“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合法化——的彻头彻尾的托洛茨基主义路线和活动，并断然决定，要把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作为新型政党建立和巩固起来：

“党不应是旧式的、同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二国际的党相似的党，在第二国际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倾轧、消极、小圈子主义、派别活动和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我们需要一个能领导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走向胜利的党……”〔12〕

同时，会议还批驳了各共产主义小组队伍中存在的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背道而驰的各种错误观点。特别谴责了“干部理论”，认为这是失败主义的和机会主义的论调，它使共产党人脱离人民群众，成为群众的尾巴，把共产党人变成一个宗派，最后取消党。

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承认为先进的理论，党在制定纲领时以及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将遵循这一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任务是：

“我们应大力坚持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提高干部的水平……”〔13〕

临时中央委员会受委托把反马克思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材料从各共产主义小组的文献中清理出去，用阿尔巴尼亚文出版《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许多著作，并组织散发和学习。

所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一开始就高度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把这看成是一种这样的力量，它能使工人运动、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解放运动蓬勃开展，给这种运动开辟远景和指出胜利的道路。

会议决定永远消除各共产主义小组在组织上的腐败状况、纪律性不强的现象、派别和小组习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健全的组织基础上建党。健全的组织工作，被认为是使党坚不可摧、保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主要手段。

第一项任务是各共产主义小组领导把它们同自己成员的全部联络关系移交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从此，共产主义者必须遵守的唯一的组织准则就是这次会议和中央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即民主集中制原则规定的组织准则。

为了代替由两三人组成的狭隘的旧支部，指示在最短时间内建立新支部。过去各小组的成员，在把他们队伍中具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机会主义倾向、小组习气的人清除出去以后，可参加新支部。在成立支部的同时，成立各州党的委员会。在委员会和支部之间，必须建立牢固的联系。会议要求，各支部应尽量发挥主动性，深入城乡广大群众，各委员会应经常帮助和检查支部的活动。

同时，会议认为，为了加强党，必须吸收新鲜血液，用新的成员，用坚定的战士、工人、贫苦农民扩大队伍，消除在吸收他们的工作当中的顾虑和宗派主义。

在党员资格问题上，大家接受了列宁的著名公式，会议是这样表述这一公式的：

“只有承认纲领、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支部)和交纳党费的人,才能成为党员。”〔14〕

党的团结和纪律问题,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大敌当前,没有钢铁般的纪律和党的团结,我们党就不可能成功地领导斗争。”〔15〕

为了保证牢固的团结和坚强的纪律性,就要共产党员保持警惕,要防止那些不遵守纪律和为反党活动准备土壤的、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习气的野心家、阴谋家混入党内。同时责成各级党组织要毫不犹豫地一切具有反马克思主义、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倾向的人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强调小圈子、集团、派别和无纪律的现象在党内不能有存在的余地。

会议讨论和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党同群众的联系问题。坚决要求一定要消除各小组在这方面的毛病。

会议指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员千万不要忘记斯大林的话:

“共产党员只要不脱离人民,即不脱离生育他们的母亲,他们就是不可战胜的。”

为了联系城乡广大群众、广大青年和妇女,为了使他们相信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会议向共产党员指出了这一途径:对各阶层人民进行富有战斗性的、经常的宣传鼓动;最积极开展政治活动和战斗活动;用党对群众的组织工作来配合政治解释工作,配合政治活动和战斗活动。

为了保证同群众建立牢固的联系,会议要求在对青年和妇女的工作方面实现一个转变,消灭拖拉现象、宗派主义和各小组在这方面的其他错误。临时中央委员会受委托采取措施,尽快建立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通过这一组织动员阿尔巴尼亚全体青年投入反法西斯斗争。在对妇女的工作方面提出的任务是要进行过细的工作,吸收劳动妇女入党,动员妇女群众投入解放斗争。

会议还特别注意保卫党不受那些力图把它搞垮的敌人的打击。意大利法西斯占领者及其阿尔巴尼亚走狗把主要矛头指向共产党，他们反对党比反对各小组更加激烈。在这方面，他们也得到了“火焰”小组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主义的叛徒们的帮助。因此，会议提出任务：党员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要不惜牺牲一切地保护党的机密，要完全保密，要使党学会在非常秘密的条件下工作。在这方面，各小组中的一些机会主义者和叛徒的观点遭到了强烈的谴责，他们说什么共产党员在面临拷打时，也可以向警察和宪兵进行招供而不构成什么叛变行为。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同无产阶级政党格格不入的，应该无情地加以粉碎。

会议要求共产党员严格保密，同时又提醒注意，对此应有正确的认识，保密不应成为限制在群众中进行活动的原因。

“我们保密是为了保护组织，反对敌人，而不是为了隐藏在幕后，把自己关在房子里。”〔16〕

民族解放战争 党的政治路线在各共产主义小组会议上规定的政治路线 的政治任务中得到了体现。党在国家所处的历史时期的战略目标被确定为：

为争取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民族独立、为在摆脱法西斯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建立人民民主政府而斗争。〔17〕

这一战略目标是根据当时在阿尔巴尼亚存在的对抗性的基本矛盾，即人民和法西斯占领者之间的矛盾规定的，为了消除阻挠全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障碍，就迫切需要解决这一矛盾。还存在另一个矛盾：人民群众和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在当时，这一矛盾已退居次要地位。尽管这样，在具体条件下，这一矛盾不可能脱离对抗性的基本矛盾单独地得到解决，因为地主、宗族首领和反动资产阶级是占领者在我国的社会支柱。我国主要剥削阶级的利益同法西斯占领者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要实现党的战略目标，不可能不触动这些阶级——外国奴役者的走狗的利益。

意大利法西斯是阿尔巴尼亚的全权统治者，因而他们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当时的**主要敌人**。而所有那些站在占领者一边、为占领者压迫阿尔巴尼亚人民效劳的人，被称为卖国贼、法西斯的走狗，对他们同对占领者一样进行了斗争。

遭到最沉重的法西斯奴役的**工人和农民**，是对达到这一战略目标的最关心的主要力量。因此，党给自己规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

“建立和扩大城乡劳动群众之间的战斗团结”。〔18〕

爱国的非劳动者阶层也关心争得民族独立。因此，党不能忽视这些阶层，并提出了要为动员这些阶层投入民族解放运动而不断进行工作的任务。

“……**联合一切真正热爱自由的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者**〔19〕，**联合一切愿意反对法西斯的正直的阿尔巴尼亚人**”。〔20〕

这就提出了关于**民族解放阵线**的思想，这一思想在战争的发展过程中变得更加深刻了，表现形式也更加明确、更加具体了。

共产主义小组会议预见到法西斯占领者和国内反动派会利用一切手段来阻止阿尔巴尼亚人民实现战斗的团结，因而指示要揭露和粉碎意大利法西斯和吉斯林政府企图分裂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切阴谋诡计。

共产党成立时，阿尔巴尼亚没有任何能代表资产阶级或其他阶级、阶层的利益的反法西斯政党。尽管这样，会议原则上表示赞成共产党同其他反法西斯政党在组织反对占领者的斗争问题上进行合作，如果有这样的党成立的话。

在解放国家和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人民民主制问题上，共产主义小组会议得出结论：在具体情况下，进行反法西斯**武装起义**是真正的、可靠的途径。会议决定：

“……在政治上、军事上使人民对发动武装总起义有所准备，把所有爱国的、反法西斯的力量都投入到斗争中

去”。〔21〕

党在选择武装总起义作为斗争的主要形式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其他的斗争形式，即罢工、反法西斯示威游行、进行破坏、用口头和文字揭露敌人，等等。但所有这一切形式，都是为了使人民对武装总起义作好准备。

组织武装斗争，要求必须准备**武装部队，即民族解放军**。会议指出，不建立一支能不断打击敌人和粉碎敌人的军事政治机构的真正的人民军队，武装起义就不可能想象，就谈不上解放国家、赢得民族独立和建立人民民主政府。

在阿尔巴尼亚被占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武装起义不可能仅仅是一次和一下子发生的行动，革命的人民军队不可能一下子建立起来。进行武装起义和建立民族解放军，将是一个完整过程。这一思想明确地反映在会议规定的一项政治任务中，即组织游击运动，建立战斗小组，建立游击支队，并以此作为未来人民军队的骨干，作为准备进行总起义的现实基础。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还根据自己的战略目标，根据苏联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中发生的情况，规定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国外同盟者和对这些同盟者的立场。

在国际范围内，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阿尔巴尼亚人民通过自己的斗争，使自己加入了伟大的反法西斯同盟最积极的成员的行列。

关于这个问题，共产主义小组会议确定，苏联、英国、美国和正在反对共同敌人——德、意、日法西斯——的被奴役的各国人民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同盟者。会议提出了**把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同世界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联系起来的任务**。

党对苏联同英国、美国的同盟作了十分正确的评价，认为这是使世界免遭法西斯奴役危险的形势所要求的军事同盟。同时，党对各同盟者作了不同的估计，决定对它们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号召阿尔巴尼亚人民，首先

“应把我们的民族解放战争同站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列的苏联的英勇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22〕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把苏联看成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忠实而真诚的同盟者，苏联也将帮助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而英国和美国只不过是反法西斯斗争中的暂时同盟者。

共产主义小组建党会议提出的任务，是要宣传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先锋作用，同时宣传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大胜利，以“加深对苏联的热爱”。

会议还指示，“要加深阿尔巴尼亚人民对巴尔干所有人民，特别是对”已经投入反法西斯解放战争的“塞尔维亚人民、希腊人民、黑山人民和马其顿人民的热爱，增强同他们的紧密战斗合作”。

最后，会议表示相信，新成立的共产党将在短时期内，消除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不健康的状况，将使自己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将能完成它作为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斗争的领导者的伟大历史使命。

共产主义小组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建立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政党，新型的党。

会议以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祖国和社会主义的要求与愿望的明确政治纲领武装了党。这一纲领还不完整，所提出的任务还没有经过详细的研究，因为要做到这点，还需要党和人民群众在革命工作和斗争中取得更广泛的经验。但这一纲领是建立在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的。

会议的结果标志着在阿尔巴尼亚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托洛茨基主义、机会主义的胜利。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首先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同时也负有保卫所有劳动群众、被奴役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利益的责任。因此，党的成立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胜利。

由于这一切原因，共产主义小组会议具有一次建党代表大会的意义。

一九三一年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

党在完成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时，面临着十分巨大的困难和障碍。

党从它的前身各共产主义小组那里继承下来的同群众的联系,是十分薄弱的。

残酷的恐怖局面笼罩着全国。意大利为维持占领制度而在阿尔巴尼亚驻扎的军队达十万人左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穆斯塔法·克鲁亚主持吉斯林政府，他是法西斯的老牌走狗和奸细，被称为破坏共产党组织、镇压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铁腕”人物。第五纵队、为占领者卖力的“火焰”小组头目和其他敌人，阻挠着党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全部活动只能秘密进行。

党没有武器、没有财力、没有军事干部来开展武装斗争。

它作为刚刚建立的党,没有足够的政治领导经验,党员缺乏深刻和广泛的理论素养。

但是，这些为中央委员会和阿尔巴尼亚所有共产党员所洞悉的障碍、困难，阻止不了党奋勇前进。党没有选择错误的等待办法，即先培养干部，寻求武器和金钱，积累经验，在理论上进行提高，然后才开始工作和斗争。所有这一切都将根据本国出现的革命形势，依靠人民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依靠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整个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在斗争中得到解决。对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必将胜利，首先对苏联必将战胜法西斯的信心，进一步加强了党必将成功地完成自己任务的信念。

初步的组织措施 最迫切的任务是组织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分别到各州建立新的支部，组织党代表会议，成立州委会。从过去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选择出来的约二百名共产党员参加了支部。建立了八个州党委会。其中多数是由党代表会议产生的。共产党员在支部和代表会议中大力支持各小组的合并和把它们联合成一个统一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他们早就有这个要求。他们接受了共产主义小组会议制定的党的政治路线，表示决心在临时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不遗余力地进行斗争。

最初一些支部几乎都建立在城市。第一批党员主要是工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每个党支部都建立了教育小组，由那些忠于人民和共产主义事业、被认为有可能发展为党员的人参加。还建立了同情者小组。

一九四二年一月，组织党的工作差不多已经结束。

在这一时期，临时中央委员会还采取了建立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措施，这个组织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各共产主义小组所属共产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会议上成立。党中央委员捷玛尔·斯塔法被选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政治书记。共产主

义青年联盟是在中央委员会和恩维尔·霍查同志亲自直接关怀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重要任务是要作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最忠实、最坚强的助手，以爱国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思想对阿尔巴尼亚广大青年群众进行教育，动员这些群众投入反法西斯解放战争。阿尔巴尼亚青年蕴藏着无穷的革命毅力。党把他们看成是最有朝气的反法西斯革命力量的最大源泉。在回答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成立时给阿尔巴尼亚党中央委员会的致敬信的时候，恩维尔·霍查同志写道：

“党寄予最大希望的是，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将不辜负我们年轻的党对它的信任，将善于以革命的方式去完成赋予它的崇高使命……它将坚决与党同心同德，以革命的方式组织和领导被奴役的阿尔巴尼亚青年走向光辉的未来，走向从法西斯奴役的中世纪桎梏下获得解放，走向进步、文明和欢乐的新生活。”〔23〕

为了提高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成员的思想水平，在党支部、教育小组、同情者小组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积极分子会议中组织学习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

首要任务是 共产党在为奠定和巩固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而**联系群众** 努力的同时，还全力进行工作，联系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相信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它把这一任务放在第一位，认为这是解决团结和动员人民参加斗争问题的关键。

党成立后，临时中央委员会立即向全阿尔巴尼亚人民发出了响亮的号召：

“我们号召所有真正热爱阿尔巴尼亚的正直的人们，联合我们的一切力量，为我们的民族解放战争服务。公开

斗争是对占领者的唯一态度。祖国的每个儿子都应该是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士。为了战胜敌人，我们的斗争应该是有组织的、团结一致的、强有力的……

大家都投入到统一的斗争中去吧！争取民族解放，反对法西斯占领者！”〔24〕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十分注意利用报刊和口头的宣传鼓动。中央委员会不断向阿尔巴尼亚人民或分别向农民、军人、妇女、青年发出号召书、传单。各州党委也向人民发出号召书、传单。从一九四二年初起，党的地方组织还出版了关于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情况的公报和定期通报。

阿尔巴尼亚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集团或组织，象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对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妇女、军人开始进行的宣传鼓动那样，进行过如此广泛和富有战斗性的宣传鼓动，其思想内容是如此健康、明确和易懂。党通过这种不倦的工作，使人们明了它的总路线，阐明国际国内形势，宣传苏联和红军的英勇斗争，揭露法西斯主义、意大利占领者、希特勒侵略者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叛徒。

在各种宣传鼓动形式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是口头鼓动——同一些人个别谈话，或集体谈话，在工人、农民和青年会议上讲话。这种鼓动形式产生了最满意的效果。共产党员深入到一切有群众的地方。为了深入到人民当中去，他们运用了可能运用的一切方式方法。他们广泛地利用了一切新老关系、全国性和群众性节日、婚礼、集市日、亲友关系等。

临时中央委员会根据党的总路线提出了主要口号，并通过党的刊物、反法西斯示威游行和口头鼓动予以传播。口号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为人民所理解和接受。“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这一口号，成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基本口号。

由于党的宣传工作的结果，团结起来和对占领者展开有组织的斗争的必要性，开始为大家所了解。这特别激起了广大青年的革命热忱。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成员捣毁了意大利法西斯建立的青年体育文化协会，建立了直接由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领导的新组织。

富有战斗性的宣传鼓动，是争取群众的十分有力的武器，但这还不够。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从各共产主义小组工作的缺点中吸取了十分有益的教训，它一开始就很清楚，群众是通过很多事实，通过很多直接符合他们的要求、利益和愿望的具体行动来了解和接受党的主张的。

起初，特别是在农村，有一部分人不理解共产党员的目的和政治活动，因为对党还不很了解，还有资产阶级宣传造成的对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的偏见。

中央委员会指示各州党委会尽量组织和进行政治活动和战斗活动——反法西斯示威游行、罢工、破坏、武装行动等，把这些活动作为加强党和联系群众的最重要的手段。中央委员会要求共产党员成为英勇、坚决、忠于人民和祖国的模范。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和一九四二年初，在各州党委会的直接领导下，几乎在所有城市都建立了战斗小组，并开展了活动。第一批战斗小组是由共产党员、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成员和同情者组成的。这是由五至十人组成的武装小组。战斗小组成员一般不是秘密的。

一九四二年初，战斗小组在地拉那、科尔察、发罗拉、斯库台、纪诺卡斯特和其他城市击毙了数十名意大利法西斯军官、高级官吏和阿尔巴尼亚奸细、卖国贼。他们袭击和破坏敌人的仓库及其他军事设施。在州委会的领导下，斯库台、地拉那、都拉斯、爱尔巴桑、发罗拉等地举行了反法西斯示威游行。在同敌人的搏斗中牺牲在前的是共产党员。

战斗小组的战斗活动不仅仅是为了给敌人造成损失，而首先

是为了使民族解放运动在政治上有所收获，对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起到作用。

武装行动和反法西斯示威游行，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员的热爱，迅速提高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威望。共产党员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表现的罕见的英雄气概和成熟性，使群众同党日益靠拢，使人民相信党的话。

一九四二年初，党中央指示，在创造必要的条件以后，特别是在农村奠定了运动的基础以后，应立即采取措施，组织游击支队。与战斗小组相比，支队将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党用组织人民的工作来配合战斗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政治军事行动。党不是从建立群众组织来着手这一工作的，因为要进行这样的组织工作，群众需要事先在政治上有所准备。在组织人民方面采用的初步形式有：党员、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成员、同情者同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妇女、中学生的个人联系，青年体育文化小组，妇女手工训练班，政治学习会。通过这些形式，保证群众参加秘密的集会和会议，进行政治解释工作，使群众积极参加反法西斯运动。

一九四二年二月，党中央第一次发出了建立民族解放会议的指示，并把这作为组织和动员人民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手段，同时作为“我国未来政府的雏形”〔25〕。民族解放会议是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十分重要的环节，是把他们团结到民族解放阵线中的环节。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对爱国的民族主义者采取的正确立场，对于党联系人民具有特殊的意义。一部分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在各阶层的人当中，特别在农村是有影响的。同正直的民族主义者合作，就能争取在他们影响下的群众参加斗争。党中央和各州党委会对民族主义者的工作是十分细心、耐心和讲究策略的。它们把这一工作看成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争取与民族主义者团结和真诚合作的同时，始终注意到他们一部分人的表现是不坚定的、动摇的，在进行革命斗争和使国家民主化方面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注意到他们中某些人表现的同帝国主义者妥协的倾向。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克服那些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没有参加民族解放战争，但也没有勾结法西斯占领者的民族主义者的不稳定性，抵消他们的影响。

在群众工作方面，还组织了为党和民族解放战争募集支援物资的工作。除了人民以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帮助党和民族解放战争解决财政物质需要。而工人、手工业者、农民、中小商人、教师和其他每一个爱国者，用钱或物品志愿给党的各种支援，不管这种支援多么微小，但都是赞同党的路线的表示，也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各级党组织发起的为党和民族解放战争募集支援物资的运动，也是对人民进行广泛的政治解释工作的手段。例如一九四二年一月就以“共产党周”的名义在整个阿尔巴尼亚组织了这样的运动。

共产党影响的扩大，它在群众中威望的提高，战斗小组的英勇行动和反法西斯示威游行，使法西斯占领者和卖国贼惊恐万状。占领当局和吉斯林政府慌慌张张地采取了一系列企图搞垮共产党的特别措施。它们发出了要实行“反对颠覆分子的强硬政策”和建立戒严制度的特别命令。

另一方面，意大利奴役者玩弄欺骗阿尔巴尼亚人民、特别是民族主义者和青年的新手法。法西斯宣传机器把民族解放运动说成完全是“共产主义的”、“反民族的”运动。穆斯塔法·克鲁亚力图使公众舆论相信，法西斯意大利是“大阿尔巴尼亚”的缔造者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民族独立的保卫者！墨索里尼给意大利驻地拉那总督发出指示，要“给阿尔巴尼亚人以更多的自治权”。占领者决定去掉阿尔巴尼亚国旗上的法西斯的标记和萨伏依的王冠，因为

他们认为这些标志是引起“阿尔巴尼亚爱国者愤怒和造反的原因”。他们在“阿尔巴尼亚法西斯党”的名称上加上了“国民”二字。

但是法西斯的恐怖行动和蛊惑宣传阻挡不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威望的提高。

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成绩就很显著。尽管这样，这些成就不能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在共产党员的工作中，还有过去遗留下来的毛病——宗派主义。组织工人的工作做得很少，而对农民的工作中存在着更大的缺点。各小组队伍中那种认为农民不属于共产主义者工作范围的旧观点，大大妨碍了正确理解农民同党联系和农民踊跃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定性意义。有很多党员不愿去农村，他们等待农民进城后再对农民进行工作。

中央委员会指出，妨碍党的活动的，不仅有小组老一套的工作方法残余，而且还有继续存在着的浓厚的小组习气，托洛茨基分子阿纳斯塔斯·卢拉和萨迪克·普莱姆特及其同伙、过去“青年”小组成员所进行的反党派别活动。

种种迹象表明，党内正在形成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危险思潮。

小组习气和托洛茨基分子在党内的敌对活动，是扩大和加强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团结他们、使他们加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障碍。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 积极分子会议 为了克服这些障碍和促使党的工作进入新的高潮，临时中央委员会召开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积极分子会议。

会议于一九四二年四月八日在地拉那开幕，在恩维尔·霍查同志的主持下进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各州委会的政治书记和组织书记以及其他一些党员。党密切联系群众和组织动员群

众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问题，是所讨论的全部问题的中心。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积极分子会议指出了党的政治工作的成就，并指出，在阿尔巴尼亚

“关于总起义的思想正在形成和增强，人民开始懂得，他们必须而且可以只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解放，同时把自己的斗争同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的斗争以及同被奴役国家的斗争联系起来”。〔26〕

但是，已取得的成就，被认为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如果没有受到小组习气的干扰，如果纪律不遭到破坏，如果不坚定的分子和派别分子不散布他们的错误理论，那么，党同群众就会建立更为广泛、更为牢固的联系。

会议认为，党组织同工人群众的联系还不那么牢固，这是不能允许的。

会议指出：

“工人应该是我们党的基础，离开了工人，我们党怎么能**是坚强的呢**？”〔27〕

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任务是：共产党员应对工人进行不倦的政治解释工作和组织工作，以便最大限度地加强他们在党的周围的团结，从中培养民族解放战争领导干部。

积极分子特别注意争取农民群众、动员农民群众参加斗争的工作。克服在这方面遇到的困难的条件是：共产党员必须反对对农民的旧观念和失败主义观点，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的生活，善于体察他们的疾苦和问题。

会议指示各级党组织要消除对青年、妇女工作中的一切旧的框框，改进和加强在这方面的活动。青年和妇女应该成为党的**坚强依靠**。

积极分子认为，中央委员会把政治活动和战斗行动放在第一

位的做法是正确的。

“没有行动就没有共产党。……培育和加强党的是行动和斗争，如果不向人民证明我们是能领导他们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联系人民。”〔28〕

为了扩大武装斗争，会议认为迫切需要加强战斗小组和建立游击支队。

在会上，关于把人民群众团结到民族解放阵线当中和建立民族解放会议的思想，更加具体化了。

会议认为，密切联系群众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力量 and 能力的最好标志，是它的政策正确的最好标志，是保护党免受敌人打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积极分子使党集中注意反对法西斯的这种企图：以民族主义和自治为幌子，散布自相残杀的种子，使阿尔巴尼亚人同邻国处于敌对状态，以便使阿尔巴尼亚人民陷入圈套。

会议提出，党的内部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消除小组习气和党内的派别活动。会议劝告阿纳斯塔斯·卢拉和萨迪克·普莱姆特断绝一切旧的关系，放弃错误道路，并且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将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积极分子提出了清党任务，要无情开除一切不可救药的分子，同时将尽一切可能使那些不坚定的分子走上正确的道路。

在主要从工人、贫苦农民中吸收新党员问题上所作的指示是，理论和政治知识水平低不要成为入党障碍。这些坚定的人将作为党的队伍中的对人民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满腔热情的战士而受到培养教育。

会议为消除党内的托洛茨基主义思潮而全力进行了斗争，并指示共产党员不要忘记反对党外的叛徒，特别是不要忘记反对托派“火焰”小组。共产党员还应高度警惕意大利法西斯和国内反动

派把间谍、奸细派进共产党内来的企图。

二、粉碎取消主义派别思潮， 建立党内团结

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以后，阿纳斯塔斯·卢拉和萨迪克·普莱姆特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破坏党的活动。他们在共产主义小组建党会议上说什么他们将服从多数的意志和党中央的指示，这只不过是欺骗而已。他们利用年轻的共产党不得不经历的巨大困难，用一切手段和方式破坏从组织上巩固党的工作，破坏党执行政治任务。阿纳斯塔斯·卢拉和萨迪克·普莱姆特继续同过去“青年”小组相当一部分成员保持原来的关系，违反党的规定和准则，同他们举行“组织”和“教育”会议，发出与中央指示背道而驰的指示。他们没有把他们小组的全部理论宣传材料、技术设备和财物交给党。

派别分子继续拚命反对党的总路线，千方百计破坏中央委员会、州委会和支部的实际活动。

他们给派别组织的成员规定的任务是，利用他们的“最大才干”和“最高理论素养”来窃取领导职位。他们力图从这些阵地出发，夺取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权。

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派别分子把攻击中央和各州的党的领导人作为主要目标，指责他们没有本领，没有文化，只知道发号施令而不会做领导工作！他们叫嚷对“青年”小组采取了“不公正态度”，说什么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州委会内，“青年”小组没有应有的代表，并要求改变这种状况。

阿纳斯塔斯·卢拉和萨迪克·普莱姆特之流有意在过去其他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些有野心的、向上爬的和狂妄自大的成员中

煽动不满情绪，竭力拉拢这些人。他们挑动这些人起来要求解释，为什么没有根据功劳和才干在党内给他们以负责职位！

派别集团在全国进行敌对活动，但在地拉那比在其他地方搞得更厉害。

毫无疑问，党内已产生一股有组织联系、有政治纲领的反党派别思潮。派别分子的政治纲领是由人所共知的一些取消主义论点组成的，即不可能进行武装斗争，不可能对民族主义者和农民进行工作，不要相信反法西斯同盟，特别是不要相信苏联在战争中的解放作用等。

情况确实是令人不安的。年轻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面临着意大利法西斯和“火焰”小组的托洛茨基分子从外部的打击，面临着取消主义派别分子从内部的打击，有被毁灭的危险。有迹象表明，还有法西斯的个别间谍和内奸在党的队伍中活动。由于进行这种活动，警察能逮捕和监禁许多共产党员和党外的爱国者。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在地拉那，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政治书记捷玛尔·斯塔法被包围之后，在同警察、宪兵英勇战斗中牺牲，这就是间谍活动的结果。法西斯还发现和抢走了中央委员会和地拉那州委会的技术设备和档案。

党内没有完全的团结。如果没有思想上的、组织上的牢固的团结，没有对所有党员都一样具有约束力的钢铁般的纪律，党就不能争取和领导群众，因而也就不能把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就不能战胜敌人。如果没有团结，党要么就变成托洛茨基主义的党或社会民主党，要么被消灭。

党的非常代表会议

为了消除威胁着党的巨大危险，临时中央委员会于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在地拉那召开了非常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地拉那

州委会委员和地拉那的一些党员。阿纳斯塔斯·卢拉和萨迪克·普莱姆特也受到了邀请。代表会议由恩维尔·霍查同志主持。

非常代表会议仅仅讨论了一个问题：消除取消主义派别思潮，建立党内团结。

党为使派别分子走上正确的道路作了许多努力，但由于他们坚持不放弃取消主义破坏活动，这种努力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代表会议指出，现在已“忍无可忍”了。

对党内派别活动和缺乏团结的现象再也不能容忍了，特别是国家处在这种决定性历史关头：民族解放运动正向总起义迅速发展，阿尔巴尼亚人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团结在党的周围。

代表会议指示说：

“为适应我们面临的如此艰巨和繁重的任务，不论在政治工作中还是在组织本身内，我们必须有一致的思想和看法（在所有列宁—斯大林式的党内，都必须是团结一致的，所以我们党也应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因为团结一致是必不可少的，是党胜利进行工作的主要条件）。”(29)

为了保证团结和巩固党，决定把一切不可救药的派别分子清除出党，将他们立即开除。代表会议提醒各级党组织注意，对那些企图陷害党的人要毫不留情。

中央委员会在衡量了阿纳斯塔斯·卢拉、萨迪克·普莱姆特及其最亲密的同伙的罪行后，根据代表会议所作的判断和建议，决定把他们不定期地开除出党。其他一些派别分子被开除三个月。

中央委员会以一个特别通知，把非常代表会议情况和对取消主义派别思潮主要领导人采取的措施通报了全党。同时指示要对在各州活动的所有派别分子采取开除措施。

中央委员会指示，不应完全抛弃被开除出党的派别分子，而应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罪过，尽量使那些改正错误的人重新回到党

的队伍中来。但对那些继续进行敌对活动的人，要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

最后，中央委员会要求大家正确地认识，正在进行的清洗是为了使党清除取消主义派别分子，建立党内团结，而不是打击过去的“青年”小组。绝不应仅仅因为阿纳斯塔斯·卢拉、萨迪克·普莱姆特和大部分派别分子是来自那个小组，就反对整个小组。很多来自“青年”小组的共产党员同派别分子没有关系，他们的坚定性和对党的忠诚经受了考验，并和其他同志一道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的决议、非常代表会议的决议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得到了全国各级党组织的完全赞同。党在短时间内清洗了派别分子和分裂分子。数以百计的经受了斗争考验的、忠于人民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新成员加入了党的队伍。很多参加派别活动的人深刻认识了罪行，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头目，衷心向党保证今后坚决遵循党的正确道路。

粉碎取消主义派别思潮，提高了共产党员的警惕性，活跃了党的内部生活。

反对派别分子的斗争，同时还暴露了妨碍党的工作和妨碍加强党的其他缺陷和弱点。

在这一时期，中央委员会谴责了穆斯塔法·纪尼希、科乔·塔什科和其他某些因为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和州党委而抱有不满情绪的人的分裂活动。他们在同党员和非党员的谈话中，几乎对党的每个指示都加以蔑视，时而诬蔑为过早的，时而诬蔑为过迟的，时而诬蔑为宗派主义的，时而诬蔑为机会主义的，给这个人或那个人可能抱有的不满情绪火上加油。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煽动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中央委员会多次就此劝告他们，要他们放弃这种反党活动。

在消除派别思潮和建立党内团结的斗争中，发现纪诺卡斯特

州委会中存在分离倾向。该委员会没有执行或歪曲了中央委员会关于武装斗争和游击队、关于民族解放会议、关于青年等问题的指示。它没有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自己的活动，没有将它发出的指示和编印的主要宣传材料上报中央。助长这种倾向的罪魁是当时的州委政治书记贝德里·斯巴修。

中央委员会特别重视这一事件，严厉谴责了纪诺卡斯特州委的分离倾向，解散了该州委员会，进行了新的委员会的选举。

临时中央委员会采取的有力措施和各级党组织对这些措施的完全支持，根除了小组习气和派别习气，消除了威胁着年轻的共产党的危险，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牢固团结、战斗团结。

三、民族解放阵线的建立。人民政权的诞生和武装斗争的扩大

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和非常代表会议，使共产党员向广大群众解释党的政治路线、揭露敌人的新手法和动员人民参加斗争的工作活跃起来了。

根据党的倡议和在党的领导下，很多村庄建立了最早民族解放会议。除城市外，一系列地区也组织了战斗小组。在这些战斗小组中，还有党外的反法西斯爱国者同共产党员并肩战斗。从一九四二年春天起，开始建立游击支队。截至七月，进行活动的有佩萨、库尔维莱希、哥拉、斯科拉巴里、莫克拉、斯库台、戴沃尔、迪勃拉和马蒂支队。他们首先在全国一些地区清除了法西斯占领者和卖国贼的军政和民政当局。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七月二十四日切断和破坏了全阿尔巴尼亚的电话电报线路。每天都在公路上袭击军车，袭击法西斯宪兵和警察的哨所，破坏军用物资仓库，烧

毁法西斯的办公楼和敌人的其他设施等。除这些活动外，还继续进行示威游行、抗议、罢工和破坏。

不断进行这种活动，在敌人队伍中造成了慌乱，使占领当局和与他们相勾结的走狗不知所措。军政和民政机关关于“阿尔巴尼亚紧急形势”、“关于无出路的形势”、“关于共产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的情况反映和报告，不断送往罗马、地拉那。敌人一再对爱国者进行逮捕、监禁，对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员的家属进行流放，颁发了新的更加残酷的命令，规定对一切从事反法西斯活动的人判处死刑。又有一些共产党员牺牲了，他们在同敌人的武装搏斗中，在监狱里，在拷打、枪杀和绞刑面前，表现了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

不断反对意大利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活动，使人民越来越多地接受党的政治路线，给党以帮助和支援。

《人民之声报》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之声报》，是共产党员手中的强大政治武器，它于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创刊。它是根据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出版和由恩维尔·霍查同志领导的。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机关报在创刊号的社论中给自己规定的目标是

“把全阿尔巴尼亚人民团结在这个机关报周围，团结一切真诚的、反法西斯的人，不分信仰、政治集团和流派……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阿尔巴尼亚而斗争”。〔30〕

《人民之声报》宣传党的政治路线、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阐明争取民族解放应遵循的道路，揭露法西斯占领者和阿尔巴尼亚卖国贼的政策和活动。它发表党的文章和号召书、关于国内国际形势的评论、大事记和来自各州的通讯。

《人民之声报》的出版，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人民之

声报》，党的指示，通过党员、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成员和党外的爱国积极分子传遍祖国每个角落。人们以极大的兴趣阅读它。《人民之声报》很快成了阿尔巴尼亚人民最喜爱的报纸。

佩萨代表会议 党在成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在解释、动员和组织工作中，在反对占领者的斗争中，为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战斗团结奠定了基础。为了加强这个基础，为了使人民的团结在全国范围内都建立在牢固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之上，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代表会议。

代表会议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六日在佩萨举行。除共产党员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各种派别的民族主义者。在这些民族主义者中，有一部分人是很靠近共产党的，他们接受了党的政治路线，积极地同占领者进行斗争。另一部分人赞成解放国家和团结人民，反对外国占领者，但没有行动起来，采取了等待的态度。这类人中还有以阿巴兹·库比为主要代表的索古分子。

共产党还号召另一类尚未公开表明态度的民族主义者参加会议，如米萨特·弗拉舍里等人。这些民族主义者没有响应号召，并竭力抵制会议。

在民族解放代表会议上，提出和讨论了团结和组织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问题。会议参加者，包括绝大多数民族主义者在内，强调了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生气勃勃的活动和巨大组织作用。会议指出，意大利法西斯和穆斯塔法·克鲁亚未能把党同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分割开来，共产党员得到了人民的热爱和信任，敌人关于“共产主义危险”的宣传已被揭穿，

“在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不再是我国人民中的正直人的恶魔，不再是农民、中产者、知识分子的恶魔，共产党员

不象法西斯极力在人民当中所散布的那样是‘不要祖国的’”。〔31〕

阿巴兹·库比和其他个别民族主义者，不敢公开跳出来反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已开始斗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他们力图通过反对某些带有党的特征的外部标记来阻挠党的威望的提高，如反对支队用“游击队”这个词命名，反对以红星作为标志。这种反对意见以及对青年广泛参加斗争和对决议中若干提法的某些相反的观点，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代表把自己的正确观点加以耐心说明后得到了克服。

代表会议选举了最高民族解放会议（临时的），一致通过了共产党制定的民族解放战争纲领。纲领包括下述主要内容：

为毫不妥协地反对法西斯占领者和卖国贼，为建立一个自由、独立、民主的阿尔巴尼亚而斗争；

阿尔巴尼亚人民团结的真正基础已经建立，并且只有在反对占领者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巩固；

不分阶级、政治信仰、宗教和地区，把一切正直的阿尔巴尼亚人牢固地组织到民族解放统一战线中；

在各地建立民族解放会议，作为团结和动员人民参加斗争的机关，作为人民政权的机关；

宣传和准备人民武装总起义，这种起义是游击战争的最后阶段和必然结果；

对农业银行和意大利股份公司以及所有依仗占领者牟利、危害人民的剥削者进行有组织的斗争。

佩萨代表会议奠定了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政权的基础。它确认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领导作用，这标志着党取得了第一个伟大的政治胜利。

佩萨代表会议不是各政党的代表会议。作为政党参加会议的

只有共产党，它是会议的组织者。不存在其他的反法西斯政党。

所以，民族解放阵线不是作为各政党的联盟而建立的。佩萨代表会议使广大人民群众志愿联合具有法律根据，它的基础是在反对占领者的斗争中从下面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是这种联合的缔造者和民族解放阵线的唯一的直接的领导者。民族解放阵线的基础是工农联盟，农民是民族解放阵线最广泛的基础。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从党的纲领中看到，他们迫切的民族要求已得到满足，他们是作为派别或作为个人而参加阵线的。

民族解放会议 恩维尔·霍查同志在佩萨代表会议上所作的题为《民族解放会议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团结和斗争的机构》的报告中所提出的论点，被认为是建立民族解放会议的基础。

在尚未解放的地区，民族解放会议是团结人民的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战斗机构。它向群众做解释工作，鼓舞群众参加斗争，使群众为总起义作好准备，募集战争所需要的支援物资，收集敌军调动情况和人数的情报，组织反对意大利资本主义公司的经济斗争，破坏法西斯征集农产品的活动。

在解放区，民族解放会议行使人民政权机关的职权。它维持秩序和治安，注意发展经济、食品供应、商业、粮食作物的播种和收割，组织教育出版事业和群众文化工作，排解纠纷，调停流血事端，使人民保持旺盛的战备精神等。

佩萨代表会议强调指出：

“民族解放会议意义重大。由民族解放会议组成政府，动员人民投入斗争和准备起义。”〔32〕

在组织民族解放会议方面，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有苏维埃的丰富经验。但是，很自然，它没有抄袭这一经验。它首先以在阿尔巴

尼亚进行反法西斯人民起义的具体情况为依据。这些起义机关的构成要适应起义的民族解放性质。一九四二年六月，中央委员会指示：应该使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和一切政治派别，不分阶级，都有参加斗争的代表参加这种民族解放会议。关于民族解放会议的思想，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群众所能接受的。自古以来，阿尔巴尼亚人每当需要进行反对外国占领者的斗争，或者解决他们的内部问题时，就成立“大会”、“会议”，这已成为传统。但民族解放会议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大会”和“会议”，它具有崭新的内容和组织。它是作为民主的革命的机构诞生和成长起来的，是由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直接建立的。它是对一切反人民的、进行剥削的国家机关与组织的否定。

这样，民族解放会议在群众中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佩萨代表会议后，不论在解放区，还是在尚未解放的地区，民族解放会议迅速建立起来。人民把民族解放会议看成是自己的和祖国的利益的保卫者。

民族解放会议作为农村人民政权机关开始行使职权，因为截至一九四二年，只解放了若干农村地区，而城市尚为意大利法西斯所占领。民族解放会议成了共产党同农民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环节。

游击支队 在把人民团结到民族解放阵线中和建立民族解放会议的同时，还扩大和加强了武装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是若干世纪以来在阿尔巴尼亚和其他国家经受了考验的、人所共知的战争形式。阿尔巴尼亚人民保持了以支队形式对外国占领者进行爱国斗争的悠久的优良传统。佩萨代表会议相信，大家会勇敢地、自豪地遵循先辈的光荣道路。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运用了过去阿尔巴尼亚爱国者支队的斗争

经验，使反对法西斯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游击战争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深刻的革命内容。

战斗小组是游击战争的第一所学校。在游击支队成立和活动起来后，游击运动就被提到了更高的阶段，并在全国广泛开展起来。

建立支队一般采取这种途径：州党委从城市派遣一些在战斗小组的斗争中经受了考验的党员、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成员和同情者到农村（山区里）去，其任务是建立支队。在这一核心周围，支队主要通过吸收农民而壮大起来。农村已成为游击支队的基地和主要来源。

支队的阶级构成没有任何限制。所有愿意对敌人进行斗争的人都可吸收。而历史不清楚的人，人民鄙弃和痛恨的罪犯、盗贼，均不允许加入支队。所有的人当游击队员都是志愿的。支队的人数在五十至六十人左右。支队以队长、政委为首，队长和政委共同领导支队的活动，负责游击队员的战斗和政治培训。在多数情况下，队长不是党员，政委是党在支队中的代表。

每个支队有一个党支部，党支部是支队的核心。

游击支队对法西斯占领者和卖国贼进行频繁的战斗活动。同时，支队不仅对游击队员，而且还对所在地区人民进行生动的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支队的根据地在解放区，在那里，它早已摧毁了旧的压迫政权，帮助人民建立了民族解放会议。它帮助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是民族解放会议维持秩序和治安的武装支柱。

在游击支队的身上，人民群众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军队、自己利益的保卫者。他们给这支军队以全面的支援。支队到农民家里住宿，农民就供给他们饮食。它也得到城市居民的各种物质支援。没有这样的支援，没有人民的全面的、不遗余力的支持，就不可能进行游击战争，就不可能建立革命的人民军队。

佩萨代表会议后，除游击支队外，在解放区每个大村或两三个小村，还建立了地方志愿支队（民军）。这是一些非正规的自卫队，当游击支队号召进行重大的进攻或者对付敌人向解放区发动的进攻时，他们就拿起武器。这种支队同时也是补充正规游击部队的源泉。

佩萨代表会议后，战斗小组、游击支队和地方志愿支队迅速增加。到一九四二年底，除了属于城市战斗小组和农村支队的数千入外，游击队员已达两千人左右。

意大利占领者为了消灭游击队，从一九四二年九月至十二月，在阿尔巴尼亚南部、中部和北部二十七个地区，用大量兵力进行了扫荡。他们烧毁了数百幢农民房屋，杀害了许多妇女、老人、青年和儿童，但是没有达到扑灭游击运动的目的。相反，法西斯恐怖行动使这一运动的烈火越烧越旺。在佩萨、斯科拉巴里、迪勃拉、马蒂、科尔察、库尔维莱希、发罗拉等地，成千上万的男女起来同游击队员一道反对意大利强盗。在力量悬殊的激烈战斗中，数以百计的法西斯士兵、警察、军官被击毙。

一九四二年游击战争的胜利和法西斯军事行动的彻底破产，说明了占领者的腐败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证明了共产党的政策的正确性。阿尔巴尼亚真正的人民革命已经开始了。

这一英勇斗争的影响超出了祖国国界。它受到了反法西斯的人民和国家的赞扬，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评价。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苏联政府通过一项特别的正式声明，表示同情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解放战争，不承认意大利帝国主义对阿尔巴尼亚领土的任何要求，并希望看到阿尔巴尼亚获得解放和独立。美国 and 英国政府虽然故意不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对阿尔巴尼亚的野心，但也同时发表了承认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正式声明。这些声明，特别

是苏联政府的声明，是对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支持，加强了胜利信心，促进了反对法西斯奴役者的武装斗争的进一步扩大。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对“国民阵线”的态度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法西斯斗争迅猛发展，使阿尔巴尼亚一切阶级、政治集团和派别都行动起来了。群众的怒潮和反法西斯运动、游击战争，使敌人队伍中发生了不可挽救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不能不把全国各反动阶级及其与占领者共命运的代表人物也卷了进去。他们对反法西斯斗争的革命高潮和共产党威望的增长怕得要死，因为他们从这些现象中看到了他们有失去特权的危险。佩萨代表会议和民族解放阵线的成立，是对他们的沉重打击。在这个事件后，反动派立即发出关于“共产主义危险”以及同它作斗争的警报。反动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代表人物在法西斯占领者的支持下，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急忙宣布成立一个与民族解放阵线直接对立的组织。这个组织叫“国民阵线”。它以假爱国主义者米萨特·弗拉舍里为首。

参加“国民阵线”的，有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地主和商人、反动僧侣、富农等。托派“火焰”小组也参加了“国民阵线”。

“国民阵线”是各种反动政治派别的政治混合物，其组织结构是腐朽的。恩维尔·霍查同志曾很好地说明了这一政治混合体的特点。

“‘国民阵线’是由一帮具有各种无根无基的倾向的、但都以民族主义一词为幌子的人组成的 ramassis（大杂烩。——编者）……在内部，‘国民阵线’是一篓海虾（……各行其是）……另一些人是九十九次弄虚作假，一次充当英雄好汉，再有些人是‘危言耸听’者，还有些人是专唱高调而不做任何事情的。”〔33〕

只是共同的阶级利益、对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运动的仇视，才使他们结合起来。

“国民阵线”立即宣布它不承认佩萨代表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纲领，这个纲领是彻头彻尾的蛊惑宣传。“国民阵线”的头目大言不惭地吹嘘什么他们正在争取“建立一个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象样的、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阿尔巴尼亚”。他们急急忙忙在山区建立了几个“秘密支队”，其任务不是同占领者进行斗争，而是阻挠游击队的战斗活动和政治活动，兜售“国民阵线”的政策，恫吓农民。他们在农村建立了“国民阵线”的“会议”，准备代替民族解放会议。他们还利用了其他一系列同共产党所运用的很受欢迎的方式方法相似的方式方法。他们把自己打扮成“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劝告阿尔巴尼亚人民不要拿起武器反对意大利占领者，因为这样的斗争会造成阿尔巴尼亚民族的灭亡！“国民阵线”的主要口号是：“等待时机”。“国民阵线”分子掀起了一个疯狂反对民族解放阵线和共产党、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运动。

“国民阵线”的全部目标，是使人民群众、特别是使农民脱离共产党，破坏民族解放阵线，扑灭民族解放运动，保证自己在战后掌握全部政权。

“国民阵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选择了同占领者相勾结的道路。由于它反对共产党的目标同占领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又因为意大利法西斯不允许“国民阵线”分子独立活动，所以它不得不这样做。尽管这样，双方的利益要求对这种勾结尽量保密。否则，就无法骗人了。

“国民阵线”的出现，使国内形势大大复杂化了。列宁教导说，没有形势不复杂的革命，因为“革命本身在发展过程中总是要造成非常复杂的环境的”〔34〕。

在“国民阵线”出现后的复杂形势中，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需要

十分慎重地、英明地、有远见地进行活动。只有对“国民阵线”执行十分灵活的策略，党才能保持已取得的成就，进一步加强同群众的联系，从而引导阿尔巴尼亚人民赢得民族独立的完全胜利，建设一个人民民主的阿尔巴尼亚。

共产党知道，“国民阵线”是反动派的产物和法西斯占领者的工具。鉴于“国民阵线”分子进行破坏活动，党的许多基层组织，甚至某些州委会坚决要求对他们使用武力。

但是党中央坚持的原则是，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把自己的策略建立在主观愿望基础上是最危险不过的。恩维尔·霍查同志在答复那些要求立即向“国民阵线”公开宣战的人时，以中央的名义指示说：

“……的确是巨大的障碍（“国民阵线”。——编者），因为不应忘记他们在阿尔巴尼亚的个人影响，这些人在人民中造成了一种心理，似乎存在着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共产党员应同它协商，并达成协议……不应忘记，在它里面有不少坚定的、真正希望团结和进行斗争的好人。”〔35〕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一开始就决定了对待“国民阵线”的下述策略：揭露“反对意大利人的时机尚未来到”的失败主义口号；公开要求“国民阵线”同意在立即毫无保留地、不妥协地对意大利法西斯占领者进行斗争的基础上团结全国一切反法西斯力量；要求“国民阵线”立即停止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同它就反对占领者的斗争问题进行谈判；把“国民阵线”的某些声名狼藉的头目作为法西斯分子和卖国贼在人民面前进行揭露。

通过这种策略，党争取达到：分化“国民阵线”的队伍，把所有那些赞成同占领者进行斗争的人争取到这一斗争中来；从而从下面迫使整个“国民阵线”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揭露“国民阵线”头目的反民族政策和他们“脚踏两只船”的立场，让群众对他们进行谴

责，孤立所有那些妨碍人民团结、妨碍对占领者进行斗争的人。

特别是对意大利占领者毫无保留地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是“国民阵线”策略的最大弱点，因为事实上它是反对这一斗争的。因此，为了揭露“国民阵线”的头目，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决定主要攻击这一弱点。要求对占领者进行斗争的人民群众，根据他们的经验深信“国民阵线”头目的“爱国主义”是假的，这些人的一切“爱国主义的”歇斯底里的叫嚷都只不过是蛊惑宣传而已。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了对“国民阵线”的这种策略之后，便嘱咐各级党组织严格执行它的指示。它认为，对待“国民阵线”的态度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要十分细心。中央委员会指示，一方面，行动需要耐心、有远见，任何时候都要防止急躁，不要陷入敌人挑衅的圈套，要注意

“……我们不能单枪匹马地进行斗争，而应同全国人民一道进行斗争，因此，对这些民族主义者，应该慎重从事”。〔36〕

另一方面，中央委员会指示说，不要在既定道路上作任何让步，因为团结全国一切力量，只有在对占领者进行无情的武装斗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采取同民族主义者讨价还价的办法是不能实现的，

“既不允许（哪怕是丝毫地）损害我们党的尊严，也不允许阻挡民族解放战争的车轮前进……，我们首先是采用讲道理、说服的办法，然后再用‘*manière forte*’（用暴力。——编者），努力制止他们（“国民阵线”分子。——编者）的猖狂活动”。〔37〕

“国民阵线”建立后的形势，对党和民族解放战争造成巨大的危险。各阶层人民中存在着政治上的模糊观念。“国民阵线”分子以蛊惑和恐吓手法拉拢了一部分人，特别是在农村。一些动摇不

定的农民脱离了民族解放阵线，倒向了“国民阵线”。恩维尔·霍查同志指示，在这种情况下，“要非常、非常细心”。“我们如果能够成功地摆脱”这种情况，“我们的事业就必定胜利，我们如果犯错误，那就要失败”。〔38〕

四、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会议。关于总起义的方针

一九四二年四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积极分子会议决定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选举正式的中央委员会，规定今后的任务。根据决定，代表会议只有在党清洗了派别分子、分裂分子和建立了牢固的团结以后才能召开。现在已做到了这点。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收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指示。指示强调必须组织反对意大利和德国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战争，把人民团结到民族解放统一战线中，尽量争取爱国者和正直的民族主义者参加斗争、参加对斗争的领导，要求党的口号不要超出民族解放战争的范围。

这一事件对年轻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指示说明，在建党会议上制定的、在临时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中进一步具体化了的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此外，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被承认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支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底，临时中央委员会决定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召开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

敌人的政治危机加深 在党准备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的时候，国际和国内事件在迅速发展。一九四二年下半年，阿尔巴尼亚人象全世界人民一样，把视线转向斯大林格

勒，那里正在决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命运。斯大林格勒保卫者的英勇抵抗，鼓舞着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员和爱国者反对占领者的解放战争。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斯大林格勒战役以红军的辉煌胜利结束了。军事史上从没有见过这样大的胜利，那样大规模的围歼，消灭了那么多的战略部队。

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不仅对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而且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根本的转折点。在斯大林格勒，开始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没落”⁽³⁹⁾。

这一事件对扩大被法西斯占领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起了巨大的作用。各国人民对希特勒德国必然彻底崩溃的信心增强了。

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对阿尔巴尼亚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这一胜利为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创造的有利形势下，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解放战争也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

武装斗争过渡到了更高的阶段，从分散的战斗行动过渡到了两个或者更多的游击支队协同行动。在下述地方，对意大利法西斯采取了有许多支队参加的行动：沃斯科波亚，格拉姆什的斯诺塞姆（一九四三年一月），巴托斯，发罗拉的塞莱尼察，利波霍瓦，在圣玛丽亚附近的库克斯—普克公路上（二月）。三个月内，解放区扩大了将近一倍。

在游击运动扩大和巩固的同时，民族解放会议政权也壮大和巩固了。在很多城市里也建立了秘密的民族解放会议。人民群众日益把民族解放会议看成是自己唯一的政权机关，只相信和服从它的决议和指示。

在全国第一次代表会议前夕，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反对阿尔巴尼亚托洛茨基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另一个重大胜利：一九四三年三月初，“火焰”小组完全被粉碎了。对它的最后一

击是恩维尔·霍查同志一月份发表在《人民之声报》上的文章《略论法西斯的某些走狗——“火焰”小组》。这篇文章揭露了“火焰”小组头目的托洛茨基主义手法，这些头目时而以“为无产阶级革命”、“为反对资本的斗争”、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左”的口号出现，企图取得那些同情共产主义的劳动群众的信任；时而打扮成“民族主义者”，企图使爱国的民族主义者脱离民族解放战争和共产党。文章用事实证明，该小组的头目是共产主义的敌人、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敌人，是内奸和占领者的工具。

小组很多成员在认识到头目的背叛行为之后，脱离了他们，无条件地站到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一边。其中很多人受到了党的再教育。

随着“火焰”小组被粉碎，“国民阵线”也遭到了打击；“火焰”小组分子在“国民阵线”内部，以“‘国民阵线’共产党员”的身分执行着反动资产阶级事业的宣传员和保卫者的任务。

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下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高涨，法西斯军队在东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战线的失败，进一步加深了占领者和卖国贼在阿尔巴尼亚的危机。一九四三年一月，意大利法西斯认为穆斯塔法·克鲁亚没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本领而解除了他的总理职务，并组成了新的吉布林政府。但仅过了一个月，他们又被迫撤换这届政府，用另一届政府予以代替。这最后一届政府也寿命极短。这时，阿尔巴尼亚士兵、警察、宪兵开始大量逃跑。

意大利掌权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政策在阿尔巴尼亚遭到了失败。一九四三年二月，希特勒也给墨索里尼写信说，阿尔巴尼亚人象巴尔干其他各国人民一样，“表明他们很少值得信任”，他把阿尔巴尼亚人民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无限仇恨”称为“残酷的现实”。〔40〕

为了维护他们的占领制度，意大利法西斯认为必须加强和扩

大使用暴力。一九四三年二月，帕里阿尼将军接替了法西斯总督雅科莫尼。帕里阿尼被认为是“善于运用武器的力量讲话并且能够运用这种力量”的人。意大利司令部拟订了在我国各地区进行一系列更大规模作战的计划。

在这一行动中，占领者要求并且得到了“国民阵线”的支持。一九四三年三月，“国民阵线”中央委员会同意大利总司令签订了一项秘密的、名为《达尔马乔—克尔楚拉》^{〔41〕}的议定书，根据这一议定书，“国民阵线”中央委员会负责防止对意大利军队的任何袭击，并帮助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巴尼亚南部进行扫荡。

同时，意大利法西斯任命了“国民阵线”的一个头目^{〔42〕}为卖国政府的总理，宣布建立“阿尔巴尼亚国民军”、“阿尔巴尼亚宪兵队”，建立意大利国家和“阿尔巴尼亚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用“大阿尔巴尼亚近卫军”代替“阿尔巴尼亚法西斯国民党”，等等，这一切始终是以“阿尔巴尼亚同意大利合并”、维克托·恩马奴伊尔三世为“阿尔巴尼亚国王”为前提的。

意大利法西斯希望加强反动民族主义者已动摇的信心，以便尽量利用这些人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以“国民阵线”为首的反动派希望不管局势如何变化，都能保住政权。他们双方都企图从散布“建立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国家”这一假象中得到好处。

提到日程上的问题 敌人的深刻危机，武装斗争的扩大，人民——**组织总起义** 的爱国革命觉悟的提高，以及有利的国际形势，把组织人民总起义和建立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解决这一任务起了历史性的作用。这次会议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在爱尔巴桑附近的拉比诺特召开的。七十名代表和应邀者出席了会

议。代表是在二月和三月初各州党代表会议上选举产生的。他们代表近七百名党员。

代表会议完全赞同临时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并得出了结论：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已为实践所证明。

发动人民准备人民总起义和组织这一起义的问题，在代表会议的全部工作中占主要地位。

全国第一次代表会议在指出反法西斯斗争所取得的巨大进展时，提醒各级党组织注意，要深刻地认识面临的困难以及为组织总起义和保证完全胜利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人民群众受到“国民阵线”和其他反动集团敌对宣传的直接压力，经常受到法西斯恐怖活动的威胁。结果，就在这里或那里出现动摇和漠不关心的现象，或者对阿尔巴尼亚共产政策的实质认识不足，一部分人受到“国民阵线”的蒙骗。

通过对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表现的有力批判，规定了关于加强党同广大群众的关系和发动群众准备总起义的今后的任务。

代表会议提醒共产党员注意工人是党的支柱，要求各级党组织进一步深入到矿山、工厂、建筑工地等地方的工人群众中去，特别是要深入到库乔瓦、塞莱尼察这些主要工业中心以及港口等地。

在代表会议上，谴责了屠克·雅科瓦所说的阿尔巴尼亚没有无产阶级的错误观点。这种毫无根据的观点，早在共产主义小组会议上就遭到了驳斥。阿尔巴尼亚工人阶级现在有了自己的共产党，并通过自己的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起着领导作用。

代表会议指出了对农民的工作所取得的进展，大部分农民把共产党看成是自己的党。但并不是全国所有地区的所有农民，特别是北方某些地区，都积极参加反对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斗争，都接受党的领导。“国民阵线”把自己的活动集中在农村。党面临的迫切任务是：保持和加强同农民的联系；在农民群众中孤立“国民阵

线”。准备和发动总起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任务的解决。

代表会议在指出农民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十分重要的作用时，指示说：

“应该特别重视农村工作，因为农民占我国人民的大多数，因此，那里应当是当前斗争的主要力量的来源。”〔43〕

代表会议认为，工农联盟是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最可靠的武器。它指示共产党员要扩大和改进对农村的政治解释工作、组织工作。首先要求使民族解放会议活跃起来，尽量争取农民参加游击队、地方支队。同时，要发动农民起来反对法西斯及其在阿尔巴尼亚的走狗的一切税收、罚款、投机、抢劫活动和其他一切压迫剥削形式；在农村进行扫盲工作，传播文化。

虽然多数富农已经倒向和正在倒向“国民阵线”一边，反对民族解放战争，但代表会议仍然要求要象过去一样，不分阶级，广泛争取农民群众参加斗争。

在代表会议上，青年和妇女工作占有重要地位。

会议指出了阿尔巴尼亚青年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精神，指出了他们不惜牺牲一切的决心、党组织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组织对广大青年群众的不倦工作。对这方面存在的缺点，如宗派主义，主要把工作集中在对青年学生方面，对农村青年的工作做得少，最后，在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中有某些同党并行的倾向，都进行了批判。代表会议指出，青年是党的新生力量的丰富的源泉，是民族解放战争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因此要求更加深刻地理解党在青年问题上的路线，对城乡广大青年开展更有益的活动，党应给这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以更大的帮助。

妇女问题被认为是首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两个主要方面进行了讨论：争取广大妇女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使妇女得到社会解放。妇女可以、而且应该在反法西斯战争和社会生活中起重要

作用。为此，首先必须使阿尔巴尼亚妇女深刻地认识占领者的长期奴役和沉重压迫，起来反对这一切，成为民族解放和争取幸福的未来的坚定战士。特别指示共产党员不要把工作局限于知识分子妇女，而要深入到广大农村妇女、城市女工和家庭妇女中去。

在青年和妇女工作方面，代表会议首先强调对他们的组织工作。代表会议指示，要建立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青年组织和反法西斯妇女阵线。

对民族主义者的态度和同他们的合作问题受到了很大的注意。

民族解放战争沿着革命道路的发展，不断使民族主义者的队伍发生分化。相当一部分民族主义者，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代表，加入了并在继续加入民族解放阵线。另一些人采取了中立立场，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没有深刻地理解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怀疑法西斯是否会失败。那些代表反动资产阶级和地主利益的民族主义者集团，不是已同“国民阵线”同流合污，就是在等待更适宜的时机采取断然的态度反对民族解放战争。

象对民族主义者做工作这样一个如此复杂的工作，有出现最严重的宗派主义、机会主义错误和现象的危险。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批评了一些共产党员和组织对动摇的、中立的和已参加“国民阵线”的民族主义者缺乏耐心和不注意策略。它指示要十分耐心地争取同民族主义者真诚团结或合作。责成共产党员要不倦地对所有那些痛恨占领者、愿意反对占领者的人做工作，也对那些表现顽固的人做工作，以便说服他们，把他们变成同盟者，即使是动摇的同盟者也好。

那些在反动资产阶级的压力面前表现有投降倾向的共产党员，受到了更加严厉的批判。这种不坚定的分子认为，党应抛弃自己的独立性，溶合在民族解放运动中。

代表会议指出：

“这种想法将导致党的毁灭。”〔44〕

代表会议规定了下述任务：加强党在民族解放阵线中的独立性和领导作用，进一步宣传共产党是为使人民从法西斯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为贫苦阶层的权利而斗争的旗手。

代表会议专门讨论了对“国民阵线”应采取的态度。“国民阵线”执行反动的反民族的两面政策。它的头目被认为是彻头彻尾的保守派、反动派，他们随时准备同占领者进行各种勾结。他们是民族解放战争的反对者，因为民族解放战争会擦亮人民的眼睛，使人民觉悟起来，摆脱所有那些蒙骗、压迫、剥削他们的人。

但特别是在农村，“国民阵线”中还有很多人是要反对占领者的。

代表会议指出，

“同这些人，有可能结成战斗的民族解放统一阵线。”〔45〕

只有“国民阵线”参加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武装斗争，才能创造它同民族解放阵线联合的可能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利用一切手段和方式，其中包括同“国民阵线”代表谈判在内。但是代表会议批判了那种以为对“国民阵线”和一般民族主义者的全部工作就是谈判、联合的想法，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表现。会议再次强调，占主要地位的是对“国民阵线”队伍中普通的、正直的人做工作，同他们建立战斗的联系，使他们投入反法西斯的行动。来自下面的压力和对占领者进行武装斗争，将使“国民阵线”内部发生分化，使群众脱离反动头目。

党将更有力地继续揭露“国民阵线”的失败主义宣传，特别是揭露它的“时机未到”的口号；要同法西斯的一切帮凶进行斗争，其中包括“国民阵线”中那些已经或正在作为法西斯帮凶公开出现的头目；要揭露反动派建立从属于法西斯意大利的“独立的阿尔巴尼

亚国家”的诡计。

为了扩大和巩固民族解放阵线，稳步走向总起义，代表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首先经常注意到斗争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性质，不允许任何歪曲党在各方面的政策的现象。

恩维尔·霍查同志指出：

“我们不是机会主义者，我们丝毫没有忘记我们的长远的任务，但是，在达到那个阶段以前，我们必须完成我们当前的任务：民族解放战争。”〔46〕

代表会议决定，进行总起义的主要环节是组织民族解放军。由于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这支军队正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决定：

“把游击队、志愿队组织成为正规的民族解放军，这支军队将使占领者感到胆战心惊，是使人民得到解放的可靠的坚强保证”。〔47〕

与此相关，还研究了下述问题：建立军队、建立各级部队、建立州司令部和总司令部的问题，对军队的武器、弹药、服装、食品的供应问题，战术和对战士的政治教育问题等。

代表会议指出，建立民族解放军对进行总起义、对战胜敌人是迫切必要的，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要求共产党员深刻地认识到，党在当时的主要工作部门是军队。

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 在代表会议上，紧密结合党的政治路线、结合根本问题——总起义，对党的组织问题进行了讨论。

党的团结的加强被认为是党内生活中最大的胜利。这是保证人民的战斗团结和党对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的必然要求。代表会议认为，一九四二年六月非常代表会议的决议、临时中央委员会为

消除取消主义派别思潮采取的措施、对“火焰”小组采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都是正确的。

阿纳斯塔斯·卢拉和萨迪克·普莱姆特在被开除出党以后，不仅没有停止反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敌对活动，反而变本加厉了。现在对他们要采取同对卖国贼，对党的、人民的和共产主义的其他敌人同样的态度。代表会议指示共产党员要始终保持警惕，要对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异己思想、对一切托洛茨基分子和背离正确路线的人、对党和民族解放运动队伍中的一切逃兵进行无情的斗争，不要忘记敌人会不断企图把他们的代理人派进党内。

代表会议认为，党的钢铁般的纪律是维护和进一步加强团结的首要条件。同时，虽然处在战争环境下，党并没有忽视发扬党的内部民主的问题。它提出了要反对党内的任何命令主义、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任务。共产党员、党支部和党的下级机关不应什么都等上面来。加强民主和发扬主动精神，将提高共产党员和党组织的能力，将把他们的领导作用提到更高的水平，将进一步加强干部的责任感，保证同群众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

党的一项特殊任务是在农村广泛建立党的组织，

“因为没有党的组织，党的工作和民族解放战争就不能获得成功”。〔48〕

代表会议指示要改善干部的组成，其办法是把那些表现了罕见的自我牺牲精神、忠于人民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年轻党员大胆地提拔到负责岗位上来。

代表会议十分重视对共产党员从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培养。代表会议指出，阿尔巴尼亚青年共产党员如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就不能在复杂的形势下，光荣地完成自己的艰巨的任务。那些认为战时不需要书本、只需要枪杆子的共产党员的观点，受到

了批判。代表会议强调，“除枪杆子外，还需要书本”，并且规定了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的一切困难和障碍的任务。

代表会议结束时，选举了由十五名委员、五名候补委员组成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中有：恩维尔·霍查、纳科·斯皮洛、希斯尼·卡博、果戈·努什、穆罕默德·谢胡、瓦西里·尚托、拉马丹·奇达库、克里斯多·赛梅尔科、彼得洛·巴比、萨迪克·贝克泰西。代表会议还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选举恩维尔·霍查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总书记。

代表会议的所有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

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在闭幕时，表示相信，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坚定地向前迈进，将光荣地完成自己的艰巨的任务，保证使阿尔巴尼亚人民赢得彻底的胜利。

代表们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信说：

“我们不会允许任何力量使我们党背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理想，背离共产国际的理想。”〔49〕

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对全面加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党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代表会议根据过去积累的经验，更深入、更广泛地制定了党的总路线。

五、组织民族解放军和人民总起义

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后，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主要集中在发动人民准备总起义方面，首先是集中在组织民族解放军方面。

党号召阿尔巴尼亚人民——工人、农民、市民、青年、妇女、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力量，为反对法西斯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斗争服务，踊跃参加游击队，以便建立新的部队，加强武装斗争，从而走向总起义。

党教导人民说：

“国家的命运取决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反对占领者的这一斗争越是广泛、激烈，解放之日就来得越快。”〔50〕

“国民阵线”的吹鼓手们到处叫嚷阿尔巴尼亚人不能够、也不需要进行反对意大利的斗争，因为同盟国会打败意大利的，也会给阿尔巴尼亚带来自由和独立的（！）。恩维尔·霍查在《人民之声报》上揭露他们时写道：

“如果全世界都象这些‘伟大的政治家’这样推论，那会怎样呢？……那就会发生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就永远成为墨索里尼的附庸国……

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俄国、英国、美国正在以大部队、坦克、飞机进行战斗；但这并不排除我们用自己仅有的步枪进行战斗……战争不能用玫瑰花、也不能用羽毛来进行，自由不能用空话、也不能用妥协的办法来赢得，而应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和鲜血来赢得。”〔51〕

在对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政治工作的同时，共产党员在阿尔巴尼亚士兵、宪兵、警察当中，在因受蒙蔽而为占领者卖力的所有那些人当中，在驻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士兵、工人当中加紧进行秘密工作。在意大利士兵、工人中间散发意大利文的传单。

由于共产党员的紧张工作，数以百计的青年战士响应党的号召，加入了游击队的行列。很大一批中学生上山同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战士汇合。从敌军部队中逃跑的爱国者，也加入了游击队。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游击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一九四三年五月，头几个营和头几个州司令部成立了。截至七月，阿尔巴尼亚已有二十个营和三十个游击支队。

粉碎发罗拉州派别组织

当全党忙于执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

议提出的关于准备总起义的任务时，人民的敌人、共产主义的敌人萨迪克·普莱姆特和巴里·德罗瓦在发罗拉州秘密地策划了一个反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敌对派别组织。事实上，正当该州党的主要领导人去参加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拼凑这一派别组织了。他们利用这一机会，利用一些共产党员缺乏警惕性、纪律性和良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素养，蒙蔽、笼络了一些党员和发罗拉“老人”游击队指挥部。四月，派别分子宣布，他们不承认州党委，提出了要召开所谓“党代表会议”的口号，这个所谓“党代表会议”将要推翻州委，选举萨迪克·普莱姆特及其亲信组成新的州委。

敌对派别组织给自己规定的目标是，夺取党组织和发罗拉州游击队指挥部的领导权，消灭坚定的共产党员，首先是消灭领导干部，扑灭该州的解放斗争，进而在全国其他地区进行破坏活动，推翻中央委员会，消灭共产党。叛徒们同“国民阵线”的头目达成了协议，以便为达到既定目标而共同行动。他们在“国民阵线”分子的支持下力图用阴谋和诽谤煽动农民，对党和游击队进行武装袭击。同时，他们向各州的许多党员和纪诺卡斯特州委写信。信中说，党对阿纳斯塔斯·卢拉、萨迪克·普莱姆特和其他派别分子所作的“不公正”的决定是反叛的原因，并要求支持。

中央委员会正确地认为，发罗拉党组织中形成的严重局面是对全党的巨大危险。总书记恩维尔·霍查前往该地领导对派别组织的斗争。

消灭派别组织的斗争是在“党高于一切”的口号下进行的。恩维尔·霍查同志同州委书记希斯尼·卡博同志和穆罕默德·谢胡同志一道，通过会议和个人接触，首先使党员明了派别组织的真正目的及其敌对活动的巨大危险性。几乎所有被叛徒们蒙蔽的党员都对自己的过错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同他们断绝了一切关系。发

罗拉和马拉卡斯特地区的人民也看清了萨迪克·普莱姆特的背叛行为，他们同党一道，积极地参加了粉碎派别组织的斗争。到五月，一切问题都已解决。萨迪克·普莱姆特作为人民的敌人、党的敌人被揭露了，逃到了意大利法西斯占领的发罗拉。

发罗拉州敌对派别组织被粉碎后，党中央一九四三年六月发出特别通知，揭露这一派别组织的根源和目的，向全体党员指出：

“这次事件应该成为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发罗拉组织的教训……我们反对这些卑鄙敌人的斗争应该更加激烈，……应该痛恨这些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只要他们一露头就给予无情打击……”〔52〕

发罗拉事件确实成为全党的教训。它有助于使共产党员更深刻地认识党的敌人的危险性，有助于使他们加强纪律性，提高警惕性和革命活动中的战斗精神。直到战争结束，再也没有发生象发罗拉这样的事件。

总司令部的成立

当党在为消灭萨迪克·普莱姆特派别组织而斗争时，游击队、志愿队在全国四面八方给法西斯占领者以接二连三的打击。其中对意大利军队最强大的袭击是在塞莱尼察矿附近（一九四三年四月），莱斯科维克（五月），斯特鲁加—迪勃拉公路（六月），佩尔梅特—库恰尔—麦兹戈朗山口—基乔克隘口一带（七月初）。仅仅在佩尔梅特战斗中，就有五百多敌人被击毙。七月六日，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在科尔察—雅尼纳公路上的巴尔玛什，也对德国军队进行了第一次袭击。同时，游击队同农民一道，抗击了意大利法西斯向库尔维莱希和麦萨普利克（四月）、佩萨、马拉卡斯特、台佩莱纳、什比拉格（六月）的军事进攻。占领者在对付游击队和人民发动的这些进攻当中动用了几个整师的兵力。他们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妇女、男子、老人和儿童，烧毁了数

以百计的村庄，抢走了许多牲口，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军事上、政治上的胜利。相反，进一步激起了人民的仇恨和愤慨。

在席卷全国的非常高涨的革命形势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最高民族解放会议研究反法西斯战争中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建立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

最高民族解放会议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在拉比诺特举行会议。会上一致决定建立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总书记恩维尔·霍查被选为总司令部政治委员。七月十日，最高民族解放会议和总司令部以一项特别文告把这一重大事件告诉了人民。

总司令部组织了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把反对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武装斗争的战略和战役领导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同时还制定了这一战争的战术。为了集中领导各地区的游击部队，成立了几个州司令部、第一战区司令部。在某些州建立的游击大队，属这些司令部领导。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第一突击旅成立。穆罕默德·谢胡同志被任命为旅长。

总司令部成立时，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常备游击部队已有战士一万人左右。参加解放区农村志愿支队、被占领的城市和地区的战斗小组的战士人数，约多一倍。

总司令部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是建立后方游击军事政权。这种政权的机关是“州指挥部”、“地方指挥部”。这些机关作为民族解放会议和游击队的可靠支柱和助手，在解放区行使民警职权。

随着总司令部的建立，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组织水平更高的和迅速扩大的阶段、人民总起义的阶段。民族解放军部队、志愿支队同人民群众一道，在全国各地同意大利占领军、同开始进入和在阿尔巴尼亚领土上活动的德国军队进行搏斗。总司

令部命令，只要意大利和德国占领者的军队还

“没有无条件地投降，只要在我们可爱的祖国的领土上还有一个武装的法西斯分子，我们的斗争就应当最激烈地继续进行下去”。〔53〕

七月，在马拉卡斯特尔、台佩莱纳，游击队和人民在同企图消灭这些地区的民族解放战争根据地的几个意大利师的战斗中击毙近一千敌人。法西斯在萨纳隘口一波格拉迪茨公路上的波依斯卡战斗中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主要在下述地区同意大利军队进行了浴血战斗：布莱尔、什塔姆隘口、布埃尔隘口（约三千马蒂人同游击队一道参加了有配合的进攻）；迪勃拉州的泽尔疆、索弗拉疆；纪诺卡斯特的卡尔迪奇、马希库罗拉；科尔察的维士库奇（八月）；斯库台的莱奇（八月至九月）。在这些战斗中，被击毙的敌人达一千五百人左右。在这一时期，游击队在科尼斯堡（八月）、在爱尔巴桑—地拉那公路上（九月初）也对德国军队进行了袭击。

对席卷全国的起义感到惊恐万状的法西斯占领者，七月间宣布整个阿尔巴尼亚的领土为作战区。意大利总司令被迫承认：“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大多数已不分阶级地起来反对意大利、反对我们在阿尔巴尼亚驻扎军队了。”〔54〕他要求他的罗马中心增加占领军人数，以便对付当地形成的局势。

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人民革命军队 在阿尔巴尼亚的条件下，共产党通过总司令部最充分地执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武装起义的学说，解决了民族解放军的基本军事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

在总司令部成立后，由于占领军在人数方面，特别是在作战装备、弹药、运输和通讯工具、食品和衣物供应方面都占优势，所以解放军还不得不主要以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在这种条件下，正面

作战就是置民族解放武装起义于死地。

各游击部队的战斗活动具有进攻性，是不断地进行的，其特点是巧妙地运用灵活机动、突然袭击的办法，高度发挥旅、大队、营指挥部的主动性，充分利用地形。

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还通过游击战争解决独特的战略任务。党赋予它的使命是以自己的力量解放全国，同时保证建立人民政权，成为人民政权的武装支柱。

只有正规军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就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为什么作出如此巨大的努力，以建立民族解放军，并把民族解放军变成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一支正规军的原因。

起初，旅被规定为正规的人民军的最大建制。总司令部制定了一项关于相继建立一些旅的特别计划，这些旅将由各州的大部分支队、营、大队逐步合并而成。

随着民族解放军的建立和不断壮大，对军事干部、政治干部的需要也增加了。党没有这种现成的干部。在战争的条件下，总司令部和最高民族解放会议不可能开办培训军官的学校。指挥员和政委是在同敌人的激烈斗争的烈火中，从工人、农民和爱国知识分子当中，从最诚实、最英勇和最忠于人民和祖国的游击队员中培养出来的。

总司令部成立后，直到战争结束，给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仍然是敌人、占领者的军队和仓库，用斗争向他们夺取。

关于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部队的衣食供应问题，这主要由城市、特别是由农村人民支援，一部分则通过斗争从敌人那里夺取。游击队员在解放区农民、市民的家里宿营。

党极其重视在军队中保持高昂的士气。每个游击队员都决心为自由、祖国和共产党而献身。这种精神力量来源于战士的高度觉悟。他们懂得为什么而战，深刻理解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完

全意识到战争带来的困难、艰苦和牺牲，毫不动摇地相信他们所捍卫的事业必将胜利。

自觉的纪律性，热爱人民，热爱同志，对待人民的高度的真诚和模范行为，极其注意维护本国优良风尚和传统，这些更进一步提高了游击队员的道义形象。

游击队员的崇高的道义、政治和军事品质是稳固的，因为它是建立在政治信念和民主的基础上的。与维护反动阶级利益的旧军队不同，在民族解放军中，普通战士与指挥员、政委一样，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解决军队中的军政和组织问题的平等权利和完全的自由。部队的一切战斗活动、政治工作、指挥部的活动、游击队员和干部的言行，都须接受集体的评议和批评。指挥部的命令体现了战士和人民的要求。为了最好地执行这些命令和党的决议、指示，组织广泛的讨论和交换意见。

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中的民主，体现了它的人民军队的性质，来源于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原则。

这种民主丝毫没有削弱军事纪律，而是加强了这一纪律，使它成为更自觉的纪律；没有损害集中的领导，而有助于实现这种领导。

对游击战争战术要领的巧妙运用和民族解放军的高昂士气，创造了抵销和克服敌人在人数方面、在战斗技术装备方面的优势的可能性。

共产党是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战士的崇高道义、政治和军事品质的缔造者。

旅、大队、营和连（支队）的政委是党的政治工作的领导者。政委同时是游击队指挥部的成员。副政委担任党的书记的职务。为了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党派了大批优秀干部到军队里工作。

在军队中除了党组织外，还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组织，作

为党的机关和支部的助手。

政委、副政委、党组织、青年组织在游击队中进行大量的政治教育工作，保证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成员在执行战斗任务中起先锋作用。他们以爱国主义精神，以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共产党的精神，以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革命战斗传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以热爱各国反对法西斯的人民的人民的精神教育战士。他们使游击队员和人民树立必胜的信心，保证总司令部和游击队指挥部的命令得到贯彻。

共产党在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战士和干部当中，享有最高的信任和威望。党是通过共产党员在斗争和言行方面作出榜样而赢得这样的信任和威望的。

军队的一切建设、战略、战术和战斗活动问题，都按照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和训令解决。党的总书记恩维尔·霍查是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的主要组织者、领袖和导师。

民族解放军的建立，是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伟大胜利。这样，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就解决了一项最有决定意义、最艰巨的任务。

揭露“国民阵线” 这一胜利，不仅是在反对占领者和卖国贼的假爱国主义的武装斗争烈火中，而且是通过同国内反动派、同“国民阵线”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取得的。

“国民阵线”为破坏反对占领者的武装斗争，用尽了人民的敌人、革命的敌人所运用的一切手段和办法：诽谤，蛊惑宣传，用“共产主义恶魔”进行恫吓，威胁，阴谋，欺诈，诱骗，暗杀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和民族解放会议成员，同占领者秘密勾结，配合他们反对革命力量的行动等。有时，“国民阵线”分子蒙骗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人。有些农民在“国民阵线”的唆使和胁迫下，不让游击队员在他

们的村庄宿营，反对在战斗中武装袭击意大利军队，不承认民族解放会议。

对这种情况如不予以制止，就会使民族解放战争力量的最大基础和源泉——农民走向中立，从而使这一战争的胜利受到威胁。由于党在对客观条件和国内具体形势深刻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了坚定的、经过仔细权衡的立场和行动，这种危险才得到了克服。

绝大多数农民是要反对占领者和解放祖国的。只有共产党天天在以行动实现这一要求。“国民阵线”是反对同法西斯作斗争的。它的这种立场是同农民和全国人民的愿望、要求背道而驰的。

一九四三年春，一些农民受了“国民阵线”头目的蒙蔽，听信了他们的“劝告”，没有用武器迎击来犯的意大利军队，当意大利军队进村时，也没有逃避，他们真的以为法西斯不会侵犯他们。但是法西斯不分青红皂白把村庄烧光，野蛮地屠杀了没有逃避的妇女、男子和儿童。这对所有受反动派欺骗的人是一次惨痛的教训。

为了破坏民族解放阵线，“国民阵线”越来越同占领者靠拢，同占领者一道进行反对民族解放会议和游击队的勾当。“国民阵线”匪帮直接帮助意大利军队，对库尔维莱希、佩萨、马拉卡斯特尔、台佩莱纳、科尔察、斯库台的莱奇等地的游击队和人民进行扫荡。“国民阵线”分子的这种立场引起了人民的愤慨。

共产党支持农民反对法西斯掠夺粮食、奶制品、羊毛的斗争。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国民阵线”分子不仅劝告农民不要反对向占领者和吉斯林政府交纳农产品，而且帮助敌人对农民进行掠夺。“国民阵线”的这种行动使群众越来越远离它。

通过广泛的政治工作，共产党宣传自己的路线和民族解放阵线的纲领，揭露法西斯奴役者和卖国贼的阴谋，揭露“国民阵线”的头目和部队的每次反民族、反人民的活动和立场的真实内容和目的。

这样，农民根据自己的经验逐渐确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战胜法西斯占领者和卖国贼。他们正在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党才能实现他们世代对自由和土地的愿望，而“国民阵线”是不愿消除压迫和剥削的。

越是对“国民阵线”的蛊惑宣传和卖国行为进行揭露，农民和其他阶层人民就越接近党。在阿尔巴尼亚各地，人民群众讽刺“国民阵线”说：“笨驴，你就傻等到草长出来吧。——这就是‘国民阵线’的说法”，并给“国民阵线”起了“国民尾巴”的绰号。

谴责穆基协议 已形成的局势，要求尽一切可能避免法西斯占领者用种种手法挑起自相残杀的战斗。根据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最高民族解放会议七月会议研究了这个问题。最高民族解放会议决定，再作最后一次努力，使“国民阵线”作为组织离开背叛道路，争取它参加民族解放战争。为此，委派一个代表团同“国民阵线”头目就下述问题进行谈判：“国民阵线”应立即参加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停止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党；把法西斯分子、盗贼和罪犯从自己的队伍中清洗出去；承认民族解放会议；通过反法西斯的斗争和战斗，达到召开一次也有“国民阵线”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以讨论和解决一切有关联合的问题。

同“国民阵线”头目的第一次会晤是在地拉那附近的塔比查举行的，第二次是八月一日至二日在克鲁亚附近的穆基举行的。

“国民阵线”分子之所以同意同最高民族解放会议代表团会晤，仅仅是为了巩固由于他们的背叛行为被揭露而大大动摇了的地位，并指望在意大利投降后夺取政权；很明显，七月二十五日墨索里尼倒台后，意大利投降只是时间问题了。

在进行谈判中，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领导代表团的于麦

尔·迪什尼察在反动资产阶级、地主的压力和蛊惑宣传面前屈膝了。他不坚决捍卫共产党的路线和最高民族解放会议决定对“国民阵线”采取的正确立场，却在穆基接受了直接违背民族解放战争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利益的协议。代表团团员穆斯塔法·纪尼希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是反动资产阶级利益的狂热支持者。

穆基协议把破坏民族解放战争、用各种办法帮助法西斯的“国民阵线”说成是和民族解放阵线一样的反法西斯战士。于麦尔·迪什尼察和穆斯塔法·纪尼希不要求“国民阵线”参加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却赞同了“国民阵线”关于“宣布独立”、推翻“四月十二日的法西斯立宪会议”（几乎所有“国民阵线”头目都参加了这一会议，而人民从来没有承认过它）的蛊惑要求。他们赞同了关于“种族的阿尔巴尼亚”的虚伪口号，法西斯和反动派用这个口号作为武器，欺骗阿尔巴尼亚人民，使阿尔巴尼亚人民忘记当时的主要敌人，并敌视邻国人民。他们赞同了反动派的建议，成立一个“阿尔巴尼亚救亡委员会”，由“国民阵线”和民族解放阵线各派等数代表组成。委员会具有临时政府的性质。

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最高民族解放会议和整个民族解放会议政权，完全被遗忘了。在没有经过最高民族解放会议和党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于麦尔·迪什尼察和穆斯塔法·纪尼希就同意散发“阿尔巴尼亚救亡委员会”的一个公告，把穆基决议通告人民。这样，他们就完全陷进了反动派的圈套。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并不是反对同“国民阵线”达成任何协议。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作了很大努力，争取“国民阵线”参加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它与民族解放阵线联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进行过谈判，同意为反对法西斯而成立“协调委员会”等。一九四三年七月最高民族解放会议关于同“国民阵线”头目进行谈

判的决定,是为了使它脱离背叛道路、参加反对占领者的斗争的最后一次努力。这一努力是为了祖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而在穆基达成的协议,违背了人民和祖国的利益。这个协议使人民迷失方向,转移人民对反对占领者斗争的视线,造成一种建立在上层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假团结的印象。穆基协议一笔勾销了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而最糟糕的是,为使政权转入反动资产阶级手中开辟了道路;反动资产阶级未放一枪,没有承担对外国奴役者进行斗争的责任,相反,始终同占领者勾结在一起。因此,这种协议是对人民、对革命的背叛。

由于这个原因,根据恩维尔·霍查同志的建议,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立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穆基协议。

党的总书记收到第一个措词含糊的报告后就已明白,在穆基会议上“是‘国民阵线’在指挥乐队”,他表示了很大不安,并提醒于麦尔·迪什尼察注意:

“……不要忘记我们党的利益,它应象过去一样,是民族解放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仍应是这样,而不应是这一战争中的一个派别。”〔55〕

当这一背叛行为已昭然若揭时,党的总书记把协议称为“在‘国民阵线’面前的彻底投降”,并给于麦尔·迪什尼察写信说:“你已彻头彻尾地陷进了‘国民阵线’的立场……”。这一协议“完全违背了我们的政治路线,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谴责”。〔56〕

中央委员会把这种严重违背最高民族解放会议决议和党的政治路线的行径告知了共产党员,并表示了自己的坚定立场:它决不同“国民阵线”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战争与人民民主政权的其他反对者分享这一战争、这一政权的成果。

于麦尔·迪什尼察和穆斯塔法·纪尼希的投降,帮助“国民阵线”利用穆基协议来反对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制造混乱。党的各

级组织必须进行广泛的解释工作，揭露这一协议的反动内容和“国民阵线”想在占领者帮助下抢夺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战争胜利果实的企图。

民族解放会议—— 为了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团结，一九四三年九月四日至九日在拉比诺特召开了第二次民族解放代表会议。

代表会议抓住人民民主政权问题作为主要环节。随着斗争的革命进程的深入发展，这个问题就越来越重要了，特别是因为“国民阵线”和所有反动派都在千方百计地企图夺取政权。

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会议提出了一个口号：

“承认民族解放会议是阿尔巴尼亚唯一的人民政权”。〔57〕

第二次民族解放代表会议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扩大民主基础和集中人民政权的措施。它扩大了最高民族解放会议，委员从七名（佩萨代表会议选出的）增至六十二名。它制定和通过了民族解放会议章程和条例，这都是具有宪法意义的文件。决定在最高民族解放会议和州民族解放会议内建立执行机关及其行政经济机构。

代表会议承认反法西斯青年联盟、反法西斯妇女联盟、反法西斯大学生联盟这些组织（不久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的）为民族解放阵线的组成部分，并指示要给它们以最大的帮助和支持。象阵线本身一样，这些都不是阶级组织，而是由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中的广大青年和妇女组成的，它们除了民族解放阵线的纲领以外，没有另外的纲领。

拉比诺特代表会议公开谴责了穆基协议，指出它是一个破坏了佩萨代表会议基本原则、违背了阿尔巴尼亚人民斗争和团结的利益的文件。

由于“国民阵线”继续进行危害民族解放运动的敌对活动和同意大利法西斯相勾结，决定对它采取断然的立场：彻底揭露它的反民族、反人民的政策，揭露它关于团结的蛊惑宣传和制造分裂、引起互相残杀的企图。同时指示，不要放弃努力利用同“国民阵线”和同运动以外的其他政治派别合作的哪怕是最小的可能性，但这种合作只能以佩萨代表会议的纲领为基础，而首先要以参加反对占领者的不妥协的、不间断的斗争和承认民族解放会议是唯一的人民政权为基础。

这一立场将擦亮受蒙蔽的人的眼睛，使他们脱离反动头目。

拉比诺特代表会议对“国民阵线”能否放弃背叛道路，没有寄予任何希望。代表会议向人民指出，“国民阵线”头目在勾结占领者和公开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上已越走越远。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根据拉比诺特代表会议的决议，指示各州委：

“……要在人民中清楚地说明，‘国民阵线’是分裂者、互相残杀的挑动者，要使人民看到，‘国民阵线’的政策将使我们走向武装冲突，要使全国人民都起来反对这种勾当，这样，历史的责任……就将如实地……由‘国民阵线’来承担；对于同‘国民阵线’的冲突，我们要有所准备，要使民族解放运动中所有的人都有所准备，要使人民有所准备；‘国民阵线’正在策划这种冲突，我们不要捆住自己的手脚……”〔58〕

代表会议在闭幕的那天获悉法西斯意大利已经投降。这一事件改变了阿尔巴尼亚迄今的形势。在新的形势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面临着新的任务。

六、加强反对新的占领者——德国 占领者和消灭反动派的斗争

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法西斯意大利宣布投降。这是德、意军队在苏德战线和北非遭到重大失败、同盟国军队在意大利南部登陆的结果。这也是意大利人民群众迅速增强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抵抗的结果。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四年半的时间内为摆脱意大利占领者的桎梏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对这一事件直接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意大利投降和我国被德国
纳粹分子占领后的新形势** 根据投降协议，总司令部立即号召意大利占领军或者交出武器，或者同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一道反对希特勒德国。但是意大利总司令没有响应这一号召。他命令驻扎在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军队向德国人投降。只有约一万五千意大利士兵、军官没有执行这一命令，他们向民族解放军投降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注意使所有投降的人在任何地方都受到友好的对待，不管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在阿尔巴尼亚干了多少暴行。对制造这种暴行的罪魁祸首，应予以清算，不论在战争期间或战后，任何时候一经抓住都要严加惩办。

在向民族解放军部队投降的意大利士兵中，一千五百人左右同意加入阿尔巴尼亚游击队的行列，对德国纳粹分子进行武装战斗。在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第一突击旅内成立了“安东尼奥·葛兰西”营。其他不愿进行战斗的士兵，被安置在我国解放区，尽管农民在经济上非常困难，但还是慷慨地接待了他们。

在阿尔巴尼亚，德国侵略者代替了意大利占领者。他们到处

都遭到了激烈的反抗。在斯特鲁加—利布拉什德公路上，在靠近发罗拉的德拉晓维察，在纪诺卡斯特附近的卡尔迪奇桥，在爱尔巴桑—地拉那公路上，在克鲁亚、科尼斯堡、戴尔维纳、萨兰达、比利什特，在科尔察—莱斯科维克公路上和其他地方，民族解放军部队给新占领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使他们没能占领阿尔巴尼亚全部领土。大部分地区和一些城市已经解放。

德国占领者把一支七万人左右的部队调到了阿尔巴尼亚。他们进驻阿尔巴尼亚后，就把扑灭民族解放运动 and 把阿尔巴尼亚人民变成德国的附庸作为自己的目的。为了达到这种目的，纳粹分子起初采用了这样的策略：企图制造“民族独立”已经取得和“阿尔巴尼亚主权国家已经建立”的假象来掩饰占领制度和欺骗人民。他们大吹大擂，说他们“作为朋友”而来，正是“为了使阿尔巴尼亚摆脱意大利的桎梏”，“如果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反共战争中给他们以支援”，德国军队“将保障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独立”！他们呼吁所有在山上的人交出武器，返回家园，因为在山上的人已在德国军队的帮助下彻底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希特勒分子唆使和帮助一些卖国贼宣布“阿尔巴尼亚脱离意大利”，建立“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国家”机关，如“执行委员会”、“摄政会议”、“阿尔巴尼亚政府”、“阿尔巴尼亚军队”、“阿尔巴尼亚宪兵队”等。反动派大肆宣传这种花招。

但是，不论希特勒分子采用什么手法，都绝对掩盖不了他们对阿尔巴尼亚的侵略。共产党早已明确告诉阿尔巴尼亚人民，德国纳粹分子是人类的凶恶敌人。德国纳粹分子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侵入阿尔巴尼亚的第一天，就完全踏平了波罗瓦，杀害了该村的全部居民、乃至摇篮里的婴儿。

连德国人自己也无法掩饰在阿尔巴尼亚建立的野蛮占领制度。他们在宣布“尊重”和“保障”阿尔巴尼亚的民族独立的同时，宣布解除所有居民的武装，打死任何一个德国士兵，进行任何一次

破坏，私藏任何武器或军事物资、食品，就要枪杀、绞死十个至三十个阿尔巴尼亚人。到处实行戒严。“摄政会议”和吉斯林政府没有得到德国占领军司令部的同意，不能作出任何决定。希特勒分子控制了国民银行和全国所有经济资源。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有为纳粹分子的蛊惑宣传所欺骗。他们更猛烈地对新占领者进行了斗争。不到一个月，希特勒分子就已相信，阿尔巴尼亚人民是他们的死对头，是一切通敌的“摄政会议”、“阿尔巴尼亚政府”的死对头。

一九四三年秋天，民族解放军部队对希特勒军队和全国各地的反动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打击，击毙数千敌人。十月十八日，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炮兵轰击了根据德军司令部倡议召开的吉斯林分子的立宪会议。为配合这一行动，同日在地拉那散发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传单，题目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用什么来回答盖世太保会议？用大炮！》〔59〕

除了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的战斗外，战斗小组在被占领的地区和城市进行各种牵制活动。这种活动变得更频繁、更有组织了。

党中央极其注意使反对新占领者的武装斗争在阿尔巴尼亚各地不断猛烈开展，并为此而进行紧张的活动。当它获悉在金·马尔库领导下的培拉特州司令部临时允许德国士兵自由进入已解放了的培拉特市时，认为这一行动是一种罪行，并进行了严厉谴责。

恩维尔·霍查同志当时给州司令部写信说：

“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游击队指挥部做任何事情，但是同我国人民和人类最大的敌人妥协，哪怕是一分钟，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即使你们全军覆没，即使你们已取得的全部工作成果受到威胁，那也无论如何不应同野蛮的纳粹分子妥协。”〔60〕

德国军队占领后，阿尔巴尼亚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势。这种形势的主要特点是：各种反动集团、派别和势力已在新的占领者周围聚集起来，并投入了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公开的、全面的战争。

国内反动派已越来越感到无法用自己的力量应付形势了。反动派的这种无能和他們同德国占领者的目标一致，使阿尔巴尼亚卖国贼公开向纳粹分子寻求支持和保护，并把自己的军队置于纳粹分子的指挥之下。

消灭国内反动派是 “国民阵线”、宗族首领、天主教上层人物
胜利地进行反对占 和所有法西斯政客，都很快就同德国占领者
领者的斗争的条件 同流合污了。“国民阵线”和宗教界的头目以
及其他反动派别的代表，参加了摄政会议、政府和其他高级吉斯林机关。

现在，既然“国民阵线”已完全走上了卖国道路，同德国纳粹分子一道投入了用武力公开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那么共产党和最高民族解放会议就不得不同样以武装斗争回击占领者的这些走狗。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示说：

“现在，同‘国民阵线’讲团结已是不可能的了，再谈不上这种事情了。现在要谈的是消灭‘国民阵线’的问题。”〔61〕

正是这时，阿巴兹·库比及索古分子的背叛行为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阿巴兹·库比在拒绝参加拉比诺特代表会议以后，脱离了民族解放阵线。他参加民族解放阵线是抱有既定目的的，即为了提高索古的声望，阻止共产党的威信、影响和领导作用的提高。他一贯秉承英帝国主义者旨意行事，英帝国主义者企图通过索古分子，控制民族解放运动和战后的阿尔巴尼亚。由于没有能达到这种目的，在意大利投降后形成的局势下，他以为消灭

民族解放阵线和共产党的适宜时机已经到来。在英国人的帮助下，他于九月宣布成立“合法派”；十一月，他召开了该组织的所谓“代表大会”。“合法派”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使阿尔巴尼亚人民脱离共产党，把阿尔巴尼亚人民聚集在阿巴兹·库比的周围，以便复辟索古政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索古分子掀起了一个广泛的运动，宣传这是唯一“合法的”政权，把这一制度美化成“自由、安宁、有秩序、和平和正义的制度”！他们要求各政党，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党，聚集在“合法派”的旗帜之下！同时，阿巴兹·库比把自己的力量同吉斯林政府、“国民阵线”联合起来，并以德国占领者为靠山。

纳粹分子虽然明知阿巴兹·库比和“合法派”是英国人的走卒，但仍准备随时给他们以一切支援。消灭共产党和扑灭民族解放运动这一共同的最近目标，使希特勒分子和索古分子联合起来了。

共产党尽了很大努力，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劝阿巴兹·库比和索古分子放弃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敌对立场，参加民族解放阵线，投入反对德国人的武装斗争。关于“合法派”的成立问题，共产党再次声明，它不反对在国内成立一个索古派政党或其他政党。但任何要成立的党，都必须反对占领者，参加民族解放统一战线。

在这一具体情况下，民族解放阵线以外的任何政党、任何组织和任何武装部队都不可能是中立的，一定是为敌人效劳的。因此，阿巴兹·库比竭力执行英国人要他不暴露自己是德国占领者的帮凶的指示，也是枉费心机。十二月初，最高民族解放会议在研究了阿巴兹·库比的反民族罪恶活动后，正式决定把他开除出最高民族解放会议和总司令部。同时，最高民族解放会议指示，要把阿巴兹·库比作为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敌人、把“合法派”作为卖国组织予以揭露。

各种反动派同德国占领者一道对民族解放军和民族解放阵线发动公开的武装进攻，说明国内的政治阶级力量发生了深刻的分化。革命运动使这些势力分化成彼此势不两立的两个集团。一方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绝大多数——工人阶级、贫农、中农、小资产阶级、大部分城市中产阶级、爱国知识分子、上层中的个别人，他们团结和组织在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中。民族解放阵线以民族解放军为主要突击力量，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首先以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为外部支援。另一方是地主阶级、宗族首领、反动资产阶级、大多数富农、反动知识分子和反动僧侣，他们聚集在成分复杂、彼此没有牢固联系的组织和集团之中。反动派的武装力量是宪兵队，“国民阵线”分子、索古分子和宗族首领组织的匪帮。反动的组织和武装力量不是一个单独的、独立的集团，它们是为纳粹占领者效劳的，主要靠纳粹占领者豢养的。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发出指示，要用武力消灭民族解放阵线以外的反动的组织和武装力量，并把对反动派的斗争看成是反对占领者的总斗争的组成部分。总司令部命令游击队清除所有解放区的反动派。同时对德国纳粹分子的走狗进行斗争，就不可能卓有成效地对德国纳粹分子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

广大人民群众立即支持党为消灭“国民阵线”、“合法派”和其他反动势力所采取的立场。他们自己要求这样做，因为经验已使他们确信，这些组织是进行卖国活动的。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不得不用武力反对“国民阵线”和“合法派”的时候，并没有放弃它在建党会议上和在全国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所制定的总路线。斗争的民族解放性质，不分阶级、政治信仰、宗教和地区，把全阿尔巴尼亚人民团结在民族解放阵线中的原则，都同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变化。民族解放阵线的大门对那些没有血债的、脱离了反动组织、反动武装部队的“国民阵线”分子、索古

分子和宪兵也是敞开着。发布了指示，要不断进行努力，使受蒙蔽的人脱离卖国头目。

党特别注意不要削弱反对德国占领者的斗争，德国占领者始终是主要敌人。

不允许对民族解放战争 一九四三年秋天，阿尔巴尼亚人民事业进行任何外来干涉 的民族解放战争遇到了另一威胁——来自英、美同盟国的威胁。

早在一九四三年五月，英、美地中海司令部代表（未经邀请）就来到了阿尔巴尼亚。一个英国军事使团被派驻总司令部，后来又来了美国军事使团。一些英国军官还被派驻某些游击队指挥部。他们说，他们来阿尔巴尼亚是出于同希特勒分子作斗争的共同军事利益，并在口头上承担了用武器和其他必要的军事物资支援民族解放军的义务。事实上，他们主要是抱着政治目的来到阿尔巴尼亚的。他们从这种目的出发，进行破坏活动，成为反对占领者及其在阿尔巴尼亚的走狗的斗争的障碍。英国人、美国人把大部分援助给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对者、反动军队。他们向这些反动军队派驻了特别军事使团，给它们供应武器、弹药、服装、黄金。当“国民阵线”和“合法派”同德国人勾结起来反对民族解放阵线时，英、美军事使团既没有撤离，也没有断绝对它们的援助。英、美军队地中海司令部开始向总司令部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不要对反动军队进行任何打击。它要求承认英、美军官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内部事务的仲裁作用。

实践证明，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丝毫没有真正援助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的目的。它们只想阻止人民革命力量取得胜利，消除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威望和影响，建立英、美对巴尔干国家的控制。

共产党认为英、美的干涉威胁着革命的胜利和民族独立，对这

种干涉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强硬的立场。通过总司令部严正警告同盟国使团，要它们放弃干涉阿尔巴尼亚内部军政事务的活动，不要阻挠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希特勒占领者及其走狗的斗争的发展。所有继续站在反动军队一边的英、美军官将被认为是敌人。中央委员会给各州党委指示说，同盟国军事使团

“不应该干预内政，绝对不应被认为是我们和反动派之间的仲裁者。如果他们喜欢我们反对反动派的斗争，那好，否则，让他们滚蛋”。〔62〕

不遵守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任何同盟国代表，要押送总司令部，然后驱逐出阿尔巴尼亚国土。

这种对待英、美同盟国的断然的、正确的革命立场，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革命的命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首先是加强政权和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

在法西斯意大利投降后的新形势下，政权问题有了更加重大的意义。反动派为破坏民族解放会议政权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而在穆基进行的十分危险的尝试遭到失败后，又为破坏这一政权而采用了新的手法。他们想用武力消灭民族解放会议。他们想在德国占领者的赞同和支持下，复辟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旧政权，以代替民族解放会议。纳粹分子毫无异议地支持了“合法派”所提出的关于索古政权的主张。纳粹分子建立的吉斯林“摄政会议”，让索古分子在卖国政府和宪兵队中担任要职，“合法派”享有出版和发行刊物、在德军占领的城市和地区进行活动的自由，都清楚地说明了这点。英、美政府特别支持复辟索古政权。这时，丘吉尔在伦敦同索古就建立阿尔巴尼亚流亡王国政府问题进行了会谈。

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给了这些阴谋以毁灭性的打击。在这种形势面前，党中央指示说：

“首先，我们面临的是政权问题……，在各地建立民族解放会议，巩固民族解放会议，保卫民族解放会议不受‘国民阵线’或任何其他竭力破坏或公开反对它的党派的任何企图的威胁。除了民族解放会议政权以外，不能有任何其他政权存在，对这一点不应该抱暧昧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妥协和骑墙态度。”〔63〕

培拉特州委会和纪诺卡斯特州委会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它们法西斯意大利投降后，没有立即采取措施摧毁这些已解放的城市的旧政权机关，而允许这种机关为“国民阵线”所控制和利用。经过批评，这一错误已立即按照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加以纠正。

各级党组织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揭露旧制度是贫穷和压迫的制度。它们更清楚地向人民群众说明，如果不用暴力来夺取，谁也不会把政权让给你、赠给你；阿尔巴尼亚人民将用自己手中的武器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允许把索古政权强加给自己；英国人和美国人没有任何权利干涉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政权问题和其他军政事务。

为了加强人民政权，根据第二次民族解放代表会议的决议和会上通过的民族解放会议章程、条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已解放的所有城市和地区，选举了新的民族解放会议，在某些州还召开了民族解放会议州代表会议。民族解放会议清洗了动摇分子。它的组成扩大和改善了。最高民族解放会议和已经解放的州、地区 and 市的民族解放会议的管理工作，随着执行机关和行政管理、经济机构的建立，得到了改进，并活跃起来。

民族解放会议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

随着反法西斯青年会议、反法西斯妇女会议在全国的建立，人民群众在党和民族解放会议周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了。

加强军队仍然是民族解放战争的主要问题，保障民族独立和建立人民政权都取决于这个问题。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一九四三年秋天，大部分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成员参加了民族解放军。农民、工人和学生中成千上万的青年响应了共产党关于扩大游击队的号召。

从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起，民族解放军人数增加了一倍。秋天，新成立了两个突击旅（即第二旅和第三旅）。

总司令部指挥战斗行动，领导和监督执行关于成立新的旅和大队及营、关于培养干部、关于冬季食品和服装的供应的计划。总司令部批评了那些违背或不善于执行革命游击战争要领的游击队指挥部，使其走上了正轨。总司令部从部队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并通报各级司令部、指挥部引以为戒。总司令部特别对那些没有发动进攻、在阵地上等待敌人的指挥部进行了严厉批评。它从德国司令部企图运用反游击战战术的尝试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已经采取的各项措施，使敌人的这一计划完全失败了。德国纳粹分子为迫使游击队正面作战的企图也遭到了破产。

反对新的占领者——德国占领者的斗争的胜利发展、人民政权的扩大和巩固，进一步提高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声望。希特勒分子、国内反动派和英、美帝国主义反动派使人民脱离党的企图破产了。人民群众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对敌人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自然，德国占领者和卖国贼对这种形势是不会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无情地打击共产党和民族解放军，竭力使这种形势发生有利于他们的变化。

中央委员会指示各级党组织丝毫不要为成绩所陶醉，要客观地观察和正确地认识形势，注意不要遭到突然袭击，自己要有所准备，要使游击队员和全国人民有所准备，以便克服面临的巨大困

难。比一切都重要的是要使党象钢铁一样坚强。

“我们党肩负的担子是 eksepsionalisht(非常。——编者)重的,为了挑起这副担子并取得胜利,我们就必须有坚强的脊椎,就必须有有组织的、坚强的党,我们的同志就必须具备应有的政治军事水平,以便在这种困难的、决定性的时刻和形势下能应付一切突然事件,并且不犯方向错误。”〔64〕

七、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是阿尔巴尼亚人民 粉碎敌人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间的 冬季计划的英勇斗争的组织者

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间的冬季,德国占领者在阿尔巴尼亚卖国贼的帮助下,对民族解放军发动了巨大攻势,其目的是为了摧毁民族解放军,扑灭民族解放运动。直接参加这次攻势的有四个希特勒师和几千宪兵,“国民阵线”分子和索古分子,共约四万五千人。这时,民族解放军战士有两万左右,分散在阿尔巴尼亚全国各地。

这样,敌人在军队人数上是占优势的,而在作战技术装备方面更占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这时,游击队严重缺乏武器、弹药、食品和服装。此外,他们不得不在冬季的艰苦条件下,在山区进行战斗。

敌人冬季攻势的破产 敌人的巨大攻势是分两个主要阶段进行的。

在第一阶段(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一月),希特勒军队和反动军队在阿尔巴尼亚中部和北部发动了一系列进攻。德国纳粹分子在阿尔巴尼亚卖国贼的支持和带领下,同时从很多方

面发动进攻。他们进犯民族解放军部队所控制的地区，造成了对人民和游击队十分严重的局势。敌人使爱尔巴桑州、迪勃拉州、克鲁亚地区、马蒂地区和地拉那区各营，使第二旅、第三旅都遭到重大损失。很多战士在激烈的战斗中牺牲了，一部分人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被打散了。尽管这样，阿尔巴尼亚中部和北部的游击队并没有被消灭。攻势结束后，他们被迫以小部队在敌占区或封锁区进行活动。佩萨大队虽然遭到了损失，但保持了主力、常备的战斗力和战斗准备。

对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和总司令部的领导造成了十分危险的局势，他们被敌人封锁在切尔麦尼克—圣乔治—马尔塔奈什地区。纳粹分子、“国民阵线”分子和索古分子为了发现和消灭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机构，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他们没有得逞。很多农民知道民族解放战争领导机构所在地，但是谁也没有被敌人的威胁所吓倒，谁也没有出卖共产党和总司令部。党和人民的领导人在农民的帮助下，英勇地、冷静地克服了异乎寻常的困难，突破了包围，没有遭到损失。

这时，希特勒分子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发动了局部进攻。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马拉卡斯特地区 and 麦萨普利克地区的进攻。

德国占领者企图通过这些进攻，箝制阿尔巴尼亚南部的游击队，使这些游击队无法增援阿尔巴尼亚中部和北部的游击队。同时，这种行动也是对民族解放军发动决定性进攻的准备。敌人企图以天天战斗的办法使游击队精疲力竭，消耗他们的弹药，搞清他们的战斗力，夺取他们的主动权，使他们士气沮丧，使农民害怕遭到严厉惩罚，最后迫使游击队集中到最狭小的地带，以便更易于包围和歼灭。

敌人的冬季大攻势的第二阶段是在一九四四年一月至二月进行的，矛头指向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在阿尔巴尼亚南部的的主力。

在这一阶段中，德国占领者和卖国贼连续发动了三次进攻。他们到处碰到了游击队的英勇抵抗。特别在俄巴尔、邱比的登达（斯科拉巴里），在佩尔梅特附近，纪诺卡斯特的卡拉迪奇，在发罗拉的瓦伊查和德尔巴奇，他们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这些打击给敌人在人员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粉碎了他们的计划。当希特勒分子以为完成了对游击队的完全包围，等待游击队投降的时候，民族解放军各部队指挥部以迅速灵活的战术分散兵力，突破包围，迂回到敌人侧翼和背后，对敌人进行了突然袭击。

虽然战斗是在十分严重的形势下进行的，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但除某些地方营外，在阿尔巴尼亚南部活动的各旅和游击大队，都没有被打散，没有丧失战斗力和战斗准备。

同时，希特勒分子继续进攻阿尔巴尼亚中部和北部一些地区，如佩萨、达依特地区、特罗波亚等地。

德国占领者在阿尔巴尼亚进行史无前例的恐怖活动，来配合对民族解放军的大举进攻。他们抢劫了许多村庄，并将这些村庄化为灰烬。数以千计的男女老幼被他们枪杀、打死、活活烧死、监禁或送往死囚集中营。所有阿尔巴尼亚城市实际上都变成了集中营。德国纳粹分子、宪兵队和“国民阵线”分子，不分白天黑夜，经常闯入民房，进行破坏，能抢到什么就抢什么，强行抓走男女青年、妇女、老人，对他们进行毒打，不经审讯就对他们进行杀害，然后甩到路上，或扔进沟里。把抢走或从坟中取出的被杀害的游击队队员尸体驮在牲口上，在城市游街，或者放在集市广场上示众。二月四日，即在地拉那大屠杀的那天，敌人在他们的刊物上写道：“鲜血是对传染病人的根本治疗。如果我们要恢复安宁，就应使地拉那街道上血流成河。一天的恐怖保证十年的安宁。”但是，对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恐怖行动，没有使希特勒刽子手和阿尔巴尼亚卖国贼得到一分钟的安宁。

除了进行恐怖活动和抢劫外，德国纳粹分子和反动派还企图利用饥饿迫使人民放下武器。他们封锁了城市和生产粮食的农村地区，不让一粒玉米、一粒小麦运进山区——游击队的根据地。但这一企图也失败了。

为了迷惑人民，占领者及其走狗一再大肆叫嚣什么游击队已被击溃，共产党已被消灭。但正在这时，民族解放军掌握了行动的主动权，转入了反攻。二月和三月，阿尔巴尼亚南部的游击队差不多完全肃清了德国军队和反动军队在进攻时期侵占的地区的敌人。阿尔巴尼亚中部和北部虽然一时还处于希特勒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控制下，但这些地方的游击运动并未被扑灭。第一旅部分部队(二月至三月)通过切尔麦尼克、哥罗波尔达、马蒂、圣乔治、佩萨和杜姆雷，英勇地深入敌后，加强了人民对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的信赖，促进了我国北方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德国占领者和卖国贼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间的冬季发动的巨大攻势破产了。在战场上同敌人搏斗中，由于严寒、重伤和疾病，有一千多名游击队员牺牲了，但是，民族解放军的队伍既没有缩小，也没有削弱，相反，它扩大和增强了。总司令部成立新旅的计划没有停止执行。在冬季，成立了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七旅。在同敌人的搏斗中，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民族解放军的士气受到了空前的锻炼。指挥员、政委和普通战士取得了丰富的军事政治经验。用在战斗中夺来的德国新式武器大大改善了游击队的装备状况。

占领者和卖国贼虽然处于攻势，可是他们在人员方面遭到的损失，差不多比游击队大两倍。但他们的最大损失是政治损失。特别是大部分反动军队开始更清楚、更深刻地看到，反对民族解放阵线的战争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已失去赢得这场战争的信心。

敌人没有能够摧毁绝大多数民族解放会议，也没有能使它们中断自己的活动。民族解放会议向民族解放军提供食品、服装、运

输工具，特别是向它输送志愿入伍的青年，从而给了它以巨大的支援。民族解放会议进行了积极的活动来提高人民的士气和斗志，抚恤战争受害者，救济农民群众免于饿死。

在敌人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间的冬季攻势中，共产党、民族解放军和全阿尔巴尼亚人民经受了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最大、最严重的考验。

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在这一考验中表明，它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士气高昂、无限忠于祖国和人民的军队。民族解放军战士虽然缺衣少鞋，忍饥挨饿，日夜战斗和行军在白雪皑皑的高山峻岭，但是他们从不叫苦叫难，对胜利和自己捍卫的事业的正义性从未丧失过信心。被敌人四面包围的个别游击队员或小批的游击队员，认为冻死饿死或者在战斗中牺牲，也比向敌人投降好一百倍。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比永远珍惜民族解放军战士称号和荣誉并使之不被玷污更可宝贵的了。指挥员和政委在运用游击战术方面，表现了高度的技巧；在判断形势和作出决定方面，表现了才干和政治上的成熟性；在独立活动方面，表现了主动精神。

总司令部通过它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成员监督它过去颁发的命令和指示的执行情况，从军事和政治方面对形势作出估计，发布新的必要的指示。尽管部队十分分散，但总司令部对军队的监督、帮助和领导从未中断过。这一时期最大的危险是部队的战斗进攻精神下降，产生了战斗后要求休息和歇口气的情绪。总司令部克服了这种危险，要求民族解放军立即投入反攻。它教导说，进攻能使军队保持高昂的士气，节约时间和精力，使敌人士气低落，抵销敌人在数量上、技术装备上的优势。进攻是适合革命军队的唯一战争方式。战士的进攻精神是在与占领者和反动派的不断斗争中，是在捕捉战机而不是等待战机中发扬起来的。

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间的冬季这个困难时期证明，阿尔巴

尼亚人民具有高度的觉悟和决心作出解放战争所要求的巨大牺牲。是人民群众的支援挽救了民族解放军，使它免遭覆灭，鼓舞了它，增强了它的力量，使它在力量悬殊的战争中赢得了胜利。农民从不把在战斗中疲劳了的游击队员拒之于门外，他们把留给自己孩子的最后一点面包分给游击队员。在城市里，青年、妇女和少年不顾种种危险，散发党的宣传品，参加党和民族解放军各机关之间的联络工作。许多青年、妇女和少年牺牲了生命，很多人遭到了监禁和流放，但是，敌人的恐怖手段没能征服他们的意志。

卖国贼和德国纳粹分子尤其企图使青年脱离共产党，强迫他们交出武器。青年对敌人的呼吁和威胁是这样回答的：

“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青年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一个决定：战斗到胜利……反法西斯青年在绞索面前脸不会改色，在枪弹面前不会感到恐惧，在敌人和卖国贼的进攻面前不会失去勇气。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必胜。他们决心不惜一切去夺取胜利。他们必将赢得胜利。”〔65〕

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政治 路线正确性的重大考验

共产党是民族解放军和全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间的冬季这个最困难时期进行英勇抵抗和斗争的鼓舞者和组织者。

这一时期更清楚地证明，党同群众的联系是多么牢固坚强，党的政治路线是多么正确。民族解放军的战士和人民群众一刻也没有失去对党的信赖。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儿女在战场上、在绞索下、在严刑拷打下牺牲时，都高呼共产党的名字。数以千计的普通老百姓宁愿自己牺牲一切，也要保卫党不受敌人的打击。

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间的冬季，党同群众的联系进一步

加强了。阿尔巴尼亚人民更清楚地看到和更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是能保证消灭外来压迫、赢得民族自由和独立、维护阿尔巴尼亚人民利益的唯一领导力量。

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民族解放军战士和人民群众，不论在任何地方，在乡村和城市，在解放区和被占领区，都直接感到党的帮助，他们看到党没有抛弃他们，他们每天都从党的救星般的教导和指示中吸取营养。

不论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还是在艰苦的行军中，政委、政治部和党组织都进行全面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工作，从而使游击队员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和战斗精神，使他们对胜利的信心不致削弱。不论在任何危急的形势下，党组织都要举行会议。在会上集体作出决议，保证战斗的胜利，保证共产党员在战争中、在克服艰难困苦中的先锋作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间的冬季，由于一批在同敌人的战斗中、在复杂形势下经受过考验的共产党员补充进来，军队中的党员人数增加了。

在被占领的城市和地区，虽然剩下的共产党员有限，但是党的工作并未削弱。敌人千方百计地企图消灭共产党，各州党委根据敌人实行恐怖和残酷迫害的情况，重新安排了支部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积极分子的工作。党在被占领的城市中的组织从未停止过印发通报、公报、传单和告人民书的工作。使敌人感到恼火的是他们无法发现印制这些材料的地方，无法破坏党的组织。最严格的戒严状态，也没有能够阻挡民族解放会议、反法西斯青年和反法西斯妇女组织以及战斗小组的活动。战斗小组根据州委计划采取的勇敢的行动，使敌人一刻也没有得到安宁，使城市居民的士气不致低落。各州党委经常十分关心每个共产党员的活动，使党员经常了解事态的发展，决不允许党员消极无为，给他们发出指示，交给他们具体任务。共产党员特别关心那些动摇的人，鼓励他们，不

让他们成为敌人压力的牺牲品。共产党员同政治犯、同在城市里的掉了队的、生病的和受伤的游击队员保持联系。在监狱和集中营里有党支部进行活动。各州委为民族解放军征集支援物资、服装和药品，收集关于敌人情况和计划的情报，送给游击队司令部。

敌人的冬季攻势再好不过地证明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员的勇敢精神、忘我精神和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很多党员、九名州委委员、一名旅政委和中央候补委员瓦西里·尚托，在同希特勒分子和反动派的搏斗中献出了生命，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共产党员的榜样和英雄气概鼓舞着人民群众对占领者和卖国贼进行抵抗和斗争。

在那种艰苦的时刻和复杂的形势下，党中央和恩维尔·霍查同志亲自不断领导，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们同各州委和民族解放军政治机关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总书记也从未中断过同那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直接指挥战争的中央委员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克服种种障碍和危险来保持的，即使在党的主要领导人被封锁在切尔麦尼克和圣乔治山区时，也没有中断过。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以最大的注意力研究报告和情况反映，从中得出结论，对整个形势和党在每个地方、每个部队的状况、活动进行总结。在这个基础上，拟定和发出必要的指示，批判错误和缺点，教导同志们应如何为解决复杂的问题而努力。总书记把重大问题告知所有中央委员，要他们发表意见，并对这些问题提出建议。

中央委员会指示说，不管反动派如何强大，哪里有人民，我们就应在那里。这是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指导党组织进行实际活动，使群众士气在国家经历的困难时刻不致下降，顶住敌人对人民的压力。在这时期，党的领导批评了发罗拉州委会，因为它曾一度失去了同城市的联系。

由于敌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青年身上，所以中央委员会特别

关心青年，使青年不要在斗争面前丧失勇气和退却。在党的领导的直接关怀下，占领者和卖国贼迫使青年脱离民族解放军的一切企图都遭到了破产。纳粹分子和反动派就他们炮制的、由在艰苦的时刻发生动摇的个别青年签名的一些反共启事掀起了一场震耳欲聋的叫嚷，这种叫嚷也遭到了揭露。敌人妄图通过成立体育和文化俱乐部和小组来争夺青年，但丝毫未能得逞。建立所谓“独立青年”组织的企图，还处于萌芽状态就被粉碎了。

在地拉那州委中，有人认为可以让某些青年发表“不参与政治”的声明，以避免监禁和流放；恩维尔·霍查同志一经获悉，就严厉批评了这种观点，并提醒大家注意，任何时候都不要堕入敌人的圈套。有人建议把民族解放阵线中的一些人组成为“民主共和党”，说什么这是为了把“国民阵线”中的那些反对自己的头目的人争取到民族解放阵线中来，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拒绝了这一建议。成立这样的党，被认为完全是人为的，有害于解放战争的。

中央委员会非常注意使党的领导人那种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不要陷入悲观主义，不要失去对自己的力量、对全党和人民的力量信心。恩维尔·霍查同志批评了一些地方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间的冬季出现的某些悲观主义表现，并指示说：

“形势的确是困难的、很困难的……，但正是在这种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应力争不要迷失 nordin……”（目标，方向。——编者）。〔66〕

恩维尔·霍查同志在谈到第二旅、第三旅和某些地方营所受的损失时，认为由于这些损失而灰心丧气，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指出，没有不受损失、毫无伤亡的战争。主要的是不要迷失方向，不要失去对自己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信心，要善于聚集力量，巧妙地随机应变，弥补损失，准备应付可能产生的最坏的形势，善于使形势有利于自己。没有比在危急的形势下迷失方向和消极无为更

为危险的了。

中央委员会最注意的是维护党，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坚强。它指示领导干部在工作中不仅要有胆略，而且要有智谋，不要在不必要的情况下盲目冒险。他们首先应成为稳健、英明的政治领导者，要善于根据情况进行工作，要对敌人用来消灭领导干部和破坏党组织的阴谋诡计保持警惕。中央委员会经常要求保护党不受敌人可能专门派进党内的奸细的破坏，注意那些过去有浓厚的小组习气的人，因为在那种困难的形势下，这种习气有复活的风险。党的警惕性和共产党员的政治锻炼，使这种危险得以避免。

即使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间的冬季那种严重的形势下，中央委员会也还是抽出时间和创造条件在科尔察州巴那尔举办了理论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党在民族解放军中的主要干部和党的一些地方干部。

由于中央委员会和党在地方与军队中的所有领导机关的关心和积极活动，党的工作从来没有象这一时期这样卓有成效，党从来没有象这一时期这样团结一致和成熟。在共产党的力量和威望面前，敌人消灭和削弱党的一切企图都遭到了破产。希特勒盖世太保和“国民阵线”妄图建立“真正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以代替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这些企图也落空了。

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间的冬季的激烈战斗和严重困难，加强了共产党、民族解放军、民族解放会议和全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革命锻炼，使他们作好了准备，投入反对纳粹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斗争中的决定性战斗。

八、人民民主新国家的建立

敌人的冬季攻势失败后，一九四四年春天，阿尔巴尼亚民族解

放战争有了新的高涨。从三月起，战争的主动权已转到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手中。根据总司令部四月五日的命令，游击队在各地都转入了进攻。什贡比河以南的几乎所有地区重新获得解放。在阿尔巴尼亚中部和北部，游击运动已活跃起来。纳粹占领军和反动军队在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战士经常袭击的威胁下，又被迫龟缩到城市兵营和主要公路、海岸的工事中心。

民族解放战争的蓬勃高涨，无限加深了阿尔巴尼亚境内的敌人队伍中的危机。反动组织和反动军队内部开始分崩离析。宪兵队、“国民阵线”分子纷纷逃散。

截至一九四四年五月，民族解放军已达三万五千人。它已完全能够为解放各城市和全国而开始总攻。

由于红军对德国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一前景更为明显了。一九四四年一月，苏联军队在东线开始了强大的攻势。它以锐不可当之势向西挺进，四月，进入罗马尼亚境内。这样，德国在巴尔干的军队就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

粉碎敌人的新阴谋

敌人在这种危急、惊恐的情况下，妄图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出路，使形势发生有利于他们的变化。他们对德国司令部正在准备的向民族解放军发动大规模的新攻势寄以很大希望。为了准备这一攻势，阿尔巴尼亚反动派也全力动员起来了。希特勒分子计划攻势在四月开始，但是没有得逞，因为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以自己的春季进攻打破了希特勒分子的盘算，也因为网罗雇佣军的企图在人民对这一阴谋的抵抗下遭到了破产。

同时，阿尔巴尼亚卖国贼企图玩弄新的手法。他们妄想建立希腊和阿尔巴尼亚反动派的联盟，以后再使这种联盟变成希腊、土耳其、阿尔巴尼亚的军事同盟。根据敌人的计划，这些国家的联军

将用来镇压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在阿尔巴尼亚人民革命斗争力量面前，卖国贼的企图在萌芽状态就破产了。

反动派想大吹大擂地宣布某些经济措施，如“土地改革”、建立“国家经济开发公司”，以便欺骗人民，这种企图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卖国贼们许诺说，这些措施将保证农民、工人得到权利，将消除国家在经济上的落后状况，而在卖国贼们看来，这种落后状况正是阿尔巴尼亚遭到严重危机的原因！但是，这种漂亮的诺言是欺骗不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现在已经确信，只有战胜法西斯，只有消灭卖国贼，才能实现他们的理想和愿望。

当阿尔巴尼亚卖国贼正处在严重危机的时刻，英、美帝国主义反动派来搭救他们了。英国政府没有放弃把巴尔干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计划。它把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高涨看作是在阿尔巴尼亚执行这一计划的巨大障碍。最高民族解放会议和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没有接受英、美的旨意。只有依靠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对者和最大限度地削弱这一运动，才能使英、美帝国主义的计划得到执行。因此，同盟国军队地中海司令部加紧用武器和其他手段援助“合法派”、“国民阵线”和卖国宗族首领的反动军队。英国军事使团力图说服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不要把军队向阿尔巴尼亚北方作什么调动，因为那是“合法派”活动的地区，将会引起冲突！在伦敦，英国政府为建立阿尔巴尼亚反动流亡政府在加紧进行活动。

共产党认为，我国在一九四四年春天经历的时刻，对阿尔巴尼亚人民革命的命运具有决定意义。在这种时刻，必须粉碎敌人为了使形势发生有利于他们的变化的一切企图，击败国内外反动派的一切阴谋，采取军事和政治措施，保证国家获得完全解放，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在这些问题上，中央委员会确定的主要环节是使民族解放会议政权这一阿尔巴尼亚人民唯一合法政权得到巩固和在

法律上加以确认，建立具有自己的民主政府和自己的正规军的阿尔巴尼亚新国家。

佩尔梅特代表大会。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决定召开第一次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 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将

研究当时形势提出要解决的军政问题。一九四四年四月最高民族解放会议主席团会议讨论和通过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建议。

同时，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总司令部已开始制定关于把整个民族解放军变为正规军、关于把全部阿尔巴尼亚领土从德国纳粹分子和卖国贼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役和战略计划。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在斯克拉巴里的赫尔麦斯举行的全体会议讨论了这些重大军政问题。全会通过了中央委员会领导和最高民族解放会议主席团关于召开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的决定。关于成立临时民主政府和把整个民族解放军整编为正规军的措施被认为是适宜的。中央委员会正确地估计了英国政府和英美驻阿尔巴尼亚军事使团的敌对活动对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的危险性。它再次强调，坚决不允许任何盟国干涉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内部军政事务。

为了防患于未然，同时考虑到某些地方已经出现和将来可能在党内、军内或民族解放阵线内出现的不正确观点，全会提醒大家注意有关党的路线的两个重要问题。它警告不要对党的口号作任何修改，要彻底保持战争的民族解放性质。进一步宣传共产党是领导者——但始终要在民族解放战争路线的范围以内——被作为一项任务提出来了。中央委员会是以下述事实作为这点的根据的：革命的反法西斯的、反帝的、民主的阶段尚未结束，而且，在阿尔巴尼亚还没有得到完全解放、国家还没有民主化的时候，也不可

能结束。另一方面，全会指示要反对这种思想：民族解放战争一结束，就已万事大吉；德国人一被赶走，民族解放军战士就可解甲归田。全会要求使大家明白，在全国解放以后，阿尔巴尼亚人民还要拿着武器，以便保证完全的自由，消灭一切敌人，保卫已取得的胜利，进一步发展这些胜利。全会指示，党要仔细研究将发生的新情况，及时采取必要的立场和措施。

全会一致谴责了于麦尔·迪什尼察在穆基的投降和金·马尔库在培拉特同德国人的妥协。根据他们的这种严重罪过，全会将他们二人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

不论在解放区还是在尚未解放的地区，党在宣传关于召开第一届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的决议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人民广泛集会表示对共产党的忠诚和热爱，感谢党的正确领导和保卫祖国利益的英勇斗争，表示决心把反对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斗争进行到底，拥护关于召开代表大会和成立临时民主政府的决议。

由于处在战争的环境中，代表大会代表是以公开表决方式选举的。尽管这样，这是阿尔巴尼亚第一次民主选举。妇女也参加了选举；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她们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享有选举人民政权机关的权利。人民代表的选举，第一次不是以宗族地位和财产状况为根据，而是以在反对祖国的敌人和人民的敌人的斗争中的功绩为根据。大会的代表代表着起义的人民群众。

对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表明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成熟性和高度觉悟。它是共产党同人民具有牢固联系的另一重要证明。

第一次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的召开，使敌人极为惶恐。希特勒分子和反动派竭尽全力寻找会议地址，以便对大会发动武装进攻。英、美帝国主义者施加巨大的压力，并为破坏这次大会的召开而无所不用其极。英国政府认为召开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是“非法的”，

命令英国驻阿尔巴尼亚军事使团团长不要接受最高民族解放会议给他发出的以盟国代表身分参加大会的邀请。英国副首相、后来的首相艾德礼在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在下议院发表讲话，把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英勇斗争归功于这一斗争的敌人——“合法派”和“国民阵线”。

共产党密切地、警惕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它使敌人的一切企图都遭到了破产，代表大会根据既定的计划完全成功地进行了工作。

阿尔巴尼亚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是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解放了的佩尔梅特市举行的。

代表大会的工作贯穿着深刻的革命精神和完全的团结一致。代表们踊跃地讨论了恩维尔·霍查同志代表最高民族解放会议所作的报告：《关于与国际事件相关联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民族解放战争的发展》。他们一致赞同所提出的全部建议。

代表大会选出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作为阿尔巴尼亚最高的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作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阿尔巴尼亚国家主权的代表。在佩尔梅特选出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是阿尔巴尼亚第一届人民议会。代表大会责成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组织具有临时人民民主政府性质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的反法西斯解放委员会是阿尔巴尼亚第一届人民民主政府。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总书记恩维尔·霍查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

佩尔梅特代表大会建立了人民政权最高机关，并决定：“根据人民今天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上庄严表达的意志，建立人民民主的新阿尔巴尼亚”；禁止前国王索古返回阿尔巴尼亚；不承认可能在国内或国外建立的违背阿尔巴尼亚人民意志的其他任何政府；对德国占领者和阿尔巴尼亚卖国贼继续进行更加激烈的斗争，

直到彻底消灭他们和在全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就作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决定，这些决定为代表大会所通过，并成为阿尔巴尼亚人民民主国家最早的法律。把索古政府同外国缔结的一切政治经济条约作为违背阿尔巴尼亚人民利益的条约予以废除的革命决定，具有特殊的意义。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建立了一个查证战争罪犯和查证占领者、卖国贼所犯的一切罪行的国家特别委员会。

同在更高水平上组织人民政权的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代表大会分析和解决了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民族解放军的问题，认为它是彻底解放国家和保卫新政权的主要武器。代表大会决定统一民族解放军最高指挥部和授予军衔。恩维尔·霍查同志被任命为总司令。代表大会作了关于建立师、军的指示。总指挥部宣布成立第一突击师。

佩尔梅特代表大会对苏联和红军表示感谢，它们以自己的英勇斗争加速了阿尔巴尼亚和被法西斯奴役的其他国家的解放。代表大会重申了对英、苏、美同盟的忠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各国人民的友谊。代表大会表明了自己的坚定立场：加强同这一同盟的国家和人民的战斗关系，履行由此产生的一切义务，同时将尽量争取盟国的援助。同阿尔巴尼亚过去所举行的代表大会、议会不同，佩尔梅特代表大会在解决问题和决定阿尔巴尼亚的命运时，没有乞求任何人的支援。相反，它警告帝国主义国家，把阿尔巴尼亚当作货币对待的那种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再也不允许进行危害他们的交易。阿尔巴尼亚人民将自己决定和解决自己的命运问题。代表大会公开谴责了英、美同盟企图干涉阿尔巴尼亚内部军政事务的行为。

佩尔梅特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并立即为他们所接受。

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烈火中为摧毁反人民的旧政权和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所作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佩萨代表会议奠定了这一政权的基础。拉比诺特代表会议使这一政权集中起来，并宣布它是阿尔巴尼亚唯一的政权。佩尔梅特代表大会使政权问题得到了有利于起义人民的解决。它建立了阿尔巴尼亚人民民主国家。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是这个国家的宪法的基础。

从此，国内反动派靠自己的力量也好，靠希特勒占领者的支持也好，都无法恢复地主、资产阶级政权了。

佩尔梅特代表大会召开时，还有半个阿尔巴尼亚处在德国纳粹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控制下。在被占领的地区和城市，民族解放会议是秘密进行活动的。在很多地区，还根本没有建立民族解放会议。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佩尔梅特代表大会后，不论是在解放区还是没有解放的地区，阿尔巴尼亚人民实际上只承认反法西斯委员会是自己的政府，服从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令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的法律。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保卫人民民主政权不受敌人的侵犯，它有能力用自己的力量在不远的将来完全解放阿尔巴尼亚，在全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第一次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人民民主国家、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会议和临时民主政府的决定，不是普通的法令。新的阿尔巴尼亚国家及其最高机关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解放战争的产物。

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会议政权，不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都完全不同于旧政权。它同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任何一种政权都毫无共同之处。按其政权类型而言，它与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相似。尽管这样，根据阿尔巴尼亚的客观条件，根据阿尔巴尼亚人民民族解放战争的情况，它又具有十分独特的性质。

根据佩尔梅特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民族解放会议和反法西

斯委员会受委托给民族解放军以全面的支援，以便完全解放国家；保证民主制在整个阿尔巴尼亚获得胜利，使索古政权和任何其他反动政权都不能复辟；消灭法西斯残余和旧的管理方法，组织社会生活，全面改变祖国的面貌，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

从阶级内容和行使的职能来看，民族解放会议政权是革命力量在共产党的直接和唯一领导下的民主专政。

政权问题的解决，说明党的战略任务之一已经完成。尽管如此，只要另一历史任务——把阿尔巴尼亚完全从德国占领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尚未解决，就不能认为这个问题已最终解决。

佩尔梅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是对占领者、国内反动派和英、美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沉重打击。这些决议对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和使阿尔巴尼亚人民得到社会解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九、阿尔巴尼亚的完全解放。

人民革命的胜利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总司令恩维尔·霍查命令民族解放军发动总攻，把阿尔巴尼亚从德国占领者的统治下完全解放出来，彻底消灭“国民阵线”、“合法派”和一切反动军队。按总司令部详细拟定的战役和战略计划，责令第一突击师向什贡比河以北的敌人发动进攻。伴随着这一进攻，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其他部队对全国各地敌人的驻防军、交通线进行了一系列袭击。继第一师发动进攻后，即将建立的几个新师以及民族解放军各旅也将发动进攻。

总指挥部关于完全解放国家的计划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使英、美地中海司令部阻止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转入总攻、防止反动军队被消灭的企图遭到破产。计划还规定要在国境以外追歼希特勒军队。

敌人六月攻势的破产

在命令进行总攻的那天，德国军队又
开始了一次大的攻势。敌人直接投入进攻
的有四个半德国师、几千宪兵、“国民阵线”分子、索古分子，共计五
万多人。

敌人攻势的第一阶段（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十日），是在科尔
察—爱尔巴桑—培拉特—佩尔梅特地区进行的。希特勒分子和反
动派遣到了第一师和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其他部队的激烈抵
抗。游击队由防御转入了对敌人的猛烈反攻，经常消灭由德国人
和卖国贼组成的整个纵队和支队，或者迫使他们仓皇逃窜。在好
几个方向的敌军纵队没有达到目的地就撤退了。被德国军队包围
在托莫里察的第一突击师，突破了包围圈，在几天之内又夺回了失
去的阵地。

敌人攻势的第二阶段（六月十日至三十日），是在发罗拉—纪
诺卡斯特第一战区进行的。这对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游击队造成了
严重的危险形势。他们已处于希特勒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但由
于游击队员的英勇精神和指挥员、政委的勇敢指挥，游击队巧妙地
进行了迂回运动，冲破了敌人的包围。通过在侧翼和背后进行突
然袭击，游击队给敌人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迫使敌人退却。

敌人的六月攻势，象冬季攻势一样，以德国纳粹分子和反动派
的失败而告终。这一攻势是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和阿尔巴尼亚
人民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的又一重要证明。经过这次攻势，人民
的军队更加壮大、更加坚强了，人民更加坚定地要把斗争进行到胜
利，对共产党的领导更加深信无疑了。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是要保持民族解放军的有生力量、团结
和战斗力；不要妨碍执行总司令部的战役和战略计划。第一突击
师向什贡比河以北进攻的命令仍然是有效的。在具体情况下，总
指挥部认为，该师转入阿尔巴尼亚中部是保证最终粉碎希特勒攻

势的一项措施。当德国军队继续在维奥萨河以南作战时，总指挥部得出结论：这是第一师开始执行过去接到的命令的最适宜时机。

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发动总攻，国内外反动派的计划被粉碎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一突击师渡过了什贡比河，并发动了进攻。遭到突然袭击的敌人，招架不住这种打击。该师

部队同地方游击队相配合，深入阿尔巴尼亚中部，以锐不可当之势继续向迪勃拉挺进。截至七月中，总司令命令中规定的所有地区都已解放。阿尔巴尼亚中部和迪勃拉州人民给了第一师以有力的支持，并同它一道投入了反对德国奴役者和卖国贼的斗争。刚刚解放的地区数以千计的青年志愿加入了该师各旅，在敌人控制下的阿尔巴尼亚中部和北部地区活动的小型游击部队，立即扩大成营，不久便成为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旅。

第一突击师在北方的进攻使占领者和卖国贼感到如此突然，以致开始时，他们以为是在南方被击溃的游击队“残余”转移到那里去寻求救援的。但他们很快就明白真相了。他们惊恐万状，慌忙开始把部队从南方调往北方，企图打垮第一突击师。

一九四四年七月和八月，敌人连续向第一师发动了两次进攻。这两次进攻都完全失败了。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战士粉碎了希特勒军队和反动军队，最后解放了整个迪勃拉州、佩什科比市、迪勃拉市和米尔迪塔的一部分地区。

英、美军队地中海司令部连续几次威胁性地要求停止对卖国贼阿巴兹·库比军队进行战斗，它们的压力也没有能阻止住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第一师的胜利进攻。民族解放军总指挥部拒绝了英、美同盟国的要求和威胁，毫不犹疑地完成了党中央和佩尔梅特代表大会交给的任务。

八月，第二突击师成立了，它立即同第一师一道，向阿尔巴尼亚

北部的德国占领军和卖国匪帮发动了进攻。除佩萨大队外，这两个师和阿尔巴尼亚中部、北部各州司令部所属全部游击队，都编入了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第一军。党中央任命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希斯尼·卡博同志为军政委。

这时，民族解放军其他部队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发动了总攻。

应佩尔梅特代表大会的要求，苏联军事使团于八月抵达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认为，这是苏联对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战争的援助，是对阿尔巴尼亚人民主权的承认。这也证明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共同斗争中结成的革命友谊和同盟。

阿尔巴尼亚的全部国土，从一端到另一端，都成了一座火山。德国驻防军、反动匪帮和敌人的交通线，每天都遭到了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的毁灭性打击。敌人无法招架这种总攻，便接连放弃他们占领的地区和城市。十月二十四日，整个南方已完全清除了希特勒分子。在什贡比河以北，德国占领者继续控制的只剩下爱尔巴桑、地拉那、都拉斯、库克斯和斯库台这几个城市。

应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军总指挥部的要求，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的两个旅（第五旅和第三旅），于十月五日越过国境，到科索沃和杜卡吉尼平原对德国纳粹分子作战。

除了祖国大部分领土得到解放、给德国军队造成了重大损失以外，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发动总攻的头几个月内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完全击溃了国内反动派。“国民阵线”、“合法派”及其武装匪帮、宪兵队在突击旅、突击师的打击下被消灭了。摄政会议和吉斯林政府都完全瘫痪了。

英国军官为了同革命临时政府相抗衡，企图成立由反动派头目参加的阿尔巴尼亚傀儡政府，他们这种新企图丝毫没有得逞。

在德国军队保护下聚集在其头目周围的反动势力的残余，把

得救的唯一希望寄托在英、美军队可能在阿尔巴尼亚的登陆和对他们的支持上。

但是，卖国贼们的这一最后希望也破灭了。民族解放军总指挥部忠实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坚决拒绝了英、美地中海司令部借口要共同对德国人作战而一再提出的要向阿尔巴尼亚派遣伞兵部队和特种部队的要求。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已有用自己的力量完全解放国家的能力，不需要外国武装部队的支援。英国袭击队^{〔67〕}在希特勒驻防军被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消灭以后进入萨兰达时，总指挥部迫使英国参谋部立即把它的部队从阿尔巴尼亚海岸撤走了。

这样，就消除了英、美军队在阿尔巴尼亚登陆对人民革命胜利造成的巨大危险。党中央和党的总书记兼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总司令恩维尔·霍查，在英、美同盟国的强大的、继续不断的压力面前表现了成熟性、智慧和革命勇气，一刻也没有允许它们干涉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内政。由于这种坚定的原则立场和革命斗争的高涨，英、美政府及其驻阿尔巴尼亚的军事使团企图攫取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消灭民族解放阵线和共产党、用武装部队登陆占领我国的阴谋被粉碎了。

人民民主制基础的巩固

全国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创造了扩大和巩固人民政权、使民族解放会议的活动空前活跃起来的可能性。反法西斯委员会在执行有利于对占领者进行武装斗争的任务的同时，还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建立国家和社会制度，重建遭到了破坏的国家，振兴经济，发展商业。在所有已解放的地区和城市，经济生活都已活跃起来。劳动队和劳动营着手修建被破坏的桥梁和公路、被烧毁的学校和房屋。开办了学校，组织了卫生事业。民族解放会议领导机构把一切具有特

殊经济意义的项目和建筑材料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

反法西斯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没收卖国贼的动产和不动产的决定。它指示要登记土地,要准备关于耕地和牲畜及其占有状况、关于无地农民的人数的统计资料。这是全国解放后立即进行的土地改革的第一个准备措施。

人民群众全力支持反法西斯委员会和民族解放会议的活动。他们表示忠于反法西斯委员会,并要求它立即以符合实际的名称——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命名。提出这一要求的原因是反法西斯委员会作为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唯一政府的威望已经提高,阿尔巴尼亚即将完全解放。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在解放了的培拉特市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

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一致决定:将反法西斯委员会改为**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民主政府在它得到这次会议通过的纲领中,向阿尔巴尼亚人民保证,它将忠实地执行佩尔梅特代表大会的决议。它负责进一步开展和加强迅速、彻底解放阿尔巴尼亚的斗争,维护阿尔巴尼亚国家的独立,加强民族解放会议政权,保障和维护公民的权利。政府将审查索古政权同外国缔结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条约,将废除所有那些危害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国家利益的条约。纲领还规定要同苏联和所有参加反法西斯同盟的国家建立关系和密切合作。在全国解放后,政府必须组织立宪会议的民主选举,立宪会议将最终确定政体,制定阿尔巴尼亚新国家的宪法。

培拉特会议通过了关于民族解放会议法和民族解放会议选举法。在此以前,民族解放会议既是政权机关,又是民族解放阵线机关。从这时起,民族解放会议只作为人民民主政权机关行使其职权。民族解放阵线将单独成立自己的组织。

培拉特会议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通过了《民权宣言》。通过

这一宣言,保证了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集会、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宗教和信仰自由,妇女同男子享有平等权利,年满十八岁享有参加选举的权利,上诉权,等等。《民权宣言》是人民民主新国家的一个具有宪法意义的文件。

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第二次会议的决议是对佩尔梅特代表大会历史性决议的补充和进一步具体化,标志着阿尔巴尼亚人民对法西斯和国内反动派取得了新的政治胜利。它是对英、美帝国主义者控制阿尔巴尼亚的企图的另一打击。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已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吉斯林政权连根拔掉。

当培拉特会议正在举行时,民族解放军已完全变成了人民和阿尔巴尼亚新国家的一支正规军。这时,它已有七万名战士,编在各旅、师、军中。其中百分之九是妇女,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青年,近百分之九十是农民。

民族解放军部队对盘踞在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的德国部队发动了最后的进攻。其中最重要的是解放地拉那的战役。解放地拉那的战役是根据总指挥部的计划进行的。这一计划的基础是第一师和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其他部队进行有配合的战斗行动,直接指向地拉那以及指向希特勒部队调动的各主要方向。计划规定要消灭敌人,防止德国人抢劫和破坏城市,要不惜一切地解放地拉那。对战役的指挥委托给第一军指挥部。第一师师长穆罕默德·谢胡指挥首都和四郊的战斗。

民族解放军为解放首都发动的进攻,经过全面准备后,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开始。进攻持续了十九天。十一月十七日,在地拉那上空升起了胜利的旗帜。解放地拉那的战役表明,民族解放军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旺盛的士气。首都人民也同各突击旅一道,积极参加了解放地拉那的战斗。

这时，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部队已越过国境，同科索沃各旅相配合；截至十一月十八日，已将杜卡吉尼平原、科索沃大部分地区的希特勒部队完全清除，通过激烈的战斗解放了尤尼克、德查尼、加科瓦、普里兹伦和佩耶。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 在全国完全解放前夕，阿尔巴尼亚共
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 产党中央委员会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培拉
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 特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时，党已有
党员二千八百名左右。为了总结党和人民
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和胜利，为了规定随着阿尔巴尼亚的解
放而开始的革命新阶段的任务，召开全会是必要的。

但是，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粗暴干涉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全会的工作完全走上了歧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为反对共同敌人——法西斯占领者而进行了英勇斗争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南斯拉夫人民之间建立了战斗的兄弟般关系。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应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要求，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一批干部被派到科索沃和杜卡吉尼平原去组织党、组织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在迪勃拉、哥斯蒂瓦尔、特托伏、克尔乔瓦等城市及其郊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迪勃拉州组织在组织解放战争方面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为了保持两党之间的联系，南斯拉夫国际主义共产党员米拉丁·波波维奇常驻阿尔巴尼亚，他是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一九四一年秋天从贝京法西斯集中营里救出来的。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关系中，他一贯支持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国际主义立场。^{〔68〕}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竭力利用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南斯拉夫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以期实现对阿尔巴尼亚的沙文主义野心。

一九四三年夏天,带着建立“巴尔干参谋部”^[69]的特殊使命来到阿尔巴尼亚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伏克曼诺维奇-坦波,以完全不能令人容忍的和不正确的方式,指责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对“国民阵线”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进行这种粗暴的诽谤是有既定目的的,就是企图造成一个印象,似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独立地进行领导,不接受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有经验的领导”的指示,就不能不犯严重错误!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当即拒绝了这种恶毒的指责,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尽管这样,南斯拉夫领导为使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屈服的第一次尝试,不是毫无影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科奇·佐治和中央候补委员赛依弗拉·马利绍瓦支持坦波的错误观点,表示准备服从南斯拉夫沙文主义领导人的路线和命令。从此,科奇·佐治便以南斯拉夫领导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内的代理人的身分在实际上开始为南斯拉夫领导效劳。

一九四三年秋天,伏克曼诺维奇-坦波明显地表现了他的沙文主义观点。他带着这样的观点,把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迪勃拉州组织在国境以外阿尔巴尼亚人和马其顿人居住的城市与地区进行的真正的国际主义活动,以及该组织和迪勃拉州司令部在那里的居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看成是一种威胁。伏克曼诺维奇-坦波以穷凶极恶的口气从马其顿给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连写了两封信。在这些信件中,他指责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和游击队员、州司令部司令哈奇·列希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本身是“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者”、“大阿尔巴尼亚主义者”。他蛮横地要求所有居住在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员脱离阿尔巴

尼亚民族解放军迪勃拉州各营，置身于南斯拉夫司令部的指挥之下；哈奇·列希应离开迪勃拉市，只有当南斯拉夫司令部邀请他来支援时，才能到那里去；迪勃拉民族解放会议应断绝同阿尔巴尼亚司令部的关系，接受南斯拉夫司令部的领导。坦波威胁说：“否则，就会发生连共产党员也会卷入的冲突。”（！）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受到这种不能令人容忍的干涉的极大侮辱，它拒绝了坦波的诽谤和指责，并对他的信件中如此激烈的、丝毫没有共产党人气味的腔调，对如此骇人听闻的造谣表示最大的惊讶。同时，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警告坦波，它无论如何不会同意外国人向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发号施令，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

南斯拉夫在科索沃和杜卡吉尼平原的军队领导人和党的领导人，也有强烈的沙文主义表现。他们不考虑阿尔巴尼亚族人的意志，千方百计地反对在战争期间已经广泛传播的关于民族自决的思想；他们就象米哈伊洛维奇的巴尔干半岛游击队一样，经常采取歧视和消灭科索沃、杜卡吉尼平原和黑山的阿尔巴尼亚人的行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库台、特罗波亚的党组织，曾多次提出意见，批评了南斯拉夫各方面的领导人的沙文主义立场，认为这种立场大大妨碍了在科索沃开展反对意大利和德国占领者的斗争。

然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采取了一贯的国际主义立场，它不允许自己有任何的哪怕是丝毫的沙文主义表现，用一切力量帮助科索沃和杜卡吉尼平原开展反法西斯战争，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同南斯拉夫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友谊进行了斗争。在科索沃问题和南斯拉夫境内其他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区的问题上，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从来没有同意过关于“大阿尔巴尼亚”的法西斯口号。它认为，人民革命在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胜利将公正地

解决这一问题。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向全世界宣布，随着两国革命的胜利，科索沃人民将赢得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否则，他们将反对竭力压迫和奴役他们的南斯拉夫。

当时，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还没有怀疑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抱有沙文主义野心，因为不能想象，一个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领导人会抱有只有社会沙文主义党、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才有的野心。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以为，坦波和塞尔维亚、马其顿的党和游击队的某些领导人在战争时期的沙文主义表现，是个别人的不正确行为，而不是体现了南斯拉夫共党政策的行动。

一九四四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压力进一步增加了。它千方百计地企图在阿尔巴尼亚人民中造成一种印象：一切事情，包括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成立，民族解放战争，都应归功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和铁托的“援助”；新阿尔巴尼亚应该看到，它的未来是同南斯拉夫、而且只能同南斯拉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南斯拉夫领导的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政策，遭到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理所当然的反对。

南斯拉夫领导认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总书记恩维尔·霍查和坚决捍卫这一路线、反对对党和国家内政的外来干涉的其他中央委员，是他们在阿尔巴尼亚实施自己计划的主要障碍。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力图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第二次全会上消除这种障碍。

南斯拉夫领导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特地把维里米尔·斯托依尼奇派到阿尔巴尼亚来，担任南斯拉夫军事使团团团长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人。维里米尔·斯托依尼奇一到这里，就开始攻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总路线，认为它是

完全错误的，要求立即对路线和领导进行根本的改变。这种诽谤性的指责和干涉党的内部事务的行径，受到了总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的反对，但同时却得到了政治局委员科奇·佐治和纳科·斯皮洛的支持。

特别是在违反组织规则补选赛依弗拉·马利绍瓦和潘迪·克里斯多为政治局委员，从而使政治局内亲南斯拉夫的人占多数后，南斯拉夫领导的背信弃义的攻击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内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维里米尔·斯托依尼奇通过这些野心家和阴谋家，背着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总书记，炮制了一个纲领，准备在大会上抛出来对抗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在大会上打起对党发动进攻的旗号的是赛依弗拉·马利绍瓦和南斯拉夫代表^[70]，他们得到了科奇·佐治和策划阴谋的其他成员的完全支持。

如此英勇地进行过斗争的、在革命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居然被阴谋分子们认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其“路线和领导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斗争烈火中经过考验的、导致祖国解放和人民政权建立的党的光荣道路，被诬蔑为反复无常地“由宗派主义到机会主义，由机会主义到宗派主义”的“充满错误和反常现象的道路”。党的创始人和导师、民族解放战争的领袖和英雄恩维尔·霍查，被叛徒们描绘为“一切错误的集中表现”。赛依弗拉·马利绍瓦提出需要设立“党的主席”，这一职位应该由具有“高度的理论素养”(!)的人担任，在这里，他指的是他自己。

维里米尔·斯托依尼奇说，米拉丁·波波维奇在阿尔巴尼亚的工作是未经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同意的错误的活动，他还提出

了一条“新路线”，将它“推荐”给阿尔巴尼亚共产党。

他把宣传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领导者称之为宗派主义活动，提出今后不要这样宣传党，而应宣传民族解放阵线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领导者。他要求把有影响的反动资产阶级和宗教界上层的代表人物吸收到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机关中来，而不考虑这些人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是采取敌对立场的。南斯拉夫领导的这些建议是符合英、美帝国主义者的计划的，因为这些帝国主义者对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意在自己的政府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中都有反动派的代表参加，以便将来依靠这些人来推翻人民政权。

南斯拉夫代表完全抹煞民族解放会议、民族解放军和政治委员的活动，要求军队具有“坚强的政治头脑”和“坚强的军事指挥部”。他特别集中地谈到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建立在“巴尔干友爱”基础上的关系。维里米尔·斯托依尼奇说：“阿尔巴尼亚不可能自己进行经济建设和独立地发展，它是帝国主义的一小块肉”，因此，它“只能同南斯拉夫结成联邦、甚至还更进一步，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道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认为必须使阿尔巴尼亚人民群众对于这种结合有所准备，必须宣传铁托是“巴尔干和欧洲各国人民解放的象征”。〔71〕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全国解放后进一步推进革命的迫切任务，由于阴谋分子在全会上对党的总路线进行了攻击而被压下了，几乎完全没有进行讨论。南斯拉夫代表和赛依弗拉·马利绍瓦甚至声称，阿尔巴尼亚在长时期内还“不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不会进入社会主义”。

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由于完全不知道在幕后策划的阴谋和南斯拉夫领导心怀的鬼胎，在全会表现了明显的动摇，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南斯拉夫使者和反党集团的论点。

这样，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就被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破坏了。在全会作出了有害于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利益的指示和决议。

全会作出的唯一正确的决议，是因利丽·盖加犯了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而将她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但是阴谋分子抱着既定目的，毫无根据地把这归罪于党的整个路线，并认定宗派主义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主要危险！全会决定，中央委员会增选七名委员和十一名候补委员。

培拉特全会严重破坏了党的领导的团结；为把南斯拉夫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组织形式和方法灌输到党内来开辟了道路；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广泛干涉党和国家的内部事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恩维尔·霍查同志和捍卫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其他中央委员的坚决抵制，铁托分子在培拉特的阴谋没有完全得逞。南斯拉夫领导没有能达到推翻总书记的主要目的，因为全会的多数成员拒绝了阴谋分子要解除恩维尔·霍查同志这一职务的要求，高度赞扬了恩维尔·霍查同志在建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领导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伟大功勋。尽管这样，这一阴谋是破坏阿尔巴尼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基础的第一次尝试，对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和人民革命造成了巨大的危险。

当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培拉特举行第二次全会时，民族解放军正在彻底肃清阿尔巴尼亚领土上的纳粹占领者。它紧紧追击和歼灭敌人，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放了最后一座城市斯库台，整个阿尔巴尼亚获得了解放。现在，在全国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标志着祖国的完全解放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阿尔巴尼亚解放后，根据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和总司令恩维尔·霍查的命令，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的两个师（第五、第六师），立即继续追击希特勒在南斯拉夫的部队，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战士为反对纳粹强盗而并肩战斗，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和一九四五年一月至二月，他们解放了黑山、桑加克和波斯尼亚南部。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员以自己的彻底的国际主义立场、以所受的共产主义教育、以在战斗中无比英勇的精神赢得了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和马其顿人、黑山人、桑加克人的爱戴和深深的敬佩。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的数以百计的战士在为解放南斯拉夫人民的战斗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十、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的总结和胜利的原因

持续了五年半以上的、反对意、德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民族解放战争，是阿尔巴尼亚人历史上流血最多、最英勇的战争。

一百万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战争中箝制意大利和德国军队达十五个师以上，歼灭（打死、打伤和俘虏）敌人共七万人左右。阿尔巴尼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最积极的成员之一，以它的面积和人口相对而言，在取得战胜法西斯的历史性胜利方面同时作出了宝贵的贡献。阿尔巴尼亚担负了相当沉重的负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七十万法西斯军队蹂躏了二万八千平方公里的阿尔巴尼亚国土，造成了异乎寻常的损害和破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人的损失方面，特别是在物质和文化财富的损失方面，阿尔巴尼亚位居首列。

阿尔巴尼亚人民以在战争中的英勇斗争、所流的鲜血和所蒙受的重大损失赢得了对国内外敌人的最后胜利。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随着祖国获得完全解放，人民革命取得胜利，法西斯在阿尔巴尼亚的统治被彻底推翻了，同时消除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一切依赖，消除了同这些国家的一切奴役性联系和关系；阿尔巴尼亚人民赢得了完全的民族独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也被推翻了。阿尔巴尼亚永远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这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在自己全部历史上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

一直到最后，民族解放战争仍然是反帝民主革命。但在战争期间，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分也得到了发展，如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权，共产党在新政权中实行不与人分掌的领导等。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反对本国主要剥削阶级的斗争不断尖锐化，这一斗争又同反对占领者的斗争交错在一起的结果。这就越来越加强了民族解放战争的革命性。

共产党没有促使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没有提出反对地主、宗族首领和资产阶级的口号；它一直到最后，都是把主要矛头指向法西斯占领者的。是剥削阶级的公开的背叛，使阶级斗争尖锐化了。

代表这些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国民阵线”、“合法派”等之所以被民族解放军消灭，仅仅是因为它们为法西斯占领者效劳。过去的统治阶级，由于公然采取反民族、反人民的立场，已丧失了参加政权的一切权利。

民族解放战争尚未结束时在阿尔巴尼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完全掌握在以共产党为唯一领导的革命民主力量手中。这一政权，不单纯是革命力量的民主专政，而是包含着正在迅速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萌芽的政权。

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取得历史性胜利后，革命只是在政治方面

已经完成。反帝民主革命的社会经济问题尚待战后解决。

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主要社会动力是工人阶级、贫农和中农。参加战争的还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

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起领导作用。它是通过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来实现这种作用的。

阿尔巴尼亚工人阶级作为产业无产阶级，是幼小的、分散的、尚未定型的，但它是最先进的、有前途的阶级。尤其是因为全国任何其他阶级，都不可能象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一样，成立一个具有健全的组织、执行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正确政策的党。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机关中，在党的组成中，工人人数很少。但这并不妨碍工人阶级在这场战争中实现领导作用。虽然很多党员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出身于农民的各阶层，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是用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用为维护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利益的罕见的坚定性来教育党员的。在具体的情况下，这种利益同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同全国人民和被奴役的阿尔巴尼亚民族的利益溶合在一个整体内。

农民成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源泉和主要武装力量，成了工人阶级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最牢固的依靠。

阿尔巴尼亚农民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他们在经济、文化方面的确是落后的，但是他们拥有巨大的革命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争取自由和土地、反对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反对高利贷商人、反对过去的反人民制度、特别是在反对外国统治者的持续斗争中培养起来的。农民比阿尔巴尼亚任何其他阶级和阶层都更富有优秀的爱国战斗传统。鉴于这一切，共产党非常正确地估价了农民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恩维尔·霍查同志说：“在我国条件下，哪个阶级能争取到农民，它就会赢得战争。”〔72〕

农民接受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纲领和领导，因为他们的经验使他们相信，共产党是坚决对占领者进行斗争、能把言论化为行动、能保证战胜法西斯占领者和卖国贼、能实现农民对自由和土地的理想的最唯一政治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农民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英勇精神。

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的口号是不分阶级地发动全体农民。尽管这样，富农、乡绅，作为阶级，没有接受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纲领和领导。一般说来，这些人是同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卖国组织——“国民阵线”和“合法派”串通的，并成为它们在农村的依靠，希望这样一来在战后能够保持自己的特权。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参加民族解放战争，是没有经过他们的任何政党的，正如农民一样。他们没有建立、而且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政党，因为他们十分复杂，经济上没有力量，特别是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缺乏坚定性、成熟性和经验。因此，他们不可能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起什么领导作用。他们赞同共产党的纲领，因为他们看到，这一纲领也表达了他们的眼前的政治要求。

在城市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虽然不很坚定、没有作出牺牲的决心，但他们几乎全都参加了民族解放战争，表现了卓绝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大部分人都紧密地同共产党团结在一起。

中产阶级表现了显著的动摇性。在他们当中表现了同占领者进行妥协的倾向。但由于他们处在占领者法律的束缚下，处在外国资本的压力下，处在阿尔巴尼亚人民传统的爱国主义的影响下，他们多数人表示反对奴役，并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不过并不踊跃。他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倒向了占领者一边，同“国民阵线”、“合法派”同流合污了。

阿尔巴尼亚知识分子多数来自上层和中层，一般是爱国的、反对法西斯的。他们中比较进步的人，以热爱祖国、坚定和强烈的革

命精神而著称，他们拥护共产党的路线，并为执行这一路线进行了斗争。只有一小撮浸透了资产阶级法西斯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占领者同流合污了。他们充当了“国民阵线”和“合法派”的思想家。

青年是民族解放战争中最富有生气的力量。在城市、农村和人民军中，他们站在反对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斗争的前列。

绝大多数青年的特出之处是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感情，同时又具有深刻的革命进步精神。他们同共产党紧密相联，成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而斗争的热情战士。

城市青年工人和青年学生是最先投入解放战争的。

青年学生主要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同青年工人一道，他们在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队伍中进行了战斗，并在向人民群众宣传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路线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他们是党对城市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施加影响的桥梁。

但大多数反法西斯青年群众是农村青年；他们跟着城市青年，以罕见的革命干劲和坚定性投入了斗争。农村青年在民族解放军中占多数。

阿尔巴尼亚妇女是反法西斯战争中一支巨大力量。她们以过去历次解放战争中空前未有的规模参加了这场战争。阿尔巴尼亚妇女拥护共产党的路线，并同男子一道，为执行这一路线而朝气蓬勃地进行了斗争，因为在这条路线中，她们不仅找到了人民获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可靠道路，而且找到了争取同男子享有平等权利、摆脱过去使她们成为奴隶的一切枷锁的道路。

民族解放战争能取得伟大胜利，首先是由于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战争中表现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阿尔巴尼亚人民从来没有象在反对意、德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斗争中这样团结一致、这样坚定、这样具有必胜的信心。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目的，从来没有这样为了争取胜利而准备忍受一切牺

牲和困苦。

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人民群众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军事生活中的创造性强烈地表现出来了。在激烈的战斗烈火中，他们表现了无限的力量和巨大的能力。从人民的亲骨肉中，从普通老百姓即从工人、农民和爱国知识分子中，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战士、群众领袖、指挥员、政委、民族解放会议成员和部长。来自人民的这些人，往往没有足够的文化，但在才干和勇气方面却超过敌人在学校中培养出来的将军、军官和地主资产阶级旧制度的职业政客，并足以战胜他们。

恩维尔·霍查同志在解放前夕写道：

“我们的解放战争使人民当家作主，胜利的原因就在这里，也只能在这里。”〔73〕

阿尔巴尼亚人民以自己的英勇斗争，既解放了祖国，也解放了自己。

光辉的爱国战斗传统和丰富的经验，对于取得胜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种经验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长期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取得的，而在最近这一次民族解放战争中，他们又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这种经验。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是民族解放战争的鼓舞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胜利的创造者。

在过去历次解放战争中，阿尔巴尼亚人民没有建立一个坚如磐石的、可靠的领导。这是他们过去没有能赢得自由和完全的独立、他们斗争的成果被帝国主义者、封建主和本国资产阶级抢走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们从斗争、困苦和贫穷中吸取了很大教训，如果没有革命的领导，他们的鲜血和努力就不可能换来最后的胜利。随着在战斗中诞生、成长和锻炼壮大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建立，他们才实现了这一理想。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产生于阿尔巴

尼亚人民当中，继承了他们的光辉爱国传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善于集中和进一步发展这种传统和经验，赋予它们以深刻的革命内容，并用来取得民族自由和独立以及革命的胜利。

共产党制定并一贯地、坚定地以革命的勇气执行了正确政策，这一政策是建立在国内外客观条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是直接符合人民、祖国和社会主义的迫切政治要求与根本利益的。

是党使人民群众如此深刻地认识到斗争的目的和它的政策的正确性，是党发掘、发挥人民群众的一切毅力和才能，并运用这一切来为反对法西斯的斗争服务。

群众凭自己的经验相信，共产党是群众利益和阿尔巴尼亚民族利益的真正保卫者，是争取民族独立、自由、民主和土地的忠实的、始终不渝的战士。

共产党以罕见的技巧解决了取得胜利的三项关键任务：把广大群众团结到民族解放阵线中；组织总起义，武装人民，建立正规的民族解放军；摧毁占领者和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组织和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党为阿尔巴尼亚人民争取到了很多强大的国外同盟者，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同反法西斯的各国人民友好和睦的精神教育人民。它对国外同盟者执行了建立在革命原则基础上的正确政策。它教育人民要区别对待国外同盟者，并把自己的斗争首先同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联系在一起。党从来不允许任何同盟者干涉我国内部军政事务。它粉碎了英、美帝国主义反动派力图阻挡革命取得胜利和控制阿尔巴尼亚的阴谋。党对同盟者采取真挚的态度，正确地评价外部支援，但它从未坐待别人给阿尔巴尼亚人民带来自由。它坚决执行首先依靠自力更生的原则，教育人民深刻地认识到，自由不能恩赐，而是要以鲜血、奋斗和许许多多的牺牲去赢得。

在反对占领者和卖国贼的革命斗争中，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诞生和成长起来，并且证明了自己是有无比的魄力和威望的领导者。它没有等到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好以后，再投入斗争。它在斗争的烈火中，在复杂的形势下学习了这一理论，同时忠实地、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一理论。

阿尔巴尼亚人民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决定性外部因素，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及其对法西斯的伟大胜利。红军没有到达阿尔巴尼亚，尽管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民认为苏联也是阿尔巴尼亚的解放者。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肩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的担子，在消灭法西斯方面起了主要作用。红军对希特勒德国取得的伟大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阿尔巴尼亚人民一致动员起来，以自己的英勇斗争赢得完全的民族独立和建立人民政权。

第 三 章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为重建国家和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八年)

一、保卫和加强人民民主政权

在阿尔巴尼亚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和共产党对这一政权的不与人分掌的领导,为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中也把反帝的人民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政治条件。同时,这就使这一革命能够不断发展,立即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改造。

只有遵循这条道路,才能保持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消除战争的创伤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剥削和贫困,并为以迅速的步伐发展经济和文化创造条件。

党在进一步进行人民革命方面面临的任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决定的。

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 当阿尔巴尼亚从外国占领者的统治下获得解放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继续进行。这次大战是随着希特勒德国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军国主义日本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无条件投降而结束的。

世界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遭到的人力和物力损失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但经过战争，它在政治和军事上更加强大了。它的国际威望和声誉大大提高了。

资本主义体系受到了深深的震动而削弱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开始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二阶段规模更大了。这个危机的主要表现是一系列革命取得胜利，这些革命在欧洲和亚洲许多新的地方打破了帝国主义阵线。

在一些欧洲和亚洲国家，由于革命的胜利，诞生了人民民主新制度。在这些国家建立起来的新的民主政权，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里进行了一系列改造，从而奠定了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础。中国的人民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

这些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果。这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这也是决定战后国际新形势的基本特点。

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解放性质，苏联在这一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一系列国家的摆脱资本主义体系，这一切促进了民族解放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治开始崩溃。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解体过程席卷了广大地区。在亚洲和非洲诞生了一系列新的独立国家。

在那些仍是殖民地或附属国的国家里，争取摆脱帝国主义枷锁的解放运动也已壮大起来。

殖民体系的解体过程是资本主义总危机进入第二阶段的又一重要表现。因此，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后备军的殖民地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性大大增强了。

世界社会和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为革命运动开辟了新阶段，为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随着战争的结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

了变化。它们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加深了，这就打破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平衡。

战后，德国、日本、意大利暂时从世界市场中被排挤出去。它们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解体了。法国不能再作为帝国主义大国发挥从前那样的作用了。大不列颠帝国在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的打击下开始崩溃，英帝国主义的势力在走下坡路。

只有美国在战后更加强大了。它大大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现在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中心。

帝国主义国家是不会容忍世界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的增长的，是不会容忍反殖民主义的解放运动的发展的。以帝国主义和反动力量为一方，以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为另一方，开始了激烈的斗争。

这样，在反法西斯同盟内部围绕战争的目的和性质问题上的矛盾，在战后就更加明朗化了，后来日益加深了。世界上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对抗更加尖锐了。世界上已形成两个阵营：民主反帝阵营和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他们的目的和意图是截然相反的。

民主阵营由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组成。它以苏联为首。它受到了国际上一切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支持，受到了为保卫各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进步人类的支持。这一阵营的目的是保障世界和平、各国人民的独立、民主和向社会主义迈进。这一目的只有通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才能达到。

帝国主义阵营以美国为领导力量。它依靠的是反动阶级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民主势力。这一阵营的目的是挽救资本主义旧制度，镇压工人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美帝国主义者妄图利用他们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建立世界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掀起了猖狂反对苏联、反对所有社会主义力量、反对所有爱好

自由和爱好和平的力量的敌对运动。国际反动派以武力直接干预和血腥镇压了希腊的人民民主运动。他们沉重地打击了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劳动人民的民主运动。在帝国主义国家出现了政治生活法西斯化的倾向。

帝国主义阵营，特别是美国，为了实现它的战略计划，开始执行赤裸裸的侵略政策，进一步使经济军事化，从而准备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这一政策和相应的措施涉及到了各个主要方面：经济领域、军事领域和思想斗争。这一政策的特殊表现，就是“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

美帝国主义者许多外国领土上驻扎了大量武装部队，建立了军事基地，以便用来发动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的侵略战争。他们利用对原子武器的暂时垄断作为恫吓各国人民的手段。

伴随着美国妄图称霸世界的侵略政策而来的是思想领域里的尖锐斗争。这一斗争的中心是反共主义。在苏联和共产主义对所谓自由世界造成了所谓威胁的幌子下，帝国主义的宣传机构企图限制和扑灭已经和正在世界劳动群众中广泛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

管理国家方面的困难

随着占领者被赶走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管理国家的重担落到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肩上，这副担子并不比领导解放战争轻些。党坚定不移地相信，它必将胜利地完成管理国家的任务。这种信心的依据是：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取得的经验，党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路线的有力支持，人民群众的高度革命热情。

但在这条道路上，党需要克服大量的困难。

解放时，国家处于悲惨的境地。阿尔巴尼亚遭到了战争的严

重损害。经济根本动摇了。所有大小桥梁都已被毁坏。道路、港口和电话网被破坏了。电力缺乏，矿山遭到了破坏。少数没有遭到破坏的工厂也因缺少原料而停产了。到处是失业现象。

农业的状况也很严重。一部分土地荒芜了，三分之一的牲畜，特别是耕畜被宰杀了。

贫困和运输工具的缺乏，造成了商业的瘫痪。国库空虚，银行里的黄金已被占领者抢走。通货膨胀达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冬季到来时，人民还无衣无鞋，没有安身之处，没有饭吃。到处都受到了饥饿和疾病的威胁。

国内外反动势力反对人民政权的勾当，更加重了这种状况。解放后，被推翻了的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反革命同盟。

借口为了准备承认新政府而在解放后仍留在阿尔巴尼亚的美、英使团，成了进行间谍活动、阴谋活动和破坏活动的中心。它们极力网罗一切反动势力，唆使他们反对人民政权，以便达到推翻人民政权的目的。被推翻的阶级把他们的活动主要集中在策划阴谋和武装叛乱方面。在这种活动中，他们的主要武装依靠是逃散在全国各地、特别是逃散在北部地区的战争罪犯组成的匪帮。这些匪帮竭力制造不安全的气氛，恫吓农民，阻挠建立秩序和维持治安。他们对共产党员和人民政权的积极分子采取恐怖行动。一九四五年一月，反动势力的余孽对科普里克进行了武装袭击，但在几小时内就被粉碎了。在一、二月份，隐藏在凯尔曼第山区的反动匪帮被完全消灭了。

反动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代表人物组织了秘密的敌对集团，如“保皇”集团、“社会民主”集团、“基督教民主”集团，等等，它们都是受英、美驻地拉那使团操纵的。被推翻的阶级组织了损害和破坏经济的活动。他们在反对人民政权的活动中，得到了混进民主阵

线内的敌对分子的支持。

解放后，阿尔巴尼亚人民完全有理由期待同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所有盟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然而美国和英国的统治集团千方百计地阻挠建立这种关系，对人民政权施加压力，唆使国内反动势力反对人民政权。

美、英帝国主义者还企图进行武装干涉。一九四五年一月，他们要求扩大他们驻地拉那的军事使团，并在五、六月间把“军事联络处”的一千五百至一千七百名军官和技术人员派到阿尔巴尼亚来，进行所谓“援助物资”的分配工作，这些要求被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坚决拒绝了。

帝国主义为了准备对阿尔巴尼亚进行武装干涉，还利用了保皇法西斯希腊。解放后，希腊政府在美国和英国的直接唆使下，就立即掀起了为实现长期以来企图并吞阿尔巴尼亚南部的野心的大规模的运动，组织有计划的边界挑衅，为在英国部队从海上登陆的同时发动武装侵略而进行全面的准备。面对威胁着国家的这一新的危险，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表示决心不惜一切保卫祖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中心问题是保卫 在这种形势下，摆在党的面前的一系列任
和巩固人民政权 务中的主要环节，是保卫和巩固人民政权。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示说：

“每次战争和革命之后，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问题是夺取和保持政权。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党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政权：这是我们的中心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要目标是……巩固政权，依靠政权不断取得胜利，不断进行改革。”〔74〕

为达到这一目标，巩固民族解放会议政权——新的国家政权

的体现——的政治基础具有特殊意义。为了使民族解放会议成为人民自己进行管理的全权机关，它必须朝气蓬勃，重新组织自己的工作，具有充分的能力，成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每前进一步的动力”。一九四五年五月在全国进行的地方政权机关的选举，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在选举运动中，党对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工作，使他们更明确地认识到新政权的人民性及其任务。党揭露了反动派关于政权“无能”的宣传，揭露了反动派企图使民族解放会议的领导权落到被推翻的阶级的“有经验”的代表人物手里的阴谋。

在战争中经过了考验的、坚定的、忠于人民利益并受到人民信任的人，被选入了地方政权机关。

与此同时，党组织了国家机关的全面建设；这种国家机关，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新的。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和社会机关、人民法院，建立了人民警察，改组和加强了国家保安机关等。

党把自己最优秀的干部派到新的国家机关工作。的确，他们缺乏管理经验，但他们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忠实地执行党的路线。他们将在工作中学会管理艺术。

同时，也有旧的行政工作人员进入新的国家机关，这些人在政治上是同党和人民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的文化、实践和思想都是资产阶级的。在使新的国家机关行使职能方面，他们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与此同时，他们不自觉地把旧机关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因素带到新机关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中来了。这也影响了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的干部，使某些不符合政权革命性质的工作组织形式得到了传播。

革命和政权的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是民族解放军。被推翻的阶级和国外反动派把军队看成是他们达到反对人民政权的目的的主

要障碍。敌人企图取消这支军队，散布这种观点，说什么阿尔巴尼亚没有受到任何危险的威胁，所以军队应当解散，因为军队是国家和整个国家经济的沉重负担！

党把保持和加强军队看作是革命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是保卫人民政权、保卫自由和国家独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为了使军队能完成自己的崇高使命，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要求使它完善起来，使它现代化，成为

“一支模范的军队，一支具有一切宝贵品质的军队，能够……保卫人民、保卫以如此巨大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人民政权”。〔75〕

人民和国家为人民军队所作的一切牺牲，都是有充分理由的。

军队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开始了系统的战斗训练，以便掌握现代战争的原则。为了提高指挥员和政委的军事能力和政治能力，开办了正规学校和训练班，实行了义务兵役制。

党在加强军队和使军队现代化的同时，还进行了广泛的、全面的政治工作。通过这一工作，使战士对他们作为人民军队所肩负的任务有了深刻的认识，使他们忠于革命事业，维护和进一步发扬民族解放战争的精神。在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之所以更加必要，还因为军队中除过去的游击队员外，大部分应征入伍的人没有经过应有的政治锻炼。

由于党采取了措施，军队成了人民民主新国家的可靠保卫者。

彻底肃清全国的法西斯和卖国贼的残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党发动了全国人民，把贯彻这一任务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运动。政权机关和部队在农民群众的协助下消灭了反动派的主要武装匪帮。人民的革命法庭给了战争罪犯以应得的惩罚。审判变成了对剥削阶级执行的卖国路线的全国性的严厉控诉。这不仅是对国内

反动派，而且也是对他们的帝国主义支持者的沉重打击。

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 只有维护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建立起来的人民群众在党的周围的团结，只有进一步加强这种团结，才能完成摆在党的面前的新的历史性任务。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提出了民族团结的口号。在这种团结中，除了曾积极参加过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广大人民群众外，还应当包括所有那些曾采取观望态度或曾被反动头目所欺骗而现在可以为建设新社会作出贡献的人。

生活证明，只有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民族解放阵线的基础上，才能保持和加强这种团结。民族解放阵线完全不愧为一个革命组织，它保障了广大群众的战斗团结，对战胜敌人起了决定性作用。在这方面，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有助于党进一步发扬在党的领导下把人民群众直接团结在阵线之中的传统。

国内外敌人为了分裂人民，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妄图在阿尔巴尼亚建立反动的“民主”党；进一步巩固民族解放阵线是粉碎敌人这种企图的最适宜的民主途径。

在民族团结的口号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于一九四五年八月组织了阵线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规定了**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现在改用这个名称）的任务和进一步加强这个阵线的措施。

在维护民族自由和独立、在重建国家和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斗争中，民主阵线将是人民政权的主要依靠。通过民主阵线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加强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周围的政治团结。

阵线的代表大会要求进行立宪会议选举，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人民民主国家在佩尔梅特代表大会上已经宣告建立，现在全国既

已解放，立宪会议就要确定政体，颁布宪法。一九四四年十月召开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第二次会议就已确定这一任务。

阵线的代表大会及阵线各级新委员会的选举，活跃了阵线组织，提高了它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

尽管如此，党关于民主阵线的路线由于赛依弗拉·马利绍瓦的机会主义立场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干涉而受到了损害。在“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下，民主阵线也向敌对分子敞开了大门。反动派利用这一点，有目的地把他们的人派进民主阵线，从内部破坏它，并且从这个阵地进行反对人民政权的活动。但是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警惕性，成了隐藏在民主阵线内部的反动分子进行敌对活动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始终没有能改变民主阵线组织的革命性。

民主阵线中的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现在，在他们面前展现着一条发展成为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产业工人阶级的康庄大道。早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他们就建立了自己的职工组织（工会）。工会受党的委托，在对职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民主阵线和人民政权的强大支柱”〔76〕。

如同过去一样，民主阵线最广泛的基础仍然是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担负了最重的担子的劳动农民。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已具备一切可能来实现劳动农民世代代的愿望：得到土地，摆脱贫困和落后。

在民主阵线内部活动的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青年联盟和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妇女联盟，作为党在动员群众、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方面的强大的杠杆，起了特殊的作用。

阿尔巴尼亚青年是人民中最有朝气、最革命的部分，他们站在重建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战斗的前列。恩维尔·霍查同志在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上在评价青年的巨大作用时，向青年

发出了如下号召：

“民主政府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它相信，你们会永远站在前列，你们将象过去参加战斗那样参加劳动，你们将为了自己和人民的幸福十分努力地学习和接受教育，你们将加强和支援我们的军队——人民利益的坚强保卫者，你们将保卫为之流过如此多的鲜血的政权……”〔77〕

阿尔巴尼亚妇女通过参加斗争和以她们在斗争中作出的贡献表明，她们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向前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在战争期间在使妇女获得解放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成为使所有妇女群众获得彻底解放、使妇女成为建设新社会的伟大力量的基础。现在党要求把民主政府在培拉特就已确认的男女平等权利变为现实。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央委员会指示，党应进行不倦的工作，提高妇女的政治水平，使她们能接受教育和文化，消除在吸收妇女入党问题上的宗派主义，消除在把妇女提拔到领导岗位问题上的犹豫不决。特别是妇女积极参加国家的经济生活，首先是参加生产，将对解放妇女起重要的作用。

对外政策 在国内巩固人民政权，也要求加强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阿尔巴尼亚人民以自己的斗争，以自己反对法西斯同盟共同事业所作的贡献，在热爱进步的人民中获得了应有的地位。现在，阿尔巴尼亚已不可能再是帝国主义大国手中的货币和商品了。它作为自由的主权国家登上了国际舞台。

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友好，是民主政府对外政策的基础。同时，政府宣布愿意同一切尊重阿尔巴尼亚的自由和独立、不干涉阿尔巴尼亚内政的国家建立关系，同它们友好合作。阿尔巴尼亚同反帝民主阵营中的其他国家一起，为保障持久和平、为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好战政策、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各国人民的

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党把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友谊和在各方面的紧密合作看作是保障民族自由和独立、加强新的民主国家的国际地位的十分重要的外部因素。党特别珍视苏联在国际上在政治、道义上的支持和经济援助，认为这是解决摆在人民政权面前的任务的十分重要的外部因素。在这一时期内，党还非常重视同新南斯拉夫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共同斗争和所流的鲜血，把阿尔巴尼亚人民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连结在一起。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不安地注视着希腊国内事件的发展，在那里，国内外反动派向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反对法西斯的共同斗争把阿尔巴尼亚人民同这一阵线连结在一起。党和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采取了国际主义立场，援助和支持希腊进步力量抵抗反动派和建立民主制的正义斗争。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在尊重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和经济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民主政府为使同美国、英国等国的关系正常化进行了努力。但是它碰到的是美、英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政策。

由于美国 and 英国背信弃义的敌对立场，阿尔巴尼亚没有被邀请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阿尔巴尼亚没有被邀请出席在伦敦召开的意大利赔款会议和在巴黎召开的德国赔款会议。阿尔巴尼亚也没有被邀请参加草拟对意和约的谈判。在所有这些场合，阿尔巴尼亚都应当占有它应有的、用鲜血换来的地位。

美国 and 英国威胁着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它们企图通过进行污蔑，把小小的新阿尔巴尼亚说成是一个扰乱巴尔干和平和安全的国家。但是，美、英帝国主义的所有破坏阿尔巴尼亚新国家的国际地位的企图都遭到了失败。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决地顶住了帝国主义的压

力。勇敢地保卫自己的独立和合法权利，保卫自己已开始走的道路，参加反帝民主阵营——这一切使阿尔巴尼亚人民成为和平和民主的不屈战士，加强了新阿尔巴尼亚的国际地位。

二、动员群众重建国家。 初步的社会经济改造

在战争造成的破坏情况下，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使国家全部经济、文化生活得到恢复和正常化。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大量的物资和资金。摆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从哪里取得这些物资和资金。

依靠国内的力量 美、英帝国主义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竭力利用阿尔巴尼亚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急忙想向它提供“援助”。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断然拒绝了这种奴役性的“援助”，并且选择了首先依靠国内力量，依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援助来建设国家的道路。

党把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的问题变成了全国人民的事情。各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妇女都组织了义务劳动小队、支队、营和旅。全国四面八方都掀起了空前的劳动热潮。为了支援战争受害者，人们节约口粮，捐献金钱、粮食、衣物和其他一切可以减轻战争受害者困苦的物品。政府还得到了苏联援助的小麦，从而为人民保证了口粮。

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在十分缺乏技术手段和干部的情况下，人们首先为修建被破坏的桥梁和道路、为迅速恢复交通而忘我地劳动。

一九四五年，在工人们的努力下，一部分工厂、电站和矿山开

始使用，并已开工生产。党动员农民把可耕地都种上庄稼，在国家的大力帮助下修复被烧毁的房屋。教育和文化机关已开始工作，特别是在农村还开办了新的学校。文盲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严重创伤，特别在成年人当中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旧的教育工作者和在专门训练班中新培养出来的成千上万的教育工作者都自愿地投入了这一运动。

在恢复工作中，感到非常缺乏各种专业技术干部。为迅速弥补这种缺陷，开办了培养技术人员和提高工人水平的训练班。

青年承担了恢复工作中最重的担子。城乡男女青年首先加入了义务劳动队的行列。他们站在修建道路、桥梁和被烧毁的房屋的活动的前列，站在普及教育和文化的斗争的前列。

由于在战争期间发了横财，资本家手中聚集了大量资本——主要是黄金和库存商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认为，把这种利润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转到国家的手中，用来满足人民和重建国家的需要，是合理的和必需的。为此，一九四五年一月颁布了战争利润特别税收法。这种税收是累进税。法律同时规定，将无偿没收所有那些不交税的人的财产。所以，这一法律同时是针对资本家的经济力量的。

为确定利润和税收额，在各州成立了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国家、军队和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些委员会是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建立和工作的。

商人、厂主和所有那些应该交税的人都千方百计地逃税。他们隐藏囤积的商品和黄金。他们力图把这些措施说成是“对人民的掠夺”，并用各种手段保护他们用牺牲劳动人民利益的办法积累起来的财富。

中央委员会指示各级党组织不要作任何让步，要坚持不懈地为严格执行法律而斗争。在这方面的任何让步，都将损害政权的

威望。

受到群众支持的委员会，迫使商人和所有其他资本家缴纳法律规定的税款。一九四五年，来自战争利润特别税的收入在国家全部预算收入中占一半以上。

所有不纳税的资本家的财产都被没收了。这样，国家手中就集中了大量的各种商品。在这一基础上开办了国营商店。这标志着在商业方面产生了社会主义国营成分。

除战争利润特别税收法外，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革命措施。颁布了征用食品和恢复工作所需要的其他物资的法律。为了清查投机分子，成立了特别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制定了固定物价表，以代替自由价格。组织人民对物价进行监督，并且对投机倒把行为和黑市进行了严厉的斗争。禁止私商为进行倒卖活动而囤积粮食。在收购和出售粮食方面，实行国家专营制，规定了国家买卖粮食的统一价格。通过对旧的银行券实行盖章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占领者留下的通货膨胀，建立了对流通中的旧纸币的监督。建立对外贸易国家专管制，以后又改为国家专营制，使这些措施得到增强。

这样，在一个时期内，就在有利于重建国家的情况下解决了财政问题，经济生活正常化了，同时削弱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

社会主义经济 成分的产生

在阿尔巴尼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是革命的
人民政权，它不可能建立在旧的社会经济基础
上。在这种基础上，它不可能成功地实现重建
任务，更不可能实现进一步开展革命的任务。

首先，需要消除控制阿尔巴尼亚财政、工业和矿山命脉的外国资本。本国剥削阶级也还保持着强大的经济阵地，控制着主要生产资料。他们企图依靠这种阵地，破坏重建工作，搅乱经济生活，

煽起对人民政权的不信任。本国和外国的商人、企业主故意囤积商品，造成物价上涨和黑市活跃；他们关闭工厂、作坊，使工人失业；他们特别拿粮食进行投机倒把活动。这就使经济生活混乱，给劳动人民的生活造成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消灭旧的经济基础就更有必要了。

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经济改造，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的确，解放后社会经济改革方面的迫切任务，是进行民主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改造。进行这种改造，是人民革命的必然的、合乎逻辑的继续，也就是把人民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在新的政治条件下，当政权已开始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职能时，党不能等待、也没有等待一切民主任务完全解决后，才开始解决社会主义性质的任务。阿尔巴尼亚各阶级的力量对比，允许在迅速进行民主改革的同时，立即转入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造。

在这种改造中，最重要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通过国有化使主要生产资料社会化。

国家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监督，是对主要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的第一步和预备性措施。这种监督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实行的。这同时也是工人监督的一种形式。对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意义和本国和外国资本的企业，都实行了这种监督。

监督是通过国家指派的代表进行的。

工人在党的机关和国家指派的代表的帮助下，积极参加组织生产和管理企业的工作。这样，他们就能检验自己的力量，学到管理生产的本领。通过工人监督，了解了企业的生产能力，了解了原料、材料和燃料的来源和储备。这就使工人阶级为在国有化后掌管和领导企业有了准备。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矿山和政治逃亡犯的财产被收归国有。

一个月以后，公布了没收在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公民和德国公民的财产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国民银行和其他银行、外国资本家的一百一十一个股份公司的财产，都已无偿地转入阿尔巴尼亚国家手中，成了人民的公共财产。一九四五年四月，以一定的报酬征用了全部私有运输工具。

这些国有化措施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使经济要害部门转入了国家手中，并被用来为劳动群众服务。随着外国资本的经济阵地被消灭，就结束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依赖，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在政治上的独立。

从形式上看，一九四五年的国有化是一般民主性措施。而从社会经济内容看，它是超出了这个界限的改造。国有化有利于劳动群众，被收归国有的资财完全地、直接地用来为劳动群众服务。所以，这种国有化实质上是对主要生产资料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化。在这个基础上，在国民经济中产生了社会主义国营成分。

工会对尽量吸引劳动群众参加恢复工作，参加政治、社会和国家生活起着特殊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下，工会开始成为解决人民政权面临的任务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提高生产和生产率、在改善工人状况和劳动条件、在对工人进行业务和政治教育方面，工会作了巨大的努力。

一九四五年七月，开始在城市成立为工人和职员服务的消费合作社。这是第一批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在国营商业还很薄弱的情况下，这些消费合作社在对城市劳动者进行正常的供应方面、在反对投机倒把活动和黑市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建立消费合作社的同时，党还为实行手工业合作化进行了大量的解释和说服工作。

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同时，还采取了有利于工人和职员的一些重要措施。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实行了不分年龄和性

别的同工同酬制，实行了保留工资的每年十五天的休假权。失业几乎已完全消灭。

这些革命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加强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夺取发展国家的社会经济的新胜利的基础。

为消灭旧的土地关系而斗争 在农业方面，最尖锐、最迫切的问题是消灭旧的土地关系。这个问题关系到根本解决劳动农民和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对抗性矛盾问题，即关系到尚未完成的最大民主改革。这是当时巩固工农联盟的主要方面。所以，党在对农村的政策中特别注意解决这一任务。

一九四五年一月公布了一项法令，免除了过去欠下的全部地租，而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的地租，则减少到百分之七十五。但这是一项不彻底的措施，没有得到贫农的一致赞同。因此，这一法令没有完全执行。

在这一时期，把过去是私有财产的全部灌溉系统收归国有了，并交给农民共同使用。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劳动农民和城市劳动群众的负担，还取消了截至全国解放的一切高利贷款。

但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注意到，这仅仅是一些过渡性措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土地问题。早在战争期间，党就向农民许诺说，它将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而斗争，并采取了预备性措施。解放后，党立即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下，农民坚持要实行彻底的、革命的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法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公布的。根据这一法律，没收和分配了过去国家的庄园、教会的地产和一切超过法律规定数量的私有土地。规定的数量是：如果土地所有者的农场是模范农场，并且亲自经营，最多可以保留四十公顷；如果土地所有者亲自耕种

或管理，可以保留二十公顷；如果土地所有者自己不耕种，但至迟在两年内做到自己耕种，可以保留七公顷。

在阿尔巴尼亚可耕地面积非常有限的情况下，给私有者二十至四十公顷土地，这是个很大的数量。许多地主由于占有这样数量的土地，而在农村仍然保持着他们的阵地，富农的经济势力丝毫没有触动，而很多贫农仍然没有土地。土地改革法中的这一错误，是赛依弗拉·马利绍瓦的机会主义观点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的影响的直接后果。

超过规定数量的土地一律无偿没收。这些土地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为他们私人所有。每个户主最多可分得五公顷。买卖和出租土地的现象被禁止了。

一部分被没收的土地没有进行分配，而归国家所有。国营农场就是在这些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它们标志着农业中社会主义国营成分的产生。此外，森林、水流和地下资源都已成为人民的公共财产。

在土地改革法公布前后，党就这一改革的目的，特别向农村党员和劳动农民进行了大量的解释工作。

党警告说，反动派必将利用一切手法来阻挠土地改革的实行，打击农民的热情，在人民面前污蔑民主政府无能。中央委员会指示，要把土地改革看成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行动，它不仅应给农民以土地，而且还应使他们彻底摆脱长期以来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使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为了迅速而正确地实行土地改革，党建立了贫农委员会。在确切地测定国家、地主和人民的敌人拥有的土地方面，在登记无地和少地的农户方面，贫农委员会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帮助农民分配被没收的土地，特别是动员劳动农民起来揭露一开始就反对土地改革的地主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敌对活动，并与之进行斗争。贫

农委员会的建立及其在土地改革中所做的全部工作，大大促进了贫农的阶级政治觉悟的提高。

三、巩固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 一种形式的人民民主国家

民主阵线代表大会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体现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一九四五年九月宣布的选举法中。

根据这一法律，决定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日进行的选举将是民主的、自由的、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投票的。所有年满十八岁的阿尔巴尼亚男女公民都有选举权。民族解放军战士不受年龄限制，都享受这种权利。法律剥夺了吉斯林政府的部长、战争罪犯和所有丧失了公民权的人的选举权。

人民决心坚持走党指引的道路 选举立宪会议，对党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政治行动，是对党的成熟性、党的组织能力、党同群众的联系、人民坚持走党指引的道路的决心的重大考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为人民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下已充分动员起来，争取在这场新的政治战斗中获得胜利。

在讨论立宪会议选举问题的第四次全会上，恩维尔·霍查同志在谈到党在选举运动中的工作时说：

“人民应具体地看到，使祖国从外国占领者和卖国贼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那些人，能够管理国家，能够恢复和改善全国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同志们应当从选举运动中获得丰富的经验，选举运动应成为他们的一所学校，应把他们武装起来，去解决将要遇到的其他重大问题。”〔78〕

党指示要使选举成为全民投票，要保证所有的选民都参加选

举，要保证民主阵线在这次选举中获得完全的胜利。根据这一指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决定提出统一的民主阵线候选人名单。但由于赛依弗拉·马利绍瓦的机会主义倾向，在这一名单中也有一些反动派的代表，并曾经向天主教神甫建议在选举中结成联盟。

国内外反动势力也竭力利用选举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反动派利用一些法律条款，起初决定作为一个与民主阵线相对抗的集团在选举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在最初的这个企图由于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而失败后，他们改变了策略，决定抵制选举。反动派号召人民弃权，同时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没有民主”，“只有一党的独裁”；什么“选举法是反民主的”，因为“没有给所有希望提出候选人的公民保证平等的权利”。反动派的主要代言人之一、曾是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成员的捷尔基·科科什怀着这种目的，示威性地退出了民主阵线。反动天主教神甫领导的名为“阿尔巴尼亚联盟”这一非法组织，进行了特殊的抵制选举的活动。这一组织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同在逃的战争罪犯相勾结，进行恐怖活动。

留在民主阵线内的反动派的其他代表人物，感到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能组织公开的反对派。所以，这时他们决定留在民主阵线内，直到选举结束；他们企图利用民主阵线的旗帜选入立宪会议，然后在立宪会议内部建立一个派别，一个“合法的”反对派或一个独立的党。

美、英帝国主义者是国内反动派敌对活动的直接鼓动者和组织者。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企图使民主阵线在选举中遭到政治失败。他们展开了一个反对民主阵线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宣传运动，蛮横地要求民主政府允许他们驻地拉那的军事使团的军官不受限制地监督选举运动，等等。他们特别利用承认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问题施加压力。他们通知说，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美国

和英国“得到保证，选举将是自由的”，“外国记者可以自由地观察选举的进行”，他们才会承认民主政府。这是一种干涉内政的企图，因为事实上，选举法和人民政权的全部精神与活动已满足了上述条件。

美国政府还提出了其他条件。它借此机会，要求承认美国和阿尔巴尼亚之间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以前签订的一切条约。

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通知要同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但这只不过是反对人民政权和企图鼓励国内反动派的一种政治手腕罢了。事实上，在选举以后，它们也没有同阿尔巴尼亚建立外交关系。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坚决拒绝了帝国主义者的一切新阴谋，没有允许他们对阿尔巴尼亚的内政进行任何干涉。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为揭露国外和国内反动派的阴谋和手法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孤立了敌对势力，进一步加强了人民在自己周围的政治团结。

当选举运动正在进行时，发生了一个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苏联政府正式承认了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在苏联、南斯拉夫和波兰承认之后，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其他国家也相继承认了我国政府。这就加强了阿尔巴尼亚人民政权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国家的前途的信心。

百分之九十左右的选民参加了十二月二日的选举，其中百分之九十三的选民投票赞成民主阵线的候选人。这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具有一切民主特征的选举。这次选举成了人民、民主阵线和党的一所政治大学校。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十二月二日的选举中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而反动派遭到了失败。自由和自主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通过这一胜利表示完全赞同党的政策，决心毫不动摇地遵循党指引的道

路前进。

宣布成立阿尔巴尼亚 在召开立宪会议的前夕，人民嘱咐当
人 民 共 和 国 选的代表要主张成立人民共和国。一九四
六年一月十一日，立宪会议表达了人民的
意志，一致宣布阿尔巴尼亚为人民共和国，选举了以恩维尔·霍查
同志为首的新政府。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把政府拟订的宪法草案提交全国人民讨论。对这一草案进行两个月的讨论是十分有益的。人民群众提出的建议是对加强宪法的革命内容的宝贵贡献。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四日，立宪会议通过了宪法。从此，立宪会议改称人民议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新的民主宪法肯定了已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反映了人民政权建立后国家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中发生的变化。它反映了国家已开始的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发展过程，并为新的社会经济改造开辟了前景。

宪法首先确定了建立人民政权和人民政权活动的原则：
政权来自人民和属于人民。

宪法宣布了这样的原则：主要社会生产资料由人民的公共财产、合作社财产和私有财产组成。私有成分受国家监督。为了保卫人民的切身利益和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国家受委托根据总的计划领导经济生活和发展经济。国家依靠劳动群众的直接参加来实现这种计划。

公有制，即社会主义经济——国营成分和合作社成分，被规定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为了使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发展和巩固，宪法规定，如果社会整体利益需要，国家有权限制和没收私有财产。在这一基础上，可以对整个经济部门或个别经济企业实行国

有化。资本主义的垄断组织、托拉斯和卡特尔已被禁止建立。

宪法认为劳动是光荣的事情和普遍的义务。它宣布了每个公民有权根据自己的劳动和能力得到报酬的原则。

宪法规定了自由、直接、普遍、平等选举和无记名投票的原则。它赋予选民以撤换他们在各级政权机关中的代表的权利，保障了集会、结社、言论和信仰自由，保障了维护和行使这些权利的必要条件。

这就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一些基本原则。随着宪法被通过，就完成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的政治组织过程。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除了它的普遍性的内容外，还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是：

人民政权是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在根本摧毁了占领者和国内反动阶级的国家机器以后诞生的。

人民会议——民族解放会议的直接继续，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基础。

工农联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体现在代表革命的政治队伍的民主阵线中。

人民政权从开始建立时起，就只受一个党，即全国唯一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实行不与人分掌的领导。

无产阶级专政是民族解放战争期间作为反帝民主革命开始的、全国解放后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不断进行的人民革命的直接产物。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中，党的战略目标是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人民民主制度；而在第二阶段，战略目标则是巩固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的人民民主国家，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这两个阶段，是一个革命的两个交织在一起的、相辅相成的环节。第一阶段的任务的完成，为第二阶段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二阶段来源于第一阶段，是从第一阶段中发展出来的。第二阶段同时也进行第一阶段留下的未完成的民主改革。

四、党关于深入开展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机会主义表现的消除

一九四五年的改革，为阿尔巴尼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现在提出的问题是要以更快的步伐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为此目的，就需要完成已开始的改革，并确定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方向。

但是，在执行党的路线中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观点和立场，妨碍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赛依弗拉·马利绍瓦就是这种机会主义观点和立场的代表。赛依弗拉·马利绍瓦的机会主义是在被推翻的阶级、特别是在美、英帝国主义者向民主政府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施加的强大压力面前投降主义的直接表现。

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机会主义表现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谴责，而赛依弗拉·马利绍瓦尽管未得到任何支持，仍然顽固地为他的观点进行辩护。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 为了解决有关党在深入开展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方针问题，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召开了第五次全会。

全会指出，党的路线受到了赛依弗拉·马利绍瓦在政治和经

济方面坚持的明显的机会主义观点的严重危害。

赛依弗拉·马利绍瓦认为，在阿尔巴尼亚建立起来的新的民主制度，应该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类型的制度。他要求缓和阶级斗争，过高地估计被推翻的阶级的力量，不相信党和人民的力量。他主张让资本主义私有经济有完全的活动自由，使它的发展不受监督和限制，他反对支持城乡合作社经济。实质上，他反对建设社会主义，保护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

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害怕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势力面前屈膝投降。他把阿尔巴尼亚的自由和独立的命运，把人民政权的命运，寄托在向美、英帝国主义作政治经济让步直至屈膝投降上。他要求不加区别地对待苏联、美国和英国，在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中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

赛依弗拉·马利绍瓦以其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已成为我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在党内的代言人和保护者，已成为他们的走狗。不对这种观点进行揭露和斗争，党的路线就会受到威胁，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受到阻碍。肃清这种观点，现在已成为迫切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坚定不移地批驳和摒弃了这些观点。由于赛依弗拉·马利绍瓦继续坚持他的看法，全会把他开除出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对赛依弗拉·马利绍瓦机会主义的揭露，使中央委员会能够引导全党深入开展政治、经济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央委员会大体上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方向。

使工业、国内大商业和对外贸易完全转入国家手中，已被作为首要的任务提出来了。在城市和农村，将建立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国家必须严格监督私有经济，不断限制资本主义因素。恩维尔·霍查同志是这样规定党在经济工作中的方针的：

“一切为了加强国营成分，对私人资本进行无情的斗争，国家给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以最大的帮助。”〔79〕

为了发展生产力和利用自然资源，规定总的方针是在主要开发矿藏的基础上建立工业，并建立轻工业。

决定沿着已开始采取的消除农村旧关系的途径进行根本的土地改革，把这一改革进行到底，并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同时，将建立示范性国营农场。国家必须以资金和劳动工具帮助劳动农民，并限制富农。在发展农村生产力方面所确定的总方针是，实行农业机械化，消除农业的单一性，推广新的作物，发展畜牧业，改良土壤。

为了深入开展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的文教革命，全会指示教育改革应在下述基础上进行：教育和文化应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有，不应再是一小撮人的特权，学校应摆脱旧的习气，而用新的革命精神武装起来。尤其必需的是扫除文盲。

培养在专业技术和文化水平方面能领导政权和经济工作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干部，这对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对外政策方面，强调主要的任务是党应为维护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为加强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友谊、为捍卫世界和平而斗争。全会特别指示，要对给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制度造成主要威胁的美、英帝国主义采取果断的、坚决的和有原则的立场。

在完成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任务方面，人民政权始终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武器。全会提出的方针是不仅应从内容上，而且应从结构上和行政机关的组成上使政权民主化。对于在这些机关中工作的旧的专家，要不断地进行监督，防止他们把官僚主义方法带进来。为了加强民主阵线，指示要从根本上清理民主阵线的队伍，把敌对分子清除出去。

最后，要完成在深入开展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一切任务，就必定要求加强党本身，进一步提高党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和组织作用。因此，一九四五年十月第四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决定代表大会将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举行。但是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干涉，这一决议没有实现，代表大会被不定期地推迟了。

深入进行社会 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的指示立即在阿尔巴
经济改造 尼亚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得到了反映，这时宪法草案正在人民中进行讨论。

全会后，开始了国有化的新阶段。主要属于我国资产阶级所有的现有电站、建筑材料工业、全部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都已归国家所有。到一九四六年底，城市主要生产资料已变成公共财产，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成分已占百分之八十七。一九四七年底，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已差不多完全消灭。

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结束了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它给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经济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工业、商业、运输业、财政方面的社会主义成分。被收归国有的企业已成为社会主义企业。在这种企业中消灭了人对人的剥削。

在阿尔巴尼亚，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进行得很快，并且是无偿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和以后发生了深刻的阶级分化，导致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推翻。这样，便排除了在消灭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方面的主要障碍。

高速度地实行公有化，也是碰到了困难的。工人阶级和国家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妥善组织和管理还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接管它们的。缺乏有经验的、忠于革命事业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尽管这样，由于对工人们进行了良好的组织工作和进行了全面的政治训练，由于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了国家监督，国有化在没有引起波动和经济破坏的情况下得到了实现。

除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外，还建立和发展了合作社经济。一九四六年新成立了几十个城市消费合作社和农村供销合作社。手工业者响应党的号召，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合作化道路。到一九四六年年底为止，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的人占手工业者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为了保证对人民的面包供应，一九四六年六月实行了由国家收购、征集和销售粮食的制度。这一措施消除了私商用人民的口粮进行投机活动的一切可能性。

一九四六年七月进行了货币改革，规定了每户兑换的新币的最高限额。通过这一措施，剥夺了资本主义分子手中的相当一部分货币资金，消除了损害劳动群众利益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果。

为了保证对食品进行更合理和正常的分配，一九四六年九月实行了配给制。根据这种制度，给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的工人规定了比其他人都更高的食品供应量。这种制度的缺点是在供应中对职工和没有参加国家工作的资本主义分子未加以区别。

在食品有限的时候，实行配给制是必要的。这种制度保证满足劳动群众的主要需要，堵塞了用定量食品进行投机活动的渠道。党知道，配给制是一项临时措施，一旦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条件以后就将取消。

随着国营经济的建立和扩大，按计划管理和调节国家全部经济生活的可能性增大了，并已成为必需。一九四六年八月公布了关于国家总的经济计划和计划机关的法律。一九四五年成立的计划委员会经过了改组，并立即开始了制定一九四七年总的经济计划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五月对土地改革法进行了修改，使它具有更深刻的革命内容。那些不自己耕种土地的人的财产——全部土地、葡萄园、橄榄园、菜园、建筑物和农具均被没收。全体农民和那些自己进行耕种的土地所有者最多分给五公顷土地。禁止以任何名义买卖土地或用土地进行抵押。

由于进行了这些修改，就完全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消灭了大地主，打击了富农的经济地位。这些修改在劳动农民中激起了新的热潮，保证了他们更积极地参加土地改革。

这些修改碰到了剥削阶级的激烈反对。地主和富农运用一切手段来阻挠土地改革的实行。他们对农民进行威胁，企图使农民不接受土地改革分给的土地；他们用“政府不会得到大国的承认，人民政权很快就会垮台”的口号，对农民进行恫吓。反动僧侣叫嚷说，土地“是神圣的”，“谁侵犯了它，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特别是一部分混进贫农委员会、国家机关和农业机关的资产阶级技术人员和被推翻的阶级的代表人物进行敌对活动。他们竭力让地主、富农保留最好的或较多的土地。财主们对即将分配给农民的牲畜和劳动工具开始进行宰杀和破坏。有时，他们对党政机关的积极分子还采取赤裸裸的恐怖行动。美国 and 英国驻地拉那使团给他们以直接的支援，并特别在穆泽切组织破坏土地改革的活动。

全党都为彻底实现土地改革而动员起来了，党发动了贫农群众，组织了对阶级敌人的激烈斗争。城市劳动者也给了农民以支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土地改革在全阿尔巴尼亚胜利结束。农民成了他们世代耕种过和流过汗水的土地的真正主人。党实现了农民千百年来宿愿。

在土地改革中没收了十七万三千公顷土地、四十七万四千株橄榄和六千头耕畜。百分之九十左右的被没收的土地（十五万五千公顷）、一半的橄榄树和全部耕畜，都无偿地分配给了七万户无

地和少地的农民。

土地改革是农村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第一场革命。土地改革的实质是对农村土地关系实行民主改造。它消除了大地主，永远消灭了封建主义残余和地主阶级。通过限制土地私有制，通过禁止买卖、出租和抵押土地，防止了农民的两极分化，大大缩小了富农剥削农民的范围。所以土地改革同时具有强烈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因素。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这一改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

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改革虽然保持了劳动农民对少量的土地的私有制，增加了中农的数量，但它限制了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土壤。

给农民以土地，使农民从地主和商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激起了他们更好地利用土地、更快地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愿望和兴趣。

土地改革的实现表明，只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才能在夺取政权后对土地关系实行根本的改造。

土地改革从经济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之间的联盟，也加强了建立在这种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政权本身。劳动农民更加强了在党的周围的团结，更加深信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这一切都是对党走上对农村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的十分重要的支持。随着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一九四六年的建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向农民宣传集体化思想的工作产生了效果。在穆泽切的克鲁蒂亚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

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造创造了促进文化革命的新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要求迅速进行这一革命。文化革命首先表现在一九四六年八月的教育改革中。根据这一改革，教育应是普及的、免费的、平等的、与宗教分离的，并使用本国语言。学校是完全由国家管理的，是统一的。取消了教育税。小学教育在全国已成为义

务教育。建立了学前教育体制和专业教育、成人教育体制。新编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具有新的内容。在每个村庄都开办了小学。此外，还大力开展了扫盲运动。

文化革命和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培养新的知识分子。在阿尔巴尼亚知识分子极少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此，派了人民的很多儿女到国外，特别是到苏联去接受高等教育。国家虽有经济困难，但还是为专家创造了适宜的工作、创作和生活条件。建设工作、教育工作和党的热情支持，使过去的很多干部能受到再教育，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承认党的领导作用。

伴随着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新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来的，是清洗人民政权机关和民主阵线组织中的敌对分子。特别是重新选举人民会议和民主阵线领导机关，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通过颁发特别法令，扩大了地方政权机关的权限和职能，建立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劳动群众通过该委员会增强了对国家机关及其活动的监督。

民主阵线通过所采取的新的革命措施改善了自己的社会成分。现在，民主阵线已完全是劳动群众的一个政治组织。

社会主义改造和群众的革命干劲，使遭到战争破坏的主要项目在一九四六年内就得到了恢复。在这一年年底，不论是工业生产还是农业生产，都达到了一九三八年的水平。此外，还主要用义务劳动进行了一些新的工程的建设。青年们建设了库克斯—佩什科比公路。改造了马里奇沼泽地。开凿了新的排灌渠道等。在为重建国家而掀起的劳动热潮中，发扬了劳动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创造性活动，组织了社会主义竞赛，产生了体现新的劳动态度的突击运动。

为重新审查培拉特全会而提出的论点 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沉重地打击了机

会主义，但它没有揭露和消除这种机会主义的根源：培拉特第二次全会的错误估计和方针。它没有谴责、也没有制止南斯拉夫干涉内政的行径，没有恢复党的领导机构内的团结和集体领导。因此，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领导党和整个国家生活中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通过他们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千方百计地企图把总书记从党的领导工作岗位排挤出去，其借口是他作为部长会议主席应只管国家工作。事实上，党的整个领导工作已集中在中央委员会组织书记科奇·佐治的手里。这样，就出现了党政二元化的现象。但实际上，科奇·佐治滥用党的威望，还企图插手政权领导工作。他建立了这样一种制度，即只有中央委员会机关发出经他签署的特别指示后，命令、法令和法律才能实施。这种工作方法大大削弱了国家机关的作用，滋长了官僚主义，妨碍了问题的迅速合理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党的总路线的纯洁性，使党成功地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民族自由与独立的巨大任务，就没有任何保证了。

恩维尔·霍查同志从未相信过培拉特全会所作的估计和决议是正确的，他得出结论：这些估计和决议应当重新审查和纠正。只有这样，才能恢复领导机构内的团结，才能使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作为党和国家生活的领导机构正常地进行活动，才能保证第五次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得到执行。

为此，恩维尔·霍查同志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向政治局提出了一个关于重新审查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的特别报告。

这个报告的主要论点是：

——在筹备第二次全会的工作中，严重违背了党的内部生活

准则。全会前提交政治局讨论的问题，不是以同志的和共产主义的方式提出来的，而是在政治局以外决定的，是没有经过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的，是感情用事和带有成见的，是事先没有经过自由讨论的。这些问题是以“政变”的方式提出来的。

——培拉特全会的估计和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培拉特全会“抹煞、贬低和指责了”光辉的民族解放战争阶段。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独立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维里米尔·斯托依尼奇和赛依弗拉·马利绍瓦负主要责任。“维里米尔·斯托依尼奇玩弄了我们党和我们大家”。他“指挥和操纵了全会的工作”。

——培拉特全会的方针对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果继续下去，就会对党造成巨大的危险。

恩维尔·霍查同志当时还不知道培拉特的幕后活动，不知道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所策划的阴谋和这一阴谋的全部参与者。因为维里米尔·斯托依尼奇和赛依弗拉·马利绍瓦在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打着向党进攻的旗号，所以恩维尔·霍查同志认为他们应负主要责任。其他的人——科奇·佐治、潘迪·克里斯多和纳科·斯皮洛只因支持维里米尔·斯托依尼奇和赛依弗拉·马利绍瓦而在报告中受到了批评。但恩维尔·霍查同志在不知道幕后活动的情况下，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分析了培拉特全会的工作，并坚信，在这次全会上，党的路线遭到完全不正确的、毫无理由的指责，党没有犯政治错误，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因此，他要求撤销这次全会的决议，恢复历史的真相，消除威胁着党的独立和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危险。

恩维尔·霍查同志的这些正确论点在政治局内遭到了反对，没有为科奇·佐治和潘迪·克里斯多所赞同。他们害怕仔细研究

和赞同这些论点会暴露他们的反党活动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内部事务的敌对干涉。

纳科·斯皮洛也没有鼓起勇气起来公开揭发他自己和其他成员所组织的幕后活动。他曾以为，时间会掩盖他在培拉特犯的错误，通过自己的工作可以洗刷自己的罪过；恩维尔·霍查同志的论点提出以后，他开始转变，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总书记的正确观点。从此，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坚决为党的路线进行了斗争。

在报告中提出的论点被拒绝以后，恩维尔·霍查同志始终抱着创造条件以纠正错误、使政治局团结一致的目的，要求用在斗争和工作中经过考验的新成员扩大政治局。但这一建议也遭到了科奇·佐治和潘迪·克里斯多的反对，没有被完全接受。

为使党内生活正常化而努力 人民革命胜利以后在国内出现的新条件以及党所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要求取消战时在党内民主方面的一些限制，执行组织生活方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全部准则。但是，南斯拉夫领导的干涉、科奇·佐治从南斯拉夫领导那里抄袭来的托洛茨基主义、修正主义的方式方法，不允许这样做，而且在组织路线上带来了严重的偏差和缺点。为了克服缺点和使情况正常化，恩维尔·霍查同志建议对党的组织工作和党政关系进行分析。责成科奇·佐治就这个问题向政治局提出报告。但是，他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唆使下逃避作这个报告，他从来没有作过这样的报告。原因就是为了使对组织问题上的错误负直接责任的科奇·佐治不致遭到打击，使南斯拉夫领导的干涉不致暴露，使它强加给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错误路线不致受到触动。

尽管如此，中央委员会在恩维尔·霍查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坚决要求下采取了一些使党的组织生活正常化的措施。由于没

有党章，中央委员会发出了有关处理党内生活、吸收新党员以及处理党同政权、同群众组织的关系的详细指示。但这些指示都根本没有谈到党的机构的选举。后来，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央委员会决定只选举支部书记。但在这方面也没有执行全部组织规定。书记是以公开表决的办法选举的。党的支委会和委员会没有进行选举。

一九四六年进行的清理党的队伍(重新审查)和分发党证工作对党内生活具有特殊的意义。重新审查的结果，一千二百四十六人被开除出党，占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其中不少人不配党员的崇高称号。但是，重新审查不是完全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规定进行的。由于一系列错误的结果，有些不配做党员的人还留在党内，而有些人则不公正地被开除出党。

重新审查后，党员人数迅速增加。一年之内，增加了二倍半。一方面，这说明了党的威望的提高，另一方面，这也削弱了党的组成和战斗性，因为只注意了数量的增长，而几乎完全忽视了质量。这使道地的异己分子甚至敌人重新混进了党内。同时，尤其是在农村，对吸收妇女入党则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

中央委员会在努力使党的组织生活正常化的同时，还采取了措施来提高共产党员的相当低的理论水平。由于党组织还没有感觉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必不可少的需要，这一工作就更显得迫切了。为此，开办了理论学习班，成立了理论学习小组，还组织了自学。此外，采用新的形式和方法扩大了对人民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

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革命的深入遭到了阶级敌人的激烈反抗。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虽然在阿尔巴尼亚遭到了失败，但他们决不甘心于人民政权的存在，决不甘心于社会经济的革命改造。美、英政府在立宪会议选举时策划的阴谋

失败后，依靠国内外反革命活动的紧密配合，又策划了一个反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新阴谋。这一阴谋的目的是重新纠集和组织国内反动势力的一切残余，利用他们在国内制造紧张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他们要制造这样一些事件，来为帝国主义者从外部进行武装干涉和在国际舆论面前使这一干涉合法化制造借口。

这样，帝国主义宣传机构掀起了一个疯狂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运动，号召阿尔巴尼亚人民起来反对这一制度。英、美间谍机关把逃亡国外的法西斯分子、索古分子和“国民阵线”分子集中在希腊和意大利的特种营地，组织他们进行军事特务训练，从而使他们作好准备，从国内外发动对“共产党人”的联合进攻。英国的军舰示威性地在阿尔巴尼亚领海里游弋，时常向阿尔巴尼亚陆地上进行射击。

这时，驻阿尔巴尼亚的美、英军事使团，把国内反动派发动起来了。它们把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当选为立宪会议代表的某些反动分子组织成一个单独的集团。这些代表开始明目张胆地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妄图为通过和执行法律制造种种障碍。帝国主义间谍机关向他们提出的任务是把国内反动派的一切残余纠集到自己的周围，并领导在策划中的向人民政权的进攻。帝国主义间谍机关使卖国的代表与在国外的“国民阵线”、“合法派”的头目以及希腊保皇法西斯分子取得联系。

美国使团通过对主要的建设和生产项目进行破坏，专门从事扰乱经济的活动。由被收买了的资产阶级专家组成的破坏分子集团，在美国使团的指挥下，在马里奇（这里正在进行沼泽地的排水工程）、桥梁修建工地、库乔瓦石油企业、鲁比克铜矿和其他一些地方进行活动。

一九四六年九月，反革命匪帮对斯库台市进行了一次武装袭击。这次袭击原来计划作为外来武装干涉的起点。但敌人的打算

落空了，因为反动匪帮当天就被消灭了。两个月以后，帝国主义者对阿尔巴尼亚策划了一次国际性的挑衅。当一支英国舰队怀着公开的挑衅目的在阿尔巴尼亚海域经过时，其中两艘军舰在科孚海峡触雷而损坏了。后来发现这是英军指挥部自己有目的地策划的事件。英、美政府诬蔑说海峡的水雷是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设下的，妄图利用科孚事件来为它们在阿尔巴尼亚武装登陆的合法化制造舆论。同时，希腊保皇法西斯政府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国境线上更频繁地进行地面和空中挑衅。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的频繁活动，增加了威胁阿尔巴尼亚人民革命的危险。但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劳动群众现在已经有了与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经验。党教导党员和劳动人民始终保持警惕，准备对付任何威胁。“代表小组”和国内其他敌人在群众中得不到支持。反动分子的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以及在科孚海峡的挑衅，更加增加了人民对卖国贼和美、英帝国主义者的仇恨，全面提高了党、政权、武装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为保卫人民民主制度、民族独立和共和国领土完整的决心。城乡劳动人民积极地和国家保安机关、武装部队一起侦察和消灭敌人。卖国贼和破坏分子被押上了人民法庭，他们得到了清算和应有的惩办。他们不得不彻底供出美、英政府策划的反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阴谋，并公开承认他们的卖国行径。

同时，帝国主义者在科孚海峡挑衅事件中也没有达到目的。他们虽然调动了他们的驯服工具，如海牙法庭等国际组织，但也没能使国际舆论相信阿尔巴尼亚真正是科孚事件的肇事者。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民主政府在全世界面前证实，它对此事件毫无过错，那是英国政府怀着敌对目的而策划的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挑衅。这时候，整个世界进步舆论支持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的正义事业，谴责帝国主义者归罪于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企图。

美、英政府顽固地企图否认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一事，也加强了阿尔巴尼亚人民这一信念，即美国和英国的所作所为，说明它们不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盟友，而是死敌。它们在安理会上利用否决权反对接纳阿尔巴尼亚加入联合国。

美、英帝国主义者还千方百计地企图阻挠阿尔巴尼亚出席一九四六年七月在巴黎召开的和会，但没有达到目的。

为了表达阿尔巴尼亚政府关于对意和约的观点，一个由恩维尔·霍查同志率领的代表团前往巴黎。代表团要求，意大利不仅必须象和约草案提出的那样尊重阿尔巴尼亚国家主权和独立，而且要尊重它的领土完整；德国占领者抢去的黄金应归还阿尔巴尼亚，意大利应向阿尔巴尼亚赔偿损失；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应被看作是同盟国。在美、英代表团的压力下，会议拒绝了这些合理的要求，但在民主政府的坚持下，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同盟国大国外长会议同意了阿尔巴尼亚的要求。

英、美代表还妄图迫使和会讨论希腊对阿尔巴尼亚的领土要求，并把阿尔巴尼亚说成是“战败国”，但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坚定立场使这一企图也失败了。

恩维尔·霍查同志在回国前说：

“我庄严声明，巴黎会议也好，四国会议也好，任何其他什么会议也好，都不能讨论我国的边界，我国境内没有外国的一寸土地。我国的边界是无可争议的，谁也不敢侵犯的……让全世界都知道，阿尔巴尼亚人民派遣代表团到巴黎来不是为了还账，而是为了同那些人算账，他们如此严重地损害了阿尔巴尼亚人民，而阿尔巴尼亚人民同他们进行了如此激烈的坚持到底的斗争。”〔80〕

友好国家，特别是苏联给予的支持，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取得成就起了重大作用。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从解放初期对反动派的斗争经验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共产党员从实践中相信,同时也使劳动群众相信,只有通过

“对国内敌人和他们的国外帝国主义支持者进行激烈的无情的斗争”(81),

才能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党从来没有被人民群众在它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胜利和敌人遭到的失败冲昏头脑。中央委员会教导说:

“要认真对待敌人的活动,为此就需要有警惕性,持续不断的革命警惕性。”(82)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初步成果 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土地改革,使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革。现在,经济由三种主要成分组成:社会主义成分、小商品生产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

社会主义成分包括工业、矿业、电站、运输和邮电、财政系统、对外贸易、国内批发商业、零售商业的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国营农场、农业合作社、机器拖拉机站、森林、水流和地下资源。到一九四七年底,这一成分占据了经济的统治地位。它的比重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五。

小商品生产包括大部分参加劳动的人口,它的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小商品生产由贫农、中农和不使用雇佣劳动的手工业经济组成。所有这些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

资本主义成分由农村富农经济、商人、投机倒把分子以及使用雇佣劳动的城市手工业者和小企业主组成。这一成分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左右。它主要集中在流通部门。一九四七年,

私营商业占零售商品流转总额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与这三种经济成分相适应的有三个社会阶级：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成了社会上的两个主要阶级。资产阶级由于失去了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成了非主要阶级。但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它激烈地反对人民政权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在这场斗争中，它还得到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

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为了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党既考虑到这一建设的基本有利条件，也考虑到它的基本困难条件。

基本有利条件是：有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作为政权和国家管理的领导；城乡劳动群众在党的周围、在民主阵线中的牢固的战斗团结；城乡劳动群众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经受了革命锻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在道义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援助；反帝解放运动的支持。

基本困难条件是：阿尔巴尼亚从半封建状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人民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落后状态，缺乏工程技术干部和熟练工人；物质和财政资源不足；国家处于帝国主义者和持敌对态度的邻国包围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党把挖掘和利用国内一切可能和资源来迅速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这一任务的解决同时也是限制和消灭资本主义成分、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扩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性条件。

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使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能够采取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具体措施。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的头几个计划，是通过首先发展矿业和轻工业部门来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在农业方面，规定要扩大播种面积，增加粮食生产和推广新的经济作物。在文化方面，占主要地位的是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和培养专门人材。

为了执行有计划地管理经济的任务，党和政府在一九四七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国营工业企业实行了经济核算制。这是按计划领导企业经济活动的新方法，它要求企业用出售产品所得的收入来补偿产品的全部生产费用，并同时提供一定数量的积累。

在经济企业过渡到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同时，还实行了劳动定额制度和符合社会主义按质按量计酬原则的新的劳动报酬制度。

为了集中积累和分配，对财政制度、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银行职能都进行了改革。预算原来几乎纯粹是行政性质的，变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财政计划。税收也失去了它过去的财政性质。经济企业的周转税和利润余额被确定为预算收入的主要形式。银行成了信贷和结算的唯一机构。

关于劳动和职工社会保险的新法律规定了工人的权利和义务。这一法律还规定了企业领导和工人之间的集体合同的签订办法、劳动报酬、劳动和休息时间。它特别维护儿童以及女工和母亲的权利。根据新法律，每个职工在生病和工伤事故时，在老年、怀孕和产期，均可享受国家的社会保险。

党正确估价合作社成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作用，打击了公开背离党的经济路线的错误行为。

在手工业合作社中，禁止把利润全部分给社员而不留一部分用于扩大生产，制止了投机倒把和追逐最大利润的倾向，确立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劳动报酬制。

严格禁止城市消费合作社把收购来的商品转卖给私商，过去在个别场合曾发生过这种情况。为了鼓励消费合作社收购尽量多的农产品，在消费合作社和农村供销合作社之间建立了一整套经济联系制度。

供销合作社不仅负责把工业品送往农村，并且还负责收购农产品，对城市进行正常的供应。这一措施排除了私人掮客和投机

商，促进了乡村和城市之间有组织的交流，这在物质上更为有利。

在合作社成分采取这些措施具有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这些措施有助于使合作社运动建立在正确的、牢固的基础上，堵塞了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路线的资本主义分子利用这些缺点的孔道。

党没有低估流通方面的合作化的作用和意义，它认为这只是进入到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初级阶段和起点。根据这一点，在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继续为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而进行了努力。

为了使第一批农业合作社成为示范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单位，它们需要有先进的物质技术基础。为此目的，早在一九四七年就建立了第一批机器拖拉机站。

机器拖拉机站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建立起来的。它是国家有组织地给予农民巨大援助的一种特殊形式，以便在农村建立和巩固新的合作社制度。机器拖拉机站是建立社会主义农业新的物质技术基础的第一块基石。它是强大的政治手段和组织手段。党通过它在农村宣传和传播集体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粮食问题是党和政权的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民政权不得不发布特别命令，规定农业生产者除留足法律确定的种子和家庭用粮以外，必须把全部余粮出售给国家。

这样，国家就能收购必要数量的粮食。但是，在执行这些命令时遇到了由于农民的反对和敌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这种反对所造成的困难。另一方面，这个收购制度没有引起农民对扩大播种面积和增加农业生产的丝毫兴趣，也没有物质上的鼓励。由于这

些原因，一九四八年对粮食收购制度作了修改。现在，规定了每个农业经济单位必须按统一价格交售给国家的粮食数量。这一数量之外的余粮，农民可以留作自用，或以比征购粮价较高的价格出售给国家。这一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农民增加农业生产的一定的物质鼓励。但它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它给错误做法留下了孔道，即强迫收购全部余粮，或者留下的余粮超过法令规定的数量。

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收购制度的频繁修改，不仅是粮食困难的结果，而且也是在寻求最合适的城乡经济联系形式方面缺乏经验的结果。

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劳动群众为完成计划作了巨大努力。在这两年中，建设了新的工业项目，修筑了地拉那一都拉斯—贝京铁路，提高了矿山生产能力。一九四八年，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三八年增长了一倍。

这期间，农业生产也超过了战前的水平。随着新的经济作物的推广，旧的农业结构开始逐渐而稳步地发生变化。在改造沼泽地和土地排灌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在阿尔巴尼亚刚一解放就进行的具有民主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改革，是深刻的、迅速的和气势磅礴的。这是因为这种改革是由代表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人民政权进行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主义革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不仅是工人阶级和贫农，并且还有中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坚决地支持党和政权在国家的革命改革方面的活动。

地主和反动资产阶级一九四四年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遭到彻底失败和人民政权在广大群众中拥有牢固的基础，使被推翻了剥削阶级不可能把他们在解放后进行的阶级斗争变为国内战争，尽管他们、尤其是美、英帝国主义为此搞了许多勾当。解放后，这些阶级在政治领域和社会经济领域中遭到了又一重大失败。

五、粉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 的敌对干涉。揭露科奇· 佐治集团的反党活动

假如没有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国家的内部事务的公开干涉，解放初期的成就会更大。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敌对活动，给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

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旨在加强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关系的一贯的国际主义政策的基础上，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同南斯拉夫政府缔结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合作互助条约。几个月以后，又签订了经济条约。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以信赖的眼光看待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南斯拉夫人民之间的同盟；两国人民曾经为反对共同的敌人，为达到共同的目标而并肩战斗，洒过鲜血。党把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紧密合作和相互帮助，看作是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民族独立不受美、英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希腊保皇法西斯分子的奴役阴谋的侵犯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尽管如此，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同志不安地注视着南斯拉夫代表对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内部事务的干涉。不过，他们仍未怀疑这些干涉是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和赞同下进行的。他们在反对南斯拉夫驻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官和军事人员对党和国家的内政的任何干涉的同时，努力消除两国、两党关系

中的一切误解和障碍。

但是，这些努力遇到的是南斯拉夫领导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阿尔巴尼亚的立场。南斯拉夫宣传机构竭力把这种立场说成是“无私的兄弟援助”政策，而在这种立场的背后，却隐藏着消灭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国家独立的目的。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对南斯拉夫干涉的抵制 一九四七年初，开始执行在经济条约基础上签订的协定。这些协定规定的第一个措施是使货币单位等值。党中央和阿尔巴尼亚政府在恩维尔·霍查同志的倡议下，一开始就在原则上反对这一措施，因为存在许多障碍，不允许实现真正的等值。两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职工的工资和商品价格都是不一样的。要在短时间内把这些拉平是不可能的。但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把这一反对说成是不恰当的，是对协定精神不信任的表现。在他们施加压力之后，在完全专横的基础上把里克和第纳尔的币值拉平了，这是有利于第纳尔的。

执行的第二个措施是统一价格。对这个措施，阿尔巴尼亚党和政府根据两国工业、农业和其他物质生产部门基本资金结构不同这一事实，也提出了反对意见。劳动生产率和单位产品的生产费用也不相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认为，这些因素都是不重要的。由于他们施加压力的结果，对两国商品规定了同样的积累标准，并且用国内价格而不是用国际市场价格进行交换。

第三个措施是合并海关。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曾努力使这一合并便于两国之间的交流。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却歪曲协定内容，并在施加压力之后，使南斯拉夫的任何企业或私商有权无限制地在阿尔巴尼亚市场购买商品，第纳尔可以自由地兑换为阿尔巴尼亚里克。结果，南斯拉夫企业和私商搞走了在阿尔巴尼

亚市场上所能找到的一切东西。市场的匮乏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劳动人民造成了非常困难的形势。这成了新的通货膨胀威胁我国的原因并引起了自由市场物价普遍上涨。

为了协调经济计划和执行其他经济协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南斯拉夫领导要求这个委员会拥有使它事实上变成凌驾于阿尔巴尼亚政府之上的政府的权利和职能。这些要求都被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拒绝了。

在经济协定范围内，成立了阿南联合公司。这些公司包括了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这些公司似乎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在阿尔巴尼亚方面向联合公司提供了它所应付的全部基金后，南斯拉夫方面却对基金一文不出。结果，这些企业只靠阿尔巴尼亚国家提供的基金来维持，而南斯拉夫方面却攫取了利润的一半。

所有这些协定连两个主权国家间关系的最起码的准则也违反了，并给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

为了执行经济协定，南斯拉夫政府曾答应在一九四七年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二十亿里克的贷款。这一贷款付了不到百分之五十。南斯拉夫用贷款提供的商品，也是按照比国际价格高一至三倍的价格计算的。全部所谓南斯拉夫援助也就是四座陈旧不堪和设备早已耗损的小工厂。此外，贷款也被用作工具来对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制造对它们的不信任，似乎它们没有能力领导经济的有计划的发展。这给完成一九四七年的计划增加了巨大的困难，因为制定这个计划也是以南斯拉夫的援助为根据的。南斯拉夫政府也没有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提供约定的一九四八年的贷款。

为了满足计划的需要，政府不得不动用原料、建筑材料和日用品的全部储备。由于这些储备量很少，国家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恶化了。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在竭力控制重要经济阵地的同时，开始了旨在控制阿尔巴尼亚军队的干涉活动。在这方面，他们在政治部的支持下，集中攻击捍卫党的正确军事路线和人民军的独立性的总参谋部和总参谋长穆罕默德·谢胡同志。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在军事问题上的观点和要求也遭到了恩维尔·霍查同志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中坚持原则的力量的反对。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为了打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反抗，于一九四七年六月向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封挑衅性的信件。在这封信中，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公然攻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责它歪曲党的路线，说什么在阿尔巴尼亚“正在形成具有反南斯拉夫情绪的第二条路线”。南斯拉夫领导企图用这种指责来加强它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已被削弱了的地位，并向它的代理人科奇·佐治提供武器来反对和打击总书记和其他坚持原则的领导同志；总书记和其他坚持原则的领导同志被转弯抹角地说成是歪曲党的路线的主要祸首。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被提交政治局进行讨论。科奇·佐治和潘迪·克里斯多既不反对南斯拉夫领导的指责，也不敢公开站出来为它进行辩护。政治局拒绝了这种指责，并委托恩维尔·霍查同志答复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出它的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公开干涉。

此后，情况更紧张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加强了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干涉和压力。他们为此制造了新的借口。

一九四七年初，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示国家机关开始制定一个发展经济的二年计划（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党是从阿尔巴尼亚的现实情况出发的，即从国内的可能性出发，从现有的研究水平以及国家机关所积累的关于制定短期计划的经验

出发。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丝毫不考虑这种情况，坚持要阿尔巴尼亚也象南斯拉夫那样，制定一个五年远景计划。不仅如此，他们还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了关于这一计划的方针，把阿尔巴尼亚看作是南斯拉夫的一个共和国。根据这一方针，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不应该独立地发展，而应该合并到南斯拉夫的经济中去。阿尔巴尼亚不应该建立和发展本国的工业，而只要生产农业和矿业原料就够了，这些原料将由南斯拉夫来加工。阿尔巴尼亚将以这些原料从南斯拉夫换取必要的工业品。这一方针旨在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进行控制和榨取，使它成为南斯拉夫经济的附庸。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拒绝了这一方针。它同意制定五年计划，但指示政府，计划的目的是要建立和发展本国的工业，实现国家电力化，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农业，计划主要建立在国内力量以及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基础上。

党采取了具体步骤来加强和扩大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但是，这些步骤遭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反对；他们企图把阿尔巴尼亚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隔离开来。

一九四七年七月，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代表团由恩维尔·霍查同志率领。谈判结果，苏联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提供一笔贷款，以便使用拖拉机和农业机器来装备农业，并兴建一些重要工业项目。

南斯拉夫领导以两国间缔结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借口，企图阻挠同苏联签订协定。更有甚者，南斯拉夫驻莫斯科代表居然要求阿尔巴尼亚代表机构把这一协定的副本交给他，并威胁说，不得到南斯拉夫政府许可不得签订任何协定。阿尔巴尼亚政府就对

其内政的这一新的干涉提出了抗议。

铁托利用党中央给政府发出的关于制定计划的正确指示和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作为借口，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提出了第二次指责。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他指责阿尔巴尼亚政府，说什么它制定了一个使阿尔巴尼亚的经济脱离南斯拉夫经济的、自给自足的、不现实的五年计划。铁托转弯抹角地指责直接从苏联取得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援助，并公开指责恩维尔·霍查同志，说什么他从莫斯科回国以后改变了对南斯拉夫的政策。铁托把对苏联的方针说成是反南斯拉夫的方针。硬给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加上这些罪名：什么它允许在阿尔巴尼亚建成反南斯拉夫阵线；什么它造成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南斯拉夫人民之间的关系的严重恶化。最后，纳科·斯皮洛同志特别被指责为敌人的同伙！

新的指责是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又一次十分沉重的打击。这些指责严重动摇了党的领导，使政治局中形成的紧张局势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这些指责向科奇·佐治派别集团提供了摧毁党的基础的弹药。实际上，科奇·佐治、潘迪·克里斯多和克里斯多·赛梅尔科^[83]成了南斯拉夫观点的最狂热的卫护者。科奇·佐治没有通知政治局的一些成员参加讨论这些指责的政治局会议，企图使恩维尔·霍查同志失去一切支持和拥护。

此外，科奇·佐治和潘迪·克里斯多不去揭露南斯拉夫领导干涉的原因和驳斥他们毫无根据的指责，反而支持了这些指责，并把重点放在纳科·斯皮洛的“背叛”上。这是一个阴谋，是为了掩盖南斯拉夫领导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及其总书记所进行的猖狂的攻击，为了掩盖南斯拉夫领导的目的。

纳科·斯皮洛同志在这一紧张局势下，在他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没有能够象共产党人所应该表现的那样顶住一切局面而自杀了。

为了加强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关系，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政府代表团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前往索非亚，签订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企图阻挠签订这一条约。它通过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成员科奇·佐治，企图以这种精神拟订条约，即阿尔巴尼亚同保加利亚采取的任何联合行动，都必须事先得到南斯拉夫的赞同。科奇·佐治的这一顽固要求被拒绝了。南斯拉夫领导由于阻挠不了这一条约的签订，改变不了这一条约的健康精神，就千方百计地竭力贬低这一条约的意义。

一九四七年十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主张在无产国际主义原则上加强同兄弟共产党的联系，完全赞同一九四七年九月底举行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华沙会议的声明和决议，赞同会议成立情报局。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表示愿意交流经验，如有必要，并准备同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协调行动。中央委员会将在适当时候要求接纳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为情报局成员。

揭露南斯拉夫领导反马克思主义反阿尔巴尼亚的计划 纳科·斯皮洛的自杀给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并更进一步加剧了党的领导内出现的紧张局势。这使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有机可乘，使它利用这一事件“证明”他们的指责的“正确性”，并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路线、党的团结和总书记进行新的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科奇·佐治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直接支持下，打着党的“救星”的旗号，准备召开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反马克思主义

的、反阿尔巴尼亚的论点是这次全会的纲领，科奇·佐治在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提纲挈领地表达了这些论点。在筹备全会期间，科奇·佐治对捍卫党的正确路线的、坚定的、久经考验的干部加紧进行迫害，并掀起了蔑视知识分子党员的运动。他通过自己控制的国家保安机关，收集和伪造材料反对他不喜欢的、要在第八次全会上加以谴责的党的领导干部。

正在这个时候，南斯拉夫领导通过他们驻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萨沃·兹拉迪奇向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在联邦基础上把阿尔巴尼亚并入南斯拉夫”的计划。联邦中还包括“巴尔干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保加利亚”。根据这一计划，联邦首先将具体体现在“经济关系”中，其途径是“合并国民经济”，“制定共同计划”。同时还要把“这些国家的军队合并为一支统一的军队”。然后考虑“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说什么这是“这些国家人民和党的意志”。⁽⁸⁴⁾科奇·佐治集团把这一计划的要点作为筹备全会的基础。

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上，铁托分子及其以科奇·佐治为首的代理人的反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敌对活动达到了顶点。

事实上，科奇·佐治和潘迪·克里斯多把恩维尔·霍查同志说成是使党走上所谓错误道路的主要祸首。纳科·斯皮洛被宣布为党和人民的敌人，被说成是特务。穆罕默德·谢胡同志被蛮横地禁止参加全会，被指责进行反南斯拉夫的“敌对”活动，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科奇·佐治捏造说，在党的领导中，在“总书记的眼皮下”有派别组织在进行活动！他甚至暗示霍查同志亲自领导着这个派别组织！这对霍查同志的地位和党的团结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全会通过了导致取消阿尔巴尼亚政府的阿南经济联系方式。

阿尔巴尼亚军队和南斯拉夫军队合并的主张被提出来了。公开试图使阿尔巴尼亚脱离苏联,出现了反苏倾向。

第八次全会进一步加深了党的建设和党内生活方面的错误。军警方式在更大的程度上代替了党的领导的组织方式。

在这次全会上,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捍卫党的路线而进行的抵抗,在南斯拉夫领导的压力面前被挫败了。全会接受了铁托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提出的指责。党的正确的政治经济路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直接遭到了威胁。第八次全会为推行南斯拉夫使阿尔巴尼亚殖民地化的计划铺平了道路。这次全会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光荣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全会以后,科奇·佐治集团竭力地为实现南斯拉夫的计划而奔忙。他们加紧准备为诋毁以至从肉体上消灭那些反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干涉和压力的党和国家领导干部。

群众组织的领导工作和群众组织的活动走上了邪路。出现了使青年组织涣散的倾向。工会的一系列职能被剥夺了,它变成了纯粹的官僚机构。

警察手段渗入到国家机关中去了。国家保安机关凌驾于党之上。

铁托分子以为他们现在已经完全征服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他们就更加公开地和更加粗暴地干涉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内政。计划协调委员会几乎成了第二政府。阿南联合公司正变成纯粹的南斯拉夫企业。从南斯拉夫派来一个特别监察委员会,其任务是促使把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合并到南斯拉夫的经济中,这将是两国政治合并的基础。与此同时,科奇·佐治集团掀起了一个广泛的与南斯拉夫“合并和亲善”的宣传运动,以便把这一合并说成是根据阿尔巴尼亚人民志愿的行动。

南斯拉夫领导和科奇·佐治派别组织顽固地要党中央和政府

使苏联顾问离开军队。最后，他们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提出建立以铁托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军队的统一的总指挥部的问题，并要政治局批准执行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合并的计划。尽管政治局出现严重局势和铁托分子及其支持者施加异乎寻常的压力，这些反马克思主义和反阿尔巴尼亚的要求，经过恩维尔·霍查同志的原则性的坚决反对，没有被接受。

南斯拉夫领导感到自己的目的可能很快会暴露，并且注意到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反抗，妄图以恐吓来达到这些目的。他们捏造了阿尔巴尼亚面临即将遭到希腊进攻的危险这一理由，要求将南斯拉夫军队的几个师紧急开到阿尔巴尼亚。这样，对阿尔巴尼亚的武装占领就将变成既成事实。这就使铁托分子能够挫败在吞并阿尔巴尼亚方面所遇到的反抗。这一要求得到了科奇·佐治及其集团的支持。他和铁托的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兰科维奇还准备了一个方案，一俟南斯拉夫军队进驻阿尔巴尼亚的领土，就向世界宣布南斯拉夫军队的到来是根据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而采取的行动！

但是南斯拉夫的这一阴谋也没有得逞。恩维尔·霍查同志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根据霍查同志的建议，决定拒绝南斯拉夫的几个师进驻阿尔巴尼亚。这一历史性的决议拯救了我国，使之免遭由于南斯拉夫部队的进驻而引起的流血冲突，免遭一次新的奴役。

恩维尔·霍查同志象以往把铁托和南斯拉夫各方面的官员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国家内政的其他严重干涉告知了斯大林一样，也把南斯拉夫领导要求派几个师进驻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拒绝这一要求告知了斯大林。

党和国家正经历着非常困难的时刻。正在这个时候，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获悉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

在这些信件中严厉地批评了南斯拉夫领导，因为他们采取反苏立场，采取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主义路线，践踏了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并严厉批评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傲慢和狂妄。

“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这种不正常情况，对党的生命和发展是一个严重的威胁。”〔85〕

这些信件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由南斯拉夫反马克思主义领导人所引起的激烈冲突的最严重时刻，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给我们党和所有其他兄弟共产党的援助是对我国人民和共产党的巨大拯救。”〔86〕

根据这些信件的观点，现在党中央完全看清了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进行干涉的性质和目的。

一九四八年六月召开的情报局会议，对揭露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修正主义和沙文主义活动作出了重大贡献。情报局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已经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背叛了社会主义，站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去了。从这一情况出发，情报局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叛徒。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拥护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特别公报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背叛、反苏和反阿尔巴尼亚的道路。

中央委员会的这一立场，得到了全党的赞同。党的各级组织在它们所举行的会议上表示了对中央委员会和总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的不可动摇的信任。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敌对阴谋被揭露以后，必须肃清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中的任何剥削与隶属的思想和内容。为此，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要求，除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外，重新审查其他一切协定。但是南斯拉夫领导无视这一合理要求。于是，阿尔巴尼亚政府不得不废除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签订的经济协定。

为了根除南斯拉夫的干涉和对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歪曲，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召开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被第八次全会无理开除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出席了这次全会。

全会深刻地分析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活动，找出了错误的根源，并为新的历史形势所要求的转折规定了措施。

全会认为，党自成立以来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解放后出现的个别错误，是南斯拉夫干涉的结果。这一干涉和科奇·佐治的托洛茨基主义活动，使战后时期党的组织路线变成了一条总的说来是不正确的路线。

第二次全会的主要决议和第八次全会的全部决议被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害的，因此受到了谴责并宣布无效。

全会详细讨论了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同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关系。全会严厉谴责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所抱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野心。另一方面，中央委员会就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过分信任进行了自我批评。

全会认为，党在成为执政党后仍保持半公开的状态是不正确的。用民主阵线的纲领掩盖党的纲领，党员对自己的党员身分保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指示作为阵线的决议进行公布，都被认为

是严重的错误。从南斯拉夫共产党那里搬来的这些形式，削弱了党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并将导致党的毁灭。

没有党章，使南斯拉夫领导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方法可以随意塞到党内来，这是有害的，所以全会提出必须制定这一根本文件。

全会认为，科奇·佐治对他毫无保留地支持铁托分子和歪曲党的组织路线应负严重的责任。科奇·佐治同时担任党的组织书记和内务部长职务，他利用这一点把党置于国家保安机关的监督之下，在党内贯彻警察式的领导方法。这严重地践踏了民主集中制和扼杀了原则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领导机构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面任命的。它不向党员群众定期汇报工作。缺乏党员群众对领导机构的监督。在许多情况下，党员的权利被践踏了。机械的纪律多于自觉的纪律。个人的发号施令代替了党的集体领导。

干部工作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在这方面，宗派主义、地方主义和私人交情占了统治地位。没有把干部看作是党的宝贵财富。教育干部和提高干部的工作几乎完全被忽视了。所有能干的和有威望的老干部都集中在中央，而党和政权的地方机构大大削弱了。

党内这种严重情况，也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作为内务部长的科奇·佐治竟容忍对社会主义法制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的严重破坏。内务机构，特别是国家保安机构，变成了不受任何监督的全权机构。这些机构的蛮横和有害的行为，使它们脱离人民。

在某些场合，党和国家机关对爱国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在政治上采取了错误态度。对待小商人，采取了用行政手段过早地消灭他们的过激的经济措施。在党的领导下为解放祖国而

战斗过的城乡中层爱国人士被无理地宣布为敌人。由于个别知识分子的敌对活动，粗暴地打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

这是后果十分严重的错误，它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惶恐不安的情绪，正使党同群众以及同民主阵线的联系受到削弱。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结束了对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一切歪曲，消除了这方面的错误。

全会给党的战士纳科·斯皮洛同志恢复了名誉，并对科奇·佐治、潘迪·克里斯多和派别集团的其他一些成员进行了处分。决定所有那些按照第八次全会精神被提拔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人回到原来的岗位。所有那些被无理处分的人，撤销了对他们的处分，回到原来的岗位。违反党的规定而被开除的党员恢复了党籍。

第十一次全会重申，今后的坚定不移的立场是继续奉行下述政策，即同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一切民主反帝革命工人运动前列的苏联和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友好和兄弟般紧密合作的政策。党面临的任务是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并根据阿尔巴尼亚的条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

党的各级组织要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使劳动群众了解，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全人类的主要敌人是美、英帝国主义者，向群众说明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领导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说明他们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敌对活动。

为了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党面临的任务是动员人民群众来完成国家计划，加强国家经济和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巩固工人阶级同贫农和中农的联盟，消灭剥削阶级。

党为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把政治思想教育建立在更健全的基础上，以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提高共产主义觉悟……，认识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87〕

政治局受委托

“组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对我国的现实情况进行科学的研究，以便更好地向党阐明我国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发展情况，阐明阶级力量的变化，阐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条件”。〔88〕

全会决定重新出版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

为了使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生活正常化，决定党立即公开，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组织问题上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标志着党的生活和国家命运的深刻转折的开始。全会恢复了领导中的团结，无限提高了党的威望。首次在报刊上发表的全会决议，激励和发动了党的一切组织，鼓励了党员的主动性和勇敢精神，增加了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

在党由严重的局势向革命高潮的新形势过渡当中必然会产生的一些个别的错误和动摇，在中央委员会的帮助下得到了克服。

在党内讨论第十一次全会决议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新的事实和文件，进一步证明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敌对活动，更加重了科奇·佐治、潘迪·克里斯多及其亲密同伙的罪行。另一方面，科奇·佐治和潘迪·克里斯多在地拉那和科尔察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自我批评时，不揭发自己错误的真正根源，以便所有党组织帮助他们改正缺点，而是企图欺骗党。这说明他们对自己所走的道路、对他们给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还执迷不悟。在新的事实面前，需要重新考虑他们对党和人民所应负的责任。

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消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社会主义经济

部门和阶级斗争战线上的影响。修改了支持富农和使富农发财致富的旧的农业税收法。新的法令支持了贫农，限制了农村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同时还制定了调整和促进农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其他法令。

为了消除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那里抄袭来的农业合作社章程中的资本主义合作化部分，制定了新社章。这一社章取消了按土地数量分配收入的办法，保留了只按劳动取得报酬的办法，限制社员的自留产奶牲畜头数和自留地面积。国家更加关心合作社的组织工作和它的顺利发展，消除了这样的错误观点，即国家机关不应插手作为群众组织的农业社的领导工作。

在这一时期，党和劳动人民专心致力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群众为了以完成经济计划来迎接代表大会，掀起了创造性劳动的热潮。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大大帮助了党高水平地做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第 四 章

党为把阿尔巴尼亚从落后的农业国 变成农业工业国而斗争

(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五年)

一、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党和国家生活中的历史转折点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地拉那举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五百六十三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二百九十九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二万九千一百三十七个党员和一万六千二百四十五个预备党员。

党的总书记恩维尔·霍查作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他分析了党成立以来的全部活动，论述了所取得的胜利以及国家和党所经历各个阶段，广泛地揭露了在执行党的路线中犯错误的环境和原因。在报告中明确规定了党在未来时期的政策。报告中所贯穿着的党性和对党的根本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给大会代表指出了正确的方向，确保了大会工作的顺利进行。

建设社会主义基础 的根本方针

代表大会强调，必须把反对由于南斯拉夫敌对干涉所造成的在政治路线方面的错误的斗争进行到底，并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主要方针。

通过迅速地发展生产力,使国家摆脱严重的落后状态,是基本的经济任务。

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家电力化是这项任务的主要内容。为了建立国民经济的崭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为了扩大本国的商品生产,为了准备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农业的条件,为了壮大工人阶级,以便加强它的领导地位,最后,为了捍卫革命胜利果实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实行工业化。

必须迅速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以便在最短的时期内摆脱过去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保证经济的独立发展,显著地提高劳动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要完成这项任务,首先要依靠最充分地利用地上和地下资源,改进和改组现有工业,建立一系列的新项目和新部门。

除社会主义工业化外,代表大会还十分重视使农业摆脱落后状态和发展农业。彻底解决这一任务的唯一途径就是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代表大会在批判了集体化问题上所犯的 错误之后,指示党要坚持这一方向:

“加强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国营农场),并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地、慎重地和自愿地实现农村土地集体化,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给这些合作社以支持。”〔89〕

由于广泛实现集体化的条件尚未成熟,党把自己在这方面的政策具体体现在这个口号里:“在集体化问题上既不应操之过急,也不应停止不前。”

由于在农业中占多数的个体经济发展水平低,因此,有必要给个体劳动农民以全面的支援,以便增加农业生产。

同时,代表大会要求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个体经济占主要地位的条件下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危险。代表大会指示,要对农

村资本主义因素实行经济上限制和政治上孤立的政策。

党在执行自己的农村政策的过程中，要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富农”这个列宁主义口号为指南。

国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发展要求继续为消灭文化落后、深入开展文化思想革命而斗争。为此，就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实行和扩大义务教育，尤其是中等专科教育，发展高等教育，在国内外培养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和科奇·佐治集团企图把否定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财富的思想塞进教育、艺术和文化领域中来，代表大会在批判了这一企图之后，在这一方面提出了构成开展文化革命的实质的主要方针。教育和文化应该属于人民，并为广大劳动群众服务。它们要以民族财富为基础，同时要具有深刻的社会主义内容。在教育、艺术和文化领域中，党要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牢牢地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

代表大会提出的方针和任务结束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出现的错误，充实、确立和进一步发展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纲领。这些方针具体表现在发展国家经济和文化的长期计划中。

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发展国家经济和文化的两年计划的指示。在这一计划期间，将为过渡到以更长期的计划发展经济准备条件。

两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工业投资约占两年计划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七。占第一位的是扩大矿业生产，尤其是扩大石油和沥青的生产。发展轻工业占第二位。在两年计划期间，规定要兴建“斯大林”联合纺织厂、马里奇糖厂、赛里特水电站和其他一系列项目。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与合作化对克服向人民供应工业品方面的困难也起着特殊的作用。

在农业方面，计划扩大播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扩大土

地改良和农业机械化等,以增加农业生产。

人民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民主化 代表大会强调指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基础,必须使政权进一步巩固和民主化,必须加强人民军和国家保安机关。

把政权分成区人民会议和市人民会议,前者主要管理农村问题,后者主要管理城市问题,这是原则性的错误。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那里贩卖来的这一行政措施,导致了城乡劳动人民的人为的脱离。为消除这一缺点,指示区人民会议和市人民会议立即合并,由地方政权机关处理全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所有问题。

政权和党二元化以及由此造成的贬低和削弱政权机关的作用、助长官僚主义和解决问题拖拉的这种不正常状态,受到了批判。人民会议及其执行机关,必须行使法律所赋予的一切权力,以提高它们的作用。

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不断进行的反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敌对活动,目的在于把它搞垮,这就使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始终保持警惕,不断提高祖国的国防力量。阿尔巴尼亚在敌对国家四周包围之中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事实,使这一任务显得更加重要。

第一次代表大会指示,要采取措施全面加强人民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加强战备,使军队进一步现代化。代表大会指示,军队的军事和政治训练要按照计划进行,这个计划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的经验和根据国内条件运用苏联军事科学的基础之上的。

在这一时期,党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就是消除国家保安机关的错误,引导它们走上正确的道路,进一步加强这些机关。在过去的年代里,这些机关比任何其他部门都更多地遭到南斯拉夫的干涉和科奇·佐治的托洛茨基主义活动的危害。代表大会赞同中央第

十一次全会以后党为了消除保安机关中的警察手段，清洗保安机关中犯有严重过错的人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代表大会特别强调，保安机关的活动要在党的直接领导和监督下进行，要捍卫社会主义法制。

同时，代表大会指示要按党性的原则来分析国家保安机关的错误。国家保安机关为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做了宝贵的工作。批判错误绝对不应该用来否定保安机关存在的必要性，也不要把它变成对保安人员的普遍斗争。党将帮助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代表大会警告说，阶级敌人将会极力利用揭露铁托集团和科奇·佐治集团之后所造成的局面，把打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保安机关。

“党应努力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保安机关，因为它是党指挥的、政权手中的宝贵的武器，它保卫党和政权不受国外和国内敌人的敌对活动的侵犯。”〔90〕

制定正确的对内政策还必然要求坚持正确的原则性的对外政策。

代表大会谴责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把阿尔巴尼亚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割离开来的活动，谴责了科奇·佐治反党集团盲目追随南斯拉夫领导的反苏的民族主义政策的企图。代表大会制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本身所决定的、符合人民和祖国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的目的，首先是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维护和保障民族独立的斗争，努力保卫和平和建立睦邻关系。

阿尔巴尼亚 只有消除一切组织上的错误，制定一条马克思
劳动党章程 列宁主义的组织路线，才能使正确的政治路线得到贯彻。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准则将使党内的转折得到彻底实现。

代表大会决定把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改名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一改变与党和国家的社会成分有关，并不影响党的性质和目标。在阿尔巴尼亚，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约占百分之八十。这也反映到党内来，党员的绝大多数是农村劳动者。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共产党的继续。

党内生活建设的准则和规章体现在代表大会通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章程中。

在党章的序言部分概括地规定了党的目的：最近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建设共产主义。

党章强调了党在政权和国家的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领导作用。

党的建设和它的整个内部生活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由于环境的原因，执行这一基本原则受到了限制。解放后，由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干涉和科奇·佐治集团的活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遭到粗暴的践踏。代表大会指示，“要执行和象保护眼珠一样地保护这一原则”〔81〕。

党章保障了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团结，认为这是党能够维护和加强劳动群众在自己周围的团结，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必要条件。

在这个基本文献中第一次规定了党员作为进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在民主阵线中的团结和捍卫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先锋战士的义务。特别强调了共产党员作为“道德品质的模范”的义务，保持和不断加强同群众的联系以及当好群众带路人的义务。

根据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的社会条件，党章规定了入党手续。任何剥削他人劳动的人不得入党。对于吸收劳动人民入党，根据家庭出身和社会成分规定了不同的要求，首先吸收工人和

贫农入党。

通过党章，对党来说是一个重大事件。七年来，党只是根据决议、通知和指示来处理党内生活。

党章为防止今后破坏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的规章准则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是：

“要对企图破坏党章规定的党的组织制度和原则的表现进行斗争”。〔92〕

同时，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加强思想工作的决定；作出了关于通过党内教育的方式，通过训练班、党校和自学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史的指示，并规定了具体措施。

代表大会将科奇·佐治和潘迪·克里斯多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党和人民的敌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领导的代理人开除出党。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二十一名正式委员和十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恩维尔·霍查、穆罕默德·谢胡、希斯尼·卡博、贝基尔·巴卢库、果格·努什、斯皮洛·科列加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恩维尔·霍查再次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代表大会的工作是高水平的，是在健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气氛中进行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广泛地、积极地参加讨论问题，有助于正确地解决党的政策和内部生活中的根本问题。

代表大会谴责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干涉和科奇·佐治的托洛茨基主义活动，同时也不允许走向另一极端。代表大会认为，金·马尔库将代表大会引向完全错误方向的企图是非常有害的，并谴责了这一企图。金·马尔库利用党同托洛茨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投机，企图否定党过去的整个政治路线，指责党的所有主要领导干部都受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要求把他们看成同科奇·佐治是一丘之貉而严加惩办。他企图这样来改变党的领

导，抢夺“救星”的旗帜，窃据党的领导地位。还有其他一些对党犯有严重过错的人，为了掩盖他们个人的责任，表白自己是无罪的，也进行了同样的活动。恩维尔·霍查同志的发言帮助代表们识破了金·马尔库和其他不良分子的真正目的，消除了一切混乱，始终保持了代表大会的革命性和原则性。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加深和肯定了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上开始的党和国家内部生活中的转折。代表大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总路线武装了党，以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科学纲领武装了劳动人民。

代表大会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胜利，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的丰富经验武装了党。

代表大会加强了党的团结，增强了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诚。

第一次代表大会还预见到党在执行所提出的任务时，将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遇到巨大困难。它使党为对付和成功地克服障碍作好了准备。

代表大会的文件传达到全国人民。劳动群众完全拥护党的路线，大胆地批判了过去所犯的错误，表达了他们对党的忠诚和执行党的纲领的决心。

在党内出现了新的健康的局面。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加强工人 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联系

党中央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来实现代表大会所标志

的转折。重新审查了所有的法律、指令等。由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使区的数量减少了一半，党和政权就把力量集中在更少的点上。此外，从中央派了有经验、有威信干部到地方党政机关中去。市委员会和区委员会的合并，结束了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割裂现象。

党的基层组织是按生产单位建立起来的。党使群众组织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纠正了在民主阵线方面所犯的错误，并正确地规定了民主阵线的组织建设和任务，这在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新章程中得到了反映。党及时打击了代表大会后在一些共产党员中出现的一种倾向，他们认为，既然有工会、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做群众的政治工作，民主阵线就应该取消了。民主阵线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党的周围的团结的体现。这种已经成了优良传统的组织形式是不断加强广大人民群众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而斗争中的政治团结的最适宜的形式。

根据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一九四九年九月在斯库台召开了青年组织统一代表大会，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和人民青年联盟^[93]合并为一个组织，命名为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党赋予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的主要任务是保持和进一步发扬广大青年群众在战争时期以及在解放初期所表现的革命热情和牺牲精神。青年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前列，要求他们把注意力转向教育、文化和技术，以便提供在思想上和专业技术上具有高度素养的青年干部。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示，阿尔巴尼亚工会要在对职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完成国家计划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在完成这些任务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将得到全面的锻炼，使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巩固党的基础方面能够出色地完成领导使命。这一指示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召开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体现。

党的征购和供应政策 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经济联系，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率，是党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当时一系列任务的主要环节。象阿尔巴尼亚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国家，不改善农业的状况，不进一步发展和促进农业生产，就不可能摆脱落后状态和建设社会主义。不保障工业的原料供应，不保障工人阶级的食品供应，工业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应该执行使农牧业生产得到提高的政策。

当时执行的征购和供应制度不仅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成了发展农村生产力的障碍。由于主要产品的剩余部分，特别是余粮，由国家收购，所以农民对增加农业生产不太关心。在这方面，旧的配给制也起了不好的影响，根据这一制度，也发给农民工业品配给证。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感觉不到必须把那些不属于征购范围之内的产品卖给供销合作社。农民不把这些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要不然就以高价出售。此外，由于在自由市场上缺乏工业品，农民对向国家义务交售也就犹豫不决。富农和投机商从这种形势中得到了好处。他们用配给证从国家取得了必需品，用农产品和工业品发展黑市，剥削城乡劳动群众。

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在削弱。工人开始把农民看作是投机商人，而政权机关为了进行征购，往往不得不对农民采取行政措施。工农联盟面临着危险。

为了排除这一危险和进一步加强同农民的联盟，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支援农村的重要经济措施，如增加农业贷款，扩大土地改良工程，通过机器拖拉电站给予支援等。但在农村小私有制占主要地位的情况下，这些措施不可能完全解决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问题和巩固工农联盟问题。工农联盟主要通过贸易领域里的工业

产品同农业产品交换这种经济联系，才能进一步巩固。这些联系更容易为农民所理解，对农民更为有利。通过实行中央委员会一九四九年一月批准的**新的征购和供应制度**，党把这方面的政策具体化了。

根据新的征购制度，农民向国家义务交售的数量，按土地数量和类别确定。不收购农民的全部剩余农畜产品，而只收购一部分，另一部分由农民自由支配。这个制度促进了农牧业生产力的发展。现在，农民事先知道向国家义务交售的产品数量，就努力生产更多的东西，以便获得更多的剩余产品。

国家通过新的征购制度获得相当一部分粮食和必需的农畜产品。另一部分，国家按新的供应制度通过收购农民留下的剩余产品来获得。通过这个制度调整了工业品和农畜产品的交换以及城市劳动人民的日用品供应。这个制度建立在三种市场的基础上。

有保障的国营市场在配给制的基础上对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他们供养的、没有劳动能力的家属进行供应。同时还供应所有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个体手工业者，以便不妨碍手工业品的生产，从而有助于活跃城乡市场。

互换市场通过农民的剩余产品和工业品的交换对农民进行供应。供销合作社是城乡贸易的主要环节。它们应该成为加强城乡劳动人民的经济联系和联盟的重要社会经济组织。

自由市场是为了满足农民和城市居民在有保障的市场和互换市场上所不能满足的要求，对那些不享受配给的人进行供应。这种市场上的价格要比前两种市场上的价格高得多。国家的目的是要通过自由市场最大限度地收回农民和资本主义分子在私营市场上积累的货币。此外，自由市场促使农民用自己的产品在互换市场上进行交换。

新的供应制度对劳动人民和寄生虫实行区别对待，无论在农

村还是在城市促使更多的劳动力投入生产，节约了过去不按制度分配的、浪费掉的大量粮食。

贯彻新的征购和供应制度，要求巩固和活跃乡村和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主要部门——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为了适应这一制度，还进行了商业的改组。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使商业部门更能贯彻党的经济政策和反对这些部门的官僚主义。新的商业形式还直接为繁荣和扩大轻工业服务。

为了更好地组织商业和合理而迅速地分配商品，党特别重视干部的培养工作，并提出了“共产党员要学会做商业工作”的口号。

对小私商和个体手工业也采取了新的态度。在社会主义商业和工业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全部需要的情况下，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活跃小私营市场。这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发展小商业和个体手工业还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它有助于加强把小私商和私有小生产者团结在民主阵线内。

允许小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发展，就意味着允许资本主义因素有一定程度的活跃。但是，国家对资本主义成分的有系统的监督排除了资本主义成分可能对社会主义经济造成的任何危险。此外，资本主义成分在国民经济中并不占什么大的比重，它不能够和社会主义经济进行竞争。

新的征购和供应制度不仅限于交换方面。它是党的经济政策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有助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这个制度正确地解决了巩固工农联盟的问题。

为克服在贯彻新的征购和供应制度中遇到的困难而斗争 新的征购和供应制度的执行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这个制度体现了党的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有利于劳动群众的政策。新的法令对富农课以附加税，并堵塞

了他们进行投机倒把的孔道。这就是富农一开始就起来反对新的征购和供应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利用农民起初还看不到这个制度的好处和党在这方面的宣传还很薄弱这一事实，竭力歪曲这一制度的内容，从而使农民对人民政权产生敌意。他们采用了这样的口号，如“新制度只对职工有利”，“政府弄得农民没吃没穿，所以不要下地干活”，“贫农饿死的时候到了”，“不要交粮”。他们煽动许多农村的学生要求发面包配给证。富农为了掩盖他们的敌对活动，一方面，他们自己完成全部义务交售任务，另一方面，唆使贫农和中农不要交出产品。一些受富农挑拨的农民反对播种列入计划之内的农作物，以为这样就可以不交义务粮了。他们不懂得，这些义务交售的数量不是按实际产量而定的，而是按可耕地面积来定的。

执行政府关于其他农畜产品，特别是肉类的义务交售法令，在农村也遇到了阻力。下述事实在这方面也起了不良影响：在传达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时，有些党的工作人员在批判过去所犯的错误时，使人以为似乎今后就没有义务交售任务了。

某些共产党员也陷进了富农的圈套。由于不认识新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它为发展整个经济，特别是发展农业所开辟的远景，他们怀疑这一制度是否会对贫农有害。一些基层组织书记、共产党员和人民会议成员在富农的压力下站到机会主义的立场上去了，他们在贯彻征购法令时在困难面前后退了。另一些人陷入了悲观主义，他们向中央和恩维尔·霍查同志“申诉”，认为“政府关于征购的法令是不正确的”，“农业正在破产”，“农民不满”等。

恩维尔·霍查同志一九四九年三月在《人民之声报》上发表的公开信《关于农村的几个问题》，对扭转已造成的局面具有重大意义。在这封信中阐述了新制度的必要性，特别强调了它为发展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所开辟的远景。

恩维尔·霍查同志提醒党的各级组织注意富农的敌对活动。富农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进行反对人民政权的斗争的，他们需要同盟者，需要接受和传播他们的口号的人。因此，他们竭力散布自己的不满情绪，使它变为全体农民的不满情绪，煽动农民起来反对人民政权。信中号召共产党员在贯彻新的征购和供应制度中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困难面前不屈不挠，用他们的解释工作来消除富农的敌对活动在农民中的影响。

恩维尔·霍查同志批评了某些共产党员，他们对农村沿着进步和富裕的道路向前发展的远景认识不清，成了落后思想的奴隶，说什么“我国农民不要求什么，只要有国产煤油和食盐就行了”。恩维尔·霍查同志指出了这种使农民放弃增进自己的福利的目标和努力、抹杀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远景的论调的反动性。他指出，“党引导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走向幸福和富裕生活，而不是引导他们走向中世纪，党是为现在和未来而奋斗的”。不建立工厂和电站，不实行农业的全面机械化，农民的生活就不可能得到改善；如果农业不能用必要的农产品供应城市，不能用原料供应工业，这一点是不可能实现的。

恩维尔·霍查同志说，糟糕的不在于征购和供应法令的内容，而在于共产党员与农民群众的联系薄弱，在于在农村缺乏全面的解释工作。

《关于农村的几个问题》一信，加强了基层组织和各区党委会为彻底地、正确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新的征购和供应制度的决定和政府关于这一制度的法令而进行的斗争。

那些过去认为根本不可能完成征购任务的党委会，在恩维尔·霍查同志发表这封信以后，振作起来了，放弃了这一立场。采取了全面措施来使农民相信新的制度的正确性，并开展一场有组织的、更有成效的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

国家掌握的与农产品进行交换的工业品储备量不足，也妨碍了新的征购和供应制度的贯彻。同时由于商业企业存在着缺点，商品分配也不合理。

产生这些缺点的根源还在于党组织对经济问题重视不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党组织的注意力集中在党的内部问题上，这些问题得到了研究和正确的解决，但在完成经济任务方面却努力不够。此外，党组织在管理经济方面经验还很少。因此，它们缺乏主动性，什么事都得等着中央来解决。往往把经济问题看得很狭隘，只是从满足眼前的需要出发。

中央委员会批评了这种错误态度，并要求各级党组织集中注意力来有力地组织和从政治上领导经济工作，消除靠大会和游行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想法。在党和国家的一些干部中开始散布的经济主要靠外援才能向前发展的错误观点也受到了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党需要进行全面的工作来加强干部和劳动人民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在他们的思想上树立这样的信念，即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内的资源 and 力量，而外援只是重要的辅助因素。

为了满足劳动人民对工业品和农产品的需要，党采取了加强已合作化了的手工业的措施，纠正了过去在这个部门中所犯的错误。部长会议为了促进农牧业生产的增长，为一九四九年的秋播规定了特别贷款，并通过修正对土地的分级，把这一年的征购量降低了百分之十五。

党知道，只有大力依靠群众，才能完成所面临的巨大任务。党把国家遇到的和将要遇到的困难公开告诉人民，并号召他们起来克服这些困难。成千上万的城乡劳动人民响应这一号召，参加兴建“斯大林”联合纺织厂、马里奇糖厂和两年计划其他项目的义务劳动队。在发行国家第一次公债时，也表现了人民对建设社会主

义的决心；发行公债成了一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它很好地反映了人民同党的团结和对党的路线的忠诚。

粉碎国外和国内敌人的计划 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千方百计地利用了在大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标志的历史转折之后国家面临的巨大经济困难。他们以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应付不了这种严重的局面，以为实现他们反对在铁托公开叛变后在地理上处于敌对国家包围之中的阿尔巴尼亚的阴谋的最有利时机已经到了。

美国、英国、南斯拉夫、希腊等国的电台和报刊，掀起了一个疯狂的造谣诽谤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运动，把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说成是“侵略者”。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的特务机关，通过空投和其他手段不断散发传单，号召阿尔巴尼亚人民起来反对自己的党和政府。

国外敌人，在开展宣传活动的同时，还网罗和组织逃亡的阿尔巴尼亚反动分子。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用这些人组织了新的间谍组织，召开了专门的会议。成百的逃亡分子作为间谍被派到阿尔巴尼亚来。

在整个国境线上，在空中、地面和海上，不断地发生挑衅事件。所有这些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直接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发动武装进攻作准备。

特别是特务活动加紧了。美国、英国、意大利、希腊和南斯拉夫的特务机关，相互协调计划和行动，进行反阿尔巴尼亚的活动。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领导通过他们驻地拉那的外交代表机构，使他们在阿尔巴尼亚的特务活动起来了。这一代表机构成了在经济领域里进行捣乱和破坏的中心。它利用宣传和威胁策动阿尔巴尼亚公民逃往南斯拉夫。

外国特务机关的间谍同在国内流窜的罪犯建立了联系。他们通过这些罪犯进行恐怖活动，杀害党和政府的积极分子，人民议会代表、米尔迪塔区党委第一书记巴尔索克·比巴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策划焚烧农业合作社的仓库、政权机关的办公室和农村学校。

铁托主义领导人在外交上全面地施加压力和进行讹诈，企图孤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他们截断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航空联系，单方面撕毁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最后要求阿尔巴尼亚公使馆人员离开贝尔格莱德。

国内的阶级敌人受到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加紧活动的鼓舞，竭尽一切可能来制造恐怖和不安气氛。他们造谣说，“战争很快就要打起来了”，“政府和中央内部有分歧”，“形势很快就要发生变化”，等等。

国内反动派还利用党反对南斯拉夫领导人和科奇·佐治集团活动的斗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敌对分子利用过去所犯的¹错误，妄图攻击党的整个路线。那些受到人民政权的改革措施和法律的正确处理的人开始把自己说成是受到不公正打击的人。他们说²什么希望纠正“过去发生的一切坏事”和“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把对过去的错误的批判变为对党和地方政权机关工作人员的指控，企图把这些工作人员在群众中孤立起来，使群众对这些工作人员心怀敌意。他们企图把共产党员从人民会议代表候选人的名单上勾掉。他们企图转移阶级斗争的方向，把党和人民的攻击矛头指向保安机关。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关于敌人将会集中打击这些机关的警告，有助于及时识破敌人所采用的策略，保卫保安机关和保安人员，纠正某些共产党员在这方面的错误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配有炮兵的希腊武装力量在空军的掩护下向阿尔巴尼亚国土发动了突然进攻，深入阿尔

巴尼亚国土达三百至四百米。这一挑衅是一次侵略行动，是为了实现希腊政府对科尔察和纪诺卡斯特的沙文主义野心。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顶住了这一侵略，完全粉碎和消灭了敌人。

当希腊军队侵略阿尔巴尼亚边界的时候，南斯拉夫政府也加紧了它的敌对活动，在阿尔巴尼亚北部边境、在斯特鲁加和奥赫里地区进行了威胁性的部队调动。同时，美国、英国和意大利的特务机关空投了更多的间谍，企图在军队后方制造混乱。国内的反动分子作好了上山的准备。南斯拉夫政府负责对他们的装备。这些由“国民阵线”和“合法派”的残余组成的集团，在它们举行“起义”之前就被保安机关消灭了。

所有这些事实证明，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面临着美、英帝国主义者指挥和支持的希腊保皇法西斯分子、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意大利新法西斯分子的相互配合的侵略行动。

在这困难时刻，阿尔巴尼亚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们决心不惜一切地捍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成千上万的人自愿要求拿起武器投入反侵略者的战斗。根据党和政府的决定，武装了数以万计的农民，他们同保安部队和边防部队一起消灭了间谍和罪犯组成的匪帮。劳动群众表达了对党和人民政权的忠诚，全力以赴地为完成经济任务而努力。

恩维尔·霍查同志一九四九年九月对北方地区的视察和他与人民的会见，对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并在人民中建立对党和人民政权的更大信任起了重要的作用。

党和人民为克服异乎寻常的困难和粉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活动而进行的斗争，也在经济领域里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就。

一九四九年的收购量与一九四八年相比：小麦增长到百分之一百三十八点八，玉米增长到百分之二百五十五点七。而商品流转

额，一九四九年是一九四七年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七点七。结果，完成的征购量增加了，农村中发现了新的生产资源，市场情况有了好转，对劳动群众的供应有了改善，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工农联盟加强了。

三、为维护和加强思想上和组织上的 团结，为完成两年计划而斗争

在新的形势下，如果能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保证完成两年计划，那么，党的政策就能落实，困难就能克服。

消除歪曲和践踏党的路线的现象 由于在转折后有时候对党内民主的错误理解，由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压力，出现了践踏和歪曲党的路线、破坏纪律、滥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现象。

党中央采取了刻不容缓的措施来克服这些现象，要求严格执行党章。

在野心、傲慢、名位思想、对富农的自由主义态度扎了根的卢什涅区党组织内出现的、被阶级敌人用来为其利益服务的不良现象得到了改正。党委被解散，主要祸首被开除出领导机关，被清除出党。中央委员会派干部加强了该区党的领导。

党谴责了在司法机关的某些工作人员中出现的机会主义表现，他们利用司法机关是独立的机构这一事实进行投机，贬低党的监督作用，在他们的工作实践当中，不考虑这些机关是有阶级性的，是不能脱离阶级斗争进行活动的。

阿别丁·谢胡和尼阿兹·伊斯拉米反党集团是在这个时期被揭露的。这个集团的显著特点是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压力，失败主

义和对党的经济路线采取不信任态度。他们认为两年计划是不现实的，在干部和工人中间散布松劲情绪。这个集团成员的失败主义活动，使他们窃据领导岗位的工业、石油开采和运输部门没有能够完成计划。此外，他们贬低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历史，对劳动群众，尤其是对阿尔巴尼亚工人阶级采取蔑视的态度。他们不相信国家的防御力量和人民军的战备。

一九五〇年二月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揭发了反党集团的观点和活动，为消除这个集团所散布的失败主义情绪采取了全面的措施。

由于中央委员会的警惕性，还及时发现和打击了金·马尔库和奈基甫·文恰尼歪曲党的政策、破坏党对军队的领导的反党活动。

为了堵塞践踏党的路线的渠道，为了维护和加强团结，除其他措施以外，还必须把一些与党员称号不相称的人清除出党。为此，一九五〇年一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审查党证》的决定。

审查党证是一个重要组织措施，它有助于纯洁党的队伍，得到关于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完整的确切材料，确立党内行政工作制度。同时，这有助于加强党的整个内部生活，也是教育共产党员的学校。

党并不认为清洗是巩固党的唯一措施。与此同时，党非常注意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对那些不够入党年龄入党和思想政治水平低、但忠实和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的共产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党采取了重要的措施提高共产党员的文化水平。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 一九五〇年四月在地拉那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是为了克服阻

碍完成两年计划的困难和提高党的领导作用。

代表会议对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出现的国际和国内形势进行了分析。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光辉胜利，是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国际工人阶级赢得的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它给了殖民主义体系以决定性的打击，大大地动摇了资本主义世界。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巨大变化。中国革命成了被压迫人民的鼓舞人心的典范，是对世界革命运动有巨大吸引力的力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社会主义的另一个胜利。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现在包括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社会主义阵营包括：苏联、中国、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波兰、罗马尼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

在这种条件下，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避免它们彻底的失败，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对活动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在美帝国主义的指挥下，成立了名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侵略集团。这个集团首先是为了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阿尔巴尼亚的全面攻击也是和帝国主义者加紧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破坏活动直接相连的。敌人以为，阿尔巴尼亚那时是同社会主义阵营隔离的，是社会主义阵营最薄弱的一环。

但是，地理上的隔离阻碍不了社会主义阵营对阿尔巴尼亚人民提供全面的援助和支持。相反，随着这个阵营的扩大和巩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国内和国际地位更加加强了。在我国处于困难的情况下，苏联表示准备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需要的贷款和强大的防御手段。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示准备援助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对这种援助表示感谢，并指示要为进一步加强同苏联人民、中国人民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人民的联系和友谊而努力。

代表会议分析国内形势时指出，尽管取得了进步，但一九四九年的工业生产计划，尤其是石油开采计划，并没有完成。这是几个原因造成的。南斯拉夫专家离开前破坏了油田。反党集团的失败主义活动起了坏的影响。另一个原因就是工业领导方面的缺点和缺乏劳动力。

农业方面的任务也没有完成。由于农业部工作中的缺点，在土地册、农业统计资料、新开垦土地登记以及耕种土地的区划方面存在着混乱现象。这种局面妨碍了制定播种计划和农产品收购。

为了摆脱已造成的局面和完成两年计划，代表会议指示所有部门都要超额完成一九五〇年计划，在有可能的地方弥补一九四九年没有完成的部分。

在农业方面，代表会议给党提出的主要任务是耐心地进行巨大的政治解释工作和组织工作，说服农民种植国民经济需要和列入国家计划的作物。

同时，代表会议提醒注意，集体化问题尽管不应操之过急，但也不能忽视。代表会议要求特别注意

“巩固农业合作社，以便使它们成为在平原地区建立新的农业合作社的榜样和推动力”。〔94〕

为了提高党的领导作用，代表会议指示要改进工作方法，加强集体领导，反对官僚主义，要更加注意对经济工作和国家工作的政治领导。代表会议批判了党组织包办代替政权机关和经济机构的工作的现象，要求通过扎实的政治解释工作，以党性进行不断的帮助和监督，而不是通过包办代替来实现党组织的领导。

代表会议批判了某些党员在个别场合对群众组织采取的蔑视

态度和对人们表现的傲慢行为。代表会议强调必须不断进行工作，以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使他们的组织和人民会议更加活跃起来，使城乡劳动人民更多地参与解决政权和经济问题。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 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有助于纠正党的工作中的许多缺点，进一步动员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去完成两年计划。

完成经济任务的工作在不断改进。一九五〇年的计划超额完成了。年终，工业产值比一九三八年增长了三倍。但一九四九年没有完成的部分仍没有完全得到弥补。结果，两年计划只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一。尽管如此，如果考虑到这个时期遇到的异乎寻常的困难，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一九五〇年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三八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农业集体化也有了进展。合作社的数目从一九四八年的五十六个增加到一九五〇年的九十个。

工农业生产的增长直接关系到劳动群众生活的改善。一九五〇年国民收入比一九四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点八。一九五〇年大大降低了国营市场商品的价格。

在取得经济上的成就的同时，在政治领域里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议会的选举就是一个辉煌的胜利。百分之九十九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投票赞成民主阵线候选人。这再一次证明了人民对党的热爱和忠诚，也再一次证明了人民捍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

一九五〇年七月，人民议会决定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补充和修改。这些补充和修改是和从宪法通过以后四年来在阿尔巴尼亚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相关的。宪法增加了一条：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是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国家。”这一条表达了国家的社会、政治现实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新型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实质。宪法中还增加了另一条，承认党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宪法体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发展应给予的支持，并首次明确规定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党忠实地执行了它的革命的对外政策。它为保障和平和制止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九五〇年七月，人民议会通过了响应关于支持世界和平运动的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决议，同时发表了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朝鲜的声明。一九五一年一月，人民议会颁布了要对煽动和宣传侵略战争的行为判刑的法令，认为这种行为是“对人类、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和祖国的严重罪行”。

反对与阶级敌人 调和的现象 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于一九四九年遭到失败以后，千方百计地企图给国内的阶级敌人打气，不让他们失去希望，驱使他们最大限度地进行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活动。为此，他们继续进行疯狂的敌对宣传，制造边境挑衅事件，成批地派遣破坏分子，尤其是间谍。从国外派进来的破坏分子和间谍伙同国内的敌对分子，对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恐怖、破坏和抢劫活动。敌人特别采用了对共产党员，尤其是对农村的共产党员直接施加压力和败坏他们名声的策略。他们给一些党员写恐吓信，派遣特务突然到一些党员的家里去。富农也运用各种方式和手段，通过婚姻和物质“帮助”等与共产党员接近和来往。他们向各级党委提了许多挑衅性的申诉，反对这个或那个共产党员，反对对他们采取的这个或那个“不公正”的严厉措施，并要求取消这些措施。敌对分子对某些党员灌输小资产阶级的毒素，怂恿他们败坏

共产主义道德，浪费和盗窃社会主义财富。

党、人民政权和劳动人民对尖锐的阶级斗争，总的说来是有准备的，并决心排除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和困难。尽管如此，国外和国内敌人的强大压力不可能不留下痕迹。它在党的队伍里也找到了市场。在这一压力面前，一些共产党员动摇了，有些甚至屈服了。结果出现了对富农和其他阶级敌人温和、仁慈和让步的现象，在某些共产党员中出现了一种同他们调和的倾向。

还有一些中央委员也在阶级敌人的压力面前屈膝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书记屠克·雅科瓦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这种屈服不是偶然的。他没有摆脱共产主义小组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坏东西，如地方主义、个人野心和对阶级敌人的小资产阶级仁慈心。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活动始终贯穿着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缺乏革命警惕性，对完成任务和提高思想漠不关心。

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利用谴责科奇·佐治敌对活动的机会，把自己打扮成受科奇·佐治迫害最甚的共产党员之一，并暂时掩盖他同党的路线对抗的立场。

代表大会以后，屠克·雅科瓦同以前一样，被资产阶级的压力所征服，他对阶级敌人的机会主义立场严重地损害了党的活动。他认为，阶级斗争正在熄灭。在他看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受到来自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任何威胁。他以各种方式怂恿对富农执行温和的政策。他插手国家机关，为敌对分子提供方便，把他们从监狱里放出来。他完全低估了反动的天主教神甫的敌对活动，并千方百计地支持他们。

屠克·雅科瓦反对党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发展矿业的经济路线，特别反对对石油工业进行投资。他认为，一些部门的经济计划是不现实的。他的这种机会主义和失败主义的立场妨碍了党的各级组织和群众完成国家计划的工作。

屠克·雅科瓦在党的组织问题上也犯了不可容忍的错误。在贯彻党章和党的决议时漫不经心和作种种让步，他的官僚主义的领导，给干部政策、党的机关和机构以及群众组织的工作方法带来了严重的缺点。这也造成了破坏吸收党员的规定、破坏纪律、削弱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放松警惕性的现象。

他是错误思想的支持者，按照这种思想，审查党证的工作应该在不受党员群众的监督，没有基层组织直接参加的情况下进行。

一九五一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分析了政治形势和党的工作，找出了对阶级敌人的机会主义表现的根源，指出了同这些表现作斗争的途径。全会谴责了屠克·雅科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严重的错误，撤销了他的中央书记的职务，并把他开除出政治局。

中央委员会利用这一机会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一次健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迅速纠正了在屠克·雅科瓦的玩忽职守和机会主义立场影响下所产生的缺点。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改进集体领导，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全会成员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对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更有系统、更严格的监督。

党以新的力量动员起来，防止同阶级敌人调和的任何倾向和现象，给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

中央委员会指示说：

“全党必须注意，我们的胜利并不能缓和阶级斗争。由于遭到失败而陷于绝望的敌人，在我们的成就面前变得疯狂起来，他们正在变换各种新手法来加紧他们的复辟活动。”〔95〕

各级党组织更加战斗化了。中央委员会对政治形势和党的工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对机会主义采取的原则性的严正立场，帮助共产党员更深刻、更具体地认识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

客观必要性，更好地防止滑到与阶级敌人调和的立场上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方面，建立了更加严格的制度。党向劳动群众说明了反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敌对活动的新形式和手段，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革命警惕性。

注意力特别集中在正确地贯彻党的在经济上限制和在政治上孤立富农的政策上，引导贫农和中农更广泛地同富农进行斗争。对所有富农进行准确的核定的特别措施对此是有帮助的，这一措施是在中央委员会和各区党委会的直接领导下，由国家机关经过细致的工作之后付诸实施的。富农被排除在农民享受的国家的一切支援之外。他们被征收更重的税款。在没收富农的财产时，决定将其百分之二十五无偿地分配给贫农。

党在反对同阶级敌人调和的同时，还打击了一切宗派主义的现象，这些宗派主义现象在群众中造成政治上的模糊，妨碍动员群众去完成政治和经济任务，阻碍引导群众和敌人进行积极的斗争。有些党委会在实践中歪曲党的政策，允许采取过早的行政措施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立即加以消灭，更糟的是把有些中农也划成了富农；这些党委会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党反对导致阶级斗争人为的尖锐化的任何措施，因为这样的措施只能有利于敌人。

在克服困难、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反对国内的阶级敌人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党维护和加强了它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丰富了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领导经验。

为使农业摆脱落后状态而努力 直接妨碍其他经济部门发展的农业落后状态仍然是最使党感到不安的问题之一。一

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期间采取的措施，尽管产生了良好影响，但也没有能使农业摆脱落后状态。农业继续以缓慢的速度发展着，农业和工业发展的不平衡在加深。这种状况

对满足劳动群众对农产品的需要和为工业提供原料方面造成了困难。农业贷款仅仅使用了百分之七十五，工业品价格高于农产品价格，都是这方面的障碍。

一九五一年四月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全会讨论了农业发展的缓慢和使农业摆脱落后状态的问题。但是，在这次全会上，片面地处理了问题，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说小农经济已没有任何可能提高农业生产了。从合作化是使农业摆脱落后状态的主要手段这一正确的估价出发，全会决定转入广泛的农业集体化。但是，这是一个过早的决定，它包含着损害集体化的危险，因为尚未具备对整个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党及时纠正了这一草率的决定。五月，再次召开了中央全会。全会强调指出，在现实条件下，主要任务不是在农村扩大集体化，而是巩固已建立起来的农业合作社，利用小农经济的一切可能来增加生产。

党正确地衡量了一切条件、可能和手段，得出的结论是，为了推动农业向前发展，当时最好的途径是巩固和进一步完善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调整工农业之间的不平衡。

中央委员会指示：

“我们应该注意，只有在经济的基础上才能保障农村和城市的紧密联系……我们应该协调地建立我们的经济。我们关心建立工业，但我们同样关心农业，不要忘记，工业是依靠农业的发展而发展的。”〔96〕

一九五一年增加了对农村的支援。为纠正土地登记和土地分级中的错误而采取了措施。粮食征购量平均降低百分之二十五，免除了对全年收入少的个体农户的税收。

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比例不能促进农民增加生产和把全部产品投入互换市场，所以，党重视降低工业品价格。一九五一年再一次降低了工业品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价格不平衡状态。

同时,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尤其是为巩固供销合作社进行了努力。这有助于使它们成为把农村与城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更加牢固地联系起来、向农民灌输集体主义精神的强大的群众组织。

伴随着使农业摆脱落后状态的经济措施的是党的广泛的政治和组织工作。改善党的基层组织的社会成分和活动的工作受到了重视,同时,人民会议、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的工作也更加活跃起来了。

四、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把阿尔巴尼亚变为农业工业国的任务

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七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五百九十二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一百四十二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四万四千四百一十八个党员和预备党员。这次代表大会时的党员人数比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略少一些,主要是由于在审查党证期间有百分之八的党员被清除出党了。

第一个五年 代表大会认为,在更长期的计划的基础上发展
计划指示 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是完全可能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五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指示。

在代表大会通过以前,这些指示在各级党组织和城乡劳动人民的公开会议上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讨论。在这些会议上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制定计划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国内的资源、已取得的经验和我国干部的才能。同时,也依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的

援助。苏联当时在这方面给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援助主要是为了发展国家的生产力，使国民经济能用自己的腿走路。党认为这一援助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的外部因素。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发展生产力，以便在五年计划末，使阿尔巴尼亚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农业工业国；巩固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提高劳动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

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新工业作为完成这些任务的主要环节。事实上，国家的工业化是随着两年计划开始的，而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基础的宏伟远大的纲领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制定的。

党正确地估价了生产资料的生产在发展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发展和建立重工业部门给予了巨大重视。但不要求发展这一工业的所有部门，因为国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通过换货和贷款将从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必要的机器设备。阿尔巴尼亚将发展那些拥有自然资源的、能提供较多的经济效益的重工业部门。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重工业主要是由矿业、机械工业、电力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组成。计划以较快的速度发展的正是这些部门。矿业占首位，它将是发展其他工业部门和满足加工工业对原料的需要的主要支柱。同时，通过矿产品出口，换取工农业所需要的机器设备。

五年计划期间，在电力工业方面将建立热电站和水电站，为满足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打下动力基础。

由于国家对日用品的需求是大量的、急迫的，并且为了减少这些东西的进口，主要依靠利用国内原料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在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

为了保证计划规定的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投资预计比一九四六至一九五〇年增长二倍。

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工业方面提出的任务要克服两个主要障碍才能解决：第一，在国民经济中占最大比重的农业发展缓慢；第二，缺乏技术干部和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低。对克服这些障碍给予了特别的注意。

一九五〇年，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三八年增长三倍，而农业总产值只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代表大会指示：

“工业的迅速发展……要求农业以比现在更快的速度发展，使它能够满足工业对原料的需要，以及国家和人民对农产品的需要。”〔97〕

彻底摆脱农业落后状态的唯一途径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在现实条件下，还不能实行广泛的集体化的方针，因为农民群众还不完全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在农业方面的优越性，还缺乏必要的技术、经济基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强调指出，在这种条件下，为了加速发展农业，就必须巩固农业合作社，加强和扩大农牧业企业。同时，必须通过扩大机器拖拉机站和农业机械化，通过国家给劳动农民提供的农业贷款援助，通过以更多的工业品供应农村和进一步调整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比例，来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

计划通过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扩大播种面积来增加农业生产。

增加粮食生产被规定为农业的主要任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农业的另一特点是扩大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这是工业发展本身的必然要求。为完成农业方面的任务，计划投资比一九四六至一九五〇年的投资增加一倍左右。

解决技术干部和熟练工人的问题，要求进一步开展和加速文化革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教育网将得到相当大的扩展，学生

总数将比一九三八年增加百分之三百七十，农艺师人数增加四倍，工程师人数增加十七倍。同时，将培养八千五百多名中等技术人员和约五万四千名熟练工人。

代表大会提醒党注意如库克斯、特洛波亚、米尔迪塔、普克等北方地区的落后状态，并指示要特别注意提高它们的文化水平。

五年计划规定要扫除文盲。

提高工农业生产将有助于增进劳动群众的福利，并将为取消配给制创造条件。

用于社会文化设施的投资比一九四六至一九五〇年五年的投资增加二点四倍。

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我国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新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将为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最后阶段创造必要的条件。

改进党的政治领导方法 恩维尔·霍查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对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党的领导活动所作的科学分析和对党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经验的总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一分析帮助代表大会揭发和批判了在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方面的错误和党组织的弱点。代表大会批判了对阶级敌人的机会主义表现，官僚主义，党委包办本应由国家机关进行的工作，夸夸其谈的工作方法，缺少切合实际的政治工作方法，对全体共产党员和群众组织的发动不够充分，等等。恩维尔·霍查同志批判了通过没完没了的会议和决议来解决问题的倾向，他说：

“会议一个接着一个，整天整夜没完，就是很少解决问题。”〔98〕

“通过决议，甚至通过很多决议，但不是所有的决议都执行。于是为了贯彻执行过去通过的决议，通过几乎同

样多的决议。为解决已经决定但被忘了的问题，又通过新的决议。这就叫做对工作和决议的嘲弄。装出工作的样子，滥造决议，而实际上什么事情也没干，停止不前，妨碍工作。”〔99〕

代表大会根据已取得的经验，规定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主要的条件：

“改善和加强党在经济领域的领导。加强和改进把经济问题与政治工作紧密联系起来的工作。对党和国家的决议与任务的执行情况进行不断的有系统的严格监督。为把工作组织好和消除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而斗争。”〔100〕

责成中央和地方机关以及党的各级组织，根据代表大会的结论和决议，重新审查和纠正工作方法。代表大会认为，集体领导，领导机关向把它们选举出来的党员群众报告工作，批评与自我批评，劳动群众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群众组织作为党的坚强杠杆的作用，对党员的有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些列宁主义原则，不能只停留在大家都接受和宣传的理论词句上，而必须坚决地彻底加以贯彻。

同时，代表大会特别指示共产党员要经常保持警惕，一刻也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者和铁托分子从外部以及富农和其他阶级敌人从内部施加的压力对党造成的威胁。解放后，特别是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党从反对各种偏向和国内敌人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屈服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压力的产物是主要的危险。

“应把右的倾向，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我党的最大危险……也丝毫不能忘记‘左’倾的危险……

应把资产阶级对我党的压力看成是非常严重的危险，应以最大的力量不断地对它进行斗争。”〔101〕

一手拿镐，一手拿枪

代表大会告诫党和人民，在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努力奋斗中，将会遇到许多困难，克服这些困难要求做好精神上和物质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全面准备。

困难是各式各样的。这些前进中的困难，是和国家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状态、缺乏经验、一般说来干部和工人的技术文化素养不够相联系的。只要做好组织工作，加强纪律，使群众相信党的路线的正确，发动群众，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同时，党和人民应当作好充分的准备来战胜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多方面的和不断的反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敌对活动所造成的困难。国外敌人为了消灭阿尔巴尼亚的人民民主制度正在策划新的阴谋。南斯拉夫政府伙同希腊和土耳其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推动和支持下正准备缔结侵略性的巴尔干公约，其矛头首先对准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

从这一局势出发，代表大会强调了党“**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建设社会主义**”^{〔102〕}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国家解放后，成为人民群众行动的座右铭。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是要提高警惕，要特别重视不断地加强人民在党周围的团结。要求不惜一切来提高祖国的防御能力，进一步完善人民军、边防部队和国家保安机关。

代表大会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和他们的整个好战政策和侵略政策，并指示要不断加深人民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对它进行彻底的揭露。代表大会认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维护和巩固和平的主要条件。

同时，也表达了同国际工人阶级和一切为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斗争的人民的团结。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合作的任务，强调了揭露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铁托集团的必要性。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二十七名委员和十二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恩维尔·霍查重新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五、为缩小工农业之间的不平衡和 改善生活条件而斗争

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遇到了没有完全预想到的障碍。一九五一和一九五二年发展经济的计划没有完成。在增进劳动人民的福利方面，没有达到预计的水平。这种障碍的主要根源在于农业落后和农业的发展速度比代表大会规定的速度慢。农作物播种面积已按计划扩大，而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特别是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却没有达到规定的指标。畜牧业生产显著下降。结果工农业之间的不平衡，不仅没有象计划规定的那样缩小，反而扩大了。

工农业不平衡的原因 这种状况引起了中央委员会的巨大不安。中央委员会专门研究了这种状况，找到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农业落后状况、农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低和农村小私有制，都妨碍了广泛地使用技术和利用党为提高农业生产所创造的一切可能性。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加速发展农业和缩小工农业之间不平衡的正确方针，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在计划数字中得到全面的反映。农业投资满足不了在小私有制的条件下发展农业的需要，它甚至比用在运输方面的投资还少。这种情况不适应代表大会提出的主要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使农业生产在五年计划末提高百分之七十一的任务。

当时为工业部门规定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可能。新的工业项目的建设超出了力量和可能的范围。结果，某些大型项目的建设无

法达到原定的速度。这些项目的建设要求大量地增加劳动力，平均每年增加二万六千人。抽调这样多的劳动力，虽然从未达到规定的指标，但却使许多农民脱离了农业。这既妨碍了农业，也妨碍了工业计划，特别是工业项目的建设计划的完成。

除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外，农民的经济困难，也对农业的发展起了不良影响。农民对国家的义务交售量很大，农业税还很重。由于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二年发生旱灾，农民无法完成义务交售量。在这几年内，农民须把所生产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玉米交给国家，而按计划规定，平均只须缴纳百分之二十五。

旱灾给农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使牲畜也减少了。在耕地面积扩大、农活的种类和数量增加、农业机器不够的情况下，没有耕畜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三分之一。

在粮食生产方面之所以没有达到预计的单位面积产量，还因为一部分最好的土地被经济作物占用了。这种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是没有经过研究的，往往没有考虑到农民的愿望和对这种作物的管理所需要的劳动力。结果使这种作物也没有达到预定的单位面积产量。

党虽然采取了措施，但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工农业产品价格的不平衡。农民以自己所获得的收入很难购置农具，因为农具的价格比农畜产品的价格高得多。此外，农民很难得到农具，还因为工业和手工业没有按规定数量生产这种工具。

农业没有达到预计的发展水平，直接妨碍了日用品生产任务的完成。这就在对人民的供应方面造成了困难，使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不能得到改善。

其他一些情况也妨碍了福利的提高。消费合作社在追求利润的倾向推动下，主要通过自由市场收购和分配农产品、销售农具，因而没有为有保障的市场和互换市场提供必要的商品。工人人数

由于招收进入城市的农民而大大增加，这就要进行新的投资，为他们及其家属建造住宅，供应定量的商品。企图以行政措施过早地消灭私营小商业，不考虑中央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这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造成市场上的商品减少。

在这一时期，党还发现了另一个缺点。国家机关和群众组织机关过度膨胀，大大加重了国家预算的负担。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干部的经验不适应随着国营经济部门的扩大而产生的新的任务，以为扩大行政机构就会解决在这方面产生的困难。这样的机构加重了国民经济的负担，削弱了领导，为官僚主义开辟了道路。

有利于发展农业和增进劳动人民福利的措施 党不能容许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受到威胁和工农联盟遭到削弱。一九五三年三月，中央委员会决定采取一系列旨在消灭发展农业和提高农业生产的障碍的措施。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农村的支援，保证了土地改良工程的按期完工，改进了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加速了农业干部的培养。

但事实表明，这些措施是不够的，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没有为扩大国家对农村的支援——推动农业发展的主要环节——保证新的来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比例没有改变：农业投资没有增加。农民在义务交售和交纳税款方面依然负担很重。

党从这一经验中吸取的教训是，要执行自己在发展农业方面的正确方针，就要采取更加彻底、经过更好地研究的措施，大家应更好地研究解决农村问题，并把这看成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所以，一九五三年，部长会议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并在中央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采取了有利于农业、有利于增进农村和城市劳动人民福利的十分重要的新措施。

重新审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主要经济部门的投资比例。取消了计划中的某些过早的工业项目。放慢了另一些项目的建设速度。工业缩减下来的大部分投资用于农业方面，另一部分则用来增加日用品生产和建设住宅。

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和一九五二年农民在粮食和其他农畜产品的义务交售方面所欠下的部分宣布全部免交。减少了农民对各类土地所应担负的义务交售。完全免去了所有农业合作社社员和没有耕畜的个体农户在一九五二年底以前欠下的税款，而对那些有耕畜的农户，则减少百分之七十五。不久，又全面降低了农业税，其幅度达百分之二十五。还降低了国产农具的价格，提高了橄榄、棉花、烟叶和甜菜的国家收购价格。

同时还决定大大增加农业贷款，用更多的拖拉机装备农业。

国家行政机关和群众组织机关人员精简了百分之三十，许多行政机关干部转入生产，其中很多人被派往农村。

取消了导致消灭私营小商业的法令，采取了在一定程度上活跃这种商业的措施。同时还采取了加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措施。为了继续努力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党在不放弃发展重工业的情况下，十分重视发展轻工业，以便增加日用品产量。要达到这一点，就要依靠对工业的充分利用，加强和扩大手工业、地方工业。为了最充分地满足农村对工业品的需要，对私营手工业进行了鼓励，并致力于建立农村手工业。

所有这一切措施证明了党的力量，证明党善于根据具体条件，以批判的眼光检查和及时纠正自己的决议。党清楚地知道，如果不经常审查自己的任务，不取消那些已经过时的决议，不弥补前进道路上的缺陷，那么，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就是不可理解的。列宁曾经指出，如果

“没有多次的重复，没有一些后退，没有检查，没有个别修

正,没有新办法”(103),
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党和政府一九五三年采取的措施,虽然具有重大意义,但毕竟是从上面采取的措施。

为了在发展经济方面,特别是在发展农业方面取得预期的进展,就必须把资源和人力全面地动员起来,把群众的革命干劲和创造性提到更高的水平。只要贯彻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根本改进党对经济工作的政治领导方法的指示,就一定能做到这点。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指示:

“党、国家和经济部门的所有干部应该明白,如果我们不在改进经济工作和国家工作的领导方法上实行根本的转变,就不可能成功地实现我们在增加工农业生产、增加消费品和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条件方面所面临的巨大任务。”(104)

为了改进领导方法,党把自己的工作首先集中在解决两个重要矛盾上。

第一个矛盾是干部的专业技术、文化水平不高和对国民经济领导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之间的矛盾。全面发展国民经济、建立现代化新工业和加速发展农业,要求提高干部的教育和文化水平,根据他们所在部门的工作提高他们的能力。必须结束一般化的领导,对经济实行具体的领导。培养干部的速度必须符合改进经济工作和国家工作领导的要求。

另一个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工艺规程和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低之间的矛盾。阿尔巴尼亚正在建立生产过程复杂的、以现代化技术为基础的新工业,而培养工人、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工作满足不了这种工业的要求。这就造成了机器设备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劳动生产率低和产品成本高的现象。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党中央重新研究了培养和提高干部与工人的问题，批评了这方面的缺点，并采取措施使这一工作建立在更加健全的基础上。

有利于发展农业和增进劳动人民福利的措施，提高了劳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创造性。社会主义竞赛吸引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在农村也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

这些措施立即产生了令人满意的显著效果。一九五四年，工业生产计划超额完成了，其幅度比其他任何一年都大。同样，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也都有所增加。畜牧业减产的现象止住了，牲畜头数开始显著增加。向劳动人民提供的住宅建筑面积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市场上的商品流转总额在一年之内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三以上。城乡交流扩大了。

这一切导致了工农联盟的加强，并为完成整个五年计划创造了条件。

六、加强思想工作和粉碎修正党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企图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尤其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年代里，文化、思想革命普及和深入到了各个方面。劳动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提高。文化教育事业真正成了人民的事业。稠密的学校、剧院、电影院、文化馆和文化站网遍及全国。建立了第一批高等院校。在全国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在校学习。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传统爱国主义获得了社会主义的新内容。劳动群众在党周围的坚强团结，成了克服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国家面临的异乎寻常的困难、粉碎帝国主义者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敌对计划和活动的主要因素。在各种情况

下，阿尔巴尼亚劳动人民都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感情。他们突出地表现了同苏联人民、中国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的纯洁的战斗友谊，表现了同正在为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枷锁而斗争的各国人民和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团结。他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劳动和公共财产的社会主义新态度产生了，劳动人民摆脱了许多落后的、宗教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的共产主义道德正在加强。

尽管如此，共产党员和所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文化水平还是相当低的。这表现在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同共产主义道德格格不入的倾向，对提高思想不够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水平低，在学习文化教育知识时在困难面前后退，这些都阻碍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水平 在提高生产和管理经济方面开始的转变，捍卫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要求进一步发动群众踊跃参加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从而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形势要求必须更好地对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阿尔巴尼亚是在经济和文化严重落后，工人阶级人数少，劳动人民文化教育水平低和具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情况下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阿尔巴尼亚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对人民和党施加全面的、巨大的压力，进行大规模的诽谤威胁运动，企图推翻人民政权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

鉴于对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是一项基本的任务，党中央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更好地组织这种教育和使它更富有战斗性。

在群众工作中以行政手段代替说服方法的倾向受到了批判。认为党既然领导着政府就可以一味发号施令的错误思想受到了谴责。特别打击了这样一些现象，即有些农村共产党员不是说服农民交售义务粮，而是贪图方便，采取一些粗暴行动，如关闭磨房、不完成义务交售就不准农民把产品拿回家等。

各级党委进行了更广泛、更具体的工作，来说明党的政治路线以及党的决议的重要性。政治解释工作更紧密地与经济问题，与完成企业、农村或机关的计划的任务联系起来了。特别重视以对待劳动和公共财产的社会主义态度教育人民。党更好地抓了阶级斗争问题，把它作为思想教育问题的主要环节。党更清楚地说明了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不让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散布的、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各种思想家开始支持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的头脑中扎根。中央委员会教导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将继续不断。这是因为剥削阶级即使在丧失政权以后，也绝不会放弃复辟的企图；国际资产阶级的主要目标是阻止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胜利或正在兴起的地方扑灭这一革命。因此，党进一步加强了宣传鼓动工作，以揭露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目的和他们为达到这些目的所使用的新手法。党使劳动人民更加清楚地了解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并提醒他们注意，盗窃、破坏和浪费社会主义财产就是它的一种形式。

为改进党的强有力的鼓动武器——报刊和广播工作采取了措施。改组了党内教育体制。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出版。除一九五二年开始出版的斯大林著作外，决定并开始出版列宁全集。特别把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经济机关的主要干部的思想、文化和业务水平方面。使全体干部和

全体共产党员更好地投入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而克服了认为这一工作纯粹是宣传鼓动部门的任务的完全错误的、有害的思想。

为了促进文化革命，党在不忽视使这一革命进一步向广度发展的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使它更多地向深度发展。加强提高群众文化教育水平的最重要的手段——教学的科学内容和思想政治内容，得到特别的重视。为加速农村文化的发展，拨给了比过去更多的资金，调去了更多的教育干部。

随着新型的知识分子的培养和国内科学机构的建立，党这时提出了把科学更紧密地与生产相结合的任务，使科学研究工作能解决国民经济的主要问题。为了进一步推动阿尔巴尼亚历史、阿尔巴尼亚文学史和语言学的研究工作，采取了特别的措施。

正是在这个时期成立了一系列新的科学、文化和艺术机构，如党史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歌剧舞剧院等。

党保持警惕，防止修正主义渗透 在党中央一九五五年四月全会讨论加强思想和文化工作的时候，屠克·雅科瓦竭力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他的修正主义观点，攻击党的总路线。

屠克·雅科瓦在第九次全会所作的、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重复的自我批评原来是假的。他坚持反对党的路线。他继续对党的领导 and 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心怀不满和极端仇恨。他认为党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和对阶级敌人采取的措施是不正确的。他从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评价近年来的国际事态，开始进行修正党的路线的勾当。为此，他同由于从事反马克思主义活动而受到党的处分的分子接近起来。

屠克·雅科瓦要求重新审查党的整个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因为在他看来，存在着应当尽早予以纠正的重大错误！他怀着打

击党的领导、特别是打击恩维尔·霍查同志的既定目的，重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领导人的众所周知的敌对论调，按照这种论调，似乎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领导人建立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是他们使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取得一切胜利的！他提出要修改党自成立以来对各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所作的评价，他特别坚持要缩小他曾一度占据领导地位的斯库台小组的消极方面。

他反对党关于阶级斗争的政策。他维护阶级斗争熄灭论，千方百计地企图全面阻止对反党思想、反党倾向和表现进行斗争，从而要大家接受同党内机会主义观点的和平共处。

屠克·雅科瓦对党的敌意达到了那种程度，以至利用把阿尔巴尼亚人民分成“盖格人和托斯克人”这个反动口号来反对党。

屠克·雅科瓦公然要求改变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把由于犯有严重过错和从事反马克思主义活动而受到处分的人安插到党的领导岗位。同时，他还主张为所有反党分子恢复名誉。

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要以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那种新方针来代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屠克·雅科瓦以“救世主”和这个方针的“热心战士”的面貌出现，以有资格担任党的领导的人自居。

贝德里·斯巴修附和了屠克·雅科瓦的修正主义论点。

贝德里·斯巴修从他入党以来，由于他的活动中的明显的机会主义和严重错误而多次受到批评。但是，他每当看到自己有被揭露的危险时，就“自动”要求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以便掩盖他的过错。他一贯抱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情绪，并以沉默的方式支持了赛依弗拉·马利绍瓦和于麦尔·迪什尼察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道路。

贝德里·斯巴修也反对党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政策，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压力，并要求取消阶级斗争。他和屠克·雅科瓦一

样，主张修正党的总路线，主张由其他反党分子组成的、以屠克·雅科瓦为首的反马克思主义领导来代替党的领导。

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贝德里·斯巴修没有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因为在核实材料时把他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完全揭露出来了。从此，他对党更加仇恨，并伺机向党进攻。

屠克·雅科瓦和贝德里·斯巴修的机会主义观点和活动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召开的党中央全会上受到了毫不犹豫的揭发和谴责。屠克·雅科瓦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随后，被清除出党，而在全会上采取了十分敌对的态度贝德里·斯巴修被立即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被清除出党。

中央委员会在作出这一决定时指出：

“……我们应不断提高革命警惕性和加强反对机会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使他们的每个危害党和人民的行动在萌芽状态就受到打击”。〔105〕

这样，就捍卫了党的团结，维护了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总路线的纯洁性。中央委员会使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作好准备，反对那些敌人的观点，他们企图在党内散布有害的太平观念和阶级斗争熄灭的观念。

屠克·雅科瓦和贝德里·斯巴修的修正主义活动并不是偶然的。它的根源在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全面颠覆活动。它与现代修正主义者准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动全面进攻是紧密相联的。

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逝世后，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开始蠢动起来，腐蚀党的基础，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这一事件后最初几年内，他们通过造谣、中伤和策划阴谋，孤

立和排斥领导中的坚定分子，竭力巩固自己的地位，窃取党的领导权。为此，赫鲁晓夫掀起了反对所谓“个人迷信”的运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个人迷信“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害做法”而加以谴责，尽管如此，它没有陷入赫鲁晓夫为修正党的政治路线和为更换领导准备条件所设下的圈套。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回答是：

“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各级领导中，存在着集体领导精神，并为日益加强集体领导而不断进行斗争。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坚如磐石地团结一致，并英明果敢地领导党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荣道路前进。党的团结坚如钢铁，任何国内或国外的敌对势力都破坏不了这个团结。”〔106〕

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全面进攻作了大规模的准备。他们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同铁托集团靠拢，并为它恢复名誉；用与帝国主义头子的合作代替各国人民维护和平的斗争。

这一活动的后果是使匈牙利和欧洲其他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对城市资本主义成分、特别是对农村资本主义成分作了明显的让步，听任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文化泛滥。但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不仅没有向阶级敌人作任何让步，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

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南斯拉夫领导人所遵循的道路看成是他们共同道路的榜样，把铁托集团看成是他们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斗争的最可靠的同盟者。在这期间，赫鲁晓夫和追随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开始十分赞赏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以及“它为争取和平共处和保卫和平所作的努力”。赫鲁晓夫企图证明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没有不同之处。开始

出现一种看法，认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联合起来的東西要比使他们分开的東西更多、更重要。为了证明给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领导恢复名誉的必要性，进行了全面的努力。一九五五年五月，赫鲁晓夫未经其他党的同意就决定推翻情报局关于铁托集团的背叛行为所作的决议以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这一集团的背叛行为所作的估价，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贝尔格莱德。赫鲁晓夫还企图把这一单方面的、错误的、专横的决定强加给其他党。仅在动身的前两天，他才把这一既成的事实通知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并要求它同意推翻情报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揭露南斯拉夫领导背叛行为的决议和重新审查一九四八年六月的决议。同时，他要求赞同他就这一问题草拟的并将在不开情报局会议的情况下就以情报局的名义发表的“决议”！尽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当时对苏联共产党非常信任，但仍对赫鲁晓夫的这一举动表示很大怀疑，并通过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给苏共中央的信表示反对赫鲁晓夫前往南斯拉夫和给铁托集团恢复名誉。

信中说：

“我们认为，你们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来信的内容和体现我们迄今为止对南斯拉夫人的共同立场的主要论点之间有着相当的差别……无论在一九四八年同南斯拉夫人断绝关系之前还是之后，一直到今天，我们党在同南斯拉夫人的关系中的日常经验，以大量的活生生的事实清楚地完全地证明，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一切决议的实质性内容，除了个别策略性问题以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为批准废除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情报局会议决议而提出的程序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对一个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事先不同对此问题有关的所有党共同进行深刻的分析而作出如此草率的（和匆忙的）

决定，更何况在报刊上发表并在贝尔格莱德会谈中予以宣布，这不仅是为时过早，而且将给总的方针造成严重损害……我们相信，我们党同南斯拉夫关系中的这一总路线，除了个别次要问题以外，是正确的。”〔107〕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向苏共中央提出在情报局成员党的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并邀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参加，发表它的意见。

赫鲁晓夫按照他的决定前往南斯拉夫，低三下四地向铁托承认“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领导犯了严重错误”（！），实际上这就是为他恢复了名誉。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的事件，是对兄弟党共同决议的公开践踏，是对其他党的蔑视。

赫鲁晓夫认为，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方针体现了他向美帝国主义靠拢的愿望和努力。他在贝尔格莱德的讲话中就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意图。他说，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的合作政策“得到了我们的完全谅解”。赫鲁晓夫同几个美国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了这样一个观点：争取和平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之外的一个政治概念，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帝国主义国家都对保障和平表示关心。事实上，他对和平的这种解释，推翻了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这一著名的列宁主义论断。

现代修正主义者竭力把他们的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升为理论，企图麻痹群众为争取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而进行的朝气蓬勃的斗争，并开始鼓吹与帝国主义和平的会晤和会谈是保障和平的主要斗争形式。在这些行动的影响下，一九五五年国际保卫和平组织的活动明显地削弱了。修正主义者以突出和平主义来代替争取和平的斗争。

赫鲁晓夫把一九五五年七月在日内瓦召开的苏、美、英、法四大国首脑会议说成是国家关系中的一个新阶段，是为争取和平而

努力的一个转折点，把参加这一会议的帝国主义政府首脑说成是为争取和平而努力的明智的人。他开始到处贩卖“日内瓦精神”。那时，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其他国家领导人，首先是美国领导人，利用“日内瓦精神”要求苏联作出让步，特别是要求苏联单方面裁军。

在赫鲁晓夫的影响和煽动下，修正主义分子也在其他国家蠢动起来。在匈牙利，纳吉·伊姆雷直接起来反对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反对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领导作用，成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和人民政权的巨大危险。屠克·雅科瓦和贝德里·斯巴修也企图在阿尔巴尼亚起这样的作用。

这时，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防止修正主义成为一股联合的国际思潮，就意味着要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纯洁性，首先是捍卫自己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纯洁性，把修正主义分子清除出党，并保卫党的团结不受侵犯。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了屠克·雅科瓦和贝德里·斯巴修，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不仅不允许在党内为修正主义开辟道路，而且为今后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表现作了更好的准备。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党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同争取完成经济任务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斗争是紧密相连的。

农业计划工作的进一步完善，补充了使农业摆脱落后状态的经济措施。这一部门的计划工作的过分集中，束缚了农业经济单位的主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农业的发展。按照在农业方面采用的新的计划方法，在国家发展农业的计划中规定了建立在义务交售基础上的农畜产品征购量、剩余产品收购量、签订合同的办法以及付给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额。当时，农业生产计划直接由每个国营农场、农业合作社和个体农户同农业

部门和机器拖拉机站共同制定，并考虑到充分利用每一地区的土地和气候条件。新的方法使许多农业专家摆脱了官僚主义的工作，增强了各区领导农业的国家干部的责任心。

一九五五年标志着工业生产，特别是矿业的一个重要转折，标志着生产部门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的组织方面，经济机关、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领导经济的方法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

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了。一九五五年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〇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九，比一九三八年增长了十倍半，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二十二。一些工业部门，如铬矿开采业、机械工业、木材工业、地方工业等，都超额完成了计划任务。手工业合作社提前十个月完成了五年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和投入生产的工厂以及国营或合作社工业企业达一百五十个左右。

农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一九五五年粮食产量比一九五〇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三。

经济的飞速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增长，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提高了文化水平。一九五五年商品流转总额比一九五〇年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五。国民收入增长百分之七十左右，职工的实际工资增加百分之二十，农民的收入增长百分之三十五。五年计划末期，决定部分取消配给制。

在发展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扩大了学校网，大、中、小学学生人数大大增加了。基本上扫除了四十岁以下的文盲。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把阿尔巴尼亚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农业工业国这个主要任务基本完成。奠定了社会主义新工业的基础，扩大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成分，为在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加速农业集体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创造了条件。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取得了领

导国家和经济的宝贵经验。在动员群众的工作中，在反对国外和国内阶级敌人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斗争中，党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五章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建成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斗争

(一九五六至一九六〇年)

一、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加速农业集体化的方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央委员会决定召开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新任务。代表大会将向党和人民汇报丰硕的成果，报告为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所进行的坚定的原则性的斗争，指出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光明的远景。在筹备新的代表大会期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碰到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尖锐问题和苏联领导为把自己的修正主义方针强加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而向它施加的压力。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赫鲁晓夫集团经过三年的准备之
的修正主义方针 后，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和苏共在斯大林领导下执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总路线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在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些所谓“新的”论点，说什么这些论点是“在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

社会主义的变化的条件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这些论点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蒙蔽苏联国内外舆论，而事实上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和修正。

赫鲁晓夫歪曲了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说；他把“两种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提到了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的高度。列宁教导说，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不是和平共处，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

“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被压迫国家的人民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108〕。

赫鲁晓夫硬要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各国人民作出选择：“或者是和平共处，或者是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样，为了不惜一切地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苏联领导鼓吹放弃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放弃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解放斗争，放弃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应该以一切手段给予各国人民的支援。苏联领导使解决和平和各国人民自由的问题服从“建立两个世界大国——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赫鲁晓夫说：“我们希望在争取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友好和合作”，“我们的目的是要争取根本改善苏美关系”。

一方面，赫鲁晓夫这样散布幻想，说和平和自由的最大、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已经放弃或者可能放弃它的掠夺和侵略目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独立国家永远不会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了。但为此就必须赞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永久共处，因为社会主义将通过“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和平竞赛”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另一方面，赫鲁晓夫集团向美帝国主义者暗示，美国在各国占据的经济和军事统治地位丝毫

不会受到侵犯；他们应该赞成两个大国主宰世界；这两个占统治地位的大国彼此亲密合作，运用自己全部的强大经济和军事潜力，运用一切宣传手段和国际机构，如联合国等，“就能保障和平”！

苏联领导把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联系在一起。赫鲁晓夫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服从和平共处，把全部重点放在“和平过渡”上，把它说成是“同议会道路”一回事。他宣称，在当前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有可能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武器，变成真正的民主机构，即对劳动者实行民主的机构”！同时，他把十月革命的道路说成“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才是正确的”！这些提法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

苏共中央的报告公开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说那里“经济管理和国家机构的组织的特殊的具体形式已经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起来了”。由于这种估计，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领导的背叛行为的决议就完全被撕毁了，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南斯拉夫道路得到了支持。

赫鲁晓夫向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宣读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给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更沉重的打击。这个报告把列宁逝世后布尔什维克党的光荣道路说得一团漆黑，把它说成是“充满错误、严重反常现象和骇人听闻的罪行”的道路。把所有这一切责任都推到连续三十年如此英明卓越地领导苏联党和国家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和被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家斯大林身上。赫鲁晓夫根据对文件的任意解释和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的声明，制造了极其卑鄙的诬蔑和诽谤，攻击斯大林“残暴”、“脱离生活和现

实”，说他是“暴君”、“恐怖主义者”、“白痴”。同时，赫鲁晓夫宣布给那些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而受到惩办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恢复名誉。

打击斯大林，就是直接打击他的革命事业，就是打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这种打击是有既定目的的，这就是为取消苏共历次代表大会制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辩护，是为了接受修正主义的新政治路线，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为实现这一目的铺平道路，赫鲁晓夫集团就必然要诋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在随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在苏联的建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而在世界上形成的新的条件下坚决捍卫了并且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赫鲁晓夫及其同伙，利用所谓“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掩盖自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观点和活动，用个人迷信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是可憎的这一事实进行投机。

斯大林是反对个人迷信的，并经常批评个人迷信，他正确地估价了群众的作用，在领导苏联党和国家方面，他一贯坚持集体领导原则。但他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制止苏联宣传机构在他的晚年对他作过多的完全不必要的颂扬。赫鲁晓夫集团利用了这一点为它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目的服务，制造了所谓“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把它作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武器。

赫鲁晓夫及其集团把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方针宣布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千方百计地使它对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具有约束力。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结论成为各国修正主义者的精神食粮。这些结论给帝国主义和所有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革命解放运动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武器。共产主义的敌人从这些结论中得到了鼓舞，掀起了疯狂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特别是反对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他们特别攻击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这方面，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一马当先，他们看到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方针和他们早已开始了的道路是一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出现紧张的局势。

修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也使阿尔巴尼亚的路线的企图失败了 尼亚的反党分子和敌对分子受到了鼓舞

并蠢动起来。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希望，认为现在改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重新夺回失去的地位，就是说开始在苏联和某些人民民主国家正在进行的同样的进程的时机来到了。铁托集团，特别是通过南斯拉夫驻地拉那公使馆，给这些分子以直接帮助。在南斯拉夫公使馆的指挥下开始组织秘密的反革命活动，旨在改变局势和攫取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权。一部分犯有严重错误而受到冲击的党员以及暗藏的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代理人都参加了这一活动。反党分子和敌对分子比谁都更加起劲地宣传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修正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路线，为科奇·佐治、屠克·雅科瓦、贝德里·斯巴修以及党和人民的其他许多敌人恢复名誉而竭力在党内制造气氛。他们抹杀在党的领导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的成就，说什么存在着“个人迷信”，“列宁主义准则遭到破坏”，“对富农和其他阶级敌人采取了粗暴的态度”，“对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表现犹豫和拖拉”。他们说这些都是“斯大林的错误观点和做法的后果”，并提出必须取消这一路线，必须对允许干这样事情的负责人采取措施！地拉那的反党分子还利用了市党委的缺乏警惕和其他的严重缺点。

修正主义分子利用一九五六年四月召开的地拉那市党代表会

议，开始攻击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领导。修正主义分子通过他们混进会议的代表，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同时，他们要求延期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理由是什么需要给时间来按照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精神重新审查路线和进行新的准备！事后证明，这一切都是由南斯拉夫公使馆在幕后策划的。

反党分子滥用党内民主，从而在代表会议上制造紧张局势。修正主义观点遭到了多数代表的反对，但其中一部分人也因受精心策划的煽动而发生了动摇。

中央委员会正确地估计了十分严重的局势，并立即得出结论：党和社会主义的敌人插手了这件事。中央委员会委派恩维尔·霍查同志到会上揭露了修正主义分子的目的，阐明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捍卫它的革命政策和实践的纯洁性所采取的坚定立场。代表们完全支持党的这一立场，谴责敌人妄图使党脱离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代表会议迫使反党分子亲口承认了他们反革命活动的目的和性质。修正主义者的阴谋破产了。

中央委员会从这次事件吸取了教训，并指示全党：

“……决不允许丝毫放松警惕，不允许自满情绪滋长，不给敌人活动的余地”。〔109〕

这一事件进一步擦亮了共产党员的眼睛，并推动他们以更旺盛的革命斗志捍卫党的路线和执行任务。

这时，赫鲁晓夫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施加压力，要它按照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结论精神重新审查自己的总路线，并要第三次代表大会接受新的路线。起初是在莫斯科通过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成员苏斯洛夫施加这一压力。苏斯洛夫以苏共中央的名义通过利丽·贝利绍娃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重新审查特别是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态度和对科奇·佐治、屠克·雅科瓦

以及其他反党分子的处分，所提的理由是什么“可能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影响下犯了错误”。到地拉那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团长更加露骨和顽固地重复了这一要求。

中央全会毫不犹豫地一致谴责了妄图修正党的正确路线的任何企图，并表示决心沿着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贯遵循的道路继续前进。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按照预定的时间，于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开幕，于六月三日闭幕。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六百七十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一百二十一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四万一千三百七十二个党员和七千二百七十二个预备党员。

大会对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工作进行了讨论，修改了党章，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指示。

党继续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的决心 在国际修正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劳动党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主要的问题是：党应当沿着什么道路前进？是沿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道路前进，还是沿着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前进？

同修正主义者的愿望相反，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听取和讨论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所作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以后，决定完全赞同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以及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和所作的结论。

代表大会满意地指出，迄今为止党所执行的政治、经济和组织总路线是正确的。”〔110〕

代表大会坚决谴责了反党分子在地拉那市党代表会议上的

活动和修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路线的任何企图。代表大会认为党

“对所有背离正确路线的、修正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反党集团和反党分子”〔111〕

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得出的结论是，在惩办这些反党集团和反党分子方面，在党的整个内部生活中都严格地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准则。党的决定获得了所有党组织的完全赞同。

代表大会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认为

“以为阶级斗争正在熄灭、被推翻的阶级会自动放弃斗争的想法是错误的”。〔112〕

代表大会指示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警惕性，并提醒他们说，总会有这样一些分子，他们

“认为党的纪律、党的警惕性也应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一切都应当用机会主义的温情、阶级斗争熄灭论来代替，他们对党和人民犯下的错误和罪行应该一笔勾销”，“在民主的幌子下践踏真正的民主的时候已经到来了……”。〔113〕

这样，代表大会就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形成的紧张局势有所准备。

在这方面提出的任务是，要继续对机会主义表现和右倾危险作无情的斗争，要象捍卫最珍贵的东西一样捍卫党的队伍的团结和统一。

第三次代表大会毫不犹豫地一致决定在所有领域里必须继续贯彻党从建立以来就奉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切结论和决议都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精神，这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结论

和决议所贯穿的修正主义精神是根本对立的。

虽然如此，第三次代表大会并没有公开谴责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把对苏联领导的一系列论点和做法的反对意见和保留意见通知了苏联领导。同时，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报刊上对这些问题有目的地给予了不同的评价，实际上这些评价是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相反的。但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结论不能公开表示反对和保留，因为这样一种行动在当时只能有利于疯狂地攻击苏联、攻击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共产主义的敌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一贯认为，捍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自己的崇高国际主义义务。此外，当时对赫鲁晓夫集团提出新论点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还没有透彻的了解。

主要的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许多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发生的情况不同，它在赫鲁晓夫集团的压力下没有作原则性的让步，没有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方针作为自己路线的基础。它捍卫了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总路线不受侵犯。

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党章的修改并没有损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准则。新的党章更好地规定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它体现了党在组织、思想问题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政治领导方面所取得的丰富经验。

第二个五年计划指示

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九五六至一九六〇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指示，确定了计划的主要任务：**主要是依靠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和调动内在潜力发展工业，特别是矿业；主要通过农业生产的社会主义改组来迅速发展农业；改善人民的物质状况和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

根据这些任务，规定工业生产总值增加百分之九十二，平均每年增长不少于百分之十四。特别是石油、铬矿石、煤和电力生产，以及日用品的生产将迅速发展。

代表大会指示还要大大提高农牧业的生产。但是，为了在全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确保农村迅速而全面的发展，代表大会把扩大农业集体化作为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最主要的任务。

代表大会认为，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央全会关于加速农业集体化的指示是完全正确和及时的。过渡到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新阶段的政治、组织、经济的一切条件已经具备。农民群众对农业集体大生产的优越性已经确信无疑。熟练的干部已培养出来，农业技术基础也扩大了。党和国家完全能胜任扩大农业集体化所提出的任务。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党中央规定在一九五六年间合作社的数目要增加一倍的任务在代表大会的前夕就实现了，这个事实也清楚地证明农村过渡到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的必要条件已经具备。

第三次代表大会根据这些条件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实现农业集体化的任务。首先在平原和部分丘陵地区实现集体化。在山区主要建立共耕社和畜牧业合作社。

代表大会指示，实现集体化必须严格遵循农民自愿的列宁主义原则。代表大会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关只能用说服的方法宣传已经建立起来的农业合作社的榜样。任何一种哪怕稍微地损害自愿原则的其他工作方法都是不好的，将受到党的谴责。

国家将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化、扩大开荒面积、扩大土地改良工程、向农业合作社提供全面的帮助来支援农业合作社。

计划指示完全贯穿着不断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的目标。在提高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将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完全取消配给制和每年降低日用品的价格提供可能性。

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将提高百分之二十五，农民的收入将提高百分之三十五。

为了最好地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代表大会号召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要清楚地了解

“光荣的岗位、社会主义建设斗争的前线是在生产物质财富的地方，在工厂，在工地，在农场，在机器拖拉机站，在合作社”。〔114〕

最后，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四十三名委员和二十二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样，中央委员会扩大了。恩维尔·霍查重新当选为第一书记〔115〕。

第三次代表大会捍卫了党的革命政策，并根据这一政策的精神确定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道路上的新任务，把完成农业集体化的任务摆在首要的地位。

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反对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 ——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面临着由于现代修正主义的泛滥和蠢动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危险局势。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出现的这种局势是**修正主义的蠢动**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后果。大部分共产党和工人党陷入了极端的思想混乱。赫鲁晓夫集团盗用了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的崇高声誉和威望，不断对其他党的领导施加压力，企图以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方针代替以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他们阴谋把所有那些反对修

正主义泛滥的人排除出党的领导。铁托集团则大肆宣扬“南斯拉夫道路的胜利”，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千方百计地进行干预，加速瓦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修正主义打着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掀起大规模的反共运动中，苏联领导人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紧密地勾结在一起。赫鲁晓夫会见铁托以协调他们在这一运动中的行动并确定这一个或那一个党的某一个领导人应该下台或谁应该上台。

在这种形势下，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就跳了出来，并在苏联领导和铁托分子的直接支持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了进攻。为反党分子恢复了名誉，其中不少人是举世皆知的反革命。

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运动中，资本主义国家里以陶里亚蒂为首的意大利机会主义分子是突出的。他们提出了苏维埃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已经蜕化变质的论点，并提出需要以“无限制的民主制度”加以代替。同时，他们越来越多地吹捧“南斯拉夫经验”。他们在“反对一党霸权”的幌子下，攻击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共同政治路线，炮制了“多中心论”即在这一运动中建立许多中心的论点。他们宣扬“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口号，这是改良主义的议会道路，它排除任何革命的起义和摧毁资产阶级政权的任何努力。在意大利修正主义者看来，这是适合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唯一道路。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在波兰和匈牙利泛滥得最广最深。在赫鲁晓夫集团的支持下，因修正主义和反社会主义观点和行为而受到惩办的反马克思主义分子占据了这些国家的工人党的领导地位。无产阶级专政瘫痪了。允许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广泛地传播。在“文化团体”的幌子下，各个城市里都建立了反革

命据点。修正主义者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帝国主义者利用了这一形势。在修正主义分子为之准备了适当条件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里，帝国主义者煽动、扩大和策划反革命事件，并与修正主义分子直接或间接地勾结起来，从事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国际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分子于一九五六年六月共同策划了波兰波兹南反革命暴乱和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匈牙利反革命叛乱。

匈牙利的人民民主制度面临着完全覆灭的危险。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毁灭了。被修正主义分子出卖了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进行了拚命的抵抗。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在全世界燃起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力量对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命运十分担心。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有苏联军队，但赫鲁晓夫集团却迟迟不肯用来镇压反革命。他们只是在来自下面的巨大压力下，特别看到匈牙利正要超出他们的势力范围，最后才迫不得已允许苏军援助匈牙利革命的保卫者。反革命被消灭了。

匈牙利反革命事件是修正主义的产物。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是匈牙利修正主义者的最狂热的支持者，他们在策划反革命事件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在反革命失败后他们下半旗致哀。铁托认为，这是由于“拉科西政权的严重错误和迟迟不推翻拉科西政权”所引起的一次“全民起义”！铁托把苏军的援助说成是“不能容许的野蛮干涉”。反革命的头子纳吉·伊姆雷就被窝藏在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里。

同时，在策划反革命事件中，苏联领导的罪责并不亚于铁托集团，反革命失败后苏联领导又竭力掩盖其严重罪行的痕迹。他们牺牲了自己一手扶植到匈牙利国家领导岗位上的纳吉·伊姆雷。

和铁托分子不同，他们不得不如实地把叛乱说成是“反革命的”。但他们把这次反革命事件归罪于“教条主义者”，而不归罪于实际上的罪魁祸首——修正主义者。

匈牙利反革命失败了，但它的根子没有挖掉。匈牙利的修正主义没有肃清，它只是作了退却。纳吉·伊姆雷的亲密同伙在政权中和改组后的执政党内占据着关键性的岗位。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毫无保留地支持匈牙利革命的国际主义立场 匈牙利革命劳动者，并动员全国人民用一切手段支援他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通过《人民之声报》声明说：

“阿尔巴尼亚人民愤怒谴责帝国主义者和法西斯反革命分子企图使匈牙利脱离社会主义阵营、颠覆工农政权、建立资本的野蛮专政的血腥行动。”〔116〕

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则在一项特别声明中号召：

“在当前的形势下，必须坚决捍卫匈牙利人民这些年来所取得的社会主义胜利。”〔117〕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万分高兴地祝贺匈牙利人民的胜利，并把它看作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的胜利。

苏联领导和匈牙利新领导把所谓“教条主义者”、“匈牙利前领导”看作是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分析这一沉痛事件时和他们不同，指出修正主义者才是真正的主要的罪魁祸首，并批评他们“对领导（匈牙利的。——编者）的接二连三的闪电般的更换，这种更换实际上使党和国家失掉了司令部，失掉了坚强而忠实的领导”〔118〕。

从匈牙利事件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吸取了对它在国内和国

际活动都有重要意义的教训。

在反革命失败后不久，恩维尔·霍查同志说：

“匈牙利人民的悲剧，对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人们当然是一个极大的教训，对于那些高枕无忧的、在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花言巧语面前、在蛊惑人心的口号面前丧失警惕的并代之以机会主义和危险的仁慈心的人们也是一个教训……

阿尔巴尼亚党和人民从来没有、将来也决不会上当，也不会被‘人民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口号或者被五味俱全，唯独没有无产阶级气味的某种‘民主’口号所欺骗……

所以，我党当前面临的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原则性的斗争，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性，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党的队伍，加强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结；我们党认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斗争，建立在这些原则基础上的斗争，是唯一正确的斗争。”〔119〕

英国、法国、以色列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对埃及的侵略进一步加剧了匈牙利反革命事件所引起的国际局势的恶化。这一行动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爱好自由与和平的力量发动总攻击的另一环节。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必须使党和人民进一步作好准备，以抗击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大增加了的压力。同时，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支部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在揭露修正主义和制止修正主义的泛滥中作出贡献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一九五七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全会讨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

势和世界形势。在这次会议上，恩维尔·霍查同志对这种形势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刻分析，并重申了党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革命斗争中的任务。

帝国主义者和南、匈、波、意等国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都把矛头对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了破坏这一团结，他们力图孤立苏联，使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脱离苏联，分割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拚命否定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和经验的普遍意义。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论点和决议也是反对这些胜利和经验的。在这些条件下，捍卫苏联的斗争，就是捍卫社会主义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为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必须

“捍卫和加强社会主义各国、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苏联周围的团结”。〔120〕

中央委员会教导说，在已出现的形势下，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具有首要的意义。它指示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要深刻地认识到，

“在当前的条件下，思想领域里的斗争已经提到了首位”。〔121〕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公开宣布，它将坚决地、始终不渝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不受修正主义者的打击。

首先必须揭露国际修正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方面制造思想混乱的企图。

恩维尔·霍查同志指出，全部历史经验教育我们：

“党的领导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具有生死攸关的必要性。”〔122〕

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就意味着使工人阶级失去

司令部，就是完全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永远保持资产阶级的统治。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揭露修正主义者大肆宣扬消灭无产阶级专政或使它“自由化”时强调指出：

“我们不是要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加强这一专政，不允许削弱它，不允许‘使它自由化’，不允许它的队伍混乱和涣散，因为这正是敌人所希望的。”〔123〕

党指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了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跑到共产主义的敌人那边去了。

修正主义者妄图通过散布否定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劳动人民中制造混乱，党指出这一企图的巨大危险性。党教导说，阶级斗争

“是客观现实，它与剥削阶级或者剥削阶级残余的存在有关，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存在、与大量的小生产者成分的存在、与人们思想意识中资本主义残余的存在，以及与帝国主义的存在有关”。〔124〕

修正主义用下述三个主要的骗人的口号来掩盖它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根据每个国家的特殊条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或者“个人迷信”。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出，修正主义者只不过是利用关于在新的形势和各国特殊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论点进行投机而已。他们用这些论点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掩盖他们的背叛行为，把“特殊的社会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强加于人。

恩维尔·霍查同志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否定它的基础，而是以从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

和科学的发展中得出的新结论来丰富这一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它所阐明了的客观规律是绝对真理……这些规律不可能过时，也是推翻不了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是共同的，社会的发展规律是没有民族界限的。历史经验表明，这样的共同问题有：无产阶级专政，即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工人阶级政权，利用一切方法加强工人阶级与农民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对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农业，有计划地发展经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指导，坚决捍卫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不受过去的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危害。”〔125〕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再次明确地指出，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反对“斯大林的错误”、反对“斯大林主义”，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便创造条件，在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内用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方针代替革命的方针，把修正主义者安插在这些党的领导岗位。

“我们不同意所有那些否定斯大林的一切革命的积极方面的人的意见……众所周知，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继列宁之后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受一切敌人和修正主义者的危害，并且对这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126〕

在这一时期，党的主要锋芒对准了打着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的旗号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但是不难理解，这一斗争是针对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党内的修正主义的，恩维尔·霍查同志报告中的论点是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论点相对立的。

中央全会通过的恩维尔·霍查同志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更加明确地阐明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关于第二

十次代表大会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重大原则问题的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这一报告是共产党人手中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有力武器。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决拒绝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方针和捍卫自己的革命总路线不受侵犯，引起了苏共领导的不安。

一九五七年四月，恩维尔·霍查同志和穆罕默德·谢胡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访问莫斯科时，苏联领导就公开地表示了这种不安。会谈中，恩维尔·霍查同志正在阐述在当时条件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情况和斗争时，赫鲁晓夫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革命立场表示不满和十分恼火，他插话说：“看来你们阿尔巴尼亚人是想把我们拉回到斯大林的道路上去”！他认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立场是“不客观的立场”，是建立在“夸大同他们的分歧的基础上”，并要求“不要无理地欺侮他们”！他毫不犹豫地为阿尔巴尼亚党和人民的某些敌人进行辩护，要求为他们恢复名誉。赫鲁晓夫对恩维尔·霍查同志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坚决捍卫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行为大发脾气，威胁说：“你们阿尔巴尼亚人火气大，是宗派主义者”！！“和你们谈不通。不谈了”！！！这一事件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和赫鲁晓夫集团的修正主义方针的第一次直接交锋。

苏联领导尽管进行威胁，但还不敢中断会谈。赫鲁晓夫集团十分希望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放弃“顽固立场”，并屈从他们的命令。苏联的经济援助是他们用来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赫鲁晓夫以为，阿尔巴尼亚没有这种援助就寸步难行！赠送从解放到一九五五年苏联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提供的四亿二千二百万旧卢布贷款就是这样一种手段。正如事后所证明的那样，苏联领

导并不是出于真正的友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赠送的。但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认为，这种援助不是施舍，而是兄弟援助，是苏联人民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人民的国际主义援助。

不论威胁还是“礼物”，都动摇不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彻底捍卫它的革命总路线的决心。

恩维尔·霍查同志在莫斯科说：

“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提高警惕，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主要任务。我们党……将坚定地沿着在阿尔巴尼亚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前进。”〔127〕

恩维尔·霍查同志在回到地拉那后重申：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停止对那些妄图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人们进行斗争，不管他们是南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或其他什么人”。〔128〕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又表达了它的国际主义的革命立场。

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集团妄图使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方针变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他的阴谋得到了各代表团内众所周知的一批修正主义分子的支持。

围绕着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战争与和平这些原则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修正主义者妄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战争、武装起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作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说成是过了时的东西。他们还肆无忌惮地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制度描绘得一团漆黑。在起草会议文件时，他们坚持不要把美帝国主义说成是和平与各国人民的主要敌人，甚至根本不提帝国主义。他们

无论如何不赞成把修正主义宣布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虽然两年来的事实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在揭露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它把自己的努力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以及在会议上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其他代表团的努力结合在一起。

在科学论证的铁的逻辑面前，修正主义者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不得不退却。在共同制定的和会议通过的宣言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规定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任务，确定了它们相互关系的准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宣言的基础。

会议肯定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会议还揭示了修正主义的根源：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国外根源。

除宣言的革命内容外，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他党代表团同意在宣言中保留这一不正确的提法：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说成是什么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阶段的代表大会。这实际上是一个让步，因为需要捍卫苏联，使它免受共产主义敌人已经发动的疯狂攻击，需要捍卫运动的团结。

尽管如此，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总的说来是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修正主义方针相对立的。宣言的通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力量的胜利。它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中的共同战斗纲领。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完全同意自己的代表团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活动，并把这一活动看作是国际主义的贡献。党赞同这次会议宣言中的革命论点，并把它作为自己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斗争的基础。

三、党为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关系和 为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而斗争

在突出政治和思想斗争的同时，党也没有忽视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社会经济任务。恰恰相反，党把实现这些任务首先看作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为大规模进行农业集体化而努力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大规模地进行农业集体化方面。在这里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建立新的农业合作社，这是最重要的方面；吸收那时还不是社员的农民参加老社。集体化主要在平原和丘陵地区进行。党组织采取一切手段支持农民关于建立新社的每一项倡议，并不一定要等到农村大多数人都同意以后才建立。少数农户也可以建立合作社。

党中央特别责成全体党员和大批党和国家的主要干部帮助农民和农村党员进行集体化工作。为了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广泛地调动了国营农场，同时也调动了工业企业和建筑公司的职工、文化机构和城市党组织。

在扩大集体化的同时，党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经济上和组织上巩固新社和老社。在这方面，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农业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农业合作社新章程具有特殊意义。新章程使农业合作社内部生活的基本规章制度、社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农业合作社的经济活动进一步完善了。改变和更合理地规定了每户社员的自留地数量。国家用机器设备、干部、农业贷款等支援合作社。

同时，党对集体化工作中的缺点和弱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党反对了一部分农民和一些农村党员同意建立合作社仅仅是为了要国家供应粮食和满足其一切需要的错误倾向。同时，还反对了另外一种企图保留比社章规定的面积更大的自留地的倾向。还批判了建社采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和违反自愿原则的现象。

党特别动员起来镇压阶级敌人阻挠集体化的任何行动。富农分子还在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派遣的破坏分子的怂恿下妄图进行破坏和制造种种混乱。阶级敌人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如：“不要急于建立合作社；限期是到一九六〇年”，“在合作社里你们会饿死的”，“集体化是剥夺农民土地的手段”，等等。他们暗中企图说服农民不要入社。合作社建立以后，他们唆使社员不要遵守社章，煽动不满情绪和在社员之间挑拨离间。他们对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极力进行破坏，并阻挠农业使用机械。

由于党的工作和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富农分子和其他敌人的活动被分割和被粉碎了。他们完全被孤立和被揭露了。集体化按照党规定的道路和速度进行着。为集体化而进行的斗争，特别是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使农民更紧密地和党团结在一起。农业集体化运动已成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

但在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中，党在第一年就发现了在畜牧业方面的一些有害的表现。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农民，他们从个人利益出发，迟迟不向合作社交售多余的产奶牲畜。他们常常在入社前就把牲畜杀掉或卖掉。这样，大部分新建的合作社只拥有极少量的集体所有的牲畜。另一方面，各级党委没有象对土地集体化那样重视牲畜集体化。结果，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播种面积已经实现集体化，而奶牛头数只达百分之六，羊百分之十。

畜牧业的这种状况使国民经济和使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受到损害。为了结束这种局面，采取了特别的措施，在土地集体化的同

时,加速牲畜集体化的步伐,发展和改善畜牧业,特别是羊和奶牛。

同时,党还从大规模农业集体化的第一年的经验中吸取了另一些教训。它批判了不少党员的自满情绪,指示谁都不要陶醉于已得的成就。为更好地宣传和总结集体化经验,采取了措施。特别是国家通过机器拖拉机站、国营农场、农业贷款、供应良种和种畜,更好地组织了对合作社的支援。一九五七年掀起了种植果树、葡萄和橄榄的高潮,以巩固合作社经济。

在讨论改进和加速为整个国民经济培养干部的问题时,中央委员会特别注意为社会主义农业培养干部。在国家行政机关和党的机关工作的其他一些党员和农业专家被派往农村,到农业合作社去工作。

一九五七年标志着农业集体化的根本转折。全国集体化的面积已经达到百分之五十八。许多农村全村加入了合作社。在某些区,农户的土地百分之九十实现了集体化。在发罗拉、比利什特、科洛涅、塞里克、萨兰达等地所有农村都建立了农业合作社。

农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已成为占优势的成分。一九五七年,农业社会主义成分生产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将近一半,棉花占四分之一,甜菜占百分之九十。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有了进一步的改进。这些成就是把集体化进行到彻底胜利的有力保证。

动员群众挖掘内部潜力 一九五七年不仅对集体化,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都是发生转折的一年。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六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六。所有主要工业部门都大大超额完成了计划。农业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十五。

在这些胜利的基础上,于一九五七年十月完全取消了配给制,并降低了物价。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胜利和经济胜利。完全取消配给制,实行不受限制的、按照国家统一价格的自由买卖,成了在社会

主义原则基础上按照劳动数量和质量更加合理地分配社会产品的重要因素。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国民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十四。按人口平均计算，商品流转额比一九五六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九。教育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了。建立了全国最大的教学和科学中心——国立地拉那大学。

一九五七年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发生转折的根源在于劳动群众的革命干劲，经济企业、合作社和国家机关更好地组织了劳动，党对经济进行了更有效的领导。

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头两年执行情况时，党得出的结论是，在国内存在着巨大的尚未被利用的潜力，应予以挖掘和用来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这一问题交给广大劳动群众进行讨论。同时，责成国家计划机关从提高指标的角度上重新审查五年计划指标。经过群众性的讨论，挖掘出来的内部潜力超过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预料。

一九五八年二月中央全会主要根据劳动人民的建议作出了关于提高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全部指标的决定。这样，第三次代表大会规定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提高了约百分之十七。在基本投资和基本建设方面的追加部分尤为显著。提高人民福利和文化水平的指标也有了增长。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追加部分主要依靠内部积累和内部潜力。

为了彻底完成已开始了的转折，党动员了自己的力量和城乡劳动人民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委显著地改进了领导、组织和解释工作。吸收从工人与合作社社员队伍中、从劳动妇女的队伍中涌现出来的、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对阶级敌人的斗争风浪中经过考验的新成员来加强自己。

工会更加努力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贯彻“面向生产”这一口号。工会扩大了生产宣传，改进了引导工人参加领导和

管理经济的工作。工人生产会议活跃起来了。产生和推广了新的竞赛形式,劳动人民的创造性增强了。开展了延长机器寿命、厉行节约、最充分地利用生产力的运动。许多先进工人,不考虑个人的物质利益,离开先进班组到别的班组去,使它们摆脱落后状态。产生了“1 + 2”运动(每一个熟练工人负责培训两名工人)。

在农村开展了每个社员每年出勤三百天的运动。农业机械工人响应延长拖拉机寿命、节约燃料的先进倡议。

劳动群众的革命化的动员给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以新的推动。一九五八年工业生产追加计划的超额完成,证明党关于挖掘和利用内部潜力的方针的正确性。

农业集体化 农业集体化继续迅速地进行着。一九五九年的**基本完成**底,集体化面积达百分之八十三以上,社会主义农业成分的耕地面积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百分之八十六以上。这样基本上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剩下的只有偏僻山区的农户还没有合作化。这样,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就提前一年实现了。

完成农业集体化是社会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最重大的历史性胜利之一。它使农村出现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农业集体化是**第二次革命,是农村社会经济关系中最根本的革命转变**。它为迅速发展生产力和根本改变农村社会文化生活开辟了道路。

农业集体化的完成证明党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加速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指示是多么正确和及时。

在农业集体化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贯注意到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条件。农业合作化所采取的形式、方法和速度与这些条件也是适应的。

集体化是在存在着农民对土地的小私有制的情况下开始和进

行的。集体化是在社会主义新工业还不能为农业提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劳动工具的情况下进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相信，集体化不应等到工业化完成以后才进行，使它受到人为的阻碍，正如集体化不应在最必需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没有具备以前就人为地加速进行一样。所以，集体化是在没有等到完成国家工业化的情况下开始和进行的。

虽然如此，集体化一开始，合作社就依靠集中在国家手中的机器拖拉机站的机械设备进行生产。农村集体大生产的机械设备是通过商品交换和贷款从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

农业集体化仅仅是依靠劳动组合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和进行的。通过这种合作社形式实现土地、生产资料和劳动的社会化。收入仅仅按照每一成员在集体经济中的劳动来分配。

集体化的过程中，还力图运用生产合作这样的初级形式，如只实行劳动社会化的共耕社。但这种引导农民投入合作化运动的形式、作为过渡到农业合作社的中间环节，在农村存在时间不长，也没有得到推广。农民一开始就直接建立农业合作社，没有经过其他中间形式。

过去，阿尔巴尼亚农村没有合作化运动的传统。因此，农民接受了党认为最适宜的生产合作形式。阿尔巴尼亚农民对党极为信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他们才从外国人和地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成了土地的主人。农民根据自己的经验相信党一贯给他们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并坚决捍卫他们的利益。所以，农民就接受了劳动组合式的农业合作社。

土地改革以后，在阿尔巴尼亚农村，农民之间在土地数量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方面没有大的经济差别。所以，加入农业合作社后社员之间在经济利益方面没有产生大的矛盾，以致必须采取合作化的过渡形式。

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并没有改变党对富农的政策。在这一阶段，对富农的斗争仍旧按照以前的在经济上限制、在政治上孤立和消灭的政策进行。由于贯彻了这一政策，富农作为阶级基本上被消灭了，不需要强制地、大规模地没收他们的财产。只有在富农不遵守人民政权的法律和法令，或者犯了反对人民政权的政治罪行时，才对他们使用武力和暴力。

一九六〇年还有约一千五百户富农，占总农户不到百分之一。他们这时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经济基础。富农每户平均只有不到三公顷土地，一头大牲畜，不到十头小牲畜。对剩下的富农继续贯彻过去的政策。由于执行这一政策，富农人数逐渐减少，富农经济逐渐削弱。在贯彻限制政策的同时，党还特别重视对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少年的再教育，但也从不丧失警惕，必要时也不放弃严厉的打击。

农业集体化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商业的加强，为更大规模减少城市里的资本主义因素创造了条件。私营小商贩组织了合作商店，国家监督他们的活动。当时为数不多的个体手工业者中，多数人加入了手工业合作社。

在集体化过程的初期，每个村庄，不论大小，都建立了自己的农业合作社。那时，农业合作社刚刚建立，底子很薄，干部还没有管理集体经济的经验，按村建社是一个必然的阶段。

当农业集体化趋于完成时，小型合作社就逐渐开始不能适应从经济上和组织上巩固合作社以及迅速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扩大和巩固合作社的客观需要。合作社农民自己也感到了这一点，并提出了这一要求。因此，党提出了通过并社来扩大合作社的任务。但是，党指示，并社必须以慎重的步骤，并在社员完全自愿和信服的基础上进行。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应当通过运动的形式仓促地进行。

但是，一九五九年初，由于受农民热情的影响，某些区宣布并社是当时的主要问题，并预计在一两年内结束。结果，党的指示被歪曲了。问题还没有研究好，联社活动的组织形式和规章制度也没有制定，就去建立联社。并社不仅在平原地区，而且也在山区进行。有些扩大了的合作社拥有十至十五个村庄，土地面积达四千公顷。有些干部认为，这样将会更快地解决从经济上和组织上巩固合作社的问题。

中央委员会及时发现了这些缺点，并采取了纠正的措施。中央委员会指出了过早的、匆忙的并社可能给集体化问题带来的危害。为此，指示要对合作社的条件加以细致的研究，并根据这些条件确定并社的可能性。

以后，并社工作仅仅在平原地区开始慎重地、有研究地进行。开始由不超过两三个村庄合并成为扩大了的合作社。同时，国家用机械设备、农业贷款、专家扩大对它们的经济支援。为了加强对联社的领导，党从城市抽调了许多干部到农村，他们被选为这些合作社的社长。

小社并大社为在经济上和组织上巩固合作社创造了新的条件。扩大了的合作社可以更好地利用土地和机械设备，社员劳动也就更有成效。在扩大了的合作社里，农业各部门可以更好地协作，更合理地使用投资，压缩行政开支。合作社扩大了，就有可能更好地利用社会主义新制度在农业方面创造的优越条件。

农业集体化为农民确立社会主义世界观奠定了新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但是没有党的教育工作，没有其他经济和组织措施，这种世界观是不会马上自动形成的。农民世代代已经习惯在私有经济里生活和劳动，所以私有观念和习惯很重。在组织性方面、在对待劳动和集体财产的态度方面所表现的一些缺点和毛病就反映了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党加强了对社员的教育工作，目的是使社员集中全力发展集体经济，提高出勤率，加强劳动纪律。此外，对劳动组织和报酬、如何贯彻社章，还采取了特别措施。

合作社的领导方法开始有了改进。社员对集体经济更加关心了。他们更加努力地开垦荒地。国家与合作社之间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加强了。

农业集体化也使农村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仅仅在一九五六至一九六〇年，农民就新建房屋三万幢左右。一九五九年农村拥有二千五百多所普通教育学校和大约一千三百个文化馆和文化站。数以百计的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专业干部在那里工作。

第二个五年 在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同时，党还为保证在国
计划提前完成 民经济的各部门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在不忽视从数量上完成计划的同时，党特别注意产品的质量。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头几年，生产力水平很低，国家困难很多，这就必须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产品数量方面。现在是更多地注意质量落后的问题的时候了。党不仅仅把这个问题看作是经济问题，而且看作是政治和思想问题。生产质量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质量反映劳动中的社会主义觉悟程度，质量对提高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加强人民对于自己力量的信心是有影响的。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党中央提出了“在不忽视数量的情况下，面向质量”的口号。同时，中央委员会指示，职工的报酬不应象过去那样仅仅或者主要根据数量，而且还要根据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来决定。坚决要求提高质量，直接有助于以社会主义劳动态度教育职工。

为了贯彻这一方针，采取了一系列完善劳动组织和劳动报酬的经济措施。重新审查了劳动定额和工人级别。在一切经济部门，劳动报酬也和质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从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的原则出发，使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更好地结合起来。各级党组织对职工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工作，阐明这些措施的革命意义，说明某些人追求金钱的倾向和“没有钱就没有竞赛”的错误想法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危害。

改善劳动组织工作和劳动报酬的措施得到了职工的正确理解。这些措施有助于把社会主义竞赛提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一九六〇年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和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小队和社会主义劳动队运动。这个运动的座右铭是党所提出的“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劳动、学习和生活”的口号。这个运动成了增加生产、改进质量、提高专业技术水平、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的巨大推动力。这有助于把生产活动同学习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结合起来。发明创造和合理化倡议运动也进一步活跃起来了。

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并超额完成了。特别是工业、运输业、基本投资和基本建设的任务大大地超额完成了。四年零九个月就完成了工业总产值，一九五九年就达到了规定要在一九六〇年达到的工业生产水平。一九六〇年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五年增长一点二倍，比一九三八年增长二十四倍。矿业、电力、机械和建筑材料工业发展速度最快。同时，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门也有了发展。因此，工业部门结构有了显著的改善。一九六〇年我国国民收入总额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来自工业部门。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兴建了二百五十个大型经济文化项目。新的油田、镍铁矿、铬矿、铜矿和煤矿投入生产了。这些项目的建设使一些新的城市出现了。

集体化的基本完成是农业方面具有历史意义的主要的胜利。

一九六〇年社会主义农业成分的耕地面积占百分之八十七。虽然气候条件不好,特别是五年计划最后两年,但一九六〇年的农业产值仍比一九五五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耕地面积扩大了百分之十三。除小麦外,各种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都有了提高。烟草、棉花和甜菜生产的提高尤为显著。

工农业生产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品成本的降低,是决定人民福利和文化水平显著提高的主要因素。一九六〇年和一九五五年相比,国民收入增加百分之四十八,职工的实际工资增加百分之二十九,农民的实际收入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六次降低了日用品价格,人民从中获益七十二亿里克(旧币)。商品流转额的增长的速度比人口的自然增长高一至二倍。

在发展教育和文化,以及人民保健事业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一九六〇年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校学习。和一九五五年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人数增加了两倍。人的平均寿命达到了六十二岁。

第二个五年计划任务的圆满完成,为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进一步发展经济和文化创造了新的起点。

四、对苏联领导的修正主义观点和 分裂主义活动的批判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只是暂时遏制了一下修正主义,而未能制止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泛滥和侵蚀。

国际修正主义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公开把会议宣言说成是
的进一步泛滥 “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否定”,是“后退”,是
“向斯大林主义的倒退”。他们对宣言的革命内容

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迫不及待地把他们一九五八年宣布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拿出来与宣言相对抗，并把它说成是“国际宣言”。

当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根本无视共同宣言的革命结论，而继续宣传和贯彻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结论。他们不放过任何机会日益与美帝国主义者靠拢和紧密勾结。赫鲁晓夫把美国总统和政府高级官员说成是“真诚希望和和平与苏联合作”的“明智的人”。他公开宣称，在当代条件下任何战争都是非正义的，非人道的。他要求联合国使每一国家和人民实现“全面彻底裁军”，只有每一国家用来“维护秩序”(!)的警察和需要在联合国下面设立的无疑是用来镇压人民战争和人民起义的“国际武装部队”除外。他开始散布幻想，说什么从一九六〇年起将建立“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

但是，赫鲁晓夫集团推行的政策是蛊惑人心的、折中主义的、矛盾百出的，这是一切修正主义的特点。赫鲁晓夫集团一方面吹捧美国，要与美国紧密合作，另一方面又骂美国是侵略者，是国际宪兵。时而把美国总统说成是“朋友”，是“明智的”、“热爱和平的”、“伟大的人物”，时而又说他是“刽子手”，“连幼儿园主任都不如”。一会把铁托和南斯拉夫经验捧上了天，一会又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特洛伊木马”，说铁托是“同全排步伐不一致”的人。同样，他又迫不得已地有气无力地谴责“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赫鲁晓夫集团就这样沿着修正主义道路滑下去，力图扰乱人们的思想，从机会主义走到冒险主义，又从冒险主义走到机会主义，准备从背后给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决定性打击。

修正主义的泛滥和渗透过程，也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内不断地进行着。

修正主义者的路线和活动，特别是苏联领导的路线和活动增

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混乱。

美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利用了这一形势，把修正主义的泛滥看作是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十分适宜的土壤。他们加紧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侵略活动，把西德变成了一个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扩大了军事基地，增强了他们的热核战争潜力。同时，他们推行以和平的反革命手段消灭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策略，鼓励修正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国家使政权自由化和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切行动和观点。

为揭露和粉碎现代修正主义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不安的心情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情注视着修正主义的泛滥和它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构成的巨大威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看作是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的发表，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提供了打击国际修正主义的一切反马克思主义活动和思想的有利时机。党在揭露南斯拉夫纲领是蒲鲁东、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披上新外衣的陈腐理论的大杂烩的同时，提出了下面的口号：

“为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揭露和粉碎现代修正主义而进行不妥协的斗争”。〔129〕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间接地谈到赫鲁晓夫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其他修正主义者的机会主义立场时指出：

“只有那些有意闭上眼睛的人才看不到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所起的为帝国主义者效劳的这一作用。”〔130〕

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严厉批判了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揭露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学说的歪曲，捍卫了工人阶级的党及

其领导作用，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在思想和政治领域打击国际修正主义的同时，还严密地注视着赫鲁晓夫及其集团的立场和活动。它看到，赫鲁晓夫及其集团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越来越远，同美帝国主义者和铁托修正主义者靠得越来越紧。对修正主义的认识过程不断加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对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的怀疑和保留越来越多。这大大有助于我们党不致陷入赫鲁晓夫为压垮它和把它拉到修正主义的道路上所设下的任何圈套。苏联修正主义领导指望，在给予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提供新贷款的协议签订以后、特别是在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五月访问阿尔巴尼亚以后，事情就会发生变化，这是枉费心机。

同苏联领导顽固要求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方针相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并加强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和整个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另一方面，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就赫鲁晓夫的某些反阿尔巴尼亚的活动向苏共中央提出了抗议。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就苏联总理和希腊反动政客维尼捷洛斯的谈话提出了抗议。赫鲁晓夫向维尼捷洛斯声称，在他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在科尔察看到了所谓希腊人，赫鲁晓夫还迎合了维尼捷洛斯的“北伊庇鲁斯自治”的沙文主义要求。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赞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领导人兰科维奇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诬蔑和谩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对此提出了另一次抗议。

所有这些都说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赫鲁晓夫集团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反对越来越强烈。

尽管如此，到一九六〇年上半年为止，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与苏联领导之间的思想分歧还没有公开化，也没有发展到两国的国家

关系中。

同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始终保持警惕，以粉碎美帝国主义者和铁托集团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敌对阴谋和活动。一九六〇年夏天破获和消灭了一个反对国家的秘密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是外国间谍机关打入党内、国家机关和军队内的老牌间谍。于是，组织一次反革命暴乱和美国第六舰队、希腊保皇法西斯分子、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联合武装干涉的阴谋被粉碎了。同时，苏联修正主义领导的计划也破产了；他们事先知道这一阴谋，支持这一阴谋，并妄图利用这一阴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 在有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 会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参加
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 的一九六〇年六月布加勒斯特会议
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企图突然
从背后给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决定性打击。

根据预先达成的协议，这次会议应具有会晤的性质，主要是为了共同讨论和决定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以希斯尼·卡博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突然发现，这是赫鲁晓夫组织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国际会议。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对出席会议的其他党的多数代表来说，这次会议也是很突然的。但是更突然和特别令人不安的是，会议前几小时，苏联代表团散发了一份攻击诬蔑中国共产党的文件。赫鲁晓夫力图要会议就这些诬蔑进行讨论，谴责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共产党开除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会议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局势。各党的代表不知道应当说些什么和采取什么立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驳斥了这些诬蔑性的指

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立即接到代表团的报告，认为形势是十分令人不安的，并得出了正确的结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赫鲁晓夫策划的一个大阴谋。接受苏联领导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性的指控，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希斯尼·卡博同志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坚决反对在会议上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所谓“错误”，反对对它进行谴责。希斯尼·卡博同志认为，布加勒斯特会议是无准备的，是违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所遵循的组织规则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指出，不能单凭一方提供的材料来判断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要对分歧作出判断，还必须听取中国同志的意见。这些分歧，应先在两党之间进行讨论。如果仍不能解决，可以提到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讨论。然后，这一会议的决议应提交按照组织规则召开的世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参加的国际会议进行讨论。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这一原则性的立场得到了许多代表团的支持。然而赫鲁晓夫却说这一立场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反叛”行为，并对它进行了粗暴的攻击。苏联领导虽然顽固地作了种种努力，但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他们仍然没有达到把中国共产党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除出去的目的。这次会议决定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责成一个专门委员会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个委员会由二十六个党的代表组成，其中也包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策划的国际阴谋破产了。他们在布加勒斯特遭到了第一次失败。这是从此开始走下坡路的整个现代修正主义的失败。

现在已经完全清楚，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是一个叛徒集团，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个巨大危险。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认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

团在布加勒斯特所采取的立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的立场。党中央把布加勒斯特会议的进行情况和赫鲁晓夫在会议上策划的阴谋告知了全党。党的基层组织一致认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在会议上的立场和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决抵抗苏联领导的攻击 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苏联领导立即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发动了疯狂的攻击，企图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屈服，迫使它支持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分裂主义活动。

攻击是从多方面进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首当其冲。苏联领导妄图分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迫使它屈膝投降，并一定要它谴责它在布加勒斯特的立场，对“肇事者”采取措施。苏联领导需要这样的谴责，不仅为了改变阿尔巴尼亚的现状，而且也是为了在即将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上达到他们在布加勒斯特所没有达到的目的。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赫鲁晓夫集团利用了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腐朽的名位思想和野心勃勃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利丽·贝利绍娃。她在莫斯科经过赫鲁晓夫集团做工作和在它的唆使下，跳出来反对党的路线，成了苏联领导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传声筒。但是，她的企图在中央委员会的钢铁般的团结一致及其在原则立场上毫不让步的坚定性面前、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方针面前碰壁了。这样，赫鲁晓夫集团改变和动摇中央委员会的立场的企图被粉碎了。

苏联领导利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的无限爱戴，力图制造混乱，挑动他们起来反对自己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苏联领导利用它在阿尔巴尼亚享有广泛的活动自由的驻地拉那大使馆人员，与军官、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经济和文化部门

的工作人员进行接触。赫鲁晓夫的代理人向他们表示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背叛苏阿友谊”而感到“不安”。然后，这些代理人向他们提出挑衅性的问题：“你们站在苏联一边，还是象你们的领导现在那样反对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尤其把希望寄托在在苏联学校学习过的干部身上。但他们的所有这些勾当和希望都破产了。党以革命的敏锐性培养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善于把苏联、苏联共产党同苏联领导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阿尔巴尼亚的活动相区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党内找不到、也制造不了任何一个缺口。他们的阴谋正是在围绕着中央委员会的这一钢铁般的团结面前被粉碎了。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监察委员会主席科乔·塔什科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动摇，由于机会主义的倾向和立场而经常受到批评，他继利丽·贝利绍娃之后屈服了。这两个人都作为党的敌人被开除出党。

苏联领导还把他们的攻击扩大到经济和文化领域。苏联领导无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签订的协议，拖延有时甚至完全停止向阿尔巴尼亚供应工业品和工业设备。在一九六〇年特大旱灾造成缺粮的情况下，他们拒绝提供一定数量粮食的要求。赫鲁晓夫集团利用这一时机作为迫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屈膝投降的高压手段，以为饥饿将迫使阿尔巴尼亚人民起来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赫鲁晓夫集团以断绝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提供任何军需品和军事装备来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威胁，并宣称“你们留在华沙条约组织里是暂时的”。

一九六〇年八月，苏联领导致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要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苏联共产党在观点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出席将于十一月举行的会议”！换句话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应当放弃它在布加勒斯特所采取的原则立场和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路线。赫鲁晓夫集团威胁说，否则在布加勒斯特产生的“误解火星”“将要变成大火”！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这种“一致”，因为这样的“一致”只能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因而也是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罪恶勾结。所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拒绝了苏联修正主义领导的阴险要求。

同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在二十六个党为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起草宣言的委员会中，与修正主义者妄图起草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文件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批判 恩维尔·霍查同志率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出席了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代表团坚决彻底执行了中央委员会关于在会议上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示。代表团唾弃了赫鲁晓夫及其同伙所运用的这种商人伎俩，即妄图以提供更多经济援助的诺言和承认“苏联官员可能犯有”某种错误来打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反抗。代表团也没有在赫鲁晓夫的新的威胁面前屈服，赫鲁晓夫宣称“苏联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关系今后将建立在新的基础上”！

恩维尔·霍查同志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就引起分歧的主要问题阐明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原则性观点。他特别阐述了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

恩维尔·霍查同志直接批判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和

其他修正主义者，他们散布这样的幻想：由于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有可能与美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和进行合作，以建立“没有武器、没有军队和没有战争的世界”。恩维尔·霍查同志说：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皮毛没有改变，本性也没有改变。它是侵略成性的，即使剩下最后一颗牙齿，也将是侵略成性的……它可能把世界推入战争。所以我们……继续坚持要向人民说清楚，只有社会主义在全世界或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取得胜利以后，才能绝对保证没有世界大战。”〔131〕

“谁看不到这点，他就是瞎子，谁看到了但是加以掩盖，他就是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叛徒。”〔132〕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认为捍卫和巩固和平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并深信，依靠和帝国主义头子空谈，向美帝国主义者讨好、献媚和让步，在他们的压力面前屈膝投降，是不能实现这一任务的。只有通过坚决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通过不断提高群众的警惕性和革命热情，通过无情地谴责一切机会主义的立场、一切旨在麻痹人民的观点和行为、一切道德败坏行为和贪图安逸的倾向，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要使帝国主义者不能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就必须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军事、道义、政治力量，国际工人阶级的力量，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爱好自由与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者。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在必须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力量和战备状态保持很高的水平时，赫鲁晓夫集团坚持对社会主义国家保守原子弹的秘密，不以原子武器武装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是完全错误的，并谴责了他们这种行为。

恩维尔·霍查同志问道：

“为什么中国不应该有原子弹？我们认为它应该有……我们掌握原子弹是为了防御。我国人民有句俗话说：有备无患。帝国主义者应当怕我们，应当非常怕我们。”〔133〕

接着，恩维尔·霍查同志批判了修正主义者对国家之间和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和平共处问题的机会主义解释和做法。他指出，苏联领导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总路线的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恩维尔·霍查同志阐明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这一观点：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政策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这一政策的另外两个更重要的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般的合作和互相援助，毫无保留地声援和支持劳动群众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革命解放斗争。

赫鲁晓夫集团推行不顾一切条件的与帝国主义共处、和解和合作的政策，事实上放弃了阶级斗争。实际上，修正主义者把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共处也扩大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关系中，扩大到了附属国和殖民地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中。

恩维尔·霍查同志指出：

“两种对立的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不是象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应该放弃阶级斗争。恰恰相反，阶级斗争必须继续下去；对帝国主义、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政治思想斗争，必须日益加强。在坚持不懈地争取建立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对帝国主义不作丝毫的原则让步的同时，必须进一步开展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以及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134〕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动员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国内一

切走狗，使他们无法生存，粉碎他们的战争基础和经济基础，推翻他们的统治，摧毁其压迫人民的政权，建立新的政权——人民政权。这一政权应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予以巩固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过渡到社会主义。

应当通过什么道路建立人民政权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本来就是很清楚的。但是，正如恩维尔·霍查同志所指出的，赫鲁晓夫按照机会主义者的口味歪曲了这个问题，把它搞糊涂了。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没有一个党，不经过流血和暴力就取得了政权……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党认为，必须对两种途径都有所准备，特别是要对以暴力夺取政权有所准备，因为只有从这方面作好了准备，第一种可能性（和平途径。——编者）取得成功的机会就会更多些。”〔135〕

关于斯大林问题，恩维尔·霍查同志批判了赫鲁晓夫集团，指出他们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不是正确地、客观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地提出这个问题的，他们对斯大林及其事业的谴责是不正确的。这个问题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关系，而不是仅仅属于苏联的问题。所以，事先不与其他兄弟党协商就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谴责斯大林，这是一个专横的决定和严重错误。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没有赞同、也永远不会赞同用已经使用的那种方式方法谴责斯大林同志。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如现在所做的那样，要从这个时代里把斯大林的名字和伟大事业一笔勾销，是不正确的、不正常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大家都应捍卫斯大林的美好的和不朽的事业。谁不捍卫它，谁就是

机会主义者和胆小鬼。”〔136〕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就必须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到底，对它进行彻底的揭露。恩维尔·霍查同志指出：

“从莫斯科会议以来的三年已完全证明，现代修正主义者只不过是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者、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死敌。”〔137〕

恩维尔·霍查同志批评苏联领导没有遵守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因为他们没有象宣言规定的那样谴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而是相反，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和解，为它恢复了名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阐明了自己始终如一的观点，认为斯大林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评价没有错误，而是完全正确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是帝国主义十分危险的代理人，因此，必须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能最好地为这种评价作证，因为它比任何其他党都更多地亲身体验过和美帝国主义者的活动相呼应的铁托分子的敌对活动。

但是，恩维尔·霍查同志指出，修正主义不仅在南斯拉夫有。它还在其他党内令人不安地泛滥着。因此，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关于现代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提法是正确的，并且在这一危险彻底消除以前，应依然有效。所以赫鲁晓夫集团要求把现代修正主义说成是已经被揭露和被粉碎，这是完全错误的，其目的是为了掩盖比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危险得多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恩维尔·霍查同志以事实说明，匈牙利反革命事件是在苏联领导了解和直接支持下由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策划的；指出波兰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少共产党、工人党内发生的动荡是修正主义泛滥的结果；接着，对会议参加者说：

“请问：为什么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在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和我们阵营内会发生这些事件？难道发生这些事件是因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是宗派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和悲观主义的吗？

我们应为这样的事情感到非常不安，应找出病源，把它治好。当然，拍拍叛徒铁托的肩膀，照苏联同志的主张在声明里写上现代修正主义已被彻底粉碎，是无法治好这个病症的。”〔138〕

特别是赫鲁晓夫集团在布加勒斯特策划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阴谋和他们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后开展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敌对活动，引起了巨大不安。这样的行动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的直接威胁。关于这个问题，恩维尔·霍查同志对苏联领导进行了原则性的严厉批评。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全党一致认为，苏联同志在布加勒斯特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指责是不正确的……绝不当忘记布加勒斯特会议，而应把它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污点予以严厉谴责。”〔139〕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指出，苏联领导后来完全有意识地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在布加勒斯特所犯的严重错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汇报了赫鲁晓夫集团为了迫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执行他们的错误方针和支持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的帝国主义式的恶毒攻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象投机商一样进行活动，在莫斯科继续对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施加压力。第一次会晤时，他们就要求代表团从两者择一：“阿尔巴尼亚应当决定，要么跟两亿（指苏联。——编者）走，要么跟六亿五千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编者）走”！！阿尔巴尼亚“要么接受和平共处，要么让美国扔一颗原子弹就足以把阿尔巴尼亚及其居民

完全消灭掉”!! 没有一个帝国主义的代表要阿尔巴尼亚人民作过这样的选择,对阿尔巴尼亚人民进行过这样的威胁。当进行威胁也捞不到什么东西时,赫鲁晓夫就对中国代表团说:“我们失掉了一个阿尔巴尼亚,你们赢得了一个阿尔巴尼亚”!! 后来,苏联领导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前夕散发给所有代表团的诬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长篇材料中,也责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和“反苏主义”。

恩维尔·霍查同志把赫鲁晓夫集团的这种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行径告知了会议,并质问赫鲁晓夫集团:

“进行这些骇人听闻的指责,对我们党、我国人民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这种‘商人’态度,这是干什么!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难道能象玩牌一样地输掉和赢得吗? ……你们把阿尔巴尼亚当作商品……有过这样的时代,阿尔巴尼亚被当作商品,有的人认为阿尔巴尼亚存在与否取决于他们,但是,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我国的胜利,这种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

赫鲁晓夫同志,你举起手来反对我们小国人民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但我们相信,为我国人民的自由流过鲜血的苏联人民、列宁的伟大的党,是不会赞同你的这种行为的。”(140)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说明,它对苏联领导进行这一原则性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出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的目的。如果不把错误和恶劣的现象揭露出来,加以严厉的谴责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加以纠正,就不可能维护团结。恩维尔·霍查同志在反驳那些妄图封住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嘴和迫使它屈从他们的错误方针的人时说:

“谁也不要以为,由于阿尔巴尼亚是个小国,阿尔巴

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就应照某人说的话办事，即使它深信这个人是错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了我们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不管什么人，无论是施加政治压力或经济压力，无论是进行威胁或给我们扣帽子，都不可能剥夺我们的这一权利。”〔141〕

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更明显地看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两条对立的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

这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已不可避免。在会议上，苏联领导企图逃避这场在起草委员会就已经开始的斗争。在赫鲁晓夫和其他一些代表团团长的讲话中，闭口不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任何矛盾和分歧，好象根本不存在一样。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妄图以此来掩盖两条对立路线的存在，阻止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苏联在会议前夕散发的材料中的攻击给予理所当然的回答。他们企图以这种办法逃避对赫鲁晓夫集团的修正主义观点和分裂主义破坏活动的批判，而把引起分歧的罪责推到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身上。但他们的这种策略彻底失败了。在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作了批判性发言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更加尖锐了。所有党的代表都不得不就所讨论的问题，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态度。这时，修正主义者妄图转移与会者对原则问题的视线，把会议变为对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卑鄙的攻击的讲坛。但是这一企图也失败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代表团支持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捍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路线。修正主义者不得不退却。

世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过的声明，基本上体现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把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企图失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取得了又一个胜利。

一九五七年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指出，我们时代的内容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一提法在新的声明中得到了补充：

“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142〕

这样，就使修正主义者无法利用对我们时代内容的不完整的提法来进行投机了，就使他们无法把我们的时代说成是没有革命、没有解放战争的和平共处和经济竞赛的时代了。

苏联领导提出的声明草案中所包含的、他们在实践中贯彻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论点也被否定了。这些论点是：“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日益增长”；“当代有可能制止一切战争”等。

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愿望相反，会议的声明明确规定：——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帝国主义仍然是侵略战争的基础；——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为了防止世界战争，必须动员各国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给美帝国主义以主要的打击，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民族解放斗争是制止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这些斗争应当得到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支持；——所有马克思列

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它们通过协商的途径取得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行动，等等。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妄图撇开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提法，他们为此所作的许多努力失败了。在新的声明中保留了这个提法。此外，

“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所谓‘援助’……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143〕

虽然如此，声明中也有一些不正确的评价，如保留了一九五七年宣言中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还有其他一些错误论点。对于这些错误的评价和论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抱有完全相反的观点，并在会议上作了公开的阐明。鉴于声明的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签署了这一声明。只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代表团才对一些不正确的评价作了让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在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活动得到了中央全会的一致和完全的赞同。全会认为，代表团的立场是“坚定的和有原则的”，代表团的讲话和全部工作是“十分积极和有益的”。

中央委员会在向全党汇报代表团的立场和活动时，还阐明了在会议上对苏联领导进行原则性的和同志式的严厉批评的原因和

目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希望通过这种批评，结束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的分裂活动，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党还希望结束苏联领导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政的干涉，消除分歧，从而加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与苏联共产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兄弟关系，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如果不这样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就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的、国际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党教育自己的党员，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斗争中要永远是正直的、有原则性的和勇敢的，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克服缺点、引导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强大武器。

在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活动所造成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和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的勇敢的、原则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说明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高度的革命成熟性。这种立场是全体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所开展的激烈斗争中的伟大榜样。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力量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同情和支持进一步增加了。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赞同自己的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议上的立场，并以这种立场为榜样；同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坚定的原则性的革命斗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次会议上战胜修正主义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共同的斗争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原则问题的一致的革命观点加强了两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

第 六 章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帝国主义 和修正主义封锁的条件下为完全 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

(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五年)

一、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完全 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方针

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于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三日至二十日在地拉那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七百五十四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五十四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五万零八百零二个党员和二千八百五十七个预备党员。

代表大会对社会经济改造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制定了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方针，通过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指示，并加强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中的革命立场。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 由于主要生产资料 and 主要流通手段——工业、矿山、运输业、银行、商业变成了社会公共财产，以及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基本完成，基本上消除了多种成分的经济，并代之以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一九六〇年，社会主义成分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九，占农业总

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占批发商业的百分之百，占零售商业的百分之九十。国民收入的近百分之九十来自社会主义成分。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根据社会经济的这些根本变化得出的结论是：**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胜利，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和人剥削人的现象被消灭了。

“我国现阶段阶级结构的最突出和最基本的特点是工人阶级和合作社农民这两个友好阶级的存在，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这两个阶级的联盟，以及全体劳动人民在这个基础上的道义、政治上的一致的加强。”〔144〕

这时，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摆脱一切剥削的劳动人民之间的兄弟般合作和同志式帮助的关系。

一九六〇年，工人及其家属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劳动农民占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人民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三点六。

主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和公有制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形成，扩大和加强了政权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与党的团结。

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改造，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党的全面的教育工作，使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及其对待劳动和公共财产的自觉性和态度、对待社会和家庭的態度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成了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成了进一步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他们的物质生活的强大力量。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为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和国防力量的加强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为完全建成社会主义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阿尔巴尼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国家在这个阶段的发展方针。

这一阶段的基本任务是把生产力发展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随着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过去五年计划期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代表大会指示，要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完全建成这种基础，使阿尔巴尼亚从农业工业国变成工业农业国。

继续进行国家工业化被确定为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主要环节。代表大会指示，社会主义工业今后仍应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在这方面，预计在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业部门将得到广泛发展；此外，将建立新的工业部门：铜矿、镍铁矿、铬矿加工工业，黑色冶金工业，生产氮肥和磷肥的化学工业等。代表大会指示，发展工业应主要利用本国原料。代表大会指示，要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即生产资料的生产。

代表大会指示，在发展工业的同时，要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农业，以便消除国民经济中这两个主要部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提高粮食产量，保证粮食自给，仍是农业的主要任务。同时，代表大会还要求增加其他农产品的生产，以便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要求，更好地满足工业对原料的需要，以及增加农产品的出口。在不停止开荒的同时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被确定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

代表大会指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到高度的水平，应进一步发展和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代表大会提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公有制——社会主义关系

的基础——的任务。完成这一任务的途径是：尽可能增加内部积累，保护社会主义财产不被破坏和浪费，实现山区个体农户的合作化，小社合并成较大的合作社，以及在经济上和组织上巩固农业合作社。

代表大会指示，要改进定额劳动制度，加强各生产部门、企业、劳动单位之间的合作和互助，改进计划制度，有组织地推广先进经验。

在分配方面指示要改进下列工作：执行按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的原则，确定国民收入的分配比例（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以及个体消费基金和社会消费基金的分配比例，并加以贯彻执行。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工人阶级将成长和壮大起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的联盟将进一步巩固，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将不断提高。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对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恩维尔·霍查同志强调指出：

“社会主义是群众的事业，而群众积极地参加这一事业直接取决于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程度。”（145）

代表大会指示，党在共产主义教育方面所进行的斗争，首先是要使大家树立对劳动和公共财产的彻底的社会主义态度，消除人们思想意识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观念和习气，消除宗教偏见、迷信和落后习俗，使劳动人民确立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另一个基本任务依然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捍卫社会主义建设中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新的胜利，反对破坏或毁灭这些胜利果实、复辟地主资产阶级制度的任何企图。

这一切说明，阶级斗争并没有随着国内剥削阶级被消灭而熄灭。在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中，阶级斗争仍将激烈地进

行。无论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剥削阶级残余，都没有放弃重新获得自己的地位和特权的梦想。然而，国内的阶级斗争主要集中在思想战线上。这一斗争被正确地认为是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反对过去的余毒，反对不能立即从人们思想中消失的反动的习惯、传统和观念，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代表大会强调指出，削弱或者停止阶级斗争，特别是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就会为内部的反革命事件和来自外部的武装干涉，从而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条件。

必须把国内的阶级斗争看成是同国际上以社会主义、被压迫人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一方，以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为另一方的阶级斗争紧密相联的。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不断地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施加压力，并没有放弃颠覆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活动。

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被认为是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剥削阶级的消灭和劳动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人民政权的社会主义基础大大加强和扩大了，人民政权进一步民主化了。

根据新的条件，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职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经济、组织、文化和教育的职能占了主要地位。为了更好地履行这一职能，提出了下述任务：改进人民政权机构对经济和文化事业的领导方法，改进它们的计划工作和组织工作。

国家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方面的职能，仍然和过去一样重要。为此目的提出的任务是，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加强人民军和一切武装力量，对全国人民进行有系统的战斗训练。

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镇压的职能仍继续存在。用行政手段实行的镇压，是用来对付剥削阶级的残余和一切阶级敌人，对付帝

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代理人，对付严重危害公共财产和共产主义道德、违犯国家法律的那些人的。

如同过去一样，在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依然是整个国家生活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为此，提出了另一个基本任务，即进一步和不断地提高党的领导、组织和教育的能力，加强党的团结、思想锻炼并改善党的社会成分。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工人、合作社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人数的增加，就使修改党章中有关入党条件的条文成为必要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取消了对不同社会成分的人的不同要求，并作出了适用于所有申请入党的人的统一规定。取消不同要求，绝不意味着党不重视入党的人的社会成分。它将一如既往地十分注意指导和领导接收党员工作，吸收最革命、最积极、最联系群众、最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战士来壮大自己的队伍。今后，被吸收入党的绝大多数人，仍将是城乡的生产者，首先是工矿、运输业的工人，其次是农业合作社社员。

第三个五年 代表大会根据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方针，
计划的指示 制定了关于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五年发展经济和文化的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这些指示提出的主要任务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将标志着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阿尔巴尼亚将在从农业工业国变为工业农业国的道路上更迅速地前进；农业生产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因而，劳动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将进一步提高。**

工业总产值预计增长百分之五十二，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八点七。生产资料的生产将增长百分之五十四左右，而日用品生产的增长将不少于百分之五十。特别是配件、水泥、铜锭、镍铁矿石、电力、玻璃制品、针织品和毛料、皮鞋、某些木制品、食品等，将

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农业预计增长百分之七十二，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五点五。特别是粮食、烟草、棉花、橄榄、蔬菜、土豆和水果生产，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为了完成计划任务，投资总额将比第二个五年计划增加百分之五十一。其中近百分之八十二用于生产部门。

国民收入将增长百分之五十六。职工的实际工资将提高百分之三十，农民的收入将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用于社会保险、养老金、文化教育、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支出将有更显著的增加，将对所有人，也包括农民在内，实行公费医疗。

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定在人民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组织工作方面实现一个转折,使学校和科学研究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同生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培养的干部人数将超过一九六〇年干部人数的一倍。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主要依靠利用内部的资源、资金和力量，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充分利用生产能力，挖掘和利用一切潜力，减少浪费和避免不必要的开支等。同时，它还依靠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根据已签订的或正在签订中的协定提供的援助。

不反对修正主义，就不能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就不能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修正主义已成为对无产阶级已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大的和直接的危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其他派别同托托修正主义勾结在一起了。与依赖居统

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恩赐过活的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的老牌修正主义不同，现代修正主义是当权的修正主义，它掌握着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最糟糕的是，这个修正主义窃据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最大悲剧。共同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以及许多共同的利害关系使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革命的斗争中同帝国主义者、同社会民主党人、同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靠拢在一起，并越来越紧密地勾结起来。世界帝国主义把现代修正主义者，特别是把赫鲁晓夫分子看作是最可靠的同盟者，是摆脱深刻的总危机和避免威胁着它的彻底失败的最好的工具。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后第二天就把这次会议的声明扔进了字纸篓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一切领域里推行其修正主义方针，用施加压力和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内政的粗暴的方式方法进行分裂活动，企图把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它们，并组成集团反对那些与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警惕地捍卫和始终不渝地执行自己的革命总路线，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捍卫和宣传遭到修正主义者攻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着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提出和讨论过的有关世界发展的重大问题而进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通过它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团明确地阐明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革命立场。第四次代表大会肯定了这个立场。代表大会宣布

“完全赞同由恩维尔·霍查同志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莫斯科会议上的活动以及

这次会议的历史性文件……我们党将象执行一九五七年宣言一样地忠实地执行一九六〇年声明，并将为贯彻这一声明而斗争。”〔146〕

代表大会严厉谴责了关于利益对立的阶级之间进行合作和共处的修正主义观点，谴责了所有这些人的企图，他们竭力把现在的时代说成是普遍安宁和谐的时代，全世界将不用经过革命、起义和解放战争就能过渡到社会主义。代表大会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者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企图，并强调指出，这些学说过去和现在都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遍规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指出修正主义者力图消灭无产阶级专政的危险性时，强调：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看来，非常清楚的是，不要说取消社会主义的国家，即使稍微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使它自由化……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说来就是自杀。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沉痛教训也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147〕

在修正主义者丧心病狂地进行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和分裂活动的情况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极其重大的任务。

“……我们党和政府更高地举起了团结的旗帜，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准备克服一切困难，彻底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148〕

“我们党将永远在莫斯科声明的原则基础上，为进一步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为发展同所有兄弟党的国际主义团结和联系而斗争。”〔149〕

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

义阵营的团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粉碎其分裂活动和破坏活动。代表大会谴责了某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他们违背莫斯科会议的共同决定,力图放弃关于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的提法,拒绝揭露作为现代修正主义的集中表现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不无情地揭露修正主义……就不能很好地揭露帝国主义。”〔150〕

由于这些原因,代表大会指示:

“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应该继续进行下去,并应把这一斗争提到更高的水平,一直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把它彻底粉碎为止。党在坚决反对修正主义这个主要危险的同时,也应当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切表现。”〔151〕

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修正主义采取了严正的原则立场,揭露了修正主义观点,尽管如此,它没有公开批评苏联领导的这些观点和他们在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分裂活动,没有公开批评他们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干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行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在兄弟党的讲坛——莫斯科会议上,以及在中央委员会和自己的组织的内部会议上这样做的。它不愿把同苏联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的领导的分歧公布于众。它严格坚持后一次莫斯科会议规定的通过协商途径解决兄弟党之间分歧的准则。

第四次代表大会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揭露,遭到了出席代表大会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的代表的直接反对。这些代表知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在后一次莫斯科会议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和对现代修正主义所进行的坚决斗争,因而带着特殊使命来出席阿尔巴尼

亚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那就是向大会代表施加压力，使他们反对自己党的战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并同自己党的领导相对立。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苏联代表和其他一些代表在自己的致词中提出了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相反的论点。他们还竭力采用讹诈和恶意煽动的手段硬要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修改自己致词的内容，不要支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路线。

大会代表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这些干涉感到极大愤慨。他们对这些干涉的回答是：下定决心更有力地继续斗争，以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贯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革命政治路线和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进一步加强党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周围的团结。

代表大会最后一致选出了由五十三名委员和二十九名候补委员组成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恩维尔·霍查再次当选为第一书记。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作为一个开辟了国家发展的新阶段，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的代表大会，作为一个使党准备对现代修正主义发动一场思想上的总攻势的代表大会载入了史册。

代表大会表现了党的队伍磐石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及其捍卫和加强这一团结、使它不受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任何阴谋活动的破坏的决心。这强有力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发言具有健康的内容和高度的战斗精神，报告、决议和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是一致通过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一致选出的。

同时，第四次代表大会充分表现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表现了它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

运动，同为争取社会主义、民族独立、自由及和平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

二、党为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任务 而斗争。粉碎修正主义者对阿尔 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敌对企图

工人阶级、合作社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立即表示拥护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全力动员起来贯彻这些决议。代表大会的工作和决议的深刻的革命精神，大大地激发了广大劳动群众为克服困难和障碍、为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任务而斗争的热情。

党一贯把制定和执行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计划看作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然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激烈斗争的情况下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具有比过去的五年计划更大的政治意义。

劳动群众只有深刻地认识了经济问题的政治意义，才能为完成计划而贡献自己的全部才能、创造性思想和劳动。

厉行节约 为了胜利地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任务，党集中注意充分利用一切物力和财力，在国民经济和国家、社会的一切活动中建立严格的节约制度。

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的节约制度，来源于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所有制在城乡的建立，使实行节约制度的范围有了扩大的可能，使取之不竭的内部潜力得以挖掘，变成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补充资源。另一方面，尽量合理地利用内部潜力，直接有助于克服由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对我国的封锁而产生的困难。

此外，党预见到以后赫鲁晓夫集团及其追随者会加紧他们反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破坏活动。这就使更广泛、更节约地利用内部资源、力量和资金显得更有必要了。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把这个如此重要的问题提到劳动群众面前，以便听取他们的创造性意见，并使这个问题成为全国人民的问题。各个企业的职工都参加了一九六一年六月组织的广泛的群众性讨论。他们提出了增产不增费用的十分宝贵的具体建议。石油工业部门的党组织倡议，每年三个月不使用进口配件和进口材料而靠内部潜力来进行工作。他们的倡议还得到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其他党组织和职工的拥护。由于这一切，一九六一年从降低成本、削减不必要的和过早的投资及采取其他措施中节约十七亿里克。这一数目占国家预算的百分之六以上。

关于节约的群众性讨论，说明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政治成熟性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提到了更高的水平，说明阿尔巴尼亚人民有适应政治形势要求的准备。它还说明国家企业和机关必须更加重视制定经济计划的工作，以便更好地挖掘和利用发展国民经济的潜力。

党中央分析了这次群众性讨论的结果，并进行了总结。在这个基础上确定了进一步厉行节约的主要方向。受到最大重视的是，在不影响质量的前提下，通过最合理地使用生产材料，用较廉价的材料代替昂贵的原材料，用国产材料代替进口材料来节约生产材料。实现节约的重要途径是：保证不使生产过程停顿，最充分地使用机械设备，合理利用劳动时间，减少非生产性开支，增加出口的收入。

在投资方面也有广泛的节约可能和很多的潜力。为此，有关国家机关必须进行充分研究，以便在不忽视将要兴建的新项目的政治意义的前提下，正确地确定其经济效益。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面对苏联修正主义领导的疯狂攻击 党和劳动群众刚刚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正是苏联领导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发动全面攻击的时候。

苏联领导单方面撕毁了两国间正式签订的一切协定。他们完全中断了根据协定必须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提供的贷款，断绝了一切贸易、科技和文化关系。他们示威性地和威胁性地从阿尔巴尼亚撤走了全部苏联专家。

苏联政府在采取这些反马克思主义、反阿尔巴尼亚的行動的同时，于一九六一年四月写信给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封信中说，阿尔巴尼亚“往后不能指望苏联会在以前的基础上向它提供那种只有真正的朋友和兄弟才有权获得的援助了”（！）；“苏联认为今后有必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它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换句话说，苏联修正主义领导公开宣布了他们在实践中执行的东西，即他们已放弃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兄弟般的援助关系。紧接着，在五月份，他们完全中断了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军运送它所需要的装备和其他技术设施，蛮横地撕毁了现行双边协定，这些协定规定了他们根据华沙条约所承担的义务。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撤走了发罗拉海军基地的舰艇，抢走了阿尔巴尼亚八艘潜水艇和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口进行修理的阿尔巴尼亚军舰。这些行动削弱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防御力量，大大助长了美帝国主义者、希腊保皇法西斯分子和阴谋成性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野心。

尽管如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并没有公开谴责赫鲁晓夫集团的这些敌对行动。相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于一九六一年七月还写信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

“必须放弃把我们两党之间存在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做法。

我们党和我国政府从来没有拒绝就任何问题进行双边会谈。但是我们过去强调过，现在仍然强调，要进行这样的会谈，应该创造必要的条件，即双方平等的条件。”〔152〕

然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既没有理睬这一要求，也没有停止他们对阿尔巴尼亚党和人民的敌对攻击。他们撕毁了《关于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苏联学校学习的协定》，停止了全部阿尔巴尼亚正规留学生和军事学员的助学金，并把他们赶出了苏联。从那时起，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无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主权，已在事实上把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开除出华沙条约组织。所以，他们还剥夺了由中央委员会书记拉米兹·阿利雅同志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全权代表团出席一九六一年八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权利。

这样，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组织了对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的野蛮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封锁；在组织这一封锁的同时，他们还进行了反对阿尔巴尼亚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全面敌对活动。苏联领导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阿尔巴尼亚制造一种不安全的局势，迫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屈膝，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屈从赫鲁晓夫的旨意和接受修正主义方针。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这一目的，在一九六一年十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更加昭然若揭。赫鲁晓夫及其集团粗暴地践踏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粗暴地践踏了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中最起码的准则，以最卑鄙的诽谤和指责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赫鲁晓夫在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竟然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说成是“为三十枚银币而出卖了自己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甚至号召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进行反革命活动。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妄图煽动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所有的代表一致起来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然而，他们没有达到这一目的。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和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许多大会代表对苏联修正主义领导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没有表示支持。当时，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公开谴责了这种阴谋手法。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致词中指出，片面的指责和把兄弟党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的态度。在代表大会上表示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外国代表团多数根本不知道苏阿关系的发展情况，而只是盲目地服从苏联领导的命令。赫鲁晓夫集团公开地、单方面地暴露分歧，并发动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就给敌人提供了武器，这样，他们就承担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历史责任。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能
同苏联修正主义 沉默。它不仅完全有权利，而且有责任公开
领导的公开斗争 阐明自己的观点，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公
众舆论都知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之间的关系的真相以及苏修领导反阿尔巴尼亚的敌对活动。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回答赫鲁晓夫集团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诽谤和攻击时指出，这一切

“只有利于共产主义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敌人，有利于各国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赫鲁

晓夫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实际上就是发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公开的攻击。赫鲁晓夫应对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153〕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通过恩维尔·霍查同志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七日在庆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二十周年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四周年的时候所发表的讲话，对阿苏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并指出阿苏关系恶化是由于赫鲁晓夫及其修正主义集团执行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这个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政府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一贯执行的传统政策。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建立以来的二十年中不断地为加强阿尔巴尼亚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的友谊，为建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最密切的联系而斗争。它以对列宁、斯大林的伟大的党和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忠诚和无限热爱来教育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曾经是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鼓舞力量和学习源泉。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曾得到苏联慷慨的、全面的援助。直至一九六〇年夏天，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与苏联党和国家之间的合作还是正常的。

恩维尔·霍查同志在表达阿尔巴尼亚党和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愿望和决心时强调说，今后，阿尔巴尼亚仍将完全保持同兄弟的苏联各族人民的纯洁的友情。但是，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决不同赫鲁晓夫集团的修正主义方针调和，不会放弃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信念，不会屈从赫鲁晓夫的命令。

时间清楚地说明，赫鲁晓夫集团一贯把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作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作为在国内和国际上达到自己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的手段。对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再次

阐明了它的众所周知的观点，即斯大林过去和将来都不仅是苏联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最杰出的领袖和人物之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之一。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不仅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敌人，而首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本身的敌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相信，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终将认识到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方针给苏联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所带来的危害。

恩维尔·霍查同志指出，衡量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学说的忠诚及对苏联的爱戴的标准，不是对待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或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的态度。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只对自己的党员具有约束力。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平等的和独立的。这些党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制定自己的政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力图把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机会主义观点说成是对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准则，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毫无共同之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平等和独立原则的直接践踏。

同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再次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联共产党新的中央委员会呼吁：以列宁主义的客观态度和公正态度来分析苏阿关系中由于赫鲁晓夫集团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所造成的严重局面。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由于赫鲁晓夫及其集团的粗暴的反马克思主义行动而在目前阿苏关系中所造成的不愉快的和十分严重的局势深感不安，呼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冷静地分析已造成的局面，采取必要措施，使局

势正常化……”(154)

“为了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了我们两国的利益，我们党一直准备解决存在的分歧。但是我们党过去和现在始终认为，这些问题只有在平等而不是在压力和强制的条件下，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途径，才能求得正确的解决。我们期望并相信苏联共产党能采取公正态度。”(155)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史无前例的另一个敌对行动——断绝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来回答这一真诚的同志式的要求。他们采取这一行动的借口是无中生有的所谓“阿尔巴尼亚政府在自己国家里掀起了敌视苏联的诽谤运动”，“它正在蓄意执行旨在阻挠苏联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和商务代表处进行正常活动的措施”，等等。然而，真正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迫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放弃它对他们的修正主义方针进行原则性斗争的企图遭到了失败，是苏联领导人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一方针强加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共产党、工人党的企图遭到了失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开始公开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无论是对阿尔巴尼亚人民，还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完全负责的。它在开始这一斗争的时候，就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因为它捍卫的是正义的事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业，是社会主义的事业，因为与它一起战斗的有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所有的革命力量。同时，为了消除任何可能产生的轻易和迅速取胜的幻想，中央委员会提醒说：

“强加给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和艰巨的。但是，困难从来没有吓倒过我们党和我国人民。”(156)

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以为，在
的斗争中，人民在党周围的 断绝外交关系、进行经济封锁，就会
钢铁般的团结 使阿尔巴尼亚完全孤立，最后就会
使它屈服，因为它是一个小国，而
这样的小国是经受不住压力的。苏联修正主义者认为，阿尔巴尼亚只有两条路：要么接受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并屈从他们的命令；要么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他们完全打错了算盘，他们指望阿尔巴尼亚人民出于对苏联的热爱而起来反对自己党和国家的革命领导。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还企图通过断绝与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来教训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告诉这些国家，如果不服从他们的命令，他们就会采取同样的措施。

赫鲁晓夫集团在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敌对活动，给阿尔巴尼亚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根据与苏联政府正式签订的协定应该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提供的贷款，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投资中占不小的比重。完全中断这些贷款，就使这一计划中的许多重要项目的建设成了问题。在连续十二年的时间内，同苏联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流通量的百分之五十。苏联政府完全断绝贸易关系，就在阿尔巴尼亚商品的出口和发展国民经济十分需要的机器和其他工业品的进口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此外，由于断绝了军事援助，阿尔巴尼亚政府不得不额外加重国家经济的负担，以加强祖国的国防，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地方的边界。

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以为把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拉入帝国主义阵营的时机已到。为此目的，帝国主义国家立即表示愿向它提供贷款，并表示准备满足阿尔巴尼亚提出的各种要求。

但不论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还是帝国主义者，都完全打错了算盘，他们的希望完全落空了。恩维尔·霍查同志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七日的讲话中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人民的心情和他们不怕艰难险阻、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勇往直前的决心。

“……如果需要的话，阿尔巴尼亚人民及其劳动党将以野草为生，而决不为三十枚银币出卖自己，他们宁愿光荣站着死，决不忍辱跪着生。”〔157〕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和广大劳动群众，以加紧努力完成计划任务、进一步加强在党和中央委员会周围的团结回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为推翻党和国家领导发出的叫嚣，回答他们的攻击、压力与讹诈。人民同党的钢铁般的团结，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一九六一年，广大劳动群众的创造性和更好地利用国民经济内部潜力的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尽管苏联专家撤走了，断绝贷款又造成了其他困难，但是，由于技术干部和劳动人民下定决心并动员起来，基本上保证了正在建设中的项目的继续施工，其中一部分按计划投入了生产。

党的英明领导和人民的忘我劳动，确保了一九六一年计划的完成。这一年的工业生产总值超额完成了百分之五。尽管气候条件不好，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六〇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二。

由于取得了这些成就，所以尽管处在封锁的困难条件下，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受到影响。按计划规定，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决定在一九六一年十月降低了工业品零售价格，人民每年从中获益八亿里克（旧币）。

保证完成五年计划中其他几年的计划，也是党面临的十分重大的任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党需要克服许多巨大困难。

一九六二年，欧洲某些人民民主国家的政府追随苏联政府的方针和效法苏联政府的先例也停止贷款以后，这种困难就更多了。

这些国家的政府虽然没有象赫鲁晓夫集团那样，完全断绝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关系，但是它们故意长期拖延签订贸易协定，拒绝用阿尔巴尼亚经济发展十分需要的货物来交换阿尔巴尼亚的出口商品。

在现代修正主义者进行封锁和施加种种压力的这种条件下，挖掘和最充分地利用内部潜力，发挥工人与专家的创造才能，具有首要的意义。现在，自力更生具有更重大的政治意义。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自己力量的坚定不移的信心，使他们深信，不管在任何复杂的情况下，他们都能战斗、劳动和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并取得胜利。

一九六二年初党和政府组织的群众性讨论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这次讨论中，劳动群众提出了一万零五百多条关于用国内原材料生产新产品的建议。

所有劳动者都投入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在国内生产机器设备、配件和原先靠进口的其他材料，努力延长机器和技术设备寿命。利用内部力量和资金，设计和兴建了一些工厂、工业生产车间，设计和制造了各种机器。阿尔巴尼亚专家虽然都很年轻，但是他们成功地解决了很多复杂的任务。这一运动光辉地体现了劳动者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智力和体力用来为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捍卫党的路线，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按第四次代表大会规定的速度进行。这一运动证明，依靠内部力量的原则正在越来越深刻地为广大劳动群众所理解。

在完成计划任务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党和党中央周围的牢不可破的团结，还充分地表现在一九六二年六月三日人民议会代表的选举中。几乎百分之百的选民参加了这次选举，并且投票赞成民主阵线候选人。

对于干部的培养、深造和共产主义教育问题，提高劳动者的专业技术水平问题，始终是党关心的问题。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也全面讨论了这个问题。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封锁的情况下，更加迫切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委员会专门研究了这对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如此重要的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特别注意从专业技术上培养工人，争取在五年计划期间，至少培养十一万八千名熟练工人，并把他们的文化水平提高到先进的新技术所要求的高度。

中央委员会在把中级技术人员看成是工艺管理的传导者和日常管理生产过程的主要人物的同时，提醒各级党组织、工会、经济机关、国家机关和教育单位注意从理论上、实践上更好地培养中级技术人员，更好地和尽量广泛地利用他们来解决生产中的技术和经济问题。

为了加强培养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干部的工作，为了提高他们，使他们得到深造，采取了使教学与生产劳动更好地结合起来的措施，给高等院校提供了更充足的实验和教学设备以及必要的科学技术资料。更加重视吸收专家参加科学研究工作，更加重视开展地质、化学、物理、设计、建筑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同时，加强了对各部门干部和专家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工作。这有助于使知识分子和所有干部加深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信念，更积极地参加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理论影响的斗争。党的思想工作使专家和技术人员象所有劳动人民一样，进一步激发了忘我的牺牲精神和克服困难的革命决心。

培养和提高干部的整个工作是根据党的下述指示进行的：

“我们应用广泛的文化知识和高深的专业技术知识武装我们已培养的和将要培养的干部，但首先应教育他们同

劳动、同人民、同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三点应该始终是我们干部工作中的指南。”〔158〕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为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经济任务而斗争的同时，还非常注意增强国防力量和建立国家储备，以便应付各种局势和意外事件。

在这些艰苦的斗争年代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阿尔巴尼亚党和人民兄弟般的援助和支持，对克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敌对活动所造成的障碍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即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提供了补充贷款。这种慷慨的国际主义援助，使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多数项目的建设、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按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计划继续进行。

三、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任务

农村和农村发展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在解放后的年代里，农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它大部分已从落后的农业变成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农业。拖拉机和农业机械器的数目增加了。农业各部门中有相当一批专家，他们使农艺技术得到利用和推广。一九六一年的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三八年增加了一倍。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阶段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执行了从广度方面发展农业的政策。那时，它不能不这样做，因为缺少机械化工具、土地改良和灌溉系统、熟练干部、化肥等。但是完全有可能扩大播种面积。截至一九六一年，农业生产增长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二是来自扩大可耕地面积，只有百分之三十八是来自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由于没有充分利用农业中的潜力，所

以，农业的发展速度仍不适应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人民购买力的提高以及工业与出口的扩大而产生的要求。

为农业的集约化而努力 正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那样，农业集约化的道路是更加迅速地发展农业的道路。必须使这条道路更加具体化，使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动员起来完成农业方面的艰巨的任务。一九六二年十月党中央全会研究了这个问题。

全会指出，农业集约化的过程是一个全面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求有计划地增加投资，增加机械化工具，扩大土地改良和灌溉系统，广泛利用化肥和有机肥，不断提高农艺水平，以便增强地力，在相同的面积上，以最少的费用取得较多的农畜产品。

已经完全具备了实现农业集约化、使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和畜牧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超过扩大面积和增加牲畜头数的速度的可能性。

实现农业集体化，建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使这种经济拥有相当强大的机械装备，建立大型排灌系统，广泛使用良种，增加专业干部人数，开垦荒地等，这是过渡到集约化农业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为了保证贯彻集约化的重大任务，中央委员会责成党和国家各级机关，要坚持采用现代化农艺技术，动员一切内部潜力来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把落后的农业经济单位提高到先进单位的水平，被认为是主要的潜力所在。其他的重要潜力是：提高出勤率，全年最有效地利用劳动力，最充分地利用资金、劳动工具和全部土地。

使粗放农业过渡到集约化农业，这是在按社会主义原则进一步发展农业方面的又一重大步骤和新阶段。

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集约化的指示，有助于使农村党组织和

劳动人民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争取各种农作物都达到更高的单位面积产量,已成为每个国营农场、每个村庄的课题。农业合作社的劳动力显著增加了,每个社员全年平均劳动日增加了。修正主义封锁造成的化肥进口量减少,使更广泛地收集和利用有机肥变得更为必要了。又有数以千公顷计的农田得到灌溉。大量种植果树、葡萄、柑橘、橄榄、蔬菜的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同时,国家以更大的规模继续进行土地改良和修筑排灌渠道的工作。国家克服了封锁的障碍,使农业机械化的加强和扩大没有中断,虽然加强和扩大的程度没有完全达到五年计划规定。

同时,开垦荒地、特别是丘陵地带开垦荒地的工作也在继续进行。但是,在这方面的潜力比预计的要大,而这些潜力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期间没有得到更好的利用。

根本改善农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 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要求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要求根本改善农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由于农村创造了新的条件,生活方式同过去相比,也发生了变化。饮食的方式和结构,服装的样式和结构都有了改变。学校、学生和卫生、文化机构的数量增加了,托儿所和幼儿园也建立起来了。

但是,这些仅仅是消除乡村和城市之间明显的本质差别的漫长道路上的第一步,这些差别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本身的社会化程度,同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同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有关。

一九六三年六月召开的中央全会分析了根本改善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缩小乡村和城市差别的问题。全会确定了通过

更好和更充分地利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创造的许多条件，更迅速地提高农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的途径。

“党今天如此有力地提出这一重大问题，是因为解决这一问题是我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本身——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决定的客观需要。”〔159〕

贯彻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方针和中央全会关于农业集约化的决议，发展生产力以及主要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增加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是提高农村福利的基础。

另一途径是完善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首先是确定最适当的农畜产品分配比例，以便更好地保证扩大再生产，满足国家总的需要以及农村自己消费的需要。对此，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是改进分配方式，克服缺点，从而保证更有效地管理农业生产和农村收入。

全会特别注意协调农业合作社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之间的比例。指示要消除在一些合作社中表现出来的不正确的倾向，如所规定的积累基金低于扩大再生产的经济能力，或在非生产方面开支很大。必须根据实际生产和现有的生活水平来规定农村中的积累基金。

全会注意到在一些山区农业合作社中，来自辅助经济的收入等于或大于来自集体经济的收入。为了消除这一暂时的现象，责成党和国家机关专门研究这一问题，并采取措施改善来自自留地和来自集体经济的收入的比例，使之有利于后者。同时提醒注意，在这方面任何操之过急的做法都会造成有害的后果，因此，不要忽视更好地利用自留地来增加收入和提高农民福利。

全会认为，为了增加农民的收入，还要保证农民尽可能广泛参加生产劳动，尽量限制用在非生产活动方面的劳动日数目，在每个农业合作社中广泛地组织辅助生产活动，保证社员得到补充收入。

为了进一步发展作为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的农村福利事业，

全会提出要改变和改进生活方式。全会指出，尽管农村已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生活方式还落后于这些关系。这个矛盾的根源在于生产水平比较低，人们的头脑中还有过去遗留下来的旧观念，人们的文化水平低。

全会指示，为改变农村生活，要逐渐地达到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食品结构、烹调方法、用食方法和农民的衣着式样，广泛使用家具，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卫生和文明。全会提出了下列任务：使公用事业和手工业服务行业尽可能深入到农村生活中去，有计划地对农村进行整顿，建造美观、卫生和造价低的住房；普及用电；保证饮水；扩大乡村和城市之间以及各村之间的交通和通讯联络网。指示要在农民群众中普及卫生知识，扩大卫生机构网，卫生机构对农民进行免费治疗。

全会在讨论提高农民群众物质福利的同时，还讨论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提高他们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关于这个问题，提出的任务是扩大农村的八年制学校网；争取使所有的农村青年都进这些学校学习。中央委员会要求加强学校作为在农民中普及文化知识的主要中心的作用。为此，有必要加强教员作为在农村中传播新事物、全面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的战士的作用。

全会指出，只有把农民从旧社会的偏见和残余中解放出来，以共产主义的道德和世界观来教育他们，才能完成把文化变为全体农民的财富的任务。

反对那些贬低妇女和阻碍妇女积极参加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落后习惯，作为专门任务提了出来。全会认为，提高作为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战士的妇女的作用和人格，是根本改善农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的必要条件。

党的政治解释工作所要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消除在农村里

占上风的满足于小成的思想。这种思想阻碍农民去努力提高福利，改变生活方式和发展生产力。

一九六二年十月和一九六三年六月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用在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时期进一步发展农业，根本改善农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的战斗纲领武装了党和全体劳动人民。

四、加强党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 组织和思想工作。胜利地执行经济任务

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的艰苦的斗争年代，更清楚地证明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显示了党和全国人民沿着代表大会所确定的道路前进的决心。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共产党员受到了锻炼，党的队伍增加了新的力量，党的社会成分改善了，党在国家的全部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加强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提高了。

但是，为了胜利地实现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和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大任务，为了克服困难，就必须从组织上和思想上进一步加强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作用，改进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作。

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组织和思想问题。

进一步从组织上加强党 进一步从组织上加强党的斗争是在几个方面进行的：忠实地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革命党的建设和作用的基本原则；揭露修正主义关于党的谬论；反对违反党章规定的行为；改善党的成分和壮大

党的队伍；加强党的机关和基层组织的政治领导；提高共产党员的思想水平。

中央委员会强调指出：

“任何背离列宁主义原则、贬低党的领导作用的行为都会造成极大的危险，使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解除武装。这是党内产生弊端和不良现象的根源，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使党蜕化变质，腐败起来，进而导致党的毁灭的根源。”〔160〕

前南斯拉夫共产党堕落成资产阶级社会沙文主义的党就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全会指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使苏联共产党走上了这条道路。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谴责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宣布的关于用“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的赫鲁晓夫主义论点，认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猖狂攻击。列宁当年就曾经驳斥过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的论点。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群众的革命斗争充分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的正确性，说明历史赋予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党的伟大使命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各个阶段中起领导作用。只有在完全消灭了阶级和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也要注意国外因素），工人阶级政党才没有再存在的必要，那时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先锋作用也就完成了〔161〕。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另一个论点，即关于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论点，也是企图削弱党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领导作用的。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修正主义论点，还进一步表现于只根据生产原则改组党的机构，取消以前的党委员会和局，在苏联各地建立党的工业委员会和局以及党的农业委员

会和局。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这个措施严重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严重违反了根据生产和地区的原则建党的著名的列宁主义原则，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剥夺党的机关的政治和思想领导权，把党的机关变成单纯的经济机关的一个企图⁽¹⁶²⁾。

反对修正主义关于党的谬论的斗争，有助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更好地、更正确地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革命党的学说，这个学说是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在组织上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党的指示的基础。

根据这些指示，绝大多数被吸收入党的人都是生产者，来自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五年中吸收的预备党员绝大多数都是生产者。在这期间，党的社会成分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在党员总数中，工人占百分之三十三，农业合作社社员占百分之二十六，职员占百分之三十七，其他占百分之四。

党的队伍的扩大和成分的改善，反映了阶级结构的变化，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提高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吸收工人和普通生产者充实党的队伍，这就加强了党组织的内部生活，把党组织在经济上的领导作用提到了新的高度。这也是党密切联系劳动群众的一个证明。

党的发展和社会成分情况基本上是令人满意的，这说明党组织在吸收新鲜血液方面做了细致的工作。尽管如此，有些情况说明，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并没有全部落实到每个地方和每个新入党的人的身上。其中一个指示是要根据党员在各方面应具备的品质来选择人，培养和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党员的崇高称号。但是，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期间被开除出党的人中有百分之十八是在这五年中入党的；这个事实证明，这些指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另一个缺点是吸收妇女入党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女党员只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二点五，占（城市和农

村)就业妇女总数的百分之三,而男党员却占就业男子的百分之十六,这不能认为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这说明,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没有很好地适应妇女的革命热情和她们参加各方面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党还特别重视根据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来分布党的基层组织和力量。在代表大会以后建立起来的党的基层组织,大部分是在国营生产部门。当时只有很少一些农村没有党的基层组织。但按照科学的标准来说,党的力量的分布状况还不是完全正常的。尽管农村人口是城市的两倍,但城市的党员却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八,而农村只占百分之三十二。在一些区里,党员分布的比例也不能说是正确的,山区党员比例大于平原地区,商业部门大于工业、建筑和运输部门。

中央委员会要大家注意为在组织上加强党而斗争的经验所提出的问题,并要求对这一根本问题给予更大的重视。

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是党的基本任务 在对社会经济进行大规模的改造的基础上,由于党的全面的政治教育工作,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思想、世界观以及对社会、对劳动和对公共财产的态度也都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缩小了传播资产阶级思想的基础。

但尽管如此,在劳动人民中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旧的观点、不良的风俗、习惯和思想,这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有所表现。这些来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封建主义和宗法制的错误观念和表现,是争取完全建成社会主义时期对社会主义的主要内部危险,是阶级敌人依靠的基础。

反对错误的思想和表现的斗争,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斗争,对于党和国家来说比过去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这主要

有两个原因。第一，为了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在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同时，还必须使新型的人在精神上得到全面的锻炼，培养全体劳动人民的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第二，由于苏联领导的背叛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现代修正主义的泛滥，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侵蚀变本加厉，所以人们的错误的思想和表现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中央委员会确定下述问题作为共产主义教育的根本问题：对劳动和公共财产采取社会主义态度，为保持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的纯洁性而斗争，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感情，用阶级的革命精神教育劳动人民^[163]。

进行**社会主义劳动态度**教育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都踊跃地参加社会公益劳动，在每个人的思想上树立起靠自己的汗水和劳动生活，把全部体力和智力都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观念，动员社会舆论反对任何懒惰和寄生思想的表现。

与此同时，必须使人们更加热爱各种劳动，更加尊重一切劳动者；必须教育劳动人民随时准备到任何一个经济部门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任何地方去工作。

另一个目的是要从精神上全面教育劳动人民最充分地利用劳动时间，高效率高质量地工作，模范地遵守纪律和规章制度。

中央委员会指出，社会主义劳动态度首先要求劳动人民在一切实践活动中**不是从个人利益和物质利益出发，而是从整体利益出发**。但是，这种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不能一下子就在全体劳动人民中培养起来。所以，必须把整体利益和个人物质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

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之间的关系是需要随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情况而变化的。由于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也就有可能使精神鼓励在劳动中的作用日益提高。因

此，中央委员会指示，要经常检查有关物质鼓励的规定。

关于这一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谴责了现代修正主义者故意歪曲列宁关于物质鼓励作用的学说的观点。现代修正主义者把物质刺激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并宣布这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进行生产活动的主要动力。

社会主义劳动态度同对公共财产的社会主义态度是紧密相联的。

个别劳动者对待公共财产的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态度是很久以来人们头脑中固有的私有观念的表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企图广泛地利用这种私有观念来破坏社会主义财产——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所以，中央委员会强调指出，反对贪污、盗窃、破坏和浪费社会主义财产的斗争，反对对社会主义财产管理不善的现象，反对不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和隐瞒潜力的斗争，首先是加强劳动人民的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斗争，使他们懂得社会主义财产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侵犯的基础，要象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来保护它，使它不断地得到加强和扩大。

对待劳动和公共财产的社会主义态度是共产主义道德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这不是对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的唯一要求。社会主义社会要求纯洁的、精神生活各方面都丰富的人，有高尚的政治道德品质、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有原则性和正直的人，要求同违反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准则的各种现象作斗争的坚强战士。

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更努力地进行教育工作，同一些劳动者和共产党人身上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贪图安逸、往往滥用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职权追求个人利益和特权的倾向作斗争。同样也要展开更激烈的斗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搞小圈子、偏私行为和对别人的工作的不正当的干涉、为个人或亲友谋取非法的利益，等等。

为了保持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精神面貌的纯洁，必须始终采取严厉的态度对待个人和家庭生活腐化、污辱妇女的人格、保守主义、偏见、宗教信仰等诸如此类的表现。

经验证明，道德上的蜕化变质和政治上的蜕化变质只是一步之差。

中央委员会确定另一个重要的教育任务是**使阿尔巴尼亚人民始终保持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日常工作中进一步发扬和丰富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对劳动人民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更加有助于反对人们、特别是青年的头脑中的错误观念，要杜绝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反对轻视阿尔巴尼亚的东西的任何表现，反对美化外国的东西和媚外的任何表现，反对贬低阿尔巴尼亚专家、干部、工人和农民的才能，反对模仿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活方式和拜倒在西方艺术、文学和音乐的脚下的任何表现。如果不与这样的一些现象进行不断的思想斗争，那么这些个别现象就有可能泛滥和变成真正的危险。

在现实条件下，更深刻地理解**自力更生的原则**，对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教育劳动人民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

“自力更生的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原则。这一原则产生于下述事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首先是每个国家的内部问题，完成这些事业的决定性因素是每个国家人民的内在革命力量。”〔164〕

对劳动人民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同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群众**，以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人民和反帝的革命力量团结友好的精神教育群众总是紧密相联的。

为了保证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作具有健康的和有益的内容，必须更好地以**阶级分析的方法、以阶级观点观察各种**

社会现象的方法作为这一工作的基础。以阶级观点观察事物，就是要以政治眼光去观察事物，把无产阶级、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就是要以力求揭露各种事件和观点之性质的人的眼光去观察事物，确定它们对谁有利。这样的方法有助于人们辨别真理，即使象现代修正主义者抛出他们的观点那样，把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观点用假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伪装起来也可以辨别清楚。必须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以防止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陷进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宣传的圈套、滑进机会主义泥坑，并帮助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提高革命警惕性。

中央委员会特别重视**对青年进行革命的阶级教育**。青年人不了解外国统治者和本国地主、资本家的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的烈火，由于缺乏经验，更容易受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的侵蚀。因此，党组织和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组织要把以这样的革命精神教育新一代永远看作是首要的任务，使青年成为完成了人民革命和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的一代的当之无愧的接班人。

中央委员会在全面论述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时，指出了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党的教育工作**对造就新人的决定性意义。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实，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使劳动人民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觉悟。然而，这种社会主义觉悟水平是很低的。仅仅依靠在日常生活和客观条件直接影响下自发产生的这种觉悟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要求人们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这种觉悟不是、也不可能是自发地产生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培养出来的，是党通过整个日常工作灌输到群众中去的。”〔165〕

但是，党的教育工作如果不同革命的过程和实践，不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和实践有机地联系起来，是永远不会达到目的的。

“造就新人……决不能脱离劳动问题，离开了劳动是不能想象的，不可理解的。”〔166〕

社会主义觉悟的形成和提高是对人们进行教育和再教育的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央委员会再次明确地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始终要把说服的方法和不倦的工作放在首位，使人们自觉地认识党的路线、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准则的正确性，认识偏见和与社会主义社会格格不入的观念和表现的危害。

党要求把社会主义思想和人们头脑中的错误观念和表现之间的矛盾，同社会主义思想和有这些观念和表现的人之间的矛盾很好地区别开来。社会主义思想与人们头脑中的错误观念和表现之间的矛盾是两种对立思想之间的矛盾，是對抗性的阶级矛盾。因此，必须对这些观念和表现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但是，社会主义思想与有错误观念和表现的人之间的矛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對抗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有这些观念的人，一般说来是和人民政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阶级斗争不应该针对这些人，而应当针对这些人的错误观念和表现。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当他们站到敌对的立场上，进行应受法律制裁的活动的時候，才应该用强制的方法来代替说服教育的方法，即行使人民政权的法律。

在党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作中，**批评和自我批评、正面榜样、集体的力量与社会舆论的力量**永远是一个强大的武器。人民政权的法律体现共产主义道德准则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宣传并使劳动人民深刻地认识人民政权的法律**起着特殊的作用。

为共产主义教育服务的文学艺术 文学艺术是用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准则教育新人的强大武器。在争取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在世界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政治思想斗争尖锐化的条件下，进一步发展文学艺术，完善文学艺术的社会主义内容，提高它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在阿尔巴尼亚人民政权建立后的年代里，创造了新型的文学，新型的音乐、歌剧和舞蹈艺术，新型的美术和雕塑，新型的电影艺术等，它们的特点是具有纯洁的思想性、革命的战斗精神和健康的民族形式。

党中央根据已取得的成就指出了使文学艺术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更有战斗性和更有效的武器的道路。它提出的主要要求是更广泛和更深入地反映人民的斗争、生活和工作，反映人民的理想和希望，反映当代的问题。特别要求更深刻更广泛地反映民族解放战争和解放后发生的巨大的革命变化。

“文学艺术注意的中心应该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工人、农民、人民知识分子、党教育出来的新人，以及以忘我精神和英雄气概为建设社会主义、为保卫祖国和为祖国的繁荣而工作和战斗着的人们。”〔167〕

为了这个目的，作家和艺术家就必须更真实地反映现实，使他们的作品更好地反映在一定环境和革命发展中的现实世界。缺乏阶级性和共产主义党性，抽象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夸大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缺点并把它说成是不治之症，把人说成天生就是坏的，把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说成是徒劳无益的，等等，这些都是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格格不入的。最近十年来，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直接鼓励和支持下，在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艺术中大肆泛滥的正是这些货色。只有加强文学

艺术对一切阻碍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错误的、落后的和反动的东西的健康的批评精神，加强文学艺术对生活各方面的恶劣现象的健康的批评精神，阿尔巴尼亚的文学艺术才能很好地完成它们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十分重要的使命。文学艺术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以最大的感染力反映社会主义的、进步的东西，反映有前途的东西，进一步唤起人们对未来、对克服困难和争取胜利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信心。

中央委员会提醒大家要警惕由于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世界里各种颓废的、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在文学艺术中大肆泛滥而给阿尔巴尼亚的文学创作造成的危险。为了消除这些思潮对阿尔巴尼亚文学艺术的一切影响，提出了要为文学艺术的思想纯洁性而不断斗争的重要任务。作家和艺术家必须提高警惕，认识修正主义观点的危险性，并同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格格不入的影响作斗争。为此，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文艺工作者要同人民保持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对人民的生活、对现实要有深刻的和不断的了解，同时，对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现象和进程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

“我们应该从人民那里得到鼓舞，取得歌曲的音韵、舞蹈的旋律、纯洁的语言、劳动的干劲、创作的灵感、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的典范、人民纯朴而正直的高尚品质，等等。象任何事物那样，艺术和文化的创作基础应该是人民。”〔168〕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群众进行思想和美学教育，党要求艺术和文化机构的工作计划要反映出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机构的最高原则永远是：它们的活动要为广大劳动群众服务，要有利于进行革命教育和开展有教育意义的娱乐活动，使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得到文明的休息。

更广泛地普及民间歌舞、革命的战斗歌曲和劳动歌曲，是业余艺术活动的总方针。

为了进一步发展文学艺术，提高它们在共产主义教育中的作用，中央委员会要求加强和改进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在这方面的领导。党在艺术文学方面的领导首先是对创作活动的政治思想指导，确保创作具有革命的思想内容和最富有教育意义的艺术力量。

对文艺工作者进一步进行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使他们经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锻炼，始终是党的重要任务。作家、艺术家、全体文化工作者必须更深刻地了解党的路线，更好地了解他们的任务的政治意义。为此，他们应该不断地学习党的决议和其他文件，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自己的工作中的问题，同在这方面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任务，不仅要克服前进中必然产生的困难，而且特别要克服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封锁以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铁托修正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猖狂的和不断的敌对活动所造成的困难。因此，完成计划的斗争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反对修正主义的原则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以粉碎它们的敌对计划和活动）有机地交错在一起。

党和人民一道，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冲破了封锁，粉碎了各种阴谋。他们依靠自力更生，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兄弟般的国际主义援助下，克服了困难，基本上胜利地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任务。达到了规定的主要目标。

工业总产值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七。铬、铜、电力和机械工业都令人满意地超额完成了计划。石油工业、煤炭工业、建筑材料

工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化学工业打下了基础。五年中，有四百三十个工农业项目和社会文化设施建成并开始使用。一九六五年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六〇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九，比一九三八年增长三十三点八倍。

一九六六年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六〇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六，比一九三八年增长一点三倍。粮食生产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一，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了百分之十一。灌溉能力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二。机械耕作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二。总的来说，农业集约化基础加强了。

国民收入与第二个五年计划相比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四。收入中用于消费基金的部分增加了，社会主义贸易的商品流转额、住宅面积都有所增加。中、小学生和大学生的总人数超过了原定计划。受过中等教育的干部人数增加了将近一倍，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

尽管如此，劳动人民的福利的提高没有达到预计的水平。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首先由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封锁，而在农业方面还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的严重后果，以及在领导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的一些弱点所造成的困难，使计划任务总的说来没有完全实现。由于封锁环境所迫，党不得不对第三个五年计划任务进行修改。国民收入的积累指标提高到规定的限度以上。物资储备增加了。进行这些修改是为了保证经济的不断发展，提高和全面加强祖国的防御力量。

然而，即使在封锁的困难条件下，党也不允许降低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和使它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城乡居民所需要的主要日用品得到了正常的供应。物价没有提高，某些商品价格还有所降低。里克的购买力进一步提高了。人的平均寿命延长到六十五岁。这些都是胜利。然而，在同一时期，在修正主义统治下的几乎所有国家里，生活费用丝毫没有降低，相反在一些国家还上涨了。

第三个五年计划主要目标的胜利实现，说明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力量和他们道义上、政治上对修正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巨大优势。五年计划期间证明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坚不可摧的，党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路线是正确的。在完成计划的斗争中，在这一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尖锐的政治和思想斗争交错在一起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了人民在党的周围的团结，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群众的革命精神，提高了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和能力的信心。党和人民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五年计划期间的经验证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即使在受到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包围和压力的困难条件下也能胜利地进行。

五、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揭穿赫鲁晓夫 修正主义者的蛊惑宣传和伎俩而斗争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领导继续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及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革命论点，对美帝国主义者接二连三地让步，更起劲地反对站在革命立场上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现代修正主义者把主要矛头指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因为这两个党站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最前列。

修正主义者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中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蛊惑宣传，为了自己的利益，盗用了苏联共产党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所赢得的崇高国际威望，特别是利用列宁的名字进行投机，散布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和理论，蒙骗群众。

赫鲁晓夫的机会主义的、反革命的和修正主义的政策和活动，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日益加深，使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遭到破坏。美帝国主义者和世界所有

反动派再好不过地利用了修正主义者的弱点和让步，利用了他们的分裂活动。

从思想上和政治上粉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历史赋予的必要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把从思想上和政治上粉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历史赋予的必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首先需要揭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蛊惑宣传和伎俩，彻底揭露这个集团的反革命政策。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围绕着时代的根本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分歧，苏联修正主义领导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并不是就这些问题进行原则性的论战。相反，赫鲁晓夫集团千方百计地回避对原则问题进行辩论，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对这样的辩论是软弱无力的。他们采用修正主义宣传机构不断重复的诽谤和诬蔑，策划阴谋和诡计，从事破坏和其他最卑鄙的勾当，来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的讲台也被用来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诽谤和诬蔑。修正主义者的目的是要孤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把它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除出去，以便“好好地教训”所有那些敢于反对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方针的人。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没有陷进修正主义者的立场。它不在小事上纠缠，不搞庸俗的东西。它继续在思想领域里进行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揭露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同时还揭露他们缺乏严肃的态度，揭露他们的折中主义、从机会主义到冒险主义的摇摆和破坏活动。《人民之声报》的反修文章被翻印成小册子，译成几种外文，也通过电台加以广播，它们成了党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原则斗争中的强大的、锐利的武器。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这些文章和其他文件，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和文件一起，给赫鲁晓夫集团的蛊惑宣传以致命的打击，并把他们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宣言和声明的践踏者、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者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揭露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下述企图：把第二次莫斯科会议的声明置诸脑后，把它说成是“死板公式”，是一个“短命的妥协文件”，而把苏联共产党纲领（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修正主义的法典）说成是“世界共产主义宣言”。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借口什么南斯拉夫领导人“已纠正了他们从前的许多错误”并“在内外政策方面都已经作了重大的改变”，力图在世界舆论面前为专断地给铁托集团恢复名誉的做法辩解，力图在各个方面——在思想、政治、经济方面同铁托集团的完全和解和合作辩解。

铁托和其他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领导人自己再三宣称，他们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既没有改变他们的政策，也没有改变他们的纲领，并且将来也不打算作任何改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出，改变了立场的只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他们违背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与铁托集团勾结在一起，并力图把自己和铁托集团靠拢与和解的路线强加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揭露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叫嚣“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进行斗争”的真正用意。这种叫嚣是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党的一种手段，是为了掩盖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是为了替他们违反把修正主义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的莫斯科会议的共同决定的行径辩护。“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是各个时期的修正主义者用来反对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众所周知的老手法。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一步揭露了苏联修正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活动和对帝国主义的屈膝投降，揭露了他们践踏了莫斯科会议提出的同帝国主义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任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出，苏美友好合作，美帝国主义和(变成了新帝国主义的)苏联修正主义为主宰世界而订立同盟，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路线的实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开始很少提或者根本不提美帝国主义是各国人民最大的敌人、国际宪兵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危险，这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开始把德国复仇主义说成是主要的敌人和危险，这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还千方百计地力图制造一种幻想，似乎美帝国主义者因为害怕爆发一场热核战争，已经减少和几乎放弃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意图！他们以此替自己靠拢和勾结帝国主义的行径辩护。

这种亲帝国主义的政策，导致苏联修正主义领导可耻地在美帝国主义面前屈膝投降。一九六〇年，他们赞同向刚果派遣实际上是美国工具的所谓(联合国的)国际委员会和国际部队去镇压刚果人民的解放斗争。一九六二年，在美国的威胁下，他们从古巴撤走了刚刚运去不久的火箭、飞机和派去不久的军事专家，同时同意美国对苏联船只的“国际”检查和对古巴领土的“国际”监督。同样，他们还完全放弃了缔结对德和约、解决整个德国问题，特别是西柏林问题，这就构成了对德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阵营、对欧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次严重的背叛行为。

赫鲁晓夫集团另一次屈膝投降和大叛卖是一九六三年八月同美、英帝国主义头子签订臭名远扬的关于部分停止核武器试验的莫斯科条约。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揭露这个勾当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为保持美苏两大国核垄断而策划的阴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这是对各国人民的欺骗，是既不保证停止使用，又不保证销

毁核武器的一种手段。相反，这个条约使美帝国主义者能够增加这些武器的储存，助长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掠夺战争的危险增加了。时间完全证实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这些估计。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一项特别声明中揭露了莫斯科条约，要求社会主义国家拒绝这个直接违背华沙条约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路线的条约，并谴责苏联政府的这种背叛行径。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全面地揭露了赫鲁晓夫集团和美帝国主义者配合行动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的和企图。现在，修正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一样，把中国看作共同的主要敌人。所以，他们的每个行动也都打上了反华的烙印。莫斯科条约也是反对革命的中国的，它旨在阻止中国成为核大国。苏联领导为了反华，居然放弃了对德和约，并顽固主张缔结一个所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互不侵犯条约”，目的在于使美国部队有可能从欧洲转移到东南亚。苏联修正主义者由于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印度反动派挑起的印中冲突中公开站在印度反动派一边，并毫不吝啬地对印度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政府给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还向他们提供武器。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揭露了苏联修正主义领导的大国主义的掠夺企图，它通过“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在“国际分工、协作和专业化”的幌子下践踏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国家主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揭露了在“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中建立在苏联政府指挥下的超国家机构的企图。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与美帝国主义靠拢的同时，还完全有意识地推行与社会民主党人及其他一切反共力量靠拢的路线，把这些势力用来当作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桥梁。这是他们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然结果。修正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这个国际资产阶级的老奸巨猾的代理人的靠拢是以双方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思

想为天然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正在完全溶合成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潮流。

帝国主义者、铁托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的其他代言人，以各种方式帮助和支持苏联领导的方针，并吹捧赫鲁晓夫，把他作为一个“和平巨匠”捧上了天，这不是偶然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并不是把赫鲁晓夫当作共产党人来帮助他、赞扬他。他们帮助他、赞扬他，是因为他们把赫鲁晓夫及其集团看成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的最好的工具。

同修正主义 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公开背叛的情况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提出了“**在各方面同修正主义永远划清界限**”〔169〕的口号。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要求必须这样做。在修正主义者篡夺了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权的那些国家里，历史的重担落到了党员群众和劳动群众的肩上——要尽快地对修正主义者大喝一声：“住手！”，不准修正主义和修正主义者胡作非为。无论在一个党内，还是在整个运动内，革命和反革命、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变种）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坚强逻辑性和事实的确凿性的、反对修正主义的坚决斗争，在世界各地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革命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从国外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发来了数以千计的信件，感谢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的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勇敢的、正确的和原则性的斗争，并索取《人民之声报》的文章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其他文件。修正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不让本国的共产党人了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材

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材料他们也同样如此。对于所有那些敢于索取这种材料的人，他们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直至开除出党。

对修正主义的反抗到处在增长。大批革命的共产党人同修正主义头子决裂了。为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一系列国家（澳大利亚、锡兰、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奥地利、英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成立了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革命小组和中心。

赫鲁晓夫集团面临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压力，面临被彻底揭露的危险，开始玩弄手腕，搞骗人的新花样，企图掩盖自己的分裂主义的和反革命的活动。他们开始大叫大嚷，说要维护团结。当他们开始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时候，就说论战是“列宁主义原则性的顶峰”，而当他们用尽了一切恶毒语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以后，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代表大会上突然要求停止论战（！）。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揭露了苏联领导的这一策略，指出这是虚张声势，是虚伪的。

“如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做的那样，口头上谈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在基本问题上却又步步践踏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结论，并执行一条违背各国人民及社会主义的利益的路线，这就是欺骗共产党人和各国人民，就是搞蛊惑宣传，就是搞分裂、反对团结，或者是谋求一个建立在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上的假团结。”〔170〕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出，和分裂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铁托分子、陶里亚蒂分子或赫鲁晓夫分子不可能有团结。只有在革命基础上，在排除修正主义者的条件下，在同修正主义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中才能确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只有在无

产阶级思想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牢固的团结。

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已经不是第一次面临象现代修正主义者这样的大背叛了。列宁和列宁主义者断绝了与第二国际叛徒头目们的一切联系，并且只有踢开了叛徒，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了勇敢的、无情的斗争，才达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钢铁般的团结。

为了更好地揭露修正主义者要求团结的虚伪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建议苏联领导：要敢于象公开地无理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样，公开地作自我批评，并谴责自己所有的反阿尔巴尼亚的活动；收回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发出的进行反革命活动和推翻领导的号召，以及对阿尔巴尼亚的所有恶毒的诽谤和指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苏联共产党共同发表有关两党分歧的所有正式的材料和文件，以便帮助两国的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客观地判断谁是谁非；苏联领导要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双边会谈创造一切完全平等的条件。

然而，如同预料的那样，赫鲁晓夫集团对这些建议根本就没有作出答复，因为他们对于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正确地解决分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建立团结，都不是真心诚意的。

他们一面要求“团结”，同时继续疯狂地进行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多方面的敌对活动。一九六三年七月，苏联领导采用卑鄙的诽谤和谩骂，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直接的正面攻击。

这再一次说明谁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真正分裂者，说明赫鲁晓夫集团所鼓吹的“团结”只是为了掩盖他们的大背叛。所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出：

“今天，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团结的斗争同反对分裂主义者，反对以赫鲁晓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分不开的，同反对他们的观点和行为的斗争是分不开的；这些观点和行为不但威胁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事业，而且威胁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命运。”〔171〕

在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情况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公布给苏共党员的公开信是适当的。

“在这封信里，我们想坦率地和以兄弟般的诚意把连续多年来赫鲁晓夫向你们隐瞒的真相告诉你们。他过去欺骗了你们，现在仍在欺骗你们……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给你们写这封信，是因为它认为在这种局势下，你们的责任和作用是有历史意义的……你们是唯一能够拯救被赫鲁晓夫置于绝境的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祖国——苏联和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能够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捍卫苏联的荣誉与尊严的力量，是唯一能够高举被赫鲁晓夫可耻地玷污了的你们党的革命旗帜的力量。”〔172〕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信中揭露了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和他们的追随者单独召开分裂主义的国际会议的企图。赫鲁晓夫要求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召开的会议是非法的，因为召开这样的会议是违反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共同作出的规定的。苏联领导蛮横地、没有预先和其他许多党进行任何协商就要召开这样的会议，就是践踏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平等和独立的原则，就是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它们。赫鲁晓夫匆匆忙忙地要召开所谓“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企图达

到两个目的：谴责那些反对他的修正主义方针的共产党（如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并把这些党从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开除”出去；稳住修正主义阵营动摇了的阵脚，把所有修正主义者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再一次指出，它只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宣言与声明的革命原则基础上召开有利于真正的团结而不是有利于分裂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任何一次会议和任何一种团结都不能建立在修正主义的基础上。已造成的局面不允许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出，如果修正主义者要举行他们的分裂会议，那很好，因为他们将被打上背叛和分裂的烙印，因为会议召开之时将作为“标志着他们彻底垮台之日”载入史册。

信中揭穿了赫鲁晓夫集团把斯大林逝世后的时期说成是“向共产主义胜利进军的时期”、“苏联真正历史的起点”的谎言。信中用事实说明了赫鲁晓夫及其集团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和正在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危害。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出，赫鲁晓夫集团在经济方面实行的一个接一个的所谓“改革和措施”，只不过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那里搬来的管理形式和方法而已。这些改革和措施是修正主义方针的组成部分，这个方针不是象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正使苏联走向共产主义，而是使苏联走向资本主义复辟。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号召苏联共产党人，要认清威胁着苏联的巨大危险，要粉碎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为反对苏维埃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策划的阴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再一次强调指出，十月革命的产物苏联，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来说始终是珍贵的，但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那些人的说法，他们说：“即使苏联走的是错误道路，我们也应该永远和它在一起。”只有叛徒们才这

样想。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是为粉碎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阴谋，为捍卫苏联，为反对篡夺了苏联共产党领导的赫鲁晓夫集团，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到底。

对苏联新领导人抱任何幻想。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与力量的坚决的原则斗争，撕破了赫鲁晓夫及其集团的修正主义方针和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活动的假面具。修正主义遭到了世界革命者不可遏止的抵抗。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等所有方面，在国际上和国内，修正主义都遭到了一系列失败。此外，在修正主义者内部发生了争吵和分歧，引起了分裂。这清楚地表现在陶里亚蒂的“遗嘱”里，这个“遗嘱”要求完全摆脱赫鲁晓夫集团的霸权，代之以多中心主义。同时，陶里亚蒂主张使苏联政权更深入、更迅速地自由化。各国一些修正主义头子对于赫鲁晓夫企图组织的分裂性的各国党国际会议采取的保留态度，也清楚地表明了这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处在危机之中。

苏联修正主义者为了使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免遭彻底失败，不得不在一九六四年十月把他们的头子、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修正主义路线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的炮制者赫鲁晓夫赶下了政治舞台。

赫鲁晓夫的下台，对整个现代修正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这一事件证明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它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原则性斗争的正确性。

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及其同伙为首的苏联新领导，力图把推翻赫鲁晓夫说成是一个贯穿着“高度的列宁主义原则性”的措

施，并力图给人以假象，似乎他们正在纠正臭名远扬的头子的实践中所有“过分的东西”、“专横行为”和“不可容忍的主观主义”。但是，他们没有公开批判赫鲁晓夫，并同时宣称，他们将毫不犹豫地推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及其他修正主义头目一起制定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根本不指望在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新领导会改正他们的错误和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

恩维尔·霍查同志指出：

“赫鲁晓夫的下台是一个巨大胜利，但这并不标志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结束，也不标志着整个现代修正主义的结束……修正主义的方针、政策和社会经济根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本身，并没有同他（指赫鲁晓夫。——编者）一起消失……所以，劳动党同所有真正的革命者一样，在这方面不应该、也不会抱有任何幻想。”〔173〕

只有粉碎修正主义的思想 and 政治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赫鲁晓夫方针，只有消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给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造成的一切危害，才能出现转折。

首先要解决斯大林问题，尽管他可能犯过某种无关紧要的小错误，仍要彻底恢复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名誉。

为了恢复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苏联领导就必须放弃他们的沙文主义政策和做法，放弃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干涉和压力，放弃指挥社会主义阵营的意图。苏联政府必须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由于苏联政府的片面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阿尔巴尼亚的行为而给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造成的物质损失。

在平等、不干涉内政、兄弟互助的基础上恢复社会主义阵营的

团结，是恢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基础。此外，只要苏联领导人还企图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充当“指挥者”的角色，只要他们还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盲目地追随纯属于他们一党的路线，就不会有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我们党认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指挥者，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共产党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使他们联合起来，进行伟大的斗争。”〔174〕

只要苏联新领导人还在顽固地推行同铁托集团这个帝国主义的老奸巨猾的代理人合作和友好的赫鲁晓夫路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

只有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决的原则性的斗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

“我们党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斗争，并将继续始终不渝地同它进行斗争，不管它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还是铁托修正主义，一直到把现代修正主义作为倒退的路线、反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以及具体体现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修正主义决议中的思想体系和政策彻底粉碎为止。”〔175〕

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修正主义者及其追随者推行不同于他们的这个头子的另外一种策略。他们放弃了赫鲁晓夫采用过的哗众取宠、大肆渲染和大叫大嚷的做法。他们停止了公开“论战”，更悄悄地，然而顽固地继续推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方针，在各方面与美帝国主义继续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勾结，继续进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敌对活动。他们采用了更加频繁和更加狡猾的蛊惑宣传来蒙骗群众，使动摇的人解除武装和

保持中立。他们开始用更高的调子谈论“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说“分歧不是在主要原则问题上”，“使我们联合起来的东西比使我们分开的东西更多更强”。现在，不难在苏联新领导人的讲话中和在修正主义的宣传中找到有关“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帝统一战线”，“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的词句。但进行这一切当然都是非常谨慎的、有分寸的和小心翼翼的，以便不得罪帝国主义头子。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揭露了赫鲁晓夫式的新领导人的蛊惑宣传，谴责了他们的欺骗伎俩，并指出了新策略的危险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用不可否认的事实证明，他们只是在口头上主张团结，而在行动上则是分裂主义者；只是在口头上支持民族解放斗争，而在行动上则破坏这些斗争；只是在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而在行动上则是亲帝国主义。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一九六五年一月通过波兰人民共和国装模作样地邀请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出席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委员会会议，丝毫不顾他们在这个条约组织内对阿尔巴尼亚造成的形势，好象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好象他们没有那样野蛮地践踏过阿尔巴尼亚的主权。此外，修正主义者企图通过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使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变成他们推行与美帝国主义靠拢的计划的一个伙伴。

只要还没有给作为华沙条约组织成员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创造平等条件，只要践踏它的主权，阿尔巴尼亚政府就拒绝参加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的会议，这是完全合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声明，只有保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享受这个条约所规定的所有权利的时候，只有谴责了苏联领导违背这个条约的一切行为的时候，只有当苏联政府赔偿给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造成的所有物质损失的时候，只有当条约的所有参加国政府采取了

措施，使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只有当把华沙条约组织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缺席时所作的带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性质的各项纪录和决定的副本交给了阿尔巴尼亚政府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才会参加华沙条约组织会议。

同时，阿尔巴尼亚政府感到有义务就据说是为了阻止用核武器装备西德而召开的会议将要讨论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认为，真正要阻止用核武器武装德国复仇主义者和遏制他们的侵略野心，苏联领导和执行与苏联领导同样政策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首先必须放弃与美帝国主义的勾结和共谋。没有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支持，西德就不可能用核武器武装起来，也不敢发动对邻国的进攻。阿尔巴尼亚政府认为，必须尽快废除怂恿美帝国主义和德国复仇主义进行侵略和破坏活动的臭名远扬的莫斯科条约。阿尔巴尼亚政府要求华沙条约组织用共同的革命政策来代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强加给它的屈膝投降政策，以便粉碎美帝国主义者和德国复仇主义者的侵略政策。阿尔巴尼亚政府认为，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是当务之急，苏联政府要对拖延以至最后放弃签署这个条约承担重大责任。阿尔巴尼亚政府建议华沙条约组织公开声明，如果美国用核武器武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华沙条约组织就要用这种武器来武装、而且是真正地武装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不可能接受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这些建议中的任何一条，并且也不可能放弃他们与美帝国主义进行勾结和在美帝国主义面前屈膝投降的政策，因为他们执行这样的政策不是偶然的。

修正主义者策划于一九六五年三月召开的分裂会议，暴露了他们要团结的虚伪性。这次会议是按照赫鲁晓夫制定的计划召开的。赫鲁晓夫的继承者只是为了蛊惑宣传，不把它叫作“会议”，而

称作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他们的敌对目的也没有在这次“会晤”中象他们原先设想的那样锋芒毕露地表现出来。修正主义者邀请的二十六个党中有七个没有参加会议。其中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等。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立即谴责这次会议是完全非法的，因为这次会议是以独断专行的方式召开的，没有与许多党协商，也没有考虑这些党的反对意见。三月分裂会议为了搞蛊惑宣传，说了几句温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话，但它的内容是亲帝国主义的。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谴责苏联政府的任何一个亲帝国主义的行为。相反，却表示决心要更顽固地推行与美国和平共处和合作的总路线，无视三个星期前美帝国主义者通过强盗式轰炸开始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侵略的事实。

苏联领导和其他修正主义者对美国侵略越南所持的矛盾的 and 两面派的立场是：在口头上支持越南人民，在行动上同美国侵略者勾结，反对越南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清楚地说明了他们对世界革命运动的大叛卖。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揭露了围绕对越南的“苏联援助”所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叫嚷。这是对一个英雄的人民，对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少得可怜的援助，与苏联的巨大能力相比，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在质量上也是极不相称的。这一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使苏联领导人有权“插手”越南问题，并在不触犯美国利益的情况下同美国侵略者进行交易，以镇压越南人民和东南亚其他各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在中国周围建立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火力包围圈。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不断企图通过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施加压力，要他们接受美国占领者提出的条件，从而“和平解决”越南战争，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一开始就认为，美

国对兄弟的越南人民的罪恶侵略，就是对我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所有爱好自由的人民的侵略。他们表示完全和越南南方和北方人民站在一起，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揭露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作为进行反帝革命斗争的各国人民的敌人的真面目。

党把彻底战胜修正主义的不妥协的原则性斗争看作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理所当然地感到自豪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放下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过去和现在都始终严阵以待地和现代修正主义叛徒们进行斗争。”〔176〕

第 七 章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党和整个国家生活的进一步革命化而斗争

一、深入贯彻群众路线

紧紧依靠群众是党取得一切胜利的主要因素。正是由于依靠群众，才为党如此卓有成效地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顶住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封锁和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条件。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完成经济、文化、思想和政治任务的工作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大大丰富了政治领导、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工作经验。

党和群众的日常斗争实践说明，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中必须采用新的更灵活的方式、更革命化的方法和作风。这是把人民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更好地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保证劳动群众更积极地、更直接地参加管理和发展经济与文化以及参加国家管理所要求的。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一九六五年十月号召人民积极地 and 直接地参加制定第四个五年计划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与以往组织人民群众讨论制定五年计划不同的是，在讨论制定新的五年计划中，上级没有详细提供所确定的数字，而仅仅提供一些主要的控制性数字。

人民群众响应党的号召，以那样高度的革命责任感，那样踊跃

地、创造性地讨论了第四个五年计划数字，这是前所未有的。在人民群众向党和政府提出的计划中，许多指标甚至超过了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最乐观的预计。群众的建议，为提高工农业生产，尤其为增加粮食和土豆等的生产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这样就为制定革命的、富有动员力的五年计划奠定了基础。讨论制定第四个五年计划成了党组织、国家机关和劳动群众的学校。

贯穿群众性讨论的高度革命精神，有助于党更好地发现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中的不足和缺点，用批判的眼光分析以往的活动，吸取重要的教益，以便采取一系列根本性措施来改进党的工作，使党和整个国家生活进一步革命化。

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为了使党、国家机关和整个国家生活进一步革命化，首先必须根除官僚主义。

党把官僚主义看成是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的最大的祸害，并始终对它进行了斗争。官僚主义导致脱离群众，压制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妨碍群众积极地、直接地参加经济管理和国家管理。这样，官僚主义就取消民主，使国家机关变成笨重、臃肿的机器，使它腐化变质。

因此，党不能容忍和允许官僚主义歪风的存在，不能容忍和允许在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党的机关中产生的和造成明显损失的危险的官僚主义弊病的存在。

中央和地方的政权机关以及经济机关的某些工作人员更多的相信行政措施、公文、规章和法律，而不是对人进行活的政治说服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突出党的无产阶级政治，以唯技术论者、官老爷和不问政治的专业人员的眼光看待和评价问题。迷信行政措施，热衷于制定大量公文、规章、命令，填写大量统计表，履

行繁多的手续和把许多不必要的条款塞进法律和法典当中，造成了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的臃肿，使机关工作人员脱离实际。所有这些造成了工作中的不能容忍的拖拉现象，削弱了人民会议的作用，削弱了群众直接参加经济管理和国家管理。官僚主义歪风完全违背党的革命路线，完全违背全部政权归城乡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充分民主的本质。

官僚主义歪风和表现的根源是：存在着资产阶级机关的方法和作风的残余，这些残余通过被党留用的正直的、爱国的和忠于人民政权的旧行政人员渗透到新的国家机关；在工作人员甚至共产党人的思想意识中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有时候吸收外国经验不经过认真研究，不事先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分析和不管它是否适用于本国的具体情况；最后，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在实践中对危险的官僚主义弊病认识不足。这些就是阶级敌人及其思想意识对党和国家机关施加压力的表现。

官僚主义的态度和行为是使机关工作人员和脑力劳动者形成特权阶层和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而结果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党对这种危险采取了措施。在恩维尔·霍查同志的直接倡议下，党发动了彻底根除官僚主义的无情的斗争。

中央委员会指示，要把热中于繁多的公文、命令、规章、报表和手续的做法作为可憎的东西加以抛弃，把它们减少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取消多余的、冗长的会议，把工作重点从公文和决议堆里转移到积极做人的工作方面。指示要消除国家和党的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官僚主义的束缚，使人民会议及其执行机关行使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权力，同样，使党的地方委员会行使党章所规定的一切权力。此外，要研究关于扩大政权和党的地方机关的权力问题。党和国家的各个机关和每一个干部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对自己担负的任务负起全部责任，主动地、大胆地解决问题。党的领导要

求毫不犹豫地摒弃政权机关和党的机关的命令主义的恶劣做法，摒弃对劳动人民傲慢和漠不关心的态度以及无视批评和压制群众呼声的做法。党的领导指示要抛弃官僚主义式的监督，代之以这样的监督：不仅检查决议和任务是否被严格执行，而且在生活和革命实践中检查它们是否正确、适当。只有依靠劳动群众从下面对国家机关和各级工作人员进行经常的严格的监督，上级监督才能有成效、有助于改正缺点和富有动员力量。

在无产阶级专政各个环节已经巩固的条件下，党的领导认为需要重新组织领导体制，给基层留有更大的活动余地，鼓励基层的首创精神，并从中央派遣熟练的干部去加强基层。

党发动的根除官僚主义的斗争，立即使更正确地重新配备干部和压缩编制成为必须进行的工作。中央委员会使完成这个任务成为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的事情，以便主要不是通过行政措施，而是靠他们的自愿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来解决问题。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普遍响应党发出的到主要战线、到生产战线去的号召。这样就发扬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和全国解放初期青年义务劳动的光荣传统。党全力支持这种革命首创精神，并把它看成是把祖国和社会主义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爱国主义和崇高共产主义道德的榜样。

中央委员会指示，要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查所有主要的法律和命令。为此，应征求群众的意见，并在群众的广泛参加下重新修订法律，以便取消不必要的条款，去掉一切陈旧的、多余的和错误的东西，删去混乱的词句，使它们更简明易懂，更富有教育意义。

党中央采取的其他一些具有十分重大革命意义的措施是：关于调整高工资同中等工资、低工资之间的比例的决定；关于在军队中重新设立政治委员、建立常委会和取消军衔的决定。

调整劳动报酬的比例，只触及国家和党的机关、科学文化机关

的一些工作人员的高工资，而不改变低工资和中等工资。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高工资与低工资之间的差别任何时候都不十分显著，这是因为党不允许这样做。这种差别决不能同在修正主义者统治下的国家里工人和下级职员工资与高级、甚至中级职员、干部、知识分子的工资的悬殊相比。尽管这样，党认为必须进一步缩小高工资与低工资之间的差距。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需要尽量使领导干部和高级文化科学工作者的生活水平接近全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堵塞导致脱离人民群众、不正确地鼓励做办公室工作、轻视生产劳动的所有孔道。通过这项措施防止贪图安逸和追求名利的倾向，这些倾向导致丧失革命精神，为向小资产阶级蜕化和散播修正主义观点准备合适的土壤。同时，党还注意防止犯平均主义，不允许散布这种对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有害的错误思想。领导工作和熟练劳动即使在将来也要受到重视，但永远要与国家的现实条件相适应。

在军队中重新设立政治委员、建立常委会和取消军衔的决定，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共和国武装部队与人民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军队干部与士兵群众的联系，进一步提高和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及其战斗能力和战斗准备，把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

这些措施发扬了民族解放军的传统，对民族解放军的领导是通过常委会由指挥员与政治委员共同实现的，他们没有军衔和区别于普通战士的其他标志。一九四四年五月佩尔梅特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建立军衔制和解放后在各级部队中实行一长制指挥，在使人民军成为一支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坚强的纪律性、完全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军队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全国解放前夕决定授与军衔和采取其他一系列措施，还由外来的因素决定的。这样做的目的也是力求以最完整的形式表现在人民革命中诞生的新型的阿尔巴

尼亚国家，它拥有在国际上代表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一切合法权利。那时这些措施打击了企图把人民民主的阿尔巴尼亚国家称为“非法”国家，把民族解放军称为“乌合匪帮”的世界帝国主义反动派。

虽然在当时实行军衔制和一长制指挥带来了好处，但是在新的条件下，继续保持军衔制和一长制指挥，就会产生不良后果。它们妨碍了领导干部与士兵之间建立正常的亲密的同志关系，助长了小资产阶级的骄傲自满和狂妄自大，压制了首创精神的发挥，因而孕育着军官和将军们脱离群众的危险。而中央委员会关于军队的新决议消除了这种危险，为进一步提高武装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为武装部队的革命化，为增强祖国的防御力量开辟了道路。中央委员会同共产党员、军官和将军们，同全体军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以后，作出了这些决定。

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和 贯彻党的教导的革命干劲

一九六六年三月，党中央决定向全体党员、劳动人民、战士和军官发出公开信，向他们报告近几个月来所采取的根本性的革命措施，并号召他们全力以赴地为完成这些措施所提出的任务而奋斗。

公开信对党充满着紧张的革命工作和斗争的最近几年的活动和经验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结。党在向人民谈成绩和胜利的同时，也如以往一样，把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公开告诉人民。

为了光荣地完成面临的任務，中央委员会要求全体党员和劳动人民在他们的工作及生活中要以始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原则为指导，也就是说，

“首先，每个共产党员和劳动者任何时候都应该从政治上判断每一个问题，无论是经济问题、行政问题还是技术问题，无论是国家问题还是任何其他性质的问题，应当看一

看这个问题对人民、祖国和社会主义有多少好处。”〔177〕

党在一切生活领域中、在党和人民政权的全部工作中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是国家生活进一步革命化的另一保证。始终一贯地坚定地依靠人民群众，就能达到这一点。党要求更好地倾听群众的呼声，全面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大程度地保证群众直接地、踊跃地参加经济管理、国家管理，参加反对官僚主义歪风、反对在政权和党的某些工作人员的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良行为的斗争。

“人民高于一切。这是党和人民政权机关在一切活动中过去和现在一贯遵循的根本原则。人民政权和它的机关是人民自己手中的武器，是为人民胜利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根据这一点，我们国家机关中的每个工作人员或干部，不论他们地位如何，都只不过是人民的勤务员……”〔178〕

中央委员会在信中表示相信，全体劳动人民，首先是共产党员将把党所采取的措施正确地看成是不断地进行革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建立坚不可摧的国防的措施。这些措施与共产主义教育和对劳动人民进行革命的阶级锻炼都有着直接的联系。

“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求每个党员、每个劳动者，不论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随时随地都象革命者一样工作和思考，要永远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勤务员，同工人、农民和士兵生死与共，随时准备为人民、为祖国、为革命和为共产主义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不仅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今天，而且对它的未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全体党员和劳动群众的事，特别是对青年一代，对那些未来的革命的接班人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179〕

根除官僚主义和实现国家生活革命化的措施，是对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及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的残余的一个毁灭性打击。这些措施摧毁了阶级敌人的活动基础，粉碎了他们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因此，中央委员会提醒大家，敌人将竭力完全歪曲这些措施，并乘机把采取这些措施诬蔑为人民政权的弱点，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发动新的攻击，妄图动摇劳动人民对党的信任。

“因此，在对群众进行广泛的说服教育的同时，必须加强警惕性和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决心。”〔180〕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定的原则性斗争，大大有助于党采取这些根本性的革命措施。这一斗争使党更深刻地认识了修正主义在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和扎根的国内原因。使苏联共产党窒息的官僚主义帮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政权。领取高薪和生活水平大大超过劳动群众生活水平的党政官僚与经济部门领导人以及艺术、科学和文化界人士所组成的特权阶层的形成，是修正主义观点泛滥的现实社会基础，是修正主义集团颠覆政权并把国家推上逐步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可靠支柱。揭示这些原因——修正主义的根子——对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拔掉一切修正主义根子，防止在阿尔巴尼亚发生类似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具有很大教益。

根除官僚主义和实现国家生活革命化的果敢措施，没有推翻也没有改变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总路线。这些措施是党关于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和指示的进一步的创造性的发展。这些措施显示了党的巨大力量。只有忠实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贯奉行革命政策的、团结一致的、与人民密切联系的工人阶级的政党才能采取这些根本性措施。

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成了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手中的强大武

器。党所采取的根本性措施得到了他们的完全拥护，并且在全国激发了高度的革命热情，动员了党和全国人民为彻底落实这些措施而斗争。

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中央和区的党政机关都在更加巩固的革命基础上进行了改组。国营企业和农业合作社的行政机构也同样进行了改组和精简。部减少了，不必要的司、局合并了，两个或更多的司、局合并成一个。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减少了一半。约一万五千名行政干部转到了生产部门，特别是农村。相当一批干部，包括党和国家一些高级干部，从中央调到了基层。在精简行政机关的同时，大量压缩公文，从而以积极做人的工作代替了文牍主义的工作。会计和计划系统也进行了压缩和精简。在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情况下，原来集中在部长会议的制定计划和确定价格方面的许多工作都交给各部和各区人民会议执行委员会。

为实现党的教导和要求，生产领域中的工作空前活跃。种植土豆和开垦荒地成了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活动，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在这些重大活动中，人民军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大部分农作物，特别是粮食作物都比往年获得了更高的产量。很多山区农业合作社一九六六年首次实现了粮食自给，一九六六年的工业生产计划也超额完成了。

全国掀起了一个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同生产相结合的大规模运动。大批的脑力劳动者志愿去帮助农民从事农业劳动。根据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更加健全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脑力劳动者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决定，所有机关工作人员和科学文化工作者开始每年参加一个月的生产劳动，特别是到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此外，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的成千上万的青年参加了建设和生产的义务劳动。

人民的军体训练特别活跃起来。群众越来越清楚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是准备保卫祖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的选举，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人民中出现的新的革命热潮以及人民在党周围的钢铁般的团结。几乎所有参加投票的人都投票赞成民主阵线候选人。

按照党的指示，民主阵线组织在选举时更加活跃起来了。其他群众组织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作也提到了更高的水平。

同时，为寻求更合适、更容易被群众所理解、更具有动员力的新的宣传鼓动方式作了努力。为了消除政治、教育工作中及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使其与生活最紧密地联系起来，开始了系统的斗争。

这样就沉重地打击了官僚主义，使劳动人民在思想、生活与活动方面都开始出现革命的转变。

然而，党认为，一九六六年所采取的使党和国家生活的进一步革命化的措施只是漫长的革命进程中的第一步，应使这一进程日益深入和不断发展。

党意识到，在这一进程的发展中不可能没有障碍和斗争。反对官僚主义和使国家生活不断革命化的斗争是反对保守的和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观念的阶级斗争，是革命行动与反革命行动之间的阶级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克服了各种困难和障碍，在不断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然而，也有一些人由于没有足够的毅力破除旧的风俗、习惯、观念，或由于受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极深，屈服于敌人的压力而落后了，或者中途停顿。其中也有个别共产党员。党通过孜孜不倦地说服教育工作来解决这

些不可避免的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帮助落后分子和动摇分子，使他们也以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革命步伐前进。

实践证明，多少年来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旧框框、旧观念、旧风俗和旧习惯阻挠和妨碍着人们接受新的革命的思想、方式和办法。这也是各级党委、党的基层组织、国家机关、经济单位在方法和作风上存在着缺点的原因。这也是官僚主义行为不断出现的根源，是不少脑力劳动者对于把他们的工作更紧密、更有机地与生活、生产相联系，更多地依靠群众表现出某种犹豫不决的根源。

恩维尔·霍查同志教导说：为了克服障碍和困难，为了不让旧形式、旧方法、旧观念和旧风俗形成危险，为了保持革命热潮继续不断和日益高涨，

“需要工作，需要牺牲精神、英雄主义、忘我精神、政治思想上的成熟性、组织能力和技术本领，而首先是需要钢铁般的意志和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共产党员首先应该具备的正是这些品质……

……我们面临的工作是伟大的、光荣的、艰巨而又神圣的。让我们投身到工作中去，因为无论是劳动、斗争，还是任何牺牲都没有吓倒过我们，也永远不能吓倒我们。”〔181〕

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进一步促进党和国家生活革命化的任务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至八日在地拉那举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七百九十一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四十三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六万三千零十三个党员和三千

三百一十四名预备党员。

代表大会在更高的水平上总结和概括了党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经验，特别是最近几年来的革命经验。代表大会规定了在各个领域里开展和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以及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联合战线而斗争的任务，代表大会对党章作了某些修改，并通过了关于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指示。

在各个领域里不断开展和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各个领域里不断开展和深入进行革命的问题是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

为了使革命不断地发展，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大力地、毫不动摇地**”进行阶级斗争，“**直到最后胜利**”〔182〕。

修正主义者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内的阶级斗争是客观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实际上他们千方百计地反对工人阶级和农民，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维护在苏联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产生的新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同时，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承认反对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实际上却不进行阶级斗争，而去搞资本主义国家内和国际上各对抗阶级的合作。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始终正确地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尽管如此，代表大会认为，党必须使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更正确和更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而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坚决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内开展这一斗争。

代表大会首先清楚地表明，同修正主义者宣扬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相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认为，即使在剥削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

的主要动力之一”。〔183〕

恩维尔·霍查同志曾提醒大家注意，在实践中往往存在对阶级斗争和阶级敌人的狭隘理解。在城乡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国内的阶级斗争的意义在宣传工作中往往被缩小了。有人说，阶级斗争的重点已转移到国际舞台上去了。实践证明，即使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国内的阶级斗争仍然是激烈的、时起时伏的，并且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交错在一起。此外，阶级斗争不仅针对着国内外敌人，而且也在党和人民内部开展，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各种不良现象和存在于劳动人民的思想 and 行为上的宗法制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观念、风俗和习惯。在每个劳动者的思想中都在进行着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激烈斗争。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受到剥削阶级的残余和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的威胁，而且还受到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通过和平演变从内部进行腐蚀的威胁。

代表大会指出，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将来仍然是党、国家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首要任务，并指示要把阶级斗争看得更广泛些。

“这是多方面的斗争，当前它首先是一场思想斗争，是改造人们的思想和灵魂的斗争，是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腐蚀、反对……各种残余和不良现象的斗争，是争取我们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胜利的斗争。”〔184〕

所以，为了把各个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党把思想革命，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争取无产阶级思想最后胜利的阶级斗争看作是主要环节。

思想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环节、作为在国内新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主要战线，是由客观和主观因素决定的。

国际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完全证明：

“只要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革命不获全胜，那么，政治和经

济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也就是不巩固的和没有保障的。”〔185〕

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必须为消灭思想和文化领域里旧社会的残余而斗争。因此，必须铲除一系列过去遗留下来的习惯、观念和风俗。要实现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在国内外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就必须有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摆脱了宗法制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观念和习惯以及宗教偏见束缚的，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革命锻炼和具有高度革命坚定性的人。

思想革命是党和工人阶级手中使社会的全部上层建筑实现革命化的强有力的武器。它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机构摆脱许多这样的法律准则、形式和方法，它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一阶段是适用的，而现在已经过时并成为迅猛前进的障碍。思想革命将清除一切渗入到上层建筑的不良的东西，并将为探索和贯彻新的更革命的准则、形式和方法指明道路，以便更好地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和使全体劳动群众直接参加国家和经济的管理。

思想革命的深入开展将进一步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改造作用。广大劳动群众掌握无产阶级思想，对完善生产关系，加强社会基础以及对发展生产力和开展科学技术革命将产生更有力的影响。

开展思想领域里的革命并取得这一革命的胜利，将防止象在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修正主义篡权和资本主义复辟。这样，就能保证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过渡到共产主义。苏联的悲剧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具有极大的教益，使它更好地懂得思想革命的必要性并更深入地进行这一革命。

思想革命将涉及到全体劳动人民、学生和整个国家生活。

对干部和全体知识分子进行革命的阶级教育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绝大多数干部、职员、从事技术和艺术工作的知识分子来自劳动人民，他们忠于党、忠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表现了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和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

恩维尔·霍查同志提醒说：

“但是，这些特点不应该使我们低估他们受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受修正主义观点影响的危险。这种危险不是臆造的，而是有现实基础的。它是同脑力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本身的性质和条件联系在一起的。”〔186〕

应该在阶级斗争中，在日常的革命工作中，通过同工人和农民打成一片，来对干部和所有脑力劳动者进行革命的阶级教育。

“我国的人民知识分子应该和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和工人、农民同劳动、同生活，和他们打成一片。人民知识分子应该抛弃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即知识分子什么都懂，只有他们才能指导、领导、教导和训导别人，这事实上就是否定群众的作用。应当明确，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某些个人，即使他们是十分杰出的，而是广大人民群众。”〔187〕

党认为，为了使干部和全体知识分子免受官僚主义、个人主义、名利思想、自高自大、追求安逸生活、唯知识论和技术至上的危险弊病的侵害，为了使他们保持和加强无产阶级的朴素作风、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经常使他们受到这样的革命锻炼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党教导说，干部和全体脑力劳动者同工人和农民打成一片以及他们的经常的革命锻炼，将防止产生逐渐凌驾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之上的特权阶层。在苏联，从工人阶级手中篡夺了政权的资产阶级阶层正是由脱离群众、脱离工人阶级及其领导的官僚化的干部组成的。这些干部受到了教育，掌握了文化，

但是没有受过系统的革命锻炼。相反，随着他们的教育和文化程度的提高，就拥有作为干部的许多特权，享受高薪；他们掌握大权，却不把这种权力置于劳动群众真正的监督之下；这一切使他们堕落了，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本色。

第五次代表大会指出，干部、职员、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和文化工作者、学生进行革命锻炼的十分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让他们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这是消除任何轻视和鄙视体力劳动的观点的主要途径，是脑力劳动者同工人和农民密切联系，使他们深刻地了解国家生活以及避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影响的最好方法。脑力劳动者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也是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重要方法。

党除了使干部和全体脑力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外，还采取了其他方法和形式来对他们进行革命的阶级教育，以便使他们同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打成一片。

代表大会认为，思想革命是斗争的最重要的战线，并规定在“象革命者一样思考、工作和生活”的口号下对人们进行革命的培养、锻炼和共产主义教育是一切思想工作的主要目标。

为了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代表大会要求消除在宣传和鼓动工作中的落后状况，根本改善教育工作的方法和作风。这一工作应该完全适应党和劳动群众的革命干劲。代表大会指示，要更坚决地继续进行斗争，根除在宣传工作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抛弃晦涩和枯燥无味的文风、多余的词句和模糊不清的提法。提出了在这些方面也大胆和坚决地发挥创造性思想的任务。

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革命工作，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原则性的激烈斗争，为克服重重困难而进行的巨大努力，这些对党和人民是一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学校。在这个时期，党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对自己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经验加以科学的

总结。这些总结反映在恩维尔·霍查同志的讲话和报告中，反映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和党的其他文件和材料中。

由于进行了这些总结，许多具有重大原则性和实践意义的理论问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但是，最近几年的生活所提供的十分丰富的实际材料尚未充分研究整理。当然，这些材料在今后的年代里还将更加丰富。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是，要特别根据阿尔巴尼亚的实践进行理论概括，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并把它们提高到科学水平。

同时，还批评了另一严重缺点，即特别表现在各级党组织、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日常工作中的经验主义、事务主义以及实践同理论脱节的现象。代表大会强调，领导干部、专家、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需要既在生活中学习、又在学校中学习，既在实践中学习、又从理论上学习，既在工作中学习、又从书本上学习，尽可能深入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

为使全体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引导广大群众进行思想革命，代表大会要求：

“坚决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唯知识论，即认为理论、哲学、科学和艺术是艰深的，群众是掌握不了的，只有干部和知识分子才能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某些有头脑的能理解它的人的特权和垄断物。它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只有为广大劳动群众所掌握，才不会成为抽象的东西，而会变成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巨大的物质力量。”〔188〕

文化革命直接为思想革命服务，文化革命的开展是和思想革命相一致的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全部文化工作、教育工作和艺术工作应该首先是为了

实现我们这个根本目的，即以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精神来教育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今天，我们党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提出文化革命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入的问题的。”〔189〕

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是要使艺术和文化牢固地立足于本国，来自人民并完全为人民服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贯忠实地坚持列宁主义关于艺术、文学和全部社会精神生活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艺术和世界主义是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象以往一样，文化和艺术工作者从阿尔巴尼亚文化和艺术遗产中只能吸取那些进步的、爱国主义的和民主的东西。阿尔巴尼亚人民若干世纪以来创造了具有健康和进步内容的精神生活的丰富宝库，这个宝库是艺术、文学和整个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牢固的基础和不竭的源泉。代表大会指出，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的艺术和文化吸取了并将继续吸取世界进步艺术和文化的经验，但决不会成为它们的奴隶，决不会不加深刻的分析、不用阶级观点加以批判就吸收任何东西。世界艺术和文化作品不管它们如何完美，就其整体说来都不能成为所有时代的典范。

在学校方面，学校的进一步革命化应该包括教育制度本身、教学和教育的内容及方法。学校革命化的首要问题仍然是使青年接受政治和思想的革命锻炼，使他们更加直接地作好走向生活和劳动的准备，教学和生产相结合以及通过劳动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为了完成学校革命化的任务，代表大会要求首先实现教师的革命化。党要求教师不仅要精通本行业务，而且首先是政治上成熟的人，是忠实和不倦地为党的路线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战士，是工作和生活中共产主义态度和品德的榜样。

第五次代表大会确定思想领域是阶级斗争的主要战线，并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这一斗争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政权。工人

阶级率领自己的同盟者，致力于维护和加强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武器——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被推翻的阶级的残余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则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力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权和社会经济制度。

苏联及东欧其他一些国家的沉痛教训证明，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总是企图通过思想和文化领域里的反革命来为政治、社会的反革命铺平道路。

因此，代表大会要求，思想和文化领域里的革命要同政治和社会经济领域里的革命紧密地联系起来，并直接为深入开展政治和社会经济领域里的革命服务。

巩固和完善无产阶级专政，仍然是深入进行政治领域里的革命的基本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就要继续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巨大斗争，这是阶级斗争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大家都应该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场

“为使政权及政权机关接近人民、接近广大工农群众和基层，进一步地、全面地发挥他们的创造性的斗争”。〔190〕

为此，必须首先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方法，要不断改进国家机关工作，防止旧的组织和领导形式、特别是机构臃肿的现象重新出现，要扩大无产阶级民主，保障群众更积极地和更直接地参加国家管理。这样，就可以避免人民政权受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腐蚀的任何危险。

不断加强和完善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在政治和思想上经过锻炼的、能够并随时准备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和社会主义祖国的人民军、公安机关和其他武装力量，仍同过去一样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主要方面。同时，代表大会强调指出，要加强工作，开展全国人民的体育锻炼和提高他们的战斗准备。

第五次代表大会要求，要坚决地遵循既定的道路，即把国家从农业工业国变成为工业农业国，进而变成具有先进农业的工业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而深入开展社会经济领域里的革命。

党坚持既发展工业又发展农业的路线，因为要使国民经济强大和独立，必须依靠工业和农业这两条腿。

同过去一样，工业化仍然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不完成这一任务，就不能推进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91〕。

在实行农业集约化这一发展农业的主要办法的同时，还提出了开垦荒地的任务。

代表大会提出的口号是：“**到丘陵地区和山区去，美化丘陵地区和山区，使它们变得象平原地区那样富饶**”〔192〕。贯彻这一指示不仅为增加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来源，而且也是在社会主义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山区，把文化、进步和繁荣带到山区去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不断缩小城乡差别、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差别、工业和农业的差别的问题得到特别的重视。党认为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而使城市人为地膨胀和使农村人口减少是错误道路而加以谴责和制止。缩小城乡差别应该在创造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基础上通过革命的道路来实现，即通过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扩大和特别是巩固社会主义关系，发展教育和文化，改善生活条件，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使农村得到全面的提高。在这一方面，不断加强工农联盟，加强城市对农村、平原地区合作社对山区合作社的全面的兄弟般的支援，起着重要的作用。

代表大会强调指出，党一如既往地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为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而斗争，并把这个问题看成是与自己的革命政策和工作不可分割的。

“党始终从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福利问题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理解出发，为在我国可能的范围内和在我国条件下不断改善人民福利进行了并将进行斗争……”〔193〕

与现代修正主义者不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提高福利不是为了满足小资产阶级的欲望，不是为一个阶层或某些集团保证奢侈的生活，而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不仅是今天的，而且也是明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的需要。这些需要将在同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个水平，同扩大再生产和国防的要求相适应的情况下得到满足。为了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福利的不断提高，代表大会指示，即使在将来

“积累基金的增长速度要永远高于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要把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194〕

贯彻有计划和集中地进行经济管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对推进社会经济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代表大会谴责和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经济方面以无政府主义的分散管理来取代集中管理的观点和企图。现代修正主义者实行对经济的分散管理，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发生作用和把社会主义经济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开辟了道路。代表大会表达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继续在统一的和总的国家计划的基础上对经济实行集中管理的决心。同时，代表大会提醒说，国家对经济的这种集中管理应该是彻底民主的，应同群众有组织地、广泛地和直接地参加这一管理、同扩大各级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的权力和职能结合起来。党将继续大力地反对导致在经济管理上以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取代民主集中制的任何表现和倾向。

代表大会指示，要继续努力使每一个企业以最少的开支获得

最大的效益,用自己的收入来抵偿支出,并保证社会主义的内部积累不断增加。为此,必须正确地运用和加强调节实行经济核算的企业活动的经济杠杆,如成本、利润、价格等。但是,和把利润说成是经济企业唯一的和绝对的目的修正主义者不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关和企业在自己的全部经济活动中始终把党的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进一步加强党和提高党的领导作用 第五次代表大会认为,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它的加强和锤炼以及它对整个国家生活领导作用的提高,是不断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并把这一革命进行到底的首要条件。

应该从苏联的沉痛的教训中吸取很多教训;在苏联,官僚主义、墨守陈规、形式主义和萎靡不振逐渐窒息了共产党,使它失去了革命精神,不能制止修正主义者篡夺政权和使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在苏联,由官僚化的干部组成的新的资产阶级阶层取消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建立了他们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统治。恩维尔·霍查同志在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时指出:

“……我们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方面,都不应该容许使党解除武装,被成绩所陶醉,变得萎靡不振,不应该容许让灰尘、墨守陈规的作风和官僚主义充斥党内。”〔195〕

因此,代表大会十分重视不断改善党的成分。代表大会指示,改善党的成分应该主要通过吸收新党员来实现,象过去一样坚持大多数党员应来自生产岗位,来自工人和劳动农民队伍这个方针。代表大会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更多地从妇女和青年中吸收党员,并要对这方面的宗派主义的和保守主义的观点及态度作斗争。

为保证新党员的更高的质量,决定预备党员的预备期由一年增加到二至三年,并要求进行更健全的工作,使预备党员符合党

员的崇高称号。因此，

“在预备期中，预备党员，特别是职员出身或本人是职员的预备党员及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或本人是知识分子的预备党员，应该在党的基层组织或党委指定的地方，在本地或外地，根据本人的职业，主要从事艰苦的工作，或者纯粹的体力劳动。预备期应该用来加紧对他们进行全面的思想教育。因此，他们应该完全接受基层组织和所在单位的领导，并且要使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准备转正的”。〔196〕

代表大会指出，在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标准不断为党吸收新鲜血液的同时，使共产党员不断接受革命的思想锻炼，对维护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阶级斗争也反映到党内。共产党员也带有各种不良东西的残余。共产党员也象所有劳动者一样，处于阶级敌人的压力下，特别是阶级敌人的思想压力下。这就是党内某些人蜕化变质并滑到反党立场上去的主要原因。敌人总是把通过腐蚀党员来瓦解全党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

为防止资产阶级的腐蚀，代表大会要求共产党员深刻和正确地认识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客观性，并经常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开展阶级斗争。共产党员必须首先在自己身上进行这一斗争，任何时候都不能认为自己不会受一切坏东西的侵蚀，自己身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斗的了。共产党员的经常任务仍然是：揭示党内矛盾，并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这些矛盾；不要低估和抹杀错误的观点和表现，而要很好地揭露它们的阶级性和对社会的危害性，并同它们进行原则性的斗争。

“不要为了维护所谓团结掩盖这一斗争，而应该开展这一斗争并将它进行到底，从而加强党的真正团结，发扬党的

革命精神和战斗精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197〕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贯认为，共产党员的团结和革命的思想锻炼是不能一劳永逸的。团结和革命的锻炼是在斗争中达到的，用斗争来维护，并通过党内外不断的阶级斗争来加强。

为使党和整个国家生活不断革命化，恩维尔·霍查同志认为，每个共产党员必须保持和巩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党员的优秀品质，这些品质是：

“我们革命党的党员必须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忠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这就是说，他们必须永远是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革命者和不屈不挠的战士，不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坚决地为党和人民服务一辈子，为了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准备作出任何牺牲。

共产党员应该具有自觉的铁的纪律，以钢铁般的意志执行党的路线和国家法律，尊重人民的好的风俗习惯。这绝不是说，要他们机械地执行指示。共产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要有创造性，应该深入理解党的决议、国家法令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具体实质，并根据自己所处的情况进行工作，使这些决议和法令得以胜利贯彻。

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党员应该意识到，入党没有也不可能给共产党员带来丝毫个人特权。它只能给党员带来大量的、艰巨的、责任重大的任务。谁不这样想，谁企图利用党证为个人、为家庭或者其他什么人谋取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特权，那他就一刻也不配享受党员称号这个崇高的荣誉。

共产党员应该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同群众一起生活和劳动，了解群众的心情和疾苦，站在群众的前面领导他们。共产党员应该同狂妄自大、傲慢态

度、命令主义、偏私行为、裙带关系和任何蔑视与轻视群众及其劳动的现象作不可调和的斗争，同带有这种危害劳动人民利益、危害我们党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倾向的任何人作勇敢的斗争。

我们党的优秀的、坚定的党员，就是坚决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的基本原则、时刻不忘并无所畏惧地在党内外开展阶级斗争的党员。他们应当善于通过正确的辩证的分析，区别好坏，区别危险的和不那么危险的东西，他们应当善于运用最合适的说服教育方法，最后才运用强制手段。一个优秀的革命的党员，能够以自己的工作和表现赢得人们的信任和爱戴，教育和挽救犯错误的人，以无限的仇恨无情打击那些危害社会的不可救药的分子以及人民和党的敌人。

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保持真正的革命警惕性，捍卫党的路线和党的理想的纯洁性。党员的特点应该是光明磊落，思想和行动上没有污点，坚持原则，决不隐瞒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等别人指出就进行自我批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批评同志的缺点，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并以自己的榜样，自己的纯洁性和正确的斗争纠正别人的缺点。

革命的共产党员，应该高度自觉地到党指定的地方和党需要的地方去工作，始终把整体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党员决不能容忍由于党或政权的某一机关的不正确的结论和决议所造成的不健康状况，也不能容忍某个负责人的错误或独断专行。”（198）

代表大会再次强调，党的基层组织的主要作用是使党员象不倦的革命者那样工作和生活。只有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思

想在党的基层组织内活跃起来，不断加强对工作的集体研究，使每个党员都毫不例外地担负党的具体任务，检查集体作出的决议是否得到彻底贯彻，并在这方面提出要求，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很好地起到这一作用。

代表大会指示，为了进一步深入贯彻群众路线，党要更好地利用它的强有力的杠杆——群众组织来进一步活跃这些组织。

代表大会要求清除任何轻视民主阵线组织的现象，要更好地运用这些组织，把它们作为加强人民在党周围的道义、政治上的团结的主要环节，作为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讲坛。

对工会组织提出的任务是改进它的全部工作，特别是改进对工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引导工人去领导生产和管理国家的工作。

代表大会指示，要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青年身上，让他们了解过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教育他们，特别是让他们投身到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义务劳动中去，使他们成为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的任何影响的坚定不移的战士，并用革命的阶级精神锤炼他们。

代表大会特别讨论了妇女的彻底解放问题。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思想和社会问题”，提出要对使妇女处于被奴役地位的观点进行激烈的斗争，要更坚决地继续努力提高妇女的人格，保证妇女在社会主义社会各个领域里享有应有的地位。

所有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和提高党的领导作用的问题，在代表大会作了必要的相应的修改的党章中得到了反映。

第四个五年计划指示 代表大会根据深入开展各个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制定了第四个五年计划指示。

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继续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通过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和建设新的项目来提高工业生产；首先通过农业集约化，集中力量更快地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以加速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

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增强国防力量。

通过革命的途径，进一步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规定工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左右，而第三个五年计划则为百分之六点七。

与一九六五年相比，工业生产将增长百分之五十到五十四，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八点七。生产资料的生产将增长百分之六十五到六十九，日用品的生产将增长百分之三十三到三十八。特别是化学、机械、电力、铜、镍铁、石油、玻璃以及陶瓷工业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在我国将第一次生产钢材、氮肥、磷肥、各种纸张、灯泡以及其他许多产品。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进入工业化的新阶段，即进入发展重工业的加工部门的阶段。这种工业的建立将改善工业生产结构，加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增强国民经济的独立性，大大促进农业的发展。

代表大会把发展农业看成是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主要经济任务的最重要的环节。工业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为农业服务。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一点五，预计一九七〇年的农业生产将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一到七十六。党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高于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是为了缓和农业与工业不平衡现象，缩小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在新的五年计划中，农业的基本任务首先是增加粮食、土豆、大米和食用油脂。党对农业提出的主要口号是“**保证粮食自给**”。代表大会指示，要把

这个问题的解决首先看成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保证大幅度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在这方面另一个因素是，在五年计划期间将开垦十一万五千公顷荒地，比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垦的荒地增长将近一倍。同时，代表大会指示，党和国家要帮助所有那些尚未集体化的占有农民土地百分之十左右的农户加入合作社。

为了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决定基本投资将比第三个五年计划增长百分之三十四。这些投资的百分之八十将用于生产部门。

国民收入将增长百分之四十五到五十，规定其中百分之二十八点二用于积累，百分之七十一一点八用于社会消费和个人消费。工人和职员的按人口计算的实际收入增长百分之九到十一，农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这就使商品流转额必须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到二十七。

关于人民教育事业，代表大会规定，在贯彻使它进一步革命化这一主要任务的同时，各类学校的学生人数增长百分之二十七，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干部人数增长百分之六十七到六十八。

同完成过去的计划一样，要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首先也应依靠本国内部的资源、资金、力量和潜力。然而，国内积累的绝对数量是不能完全满足第四个五年计划预计的基本投资和基本建设需要的。这一不足之数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慷慨的国际主义援助来弥补。这一援助主要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以及为了农业的进一步机械化。

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是宏伟而艰巨的。为了光荣地完成这一任务，党号召工人阶级、合作社农民、人民知识分子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才能和知识进行工作和斗争，以忘我的精神克服一切障碍和困难。新的五年计划是群众自己的创造性的成果，这一点比

以往任何一个计划都更加突出；广大群众在着手执行新的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计划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和干劲，使党更加相信这一切必将实现。

把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 第五次代表大会对国际形势作了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代表大会从这一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反对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不妥协的斗争，是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对自由和独立的命运，对社会主义的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任务。

美帝国主义和苏修帝国主义的新同盟的形成是国际形势的最基本的特点之一。

划分势力范围和两大国主宰世界的共同利益和当前的共同战略目标这是这一同盟的基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无论是美帝国主义者还是苏联领导人，都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并代之以现代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理论；——主要通过腐蚀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并使它们变成社会民主党式的、改良主义的、反革命的政党，来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通过腐蚀，在这一方法行不通的地方，就用武装干涉来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就这样来摧毁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美帝国主义和苏修帝国主义把坚持革命立场的社会主义国家及所有为争取自由、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革命力量看作是它们共同的主要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它们最大的敌人，是美国资本家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实现他们霸权目的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他们把主要矛头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修领导人企图利用蛊惑人心的“反帝”词句，千方百计地掩

盖苏美新同盟。然而这是办不到的，因为他们的全部对外政策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实际活动，贯穿着同美帝国主义者友好合作。苏美同盟正通过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条约及协定日益具体化，并正在各个领域里得到发展。

然而，美苏之间的同盟的发展不是没有困难和矛盾的。

恩维尔·霍查同志指出：

“同时，这两个大国各自竭力为自己争夺优势，加紧把伙伴集结在自己的周围，反对对方的集结，目的是为了挖对方的墙脚，靠损害对方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199〕

美帝国主义同意与苏联和平共处和合作，完全是为了遏制世界革命，阻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传播，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镇压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特别是越南人民的斗争。美国从来不放弃它独霸世界的最终目的。

建立世界霸权的目的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使美帝国主义不仅陷于同全世界人民的深刻的矛盾之中，而且也陷入同它的盟国——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同法国，甚至也同西德、英国、日本等国的深刻的矛盾之中。这些矛盾给世界帝国主义阵营造成了巨大的裂缝，并削弱了美帝国主义的力量。

使世界帝国主义阵线分崩离析的同样性质的矛盾也正在使世界修正主义阵线分崩离析。

“现在，修正主义阵线已从根本上受到了破坏，它就象一群饿狼，随时准备互相吞噬。指挥棒已经指挥不了整个修正主义乐队了。离心倾向和多中心主义的倾向正在增长，大国沙文主义的必然反应是产生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各派修正主义正在为争夺势力范围而相互倾轧，他们要求从卢布的控制下取得更多的自由和独立，而依附

于美元。每一派都极力维护自己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而同其他修正主义者的利益相对抗。”〔200〕

帝国主义阵线和修正主义阵线内部的矛盾、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修正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与帝国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者统治的国家内部存在深刻的对抗性矛盾的同时）的存在和不可抑制的激化，是他们越来越虚弱的标志。但是，代表大会提醒说，应该正确地认识这一事实，不应把敌人之间的矛盾估计过高。他们可能互相争吵和厮杀，然而他们又联合起来打击革命和社会主义。尤其是苏美同盟成了人类最大的危险。必须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来战胜这种危险，加强革命斗争，增强各国人民对在这场斗争中最后战胜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信心。

第五次代表大会再次强调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这一信念：

“通过世界各国人民和当代革命力量——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坚决的和共同的斗争，就可以粉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计划，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把革命推向前进，并赢得各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胜利。”〔201〕

代表大会明确指出，这场斗争不是轻而易举的和很快就能取胜的。各国人民必须准备进行一场激烈的、长期的和艰巨的斗争，这一斗争要求付出鲜血，作出牺牲，要求具有毫不动摇的决心和英勇精神。这场斗争将有起有伏，有进攻也有退却，有成功也有暂时的失败，直至最后胜利。革命是在克服重重困难和障碍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都遭到不断的打击。革命风暴特别席卷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英雄的越南人民以自己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为世界所有反帝和爱好自由的革命力量树立了令人鼓舞的伟大榜样。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不管他们如何虚

弱，都不会自行灭亡。他们越是接近灭亡，就越凶恶和越富有侵略性。

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世界所有反动派的一切侵略计划，为了更有成效地开展反对它们的斗争，并取得最后胜利，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客观需要是：

“各国人民组成广泛的世界反帝阵线，把矛头首先指向自由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坚持革命立场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无产阶级是这条阵线的核心，它们同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联盟是这条阵线的基础。今天，全世界人民的革命统一阵线应该同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联合阵线相对抗……。”〔202〕

为了使这一阵线真正具有反帝性质，就完全应该把所有那些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采取反帝立场的、在不同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团结到这条阵线中来。

代表大会强调指出：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以其全部政策和活动把自己置于反帝阵线之外。把修正主义者拉进这条阵线，就意味着把第五纵队和‘特洛伊木马’拉进来，从内部来破坏这条阵线。”〔203〕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坚决表示，不同意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任何联合行动。否则，它就是背叛了本国人民、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以苏联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而且也是**主要的敌人**。

代表大会再次指出，修正主义者借口所谓“反帝斗争”而提出的“联合行动”口号，完全是骗人的和蛊惑人心的手法。

代表大会在原则基础上严厉地批判了所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不反对修正主义本身，而只反对修正主义的影子，他们在现实面前闭着眼睛，装着似乎没有看见修正主义领导的背叛行径，他们要求同修正主义者和解和团结，采取中间立场。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出，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

“不可能有中间路线。‘金色的中间’路线是调和对立面的路线，是调和那些绝不可能调和的东西的路线。用中间路线来掩盖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各种倾向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如果不是以意识形态上的动机为出发点，而仅仅是从某些经济、政治矛盾出发，从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的基础出发，那就是一时的虚张声势。谁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的态度上坚持这条路线，他自己迟早也会有滑到叛徒立场上去的危险……

我们认为，今天突出地摆在日程上的尖锐而迫切的问题，不是同修正主义者调和和团结，而是同他们彻底脱离和决裂”。〔204〕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应该把反对整个修正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反对赫鲁晓夫和铁托修正主义的斗争提到一个更高的阶段。”〔205〕

代表大会祝贺在世界各国，也包括某些修正主义者统治的国家里一系列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小组的建立。代表大会再次表示，将尽一切可能来援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和所有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而斗争的人。

“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因为我们把这些新生的革命力量的成长和发展看成是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和粉碎修正主义的唯一正确的道路。”〔206〕

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小组的成立，是已经开始并正在

不断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分清界限的过程的结果。这是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之间斗争的必然过程，这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在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内和在整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共处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从来就是工人阶级政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分裂的主要根源。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说明，它从团结走向分裂，又从分裂达到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的新的团结。”〔207〕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阐明自己的下述坚定的观点时，正是注意到这一客观规律：

“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必将恢复，但是，这种团结将在清除修正主义者和叛徒，并同他们进行坚决斗争的情况下，由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恢复。”〔208〕

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阵线，为了加强国际共产主义的革命战斗精神，第五次代表大会认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建立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合作，加强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统一，是必要的和迫切的任务。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考虑到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中的十分巨大的作用，认为：

“处于平等和独立地位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力量，应该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紧密地团结起来，筑成一条使我们的一切敌人碰得头破血流的铜墙铁壁”。〔209〕

第五次代表大会最后一致选出了由六十一名委员和三十六名候补委员组成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并选出了中央监

察和检查委员会。恩维尔·霍查、阿迪尔·查尔查尼、贝基尔·巴卢库、果戈·努什、哈基·托斯卡、希斯尼·卡博、马努什·穆夫蒂乌、穆罕默德·谢胡、拉米兹·阿利雅、里塔·马尔科、斯皮罗·科列加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阿卜杜勒·凯莱齐、卡德里·哈兹比乌、科乔·蒂奥多西、彼得里特·杜米、皮洛·皮里斯特里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恩维尔·霍查再次当选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代表大会高度体现了党的坚如磐石的团结，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成熟性和不可摧毁的力量，以及党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代表大会在总结过去五年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关于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

代表大会表达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如既往地站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并把这场斗争一直进行到革命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彻底胜利的決心。

代表大会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世界上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力量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光辉体现。另一方面，通过参加代表大会的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政党和小组的代表，反映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它坚定的争取社会主义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斗争而在国际上赢得的敬意、爱戴、支持和巨大威望。

各个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政党和小组的代表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事件。

三、思想文化革命中一个新的质的飞跃

第五次代表大会对当前国内和国际重大问题所作的深刻的科

学分析和它所提出的方针，在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开辟了新的前景。代表大会提出的各项任务是国家生活各个领域里的工作基础。

两个主要环节：贯彻执行党的革命原则和准则，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思想斗争 全党及其杠杆都动员起来更好地向人民解释代表大会的方针和任务，使它们最广泛和最深入地得到落实。恩维尔·霍查同志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在地拉那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联合举行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党和政权的进一步革命化》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特殊的作用。

恩维尔·霍查同志为使党和政权进一步革命化，抓住了两个主要环节：深刻地认识党的革命原则和准则的哲学意义，用革命方式执行这些原则和准则；不断地、坚定不移地继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一贯坚决地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准则，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取得伟大胜利的主要源泉之一。但是，在国际范围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斗争尖锐化的形势下，在阿尔巴尼亚掀起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下，要更深刻地从思想上和政治上理解体现在党的路线中和党章里的原则和准则，并用更加革命的方式加以贯彻执行。苏联共产党蜕化变质的教训清楚地表明，放弃从思想上理解和用革命的方式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准则，是对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最大祸害，是使党涣散并变成修正主义政党的最大危险。因此，许多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必须克服那种由于胜利而产生的并使他们看不到缺点和错误的某些自满情绪。这种自满情绪包含着产生唯心主义的、非革命的、非辩证观念的危险，即认为党和国家的机关和干部、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的领导人是不会犯错误的和批评不得的。这就造成党组织内的批

评和自我批评，以及群众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批评往往是肤浅的和形式主义的。这就无法揭露许多缺点和错误，无法对它们进行严厉的斗争和及时加以纠正，使一些官僚主义者仍呆在他们的岗位上，贻误工作。

恩维尔·霍查同志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他们对缺点熟视无睹，不以革命的方式为执行关于群众路线、开展阶级斗争、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反对宗教、宗教偏见和落后习俗及彻底解放妇女等党的法令和准则而斗争。

“……超出党和人民的法令和准则以外的任何行为都是不容许的，不应让任何东西逃脱党和人民警惕的眼睛，任何人不向党和人民汇报自己的工作都是不容许的，任何人都应从党和人民那里得到他应得的东西。

基层组织中范围十分狭窄的、十分肤浅的和形式主义的批评应当结束了。”〔210〕

恩维尔·霍查同志要求全体共产党员都要深入学习和严格执行党章。他向党员们提出的任务是：要踊跃地参加对各项问题的讨论，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更严格地一视同仁地要求自己的同志，更严格地一视同仁地要求被选入党的领导机关的人。

恩维尔·霍查同志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吸收新鲜血液入党对党的革命化和党的存在本身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认为，在发展党员方面的迟缓现象是完全不能容许的，是危险的。他指出，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提高对被吸收入党的人的要求所作的指示，不应该被误认为是关闭党的大门。

为了消除形式主义，消除表面地执行或践踏党的准则和原则的现象，恩维尔·霍查同志认为，全体共产党员必须积极地、不断地参加革命活动，与此同时，还要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党成立以来的文件和资料，这对向共产党员进行马克思

列宁主义教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这些文件和资料是一所革命的大学校。

恩维尔·霍查同志阐明，只有通过反对官僚主义和沾染了官僚主义的人的斗争，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革命路线、原则和准则。在一九六五年底和整个一九六六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大规模的运动之后，这个斗争不应该放松，更不应该结束。只要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就不能结束。此外，这一斗争不象某些人理解的那样，单纯地采取一些行政技术措施。压缩政权机关、经济机关和文化机关的过于庞大的编制，减少公文，更正确地规定各级国家机关与合作社机构的权限，是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起重要作用的必要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仅仅是这个重大问题的行政技术方面。官僚主义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是与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形成官僚主义的观念是唯心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的。所以，要粉碎官僚主义和斗倒官僚主义者，必须对他们首先开展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恩维尔·霍查同志强调指出，这场斗争需要直接由群众来进行。党的任务是要保证使群众的呼声尽量强烈，使群众的批评有力地 and 正确地冲击缺点和错误、官僚主义观念和歪风以及官僚主义者，而不管他们的职位多高。党不怕群众的呼声，也不怕群众的批评。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怎么能害怕群众、害怕群众的呼声和批评呢？怕，就不配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但是，害怕的，从来不是党，而是某些个人，某些党员，某些国家工作人员，是害怕群众的官僚主义者，是这些利用党和政权的威信压制群众声音的人。我们应当压制这些人，应该由党和群众同时以革命的方式来对他们进行压制。”〔211〕

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恩维尔·霍查同志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的讲话，对党和整个国家生活的革命化是一个新的强有力的

推动。

党组织内讨论问题、原则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气氛空前活跃起来了。共产党员在工作中和在行动上的战斗精神提高了，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的先锋作用更加突出和明显了。

全国掀起了一个新的强大的革命高潮。群众为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任务加紧了他们的创造性活动。大家都动员起来了，勇敢地批评自己和别人，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斗争，火烧旧社会的残余——不良的观念和表现，清除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杂草。在这方面，闪电报，作为在这个革命高潮中产生的、用来进行群众性的同志式批评的新的战斗形式，起了重要作用。群众自己提出了有关促进生产，根除错误思想，使劳动人民接受思想上的革命锻炼，使人民政权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民主化以及增强国防力量的非常好的建议和倡议。这些体现在群众的含有深刻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经济内容的许多具体活动中的倡议，变成了伟大的革命运动。这些运动是：处处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运动，反对宗教、宗教偏见和落后习俗的运动，彻底解放妇女的运动，等等。

以空前规模蓬勃开展的新的革命运动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发展和日益高涨为这些运动作好了准备。它们是党一贯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路线的结果，是积累党和劳动群众丰富的革命经验的结果。它们是思想和文化革命中的一个质的飞跃。

象以往一样，工人阶级站在这些革命运动的最前列，它以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革命精神和革命坚定性，为其他劳动人民树立了榜样。

在这些运动中，在城市和乡村，特别是在男女青年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数以千计的先锋战士。从这些战士中吸收了相当一批在工作和斗争中经过考验证明自己是坚定的革

命者的人入党。

处处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运动 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运动，调动了全体劳动者——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个运动是通过各种形式和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

工人阶级提出了大量倡议，争取提前两三年达到计划中一九七〇年的主要经济指标；在不动用国家保险储备，在消耗原料和进口产品不超出计划等条件下完成和超额完成经济任务。结果，使完成经济计划的速度更快、更稳定了；工业、地质勘探、建筑、运输和商品流转都普遍超额完成了经济计划。自力更生地建起了新的工厂、车间和作业线，并生产出一系列过去要由国外进口的新产品。对待劳动和社会主义财产采取错误态度的现象减少了。先进工作者到落后班组去带动它们前进。那些力图在业余以私人劳动牟利的少数工人，大部分已放弃了这种有损社会主义觉悟的活动。

在落实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各项任务中，农民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规定在五年计划期间完成的关于实现山区农村集体化的任务，在三个月内就完成了。这样，一九六七年三月，全国完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合作社农民提出了许多关于大量开垦荒地、加强集体经济和集体劳动的倡议。

减少合作社社员的自留地是农村中最重大的革命倡议。由卢什涅区“斯大林”合作社和费里区“恩维尔·霍查”合作社发起的这个倡议，很快就遍及全国。所有合作社的自留地面积都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六，自留牲畜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平原地区合作社减少的幅度更大。随着自留地的减少，集体经济对于社员自留地的毫无疑义的优越性显得更突出了。这项在社员自愿的基础上所采取的措施，符合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方针，即根据集

体经济满足社员家庭生活需要的能力增长情况相应地逐步减少社员自留地。代表大会指出,社员的这些要求越是得到很好的满足,自留地对他们就越没有必要。但是,减少自留地的运动发展得那样快,以致超出了代表大会的预料。

减少社员自留地,在根除小私有者心理、使农民更紧密地与集体所有制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对这个所有制形成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观念方面对农民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同时,地拉那区“季米特洛夫”国营农场职工关于国营农场职工放弃自留地的倡议,在全国得到了推广和实行。

在把整体利益置于一切之上的运动高潮中出现了干部和全体知识分子要更加广泛地参加生产劳动的倡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地拉那“霍查机械厂”的领导干部和行政管理人员提出的关于用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倡议以及莱什区特洛尚合作社的领导干部和行政管理人员提出的关于直接参加生产劳动、每年做一百个劳动日的倡议。这些倡议在所有国营企业、手工业企业和农业合作社都得到了响应和实行。甚至规定生产单位的各级行政人员以及小型企业和小型合作社的领导干部要更多地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而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军人,教育、艺术和文化工作者将继续每年参加生产劳动三十天(妇女十五天)。由于领导干部和行政管理人员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因而加强了他们和群众的联系,使他们更深刻地了解社会经济问题和生活本身,进一步受到了革命锻炼,官僚主义的表现和歪风越来越少,领导工作的方法和作风有了改进。这标志着在日益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

工人和知识分子关于放弃稿费、放弃许多额外报酬和基本工资以外的其他收入以及把公债捐献给国家的倡议,是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出色表现。

全国性和地区性的青年义务劳动，如修建罗戈琴—费里铁路，修建大山公路等，是进行革命教育的大学校和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表现。成千上万的青年义务劳动者，学生，工人和农民，以高度的革命精神进行劳动，学会更加热爱劳动，更加热爱同志，更加有效地进行破除旧事物、建立和传播新事物的斗争和更好地为祖国和社会主义服务。

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运动取得优异成绩，不是没有遇到困难的，不是没有新的、进步的同旧的、反动的事物之间的尖锐冲突。群众的革命倡议遇到了许多世代以来就形成了的、根深蒂固的、依靠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宣传和宣传而滋长的私有观念和自私观念的抵制。这些观念仍然顽固地存在于相当多的劳动群众的头脑中。一些有小私有者心理的农民犹豫不定，不能立即下决心仿效同村大多数农民的榜样，实行土地和牲畜集体化，减少自留地。在企业与合作社领导干部和行政管理人员中，有些人追求个人利益，不准备实现先进倡议所提出的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天数。有些家长阻止自己的女儿参加青年义务劳动，等等。

集体的力量，党的思想斗争和它的说服工作，克服了所遇到的这些障碍和困难。

党全力支持革命倡议，并使它们在全国得到推广和进一步的发展。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使大家认识到反对把个人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的斗争，是一个具有思想和社会意义的大问题，是一场为了消除漠不关心、利己主义和对待劳动及社会主义财产的错误态度的根源的斗争，是为了堵塞传播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切孔道。党及时地打击了在贯彻这些革命倡议时违背自愿原则和说服原则的个别现象，并消除了对这些倡议的任何歪曲。党指出，这场斗争并不是为了否定或取消个人利益，而是为了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使个人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公告，对处处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起了特别的作用。

公告总结和确认了革命倡议。同时，在这些倡议的基础上，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宣布采取一系列社会经济措施，这些措施将创造更好的条件来加强劳动人民对深入开展把整体利益置于一切之上的运动的思想信念。

根据公告的指示，进一步按社会主义原则改进了对劳动的组织工作，调整了工资。在工业、建筑、农业和其他各部门里，开始推广用集体定额代替个人定额，这是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劳动的更先进的阶段。党中央和部长会议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精神鼓励较物质鼓励的优越性越来越大的事实出发，采取了基本上清除工资制度中刺激性的物质报酬的措施。取消了绝大多数的物质鼓励。进一步降低了高工资。采取这些措施所节余的全部款项，通过调整工资和增加国家对幼儿园和托儿所的开支等，仍然用在劳动人民身上。取消了劳动人民的所得税。从这些措施得益的主要是全年收入较少的劳动人民。

贯彻进一步改进组织劳动的工作和调整工资的措施，始终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些具有原则意义的措施是杜绝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其他有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不良现象的手段。

山区农户全部集体化，减少自留地以及第五次代表大会为更多地支援山区提出的特别任务，向党、政权和人民群众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党和政府决定采取特别措施，帮助农业合作社，尤其是那些刚刚成立的山区农业合作社，以便使它们克服困难，沿着代表大会所指出的道路前进。这样的措施包括：完全取消社员自留地的所得税；取消新成立的山区合作社的所得税

等；把肉类的征购价格提高到收购价格；国家通过提供无息贷款给新成立的农业合作社以更大的支援；国家增加在山区和丘陵地区进行土地改良工程和灌溉工程的投资，等等。根据党中央和部长会议的指示，由减少自留地和自留畜而得到的土地和牲畜，全部地或部分地用来以实物满足社员家庭对农产品的需要。为直接帮助山区合作社，除了其他措施以外，党还派遣了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青年联盟成员、干部和各种专家到那里去工作几年或永远工作下去。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巩固集体农业经济和保证以更快的速度提高农村，尤其是山区的物质福利、文化水平和改善社会状况。

山区全部集体化之后，党在这些地区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比过去有很大的提高。

把整体利益置于一切之上的运动提高了城乡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这个运动越是扩大和深入，工农的倡议就越大胆和富有革命性，同时，党、政权和经济部门干部的领导工作的革命化就越深入，他们就越能更好地从群众的革命经验中吸取教益，以利于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武装起来的人的思想的进一步革命化，解放了过去在制定经济远景计划时没有估计到的新的干劲和力量。

劳动人民关于提前两三年达到甚至超过生产指标和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倡议，在全国，在工业、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里得到了推广。迪勃拉区和利布拉什德区在二十五天内建成了六千三百多幢因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地震而倒塌或严重损坏的房屋和其他建筑物，提供了空前的好经验。

这种形势使党和国家机关必须重新审核计划，以适应群众的革命热潮。党中央全会决定，一九六八年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要

超过第四个五年计划的规定，在农业方面，各种作物要超过原定的单位面积产量。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是，到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也就是说，比国家远景规划规定的期限提前十四年实现全国农村电力化。

处处都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运动，把人民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为执行建设社会主义或保卫国家的任务而献出生命的劳动者留下来的岗位，立即由他们的父母、亲人和数以百计的其他人接替，这体现了具有深刻社会主义内容的崇高的爱国感情。在罗戈琴—费里铁路的建设中，来自杜卡吉尼的十五岁的女共产党员什库黛·巴尔·瓦塔牺牲了，祖国四面八方的数以千计的青年去接替她的工作。

高度的爱国精神还表现在社会主义的兄弟般的相互帮助上。阿尔巴尼亚其他各区的劳动人民为消除地震后果给了迪勃拉区和利布拉什德区兄弟以这样的帮助。

发罗拉区特拉加斯和拉季马联社提出的关于较富裕的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向偏僻山区合作社赠送相当数量的大小牲畜的倡议的推广，尤其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这个倡议扩大了社员思想中集体财产的概念。这使他们看到，每个合作社的进步和福利都是与全国所有的不管是平原地区还是山区的农民与合作社的进步和福利分不开的。这一倡议通过新的革命途径改善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并把它提到更高的阶段。

反对宗教、宗教偏见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贯对反动的思想和落后习俗的运动 和毒害人民的鸦片——宗教进行了不断的斗争。

党认为，反对宗教、反对宗教偏见和反对与宗教直接或间接联

系在一起的落后习俗的斗争，是使劳动人民得到社会解放、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与文化、使人民群众受到革命的思想锻炼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党认为，消除社会经济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是把劳动人民从宗教的精神奴役下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党一贯把反对宗教的斗争同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在反对宗教和落后习俗的斗争中，党根据当地的历史条件和宗教信仰的实际情况，根据革命的各个阶段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程度，正确地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方法。在这一斗争中，党一贯遵循信仰自由的原则，使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相信，宗教是无用的、对社会主义社会是有害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对待宗教和落后习俗方面所采取的决定和措施，始终体现了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和利益，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利益。

在阿尔巴尼亚，各种宗教都是为外国和本国统治者分裂和奴役人民服务的。这些宗教一贯是各国占领者的思想武器。因此，阿尔巴尼亚人世代代反对外国的统治和压迫者的斗争，也是针对外国压迫者的工具——反动僧侣的。这就使阿尔巴尼亚人民与宗教的关系不很密切，不是那么狂信，因而僧侣在人民群众中没有象在其他许多国家那样的影响。这一事实使党更容易进行反对宗教思想和反动僧侣的斗争。

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党粉碎了意大利和德国占领者以及我国卖国贼妄想把人民分成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的一切企图。党揭露和粉碎了宗教上层头目，尤其是天主教的上层头目妄想使人民群众脱离党和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切企图。

解放后，反动僧侣和其他阶级敌人用“圣言”来阻碍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企图，也同样遭到了失败。这些企图丝毫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人民只听党的话，照党的指示办事。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宪法宣布国家和教会分离，学校和教会分离，禁止用教堂和宗教来达到政治目的，禁止按宗教成立政治组织。依法没收了宗教机构的大部分土地和其他财产。禁止了宗教书刊的出版，限制、以后又取缔了训练宗教骨干的活动。但是，党和政府并没有禁止宗教信仰、宗教团体的存在和举行宗教仪式。党和政府也没有禁止那些在本质上虽然反动、但并不直接违反国家法律的与宗教有关的风俗习惯。党不能伤害一些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村劳动群众的感情，他们虽然都同党和人民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还信仰这种或那种宗教，尽管不是那么过分地狂信。根除宗教世界观，只能是对群众进行思想说服的结果。

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家的建设，本身就是对劳动人民进行无神论教育的一所大学校。它们告诉人们，自由和独立、进步和富裕不是来自祈祷，也不是靠“上帝”恩赐，而是要靠人们以自己的斗争和努力去争得的，它们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同时，为了使人们摆脱宗教信仰和落后习俗，党通过讲课和座谈、报刊和广播、图书、电影，特别是通过学校，通过普及文化、教育和科学知识，进行了广泛的无神论科学宣传。

所有这一切，都为使反对宗教、宗教偏见和落后习俗的斗争过渡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创造了条件。第五次代表大会和恩维尔·霍查同志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讲话发表后，这一斗争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并成了一场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伟大运动。人民中各个阶层，其中包括老年人在内，都参加了这一斗争。它通过具体行动不仅反对反动的宗教世界观，而且反对维护和滋长宗教与落后习俗的一切物质基础。

城乡群众都已行动起来，他们要求关闭教堂、清真寺、寺院和所有“圣地”；要求僧侣们放弃寄生生活，成为象大家一样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民主阵线和青年联盟组织的集会上进行了热烈的

讨论，人民谴责了宗教、反动僧侣和宗教习俗所起的反民族、反人民的作用，决定取消宗教活动中心，并把它们变为文化中心等，抛弃宗教仪式和落后习俗，清除家里的神像、宗教书籍和其他象征宗教的物品。

人民的这些倡议得到了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机关的有力支持。

随着宗教活动中心被摧毁，毒害人们意识的、也作为进行敌对活动的巢穴用的重要基地被摧毁了。

党支持了人民反对宗教、反对宗教偏见和落后习俗的运动，并慎重地领导了这一运动。党不允许发生偏差，及时制止了不是建立在人民群众自愿的基础上的、操之过急的一切行动。党引导人民以具有社会主义内容的新节日、新习俗代替宗教节日和其他与宗教有关的习俗。在群众为摧毁宗教活动中心而采取行动时，党进行了大量的科学无神论解释工作。

中央委员会指示各级党组织，要反对在反对宗教问题上的任何狭隘认识，要反对由于在很短时间内在摧毁宗教活动中心方面取得了辉煌成果而沾沾自喜的任何表现。摧毁教堂和清真寺并没有消灭作为世界观的宗教。宗教是根深蒂固的。它与许多世纪以前就已产生并长期存在和发生影响的落后习俗交织在一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习俗和习惯法，如集中世纪风俗习惯之大成的《莱克·杜卡吉尼法规》，曾经以铁腕控制了阿尔巴尼亚社会。它们的恶劣影响直到最近还很厉害。宗教习惯和落后习俗也渗透到了那些不信教的、但在不理解的情况下不自觉地遵守这种习惯和习俗的人的生活中。所以，必须揭露落后习俗、宗教习惯和教理的根源，揭露它们的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并为摧毁这一基础而斗争。

恩维尔·霍查同志教导说：

“我们应当是现实主义者，反对旧的习俗、传统和准则的斗争，反对宗教世界观……的斗争，还没有结束。这是一场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斗争。因此，我们的说服教育工作应继续不断地进行，以便落实和贯彻大家在群众集会上所作的保证，把反对同我们的事业格格不入的、有害的东西的斗争不断推向前进，在人们的头脑中树立我们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世界观，树立新的社会主义的风尚、习惯和准则。”〔212〕

为了把反对宗教、宗教偏见和落后习俗的斗争进行到底，党中央指示，要更好地利用为这一斗争所创造的有利条件，始终贯彻群众路线，按不同的宗教，按阶层，按地区、村庄和街道，甚至按家庭有区别地进行工作。

彻底解放妇女的运动 反对鄙视妇女的落后的、反动的习俗和观点的斗争，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使妇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完全享有同男子平等权利的运动，特别有力地开展起来了。恩维尔·霍查同志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发出了关于开展这场伟大的运动的号召：

“全党全国都应动员起来，火烧一切践踏党关于捍卫妇女权利的神圣法律的人，并砸烂他们的脑袋。”〔213〕

为贯彻党关于彻底解放妇女的指示，各级党组织动员起来了，妇联、民主阵线、工会和青年联盟组织，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也都动员起来了。年轻一代站在运动的最前列。但这场运动是这样猛烈，以致把过去对解放妇女问题采取漠不关心态度或站在保守主义立场上的社会阶层也卷进来了。在全国各地举行的群众集会上，男女老少都勇敢地谴责了过去用来奴役阿尔巴尼亚妇女的手段，保守的、宗法制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习俗和观点，宗教信仰，中

世纪的法规。在群众集会上，大家一致决定并向党保证，将永远抛弃野蛮的习俗和法规的残余。会上热烈讨论的问题有：如何消除使妇女在地位上低于男子的一切现象和表现，如何保证妇女更踊跃地参加全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保证她们更广泛地参加生产活动，进一步提高她们的文化教育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如何把妇女从家务劳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等。妇女空前踊跃地参加争取彻底解放的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山区妇女和所有那些被宗教习俗、法规和偏见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地区的妇女，第一次这么强有力地站起来参加这一斗争。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在家庭内部也开始进行为彻底解放妇女和争取男女完全平等的运动了。

彻底解放妇女的运动，是党从成立以来不断进行斗争和大量工作的直接的、必然的结果。党向阿尔巴尼亚妇女指出，最广泛和最积极地参加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为消灭一切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参加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是她们获得解放的唯一途径。

阿尔巴尼亚妇女遵循党的教导，积极参加了民族解放战争，用鲜血赢得了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体现在反法西斯会议一九四四年十月发表的民权宣言中和后来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宪法与其他法律中。

在党的领导下摆脱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阿尔巴尼亚妇女，象所有其他劳动者一样，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各条战线上的一支强大力量。如果考虑到过去绝大多数妇女是真正的奴隶的话，那么二十多年来阿尔巴尼亚妇女在争取彻底解放的道路上所取得的进步就是很大的了。在人民议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十八；在各级人民会议和人民法院中，妇女占百分之三十六以上。几万妇女被选入了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在妇女参加社会生产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九六七年，妇女占全国城乡劳动者总数的百

分之四十二，而在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卫生事业和其他一些部门，妇女则占大多数。在文化教育和专业技术方面，与战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妇女是文盲的严重情况相比，现在所有女孩子都受到初小和八年制义务教育，在中学和高等院校中，女生人数同男生人数非常接近，数以千计的受过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妇女在各经济部门和文化部门工作或担任领导，女工程师人数为战前阿尔巴尼亚工程师总人数的五倍，女医生人数是旧阿尔巴尼亚医生总人数的二点五倍。

党意识到，尽管取得了这些进步，但在彻底解放妇女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妇女充分地、更踊跃地参加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方面，还受到男子的阻碍，妇女也犹豫不定。妇女在生产中应起的作用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妇女的文化教育水平总的说来还是低的。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在家庭里还没有取得同男子平等的地位。旧社会的落后习俗和观念，特别是山区的法规习惯，还有很大影响，是实现男女真正平等的主要障碍。席卷全国的彻底解放妇女的伟大运动，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由于把彻底解放妇女看成是一个极其重大的社会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想象人民和每个人的自由，就不能想象国家的进步和达到我们的目的”〔214〕，所以党中央全会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召开的一次专门的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

全会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彻底解放妇女的运动和提高妇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指明了方向。

党中央再次指出，保证妇女获得彻底解放的主要途径，是引导她们最广泛地参加生产劳动，参加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

指示要消除一切障碍和限制，引导妇女参加经济和文化各部门的工作，参加整个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参加党的工作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在提拔妇女担任负责工作这个问题上，特别要

求来个转变,以便保证妇女更广泛、更踊跃地参与对生产、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的组织领导工作。

吸收女同志来壮大党的队伍,是进一步活跃党组织的生活、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的一个条件,这项工作受到了很大的重视。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党中央认为,首先必须更坚决、更激烈、更系统地反对对妇女的各种不正确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主要存在于男子的头脑中,但妇女也有。

在进行这一斗争的同时,必须进行更多的工作,保证进一步提高妇女的文化教育和专业技术水平。为此,中央委员会责成各级党政机关,要注意使所有女孩子根据义务教育法令的规定,读完八年制学校,优先把她们送入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学习。中央委员会指示,同时还要努力保证妇女更好、更广泛地参加夜校学习,举办更多的妇女培训班。

全会指出,妇女充分参加生产,参加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家庭关系的发展,还取决于妇女摆脱繁重的家务劳动。

劳动人民从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下获得解放,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和公有制的建立,以及阿尔巴尼亚妇女在党的领导下所赢得的特殊权利,都是对奴役妇女的旧的家庭关系的最沉重的打击,并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家庭创造了条件。但是,私有观念还没有消灭,还存在着许多旧的、落后的传统和习惯,阻碍新的家庭关系的建立。

中央委员会指出:

“因此,要改变家庭关系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家庭关系,就要在一个复杂和困难的领域里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心理、道德和习惯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和全面的斗争。”〔215〕

中央委员会指出，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新家庭，主要的是：要根除婚姻和夫妻生活中的旧关系；建立新的婚姻关系、正确的夫妻关系和妻子同家庭其他成员的正确关系，摆脱了私有观念、宗教规范、落后的习惯和观点的关系。为了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家庭关系，指示要重新审查调节家庭关系的一些旧的法律规范，并代之以适合社会主义革命发展新阶段的条件的新规范。

为使妇女摆脱家务劳动的奴役的斗争，是保证妇女实际上同男子完全平等的另一十分重要的途径。正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见的那样，只有实现家务社会化，并把家务变成社会生产的部门，才能完全达到这点。但这是一件复杂的工作，它要求具有十分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要求拥有如此之多的物质和财政手段，以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长时间内不可能完全达到。为了使妇女摆脱家务劳动的重担，我们不应等待完全实现家务社会化，而应更坚决地在两个主要方面进行工作。第一，要求每个男子同妇女一道从事家务劳动，以便减轻完全压在妇女肩上的家务劳动重担。家务劳动不仅是妇女的事情，而且也是男子的事情，是家庭所有成员的事情；每个男子必须懂得这个思想，必须从幼年起就深入地灌输这个思想。家庭和学校在引导孩子们参加劳动和家务方面不应该对男孩和女孩有任何区别。第二，党提出了更好地利用和更快地扩大社会服务网的任务。指示要超计划地增加托儿所、幼儿园的床位，成立食堂、洗衣房等，更多地生产和出售减轻家务劳动的设备。

中央全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彻底解放妇女的运动的任务，使这一运动不至半途而废，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解放妇女是对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使党提出的这个重大问题成了整个社会的问题。

学校革命化运动

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学校进一步革命化的任务,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为了实现这项任务,学生和教师提出了许多倡议,开展了各种带有政治思想性质的活动。

很多学校把学习党的基本文件和恩维尔·霍查同志的著作列为专门的活动。广大学生和教师不仅参加了校内的、而且参加了校外的反对宗教、反对错误观念和落后习俗的斗争。学生们在什库黛·巴尔·瓦塔和其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英雄事迹的鼓舞下,纷纷表示不惜一切,不怕任何困难和牺牲,随时准备到祖国和社会主义的利益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

在人民群众处处把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伟大运动的影响下,提出了要反对“上学还有什么用”的落后的个人主义观点的倡议,开展了争取优良的学习成绩和全部都升级的活动。

在争取优异成绩的同时,还开始了使教学内容革命化的斗争。提出了关于根本修改和改进教学大纲与教材、采用新的更有成效的教学教育方法的大胆设想。很多学校抛弃了资产阶级传统教育学的教学法公式和教学方法,开始进行改进教学工作的试验。

在使学校与生产紧密结合方面提出了很多重要倡议。在这方面,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青年义务劳动起了很大作用,但除此以外,还提出了要使教学直接联系生产的倡议。许多城市学校建立了修配厂和各种工业生产车间。同时,加强了城市学校同工业企业、建筑企业的联系。在学校和企业里劳动,使学生能掌握生产劳动的技能,并打下一定的专业基础。农村学校正在努力使学校同农牧业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很多中等专业学校既是学校又是工厂、既是学校又是工地、既是学校又是农场、既是学校又是林场。此外,工业企业、建筑企业、农场和农业合作社自力更生地开办了许多专业学校和专业训练班。劳动群众到这些学校和训练班里学

习是不脱产的，从而贯彻了这一原则：边劳动，边学习；边学习，边劳动。

在许多倡议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是把青年的学习和对青年的教育与体育锻炼、军事训练结合起来。

在关于学校革命化的倡议中贯穿着对资产阶级古典教育学中的保守的、反动的、陈旧的准则的革命批判精神，贯穿着对在师生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多礼而冷淡的现象的革命批判精神。

在进行教育革命化活动的同时，教师和学生还提出了关于在校外开展活动的一系列倡议。米尔迪塔和科洛涅区的教师提出关于进一步深入农民群众、同农民群众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向农民群众宣传党的政治路线的倡议，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倡议已在全国推广。农村教师自愿担任农业合作社的文化馆和文化站的管理工作。教员和学生已成为清洁卫生等运动的组织者。教员和学生和群众当中开展政治思想和文化活动，直接促进了学校自身的革命化。

学校的革命化具有一个广泛运动的性质。党把它看成是思想文化革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把它看成是推动科学技术革命的武器。学校是培养年轻一代的园地，党一贯最关心的是使年轻一代成为当之无愧的革命接班人，以最大的忘我精神和才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人民政权建立以来的二十五年内，学校同资产阶级旧学校相比，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发展和提高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校已成为知识的摇篮，成为给经济和文化各部门培养干部的熔炉，成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党的政策教育青年的园地。教育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财富。

尽管这样，学校还没有完全摆脱资产阶级教育学和资产阶级学校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摆脱修正主义的不良影响。一般说来，教

学和教育工作还是脱离生活、劳动和生产的。教学法中有形式主义和保守主义，师生关系中存在着多礼而冷淡的现象，还有束缚学生个性的现象。这些都是旧学校遗留下来的，我们不得不把其中许多东西接过来。这些缺点的存在，也是由于受了苏联学校的影响。苏联学校的经验，曾给了阿尔巴尼亚教育事业以相当大的帮助，但是它还保留了资产阶级教育学的许多特点，因而也有坏的一面。

随着阿尔巴尼亚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就必须使学校这个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摆脱束缚它的弱点、缺点，并对学校进行革命改造，以适应社会基础中发生的变化、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客观条件和需要。这些变化应使阿尔巴尼亚学校产生质的飞跃。

只有在本国学校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并通过对这些经验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性的分析，才能实现教育方面的革命变革。

恩维尔·霍查同志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党关于学校进一步革命化的方针。他的《关于我国学校的进一步革命化》的讲话是一个伟大的工作纲领。这个纲领正是建立在科学地分析和总结阿尔巴尼亚新型学校的经验和学校革命化运动的经验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党的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总路线的基础上的。

党要求学校首先要加强和改进培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武装起来的革命的新的新人的工作。

为此，就必须使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恩维尔·霍查同志指出：

“党应该用一切方式方法，首先用给一切科学指明道路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教育每个人：学生、教师、教

育工作者、人民、工人、农民、大人和小孩。”〔216〕

将通过一些专门课程，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政治经济学等，来继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还将通过其他各种课程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课程都应始终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党的无产阶级政策。

但是，仅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不可能使学生受到革命锻炼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武装他们。要达到这点，还要通过革命活动，通过教学密切联系生活，学校密切联系生产，联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通过使青少年最积极地参加社会工作，参与解决政治经济问题，参加阶级斗争。

每个学生都应深刻地认识到，学习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为了在政治、道德和科学技术上获得为社会、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最大才能的方法。

恩维尔·霍查同志指出：

“要使我们党的思想和政策有机地贯穿到教学和教育工作中去，就应该同时实现教学与劳动相结合及学校实行综合技术教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217〕

教学与劳动紧密相结合和学校实行综合技术教育，这不仅是一个观念形态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问题。因此，这个问题的实际解决，应与解决深入开展社会经济方面的革命以及进一步开展科学技术革命的任务相适应。

学校与生产相结合，也是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一个重要手段。

要达到这些目的，就必须重新审查教育体制的改进和布局情况。

“向更先进的文化教育和经济技术阶段的过渡，将使学校得到根本改造，这种过渡应该始终适应需要，并为当时

的形势服务。”〔218〕“……同一切事物一样，我们的学校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时候，在形式上、结构上和内容上也会发生变化。只有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这就是统帅学校的各个方面和各项改革的柱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219〕

进一步改进教育体制的整个工作都应以这一方针为指南。新的形势特别要求重新审查整个中等学校体制和高等学校体制。新设立的各种类型的学校应更好地满足经济、文化、卫生等各部门对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干部的需要。

在改进教育体制的同时，重新审查和修改各种学校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新的大纲应更好地确定各种课程所占的比例，更正确、更清楚地规定各个年级、各种学校或训练班在学习结束时应该达到的知识水平和目的。必须删去教材中的一切多余的和无用的东西，删去那些空话和含糊不清的提法，应该使教材尽量简化，使学生易懂，而首先应该具有最健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内容。

“教材应该被看成是具体体现党的路线、政策、当前的目标、纲领和为将来作准备的重要领域。我们不应该认为，社会主义新学校可以采用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并存的任何一种教材。我们不应该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作任何让步，也不应该对神学作哪怕是微小的让步。”〔220〕

学校进一步革命化的另一个根本要求是改进教学和教育方法。

恩维尔·霍查同志指示说：

“我们的社会主义学校要求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具有新的革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221〕

要实现这一要求，就必须使教师抛弃认为古典教学方法已达到了最完善的程度并在任何时候都应当作为典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只有对资产阶级教育学中的陈旧的内容和形式，对它所固有的形式主义、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空话进行激烈斗争，才能使新的革命的教学方法和教育方法完善起来。

不根本改善师生关系，就不可能改进教学方法和学校的工作作风。党要求消除师生关系中的多礼而冷淡的现象和官僚主义的束缚，发扬学校革命民主精神，对纪律和教师的威信要有革命的认识，提倡独立思考，保证学生同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一道踊跃参加解决教学和教育中的问题。教师应当同学生一道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参加郊游、体育运动和节日活动等。

最后，要使教学方法革命化，就要求教师本身成为革命者，经常以党的教导来教育自己，深刻地领会党的政策，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外，还要求教师不断努力增加科学知识，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党没有把解决学校进一步革命化的问题局限在学校内部。它把这个问题变成了党、政权和全国人民的问题。根据恩维尔·霍查同志的论点和指示，全国开展了一场关于学校进一步革命化的广泛的群众性讨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以穆罕默德·谢胡同志为首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来组织和指导关于学校进一步革命化的群众性讨论和全部工作。把学校革命化运动进行到底的全部工作是根据党的下述方法进行的：

“在发展教育事业和学校工作方面，要全力支持最广泛地实行群众路线，在这个范围内要全力鼓励学校和基层教师提出倡议……，同时，所有这些倡议都始终应该以我们党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的教育政策为基础。”〔222〕

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学校的正确路线更加照亮了国家不断

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远景，满足了青年一代精神上的自然的要求并在他们面前开辟了为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革命活动的广阔前景。

四、人民在党的周围的钢铁般的 团结是争取新胜利的保证

阿尔巴尼亚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周围的钢铁般的团结，是党成立以来一贯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政策和活动的直接结果。这种体现在民主阵线内的团结，如同在赢得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胜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样，对于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中取得伟大胜利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党从来不认为人民在它周围的团结问题已经最终解决。党把维护和加强这种团结看作是一个同革命的具体历史阶段和条件，同正确解决社会矛盾相联系的不间断的过程。民族解放战争中奠定的广大人民群众团结的政治基础，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日益得到了加强。在这一斗争中，人民在党的周围的政治团结基础，即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的联盟不断得到巩固。全国解放后，这种政治团结又有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它的社会经济基础，并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思想基础。这样，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祖国的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这种团结经过了锤炼，成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工人阶级、合作社农民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钢铁般的团结。

在争取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使国家生活进一步革命化的条件下，进一步加强人民在党的周围的团结的途径是恩维尔·霍

查同志确定并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召开的民主阵线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

通过使群众深刻地理解党的路线和指示的政治思想内容的广泛的解释和说服工作,通过动员人民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指示,团结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首先不断地巩固人民政权,并通过同官僚主义进行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不断的斗争,确保群众更踊跃地参加国家管理,使人民政权进一步民主化,这样,团结将得到巩固。

在为胜利地完成发展工业、农业、其他经济部门和文化的巨大任务的斗争中,团结将得到进一步巩固。

随着群众在心灵上和感情上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和忠诚越来越深,永远保持和进一步发扬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爱国主义的和革命的传统,不断加深对阶级敌人,对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仇恨,无限增强人民保卫国家的道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准备,团结将特别得到巩固。

但是,进一步加强人民在党周围的团结的主要环节将是“使无产阶级思想在全体劳动人民的头脑中扎根和完全取得胜利的斗争”〔223〕。人民团结的思想基础的加强,在具体条件下直接有助于加强这一团结的政治基础和社会经济基础,保证完成党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国防领域里的任务。

恩维尔·霍查同志教导说,团结的进一步加强将通过阶级斗争和用革命的方式正确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来实现。

“脱离阶级斗争来谈团结问题,以团结为幌子否认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非对抗性矛盾,这就意味着麻痹党和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警惕性,就等于破坏团结本身和社会主义事业。”〔224〕

另一方面,必须十分注意把人民和敌人之间的矛盾同人民内

部矛盾严格区别开来,不要把那些在思想上有错误观念,但忠于党和社会主义的人同敌人混淆起来。否则,就会损害团结,削弱党同群众的联系。

民主阵线始终是人民在党的周围的团结的体现。民主阵线二十五年的经验证明,这一组织对于建立、保持和不断加强党同群众的钢铁般的联系,对于动员群众贯彻党的纲领,对于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和夺取胜利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党提出的任务是,要从组织上加强民主阵线,提高民主阵线各级组织的战斗性和主动性,改进这些组织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进一步活跃和加强民主阵线,是深入贯彻群众路线和使群众更广泛、更踊跃地参加国家管理的一个主要手段。民主阵线将来仍然是党手中维护和加强人民在自己周围的团结、使国家生活进一步革命化和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强大武器。

在民主阵线中,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周围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这是国内外敌人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夺取新胜利的保障。

恩维尔·霍查同志指示说:

“我们要不惜一切地,象保护眼珠一样地维护和进一步加强我国人民在党周围的磐石般的团结,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永远是我们胜利前进的决定性条件。”〔225〕

基 本 结 论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历史，是在一个被奴役的国家的条件下为争取自由、民族独立和建立人民政权，在一个地理上被敌对国家包围的、落后的半封建国家的条件下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创造性地、坚决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经验的宝库。

总结这一经验得出的主要的基本结论如下：

（一）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在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诞生是领导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斗争的历史的必然需要。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和思想的基础上由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小组合并而成的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这一合并是各个小组的共产主义者在反对人民的敌人、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派别和组织、反对小组内的错误观点的共同斗争中把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利益置于小组的狭隘利益之上才实现的。由于制定和通过了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基础上的统一的总路线，这一合并得到了巩固。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阿尔巴尼亚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建立，并没有因为这个阶级的人数少而且分散，没有形成产业无产阶级，没有达到组织上和政治上的高度成熟性而受到阻碍。在这种条件下，除了工人运动以外，青年学生运动也是建党的有力依靠。最早接受

共产主义思想的和站在反法西斯民主运动最前列的有阿尔巴尼亚的中学生和多数大学生。他们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在工人阶级的支持和鼓舞下成了人民群众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战斗的爱国主义的传播者，从而为党的建立和宣传党的革命路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阿尔巴尼亚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政党，也始终是它唯一的政党。

(二) 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建立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实现的。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也正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着。

工人阶级的领导使阿尔巴尼亚人民彻底赢得了民族独立，消除了国家在经济上对外国的依赖，保证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革命的不断发展，捍卫了这一革命的胜利果实。

阿尔巴尼亚工人阶级通过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从指导它的理论、它所依据的建党组织原则和它的政治纲领来看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始终完整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在各个阶段和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 中忠诚地实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

党以无产阶级思想，以忠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以同阶级敌人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精神教育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其中也包括那些不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他们在反对法西斯占领者、反对本国剥削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祖国的革命活动中经受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锻炼。

党没有让自己官僚化，没有让自己死气沉沉和墨守陈规，因

此,没有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有组织地开展反对领导干部、领导机构和党的机关官僚化的斗争,是避免出现新生产资产阶级分子阶层的决定性条件,这些新生产资产阶级分子企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名义取消工人阶级的领导,建立他们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统治。

阿尔巴尼亚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得以克服实现领导作用的一切障碍,造成这些障碍的原因是:国家处于农业落后和半封建状态,工人阶级作为阶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它的组织程度有限,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和在全国解放初期,思想、技术和文化水平不高。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阿尔巴尼亚工人阶级的人数增加了,形成了新型的产业工人阶级,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得到了发展,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经受了巨大的锻炼,达到了高度成熟的地步,在组织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就进一步增强了它作为整个国家生活的领导者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组织者的作用。

随着阶级结构的根本变化,随着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受到锻炼,党通过吸收这个阶级的最优秀分子壮大和巩固起来了。

(三)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起领导作用,是因为它制定了并一贯执行了一条革命的总路线。这条路线始终符合群众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要求,符合人民和祖国的根本利益,符合国内和国际上的社会主义利益。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制定自己的政治路线时所依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对国内外条件、国内和国际阶级力量对比的科学分析;本国积累的革命经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在这一基础上,它能正确地揭示和估量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中的基本矛盾,正确地规定自己的目标和纲领性任务。

党在制定政治路线时，始终谨慎从事；在采取各项决定时，既没有操之过急，也没有贻误时机；既没有囿于民族特点的框框，也没有抄袭或机械地搬用外国的革命经验。党一向清楚地懂得，仅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其他兄弟共产党的革命经验不可能给自己提供一条现成的和完整的政治路线。为此，工人阶级的政党必须积累自己在革命实践中获得的丰富经验。所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初期，只能奠定自己的总路线的基础，然后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加以丰富和补充。

革命的实践也证明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为了保证这条路线永远是正确的和革命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一切情况下——在国内和国际的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在个别决议的正确性没有为实践所证明的时候，在生活证明从国外搬来的方式方法不适用于本国的现实或者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都毫不犹豫地予以纠正和修改。党从来不隐瞒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而是对错误和缺点采取批评的态度，及时予以纠正，不使其扩大和变得不可救药，不允许在党内发展反党派别。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各个阶段所执行的策略没有发生大的退却和曲折。这是因为客观条件没有造成大的革命低潮，党没有犯过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从自己和劳动群众的革命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越多，在这一实践的风浪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掌握得越好，理解得越深，就越能从理论上总结自己和人民的经验，就越能详细地和正确地制定自己的政治路线，就越能在复杂局势中更好地掌握方向，更少犯错误并更迅速地纠正错误。

（四）党的总路线所以能够成功地贯彻执行，首先是因为它获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路线，群众同党一

起，并在党的领导下全力以赴地为贯彻这条路线而进行斗争。党使群众相信自己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使他们认识到斗争的目的，认识到困难和障碍，认识到为争取胜利所要作出的牺牲，从而把群众团结到自己的周围，使群众跟着党走。党一贯认为，党联系群众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党密切联系群众，群众相信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党的路线变为群众的路线，这些之所以成为现实，不仅是因为这条路线符合人民和社会主义的要求与利益，而且也因为党一贯为贯彻这条路线而从事革命的实践活动。

切合实际的、具体的、明确的、富有战斗性的宣传鼓动工作和为了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而开展的广泛的、有针对性的和多种多样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党用来说服人民群众、建立同人民群众的牢固的联系和动员他们投入斗争和劳动的有力武器。

在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同时，党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一贯遵循言行一致的原则。党总是组织各种活动，通过共产党员起个人模范作用，站在斗争和劳动的最前列来配合教育工作。这使群众从自己的经验中也相信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

党每作一项决定，在自己活动中每采取一个步骤都同群众商量，鼓励群众提出批评和自由发表意见，细心听取群众的要求和建议，并一贯重视人民在道义、政治上的优秀品质。党不断从群众丰富的革命经验中吸取教益并教育群众。

党同群众的联系是建立在健全的组织基础上的，只有同组织起来的群众的联系才是真正的、稳固的联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建立了群众的各种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作为党联系群众的环节，作为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有力杠杆。党的政策始终是这些组织的纲领和活动的基础。

党对在自己道路上遇到的许多困难所采取的不屈不挠的革命立场，是党保持和加强同群众的联系、保卫党不被阶级敌人打垮的革命实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党经常使自己和人民群众作好准备，以便应付革命道路上所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极为困难和复杂的局势。因此，党从来没有因为敌人所造成的严重局势而感到手足无措。在这种局势下，党没有迷失方向，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悲观和消极，没有对自己和人民的力量失去信心。党没有因敌人的打击所造成的损失而陷于绝望的境地。党在任何危急时刻，都英明地、成熟地和果敢地行动，向群众说明真实情况，同群众商量，紧紧依靠群众，并始终无往而不胜。

党在困难的局势中是灵活机动的，但是，从来没有丧失主要目标，没有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

在困难的形势下，党同人民的联系的牢固性经受了考验，这种联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五）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自己的革命活动中执行的另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是在解决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军事等问题时一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党从阶级立场出发评价自己的一切活动和态度，评价一切现象和各种事件，看它们现在特别是将来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人民、有利于革命和国内与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

这有助于党较容易地抓住一系列问题中的主要环节，在复杂的环境中更好地掌握方向。这使党避免犯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及时地克服自己的缺点和弱点，永远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前进。

党成立以来一贯坚决执行的自力更生原则，也是同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原则联系在一起的。

在党的领导下，阿尔巴尼亚人民没有向帝国主义统治者和国内统治者乞求过自由，没有等待别人从国外给他们带来自由和独立。同样，党从来没有只靠外援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经济和文化以及捍卫革命的胜利果实。

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自力更生的原则体现在党的“自由不能恩赐，而要用鲜血和牺牲去争取”的口号中。战后，这一原则又体现在人民动员内部的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在任何情况下不惜一切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坚定性和决心中。

（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保证了革命的不断发展。

这一革命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人民政权的反帝的民主主义的阶段；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阶段；正在进行的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同一个革命的组成部分。

这三个阶段在发展上不仅是毫不间断的，而且是彼此交错的。一个阶段为另一个阶段准备前提。

在第一阶段，在完成反帝的民主主义性质的任务的同时，还完成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任务——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第二阶段，在完成社会主义性质的任务的同时，还完成了第一阶段中未能解决的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任务。

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关系的同时，就产生了共产主义关系的幼芽。

在具有政治、经济、社会 and 思想性质的许多革命任务中，在革命的每一个阶段中，都是主要解决一个基本任务：在第一阶段解决政治任务；在第二阶段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经济任务；在第三阶段解决思想和文化任务。

只要思想和文化领域中的革命还没有取得胜利，那么政治领

域和社会经济领域中所取得的革命胜利就没有保障，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没有消除。思想和文化领域中的革命的目的在于摧毁资产阶级思想，处处和在各个领域树立共产主义道德，防止修正主义篡夺政权和资本主义复辟。在进行思想和文化领域中的革命的同时，也要继续进行政治领域和社会经济领域中的革命。只有在各个领域中，在基础和上层建筑中不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

保证阿尔巴尼亚革命的不断的和胜利的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在革命的各个阶段中的不和任何人分掌的领导；党根据在这一革命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具体条件忠诚地运用了革命的普遍规律。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首先通过革命的方式解决了三个关键性的任务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把人民群众团结在以党为核心的统一的战线中；组织推翻旧政权的武装起义，建立人民武装力量，使人民为保卫胜利果实作好全面准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断完善这个专政。

（七）民主阵线（民族解放阵线的直接继续）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各个阶段中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在自己周围的政治团结、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入斗争和劳动以及夺取胜利的有力武器。

党通过民主阵线把作为工人阶级在革命的不同阶段中的同盟者的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团结在广泛的政治组织中。通过民主阵线避免了使这些同盟者中的任何人，特别是没有加入青年联盟、妇女联盟、工会等群众组织的人处于党的无产阶级政治影响之外。通过民主阵线，党建立并加强了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好地实行了它在各个领域的无产阶级领导。

民主阵线是党和人民政权的最广泛的政治依靠。它体现了人

民在党周围的道义、政治上的团结。

民主阵线始终是人民群众从下面自愿结合而建立起来的联盟，而不是政党的联盟。

在各个阶段中，民主阵线都是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的联盟的基础上的。民主阵线的最广泛的基础是劳动农民。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永远是民主阵线的唯一的领导力量，也是民主阵线中唯一的政党。

阿尔巴尼亚没有过真正的资产阶级政党，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成立以后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政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反对建立其他反法西斯的政党，如果成立了这样的政党，也不反对在组织对占领者的斗争的问题上同这些政党合作。

但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反对和摧毁了在意大利和德国占领者策动和支持下由地主和反动资产阶级建立的、企图破坏党和阵线以及阻止人民革命胜利的“国民阵线”和“合法派”之类的政治组织。党还粉碎了战后地主和资产阶级分子在美、英帝国主义者策动和支持下建立反动政党作为推翻人民政权的武器的企图。

在国内除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外没有其他政党这一历史事实，对于阿尔巴尼亚工人阶级、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是极为有利的。这有助于工人阶级的政党更好地和更容易地完成它在革命的各个阶段中作为革命领导者的使命。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国内唯一的政党，这有助于人民革命胜利以后更好地对劳动群众实行社会主义民主。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仅体现和捍卫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也体现和捍卫了劳动农民和团结在民主阵线中的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利益，它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利益的。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贯把人民在民主阵线中的团结看作是没

有对抗性矛盾、在一个或几个既定的历史阶段中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阶级、阶层和人们的团结。这个团结是在争取自由、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中建立和巩固起来的。

党一方面反对宗派主义的表现——混淆敌我，把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看作是对抗性矛盾，对人民中政治上糊涂的人缺乏耐心的工作等。另一方面，党反对机会主义的表现——对阶级敌人缺乏警惕和放松民主阵线内部的阶级斗争；反对机会主义分子放弃党在民主阵线中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以及放弃党作为民主阵线唯一领导者的作用的倾向。

这一斗争是维护和不断加强人民在民主阵线中的团结所必需的。

(八) 阿尔巴尼亚革命是通过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

在具体条件下，这一起义不可能是仅仅一次和一下子发生的行动。进行起义是整整一个过程，从反法西斯示威游行和小型的战斗行动开始，然后逐渐发展为人民总起义。

组织武装起义必然要求建立人民民族解放军，这支军队要能打败敌人的武装力量，摧毁敌人的国家机器，从占领者的统治下解放国家，确保人民政权的建立并成为这一政权的捍卫者。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必须把这支人民军队组织成阿尔巴尼亚人民和新国家的正规军队。

武装起义和建立人民武装力量经过了三个主要阶段：

在第一阶段，为武装总起义和组织正规的民族解放军奠定了基础。在这一阶段中，建立了战斗小组、正规的游击支队和营以及地方志愿自卫队，并且使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精神上为武装起义作好全面的准备。游击队从占领者的统治下解放了整片整片地

区,并把这些地区变成了游击战争的巩固的根据地。

在第二阶段,斗争变成了人民的总起义,游击支队和游击营组成了由总司令部领导的统一的民族解放军。在这一阶段中,建立了游击旅和游击大队。还建立了后方军事政权。这样就建立了正规的人民军队。

在第三阶段,通过人民总起义赶走了占领者,解放了全国,消灭了占领者的工具——反动组织和反动的武装力量,彻底摧毁了占领者和卖国贼的国家机器。在这一阶段中,民族解放军完全变成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民主国家的正规军。

起义是在城市准备和开始的。随着起义的扩大和增强,重心转移到农村。农村成了起义的主要根据地,农民成了起义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起义也在城市扩大和深入。农村首先获得了解放,它成了城市和全国解放的起点。尽管如此,城市始终是整个起义的鼓舞者和领导者。

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游击战争。游击队的战斗行动的主要特点是它的进攻性和连续性,采用迅速而频繁运动的灵活战术,出其不意地进行袭击,各级指挥部掌握巨大主动性和妥善地利用地形。巧妙地运用游击战术,保持高昂的士气,人民群众支持并直接投入战争,这就抵销和压倒了敌人在数量上、特别是在战斗技术装备方面的优势,保存了人民军队的力量,使敌人遭到大量的损失或者被消灭。

使革命取得胜利的人民武装力量是革命在各个领域中不断胜利发展,捍卫革命胜利果实不受国内反动势力、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敌对阴谋活动的侵犯的强大的和不可取代的支柱。人民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国家保安机关是这一专政的警惕的眼睛。

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随着政权的巩固和完善,武

装力量改进了自己的组织、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政治军事训练，并提高了政治军事素养。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不惜一切地使人民武装力量不断获得加强和现代化。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贯注意维护和加强武装力量的深刻的人民性、它同人民的联系、它的政治和思想训练以及党对它的领导。

不仅常备武装力量捍卫着革命的胜利，而且武装起来的全国人民也捍卫着革命的胜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完全贯彻执行了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武装人民、对人民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和使人民作好全面的战斗准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这一原则体现在党提出的“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中。

（九）阿尔巴尼亚的人民政权是作为革命民主力量的专政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诞生的。它是从根本上摧毁了占领者、地主和反动资产阶级的政权后建立起来的。在国家完全解放以前，政权问题已经得到了有利于革命力量的解决。解放后，人民政权立即开始以人民民主国家的形式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党把政权问题看作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它把民族解放战争同革命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密切联系起来。因此，在扩大和加强武装斗争的同时，在旧的政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也发展和巩固了。新政权又是人民武装起义的牢固的依靠。

党提出“民族解放会议是阿尔巴尼亚唯一的人民政权”的口号，动员群众去摧毁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政权，不允许地主、资产阶级旧政权复辟。这样也就保证了党在它建立的新政权中的不和任何人分掌的领导。在必要的条件具备了的时候，党立即成立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唯一政府——民主革命政府，而不是等到全国解放以后才成立。

党运用它的两个强大武器——阵线和民族解放军，一刻也不

忘记革命发展的前景和要达到的最终目标，从来不与资产阶级分权，并维护工人阶级对新政权的领导不受侵犯。党粉碎了国内反动派和美、英帝国主义者战争期间以及在解放初期，为把地主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塞进人民政权的领导而施加的压力。党还粉碎了党的领导中屈服于敌人的压力和同意与资产阶级分权的机会主义分子的背叛立场。

民族解放会议的直接继续——人民会议是政权的政治基础。

无产阶级专政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各个领域不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捍卫革命胜利果实的决定性的武器。日益扩大和加强的社会主义民主，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的。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劳动群众广泛地和踊跃地参加国家管理。

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的联盟。阿尔巴尼亚农民一贯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自己的政权，因为这是满足了他们世代代的愿望和理想，给他们以自由和土地，把他们从贫困和落后中解放出来，并保证他们在各个领域中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迅速前进的第一个和唯一的政权。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断地同机会主义分子使政权自由化、把政权变成“一切人的民主”的一切表现和倾向作斗争，也同官僚主义的弊病作斗争。

这一斗争对捍卫人民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避免政权脱离人民群众，防止无产阶级专政向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蜕化是必不可少的。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因此，只要阶级斗争还存在，就必须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党和工人阶级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决定性武器。只要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只要共产主义

社会还没有完全建成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外部危险还没有消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就要遵循维护和不断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方针。

(十) 革命在经济方面解决了两个主要任务。第一，消灭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消灭了私有制，在城乡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二，消除了经济的落后状态和主要是由小农业生产构成的单一的经济结构；建立了主要由使用现代技术的工农业大生产构成的新的多部门的经济结构。

党不是等到落后的生产力发展到高水平后再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党在完全建成相应的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这一任务将在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完成——之前建立了这种关系(先是在城市，后来在农村)。这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就成了迅速发展生产力的牢固基础和强大的推动力。

通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关系的残余；在土地改革中无偿地没收了地主的财产，把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同时禁止土地买卖。由于这一改革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完成的，因而也触动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关系。

通过国有化消灭了城市中的大、中资本主义资产，并代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国有化是在无偿地没收财产的基础上通过彻底革命的途径迅速完成的。

城市小生产者私有制，通过这些生产者自愿结合为手工业合作社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农村小生产者私有制，通过农业集体化变成了合作社公有制。集体化的开始和完成没有事先经过对小生产者的土地实行国有化，没有等待首先使国家工业化，而是与建立和发展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同时进行的。在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农

村中的社会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也建立起来了。

农业集体化是在农民相信社会主义农业制度的优越性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在党的帮助下根据自己的经验确立了这一信念。党始终严格执行关于农民自愿组织合作社的列宁主义原则。中农也象贫农一样，拥护集体化道路，并大批加入了合作社。

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实行集体化采用的唯一形式，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共同劳动和只按每个社员所完成的劳动来分配产品的基础上的。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多方面的经济的主要关键。工业化为建立和发展新的经济部门，为建立先进的多种经营的农业和为实现农业集约化创造了现实的可能。

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始终把建立和发展重工业放在第一位。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比重不断增长。同时，特别重视迅速地发展轻工业。党还努力保证使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只有依靠两条腿——工业和农业，才能保证建立强大的、稳固的和独立的经济，才能保证使这一经济迅速地 and 不断地发展。

对经济和社会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是集中的和民主的，是建立在国家统一的和总的计划基础之上的。

建立和发展新的社会主义工业，为农业的集约发展建立物质技术基础，首先依靠内部的力量、资源和资金。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国际主义援助过去和现在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了国家从半封建的落后状态越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保证了国民经济的独立性；保证了国民经济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迅速发展。

(十一) 阶级斗争是争取革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向

共产主义过渡的主要动力，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制定政治路线和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以这一原则为指导的。阶级斗争是客观现象，因而是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是曲折发展的，时起时伏的，时而尖锐，时而缓和，但永远不会中断和熄灭。在政治、社会、经济、思想和文化各个领域里都存在着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反对法西斯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主要剥削阶级、推翻他们的政治统治的斗争；是反对剥削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粉碎他们的反抗和敌对活动，消灭这些阶级本身的斗争；是反对剥削阶级残余的斗争；是反对新的资本主义分子和蜕化变质的反党分子、投降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是反对和我们格格不入的、宗法制的、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观念、意识、风俗和习惯，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他外部敌人的压力和敌对活动，粉碎他们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侵略、掠夺的野心和阴谋的斗争。

国内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始终是同国际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交错进行的。

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主要阶级敌人是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因此，斗争的主要矛头是指向他们的。党在贯彻不分阶级和政治信仰把全体人民团结在民族解放阵线中的路线的同时，为防止人民群众同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的主要矛盾作了许多努力。然而，地主和反动资产阶级及其政治组织——“国民阵线”和“合法派”则把共产党和民族解放阵线看成是主要敌人。他们同占领者组成一条战线，用武力向党和民族解放阵线发动进攻，妄图消灭党和民族解放阵线。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民族解放阵线不得不揭露国内反动派的组织和武装力量的反民族的政策和活动，用革命的暴力同他们进行斗争，把他们彻底消灭。这样，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就同反对国内主要的剥削阶级——意大利法西斯奴

役者和德国纳粹分子的工具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因此，民族解放战争不仅使祖国从外国占领者的统治下获得了解放，而且推翻了国内主要剥削阶级，剥夺了他们的政权。

解放后，主要的阶级敌人，在国内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在这些阶级被消灭以后是它们的残余；在国外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在这一期间，国内敌人也始终同国外敌人勾结在一起，甚至在他们的怂恿和指使下进行活动。因此，反对国内阶级敌人的斗争是同反对国外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把美帝国主义看成是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制度、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各国人民的民族自由和独立以及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和最大的危险。因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把国际上的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这个敌人。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还同其他国外敌人——美帝国主义者的帮凶和工具进行了斗争，这些敌人不仅是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的敌人，而且也是其他各国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的敌人。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帝国主义的产物和代理人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特别尖锐的斗争。一开始就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的原则性的和不可调和的斗争，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获得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和敏锐的革命洞察力，认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和其他修正主义派别，更好地和更坚决地同他们进行斗争。以苏联修正主义为中心的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凶恶的阶级敌人和主要危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胜利地反对帝国主义、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在阿尔巴尼亚和世界范围内取得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依靠人民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中表现的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决心，依靠世界反帝革命力量的强大运动，在战略

上从未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力量，在他们的压力和恫吓面前没有被吓倒，没有屈膝投降。在任何情况下和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向他们作原则性的让步，没有拿革命原则作交易。与此同时，在策略上，党没有低估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势力的巨大危险性。党从各方面使人民群众作好准备，以便抵抗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任何压力，粉碎它们的一切敌对阴谋和活动。

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仍然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在国内，阶级斗争是针对这些阶级的残余以及新生的蜕化变质分子开展的，而特别集中在思想和文化领域方面，反对宗法制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同我们格格不入的观念和表现。这些过去遗留下来的观念和表现是根深蒂固的，长期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这些观念和表现以及来自外部的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政治、思想压力，是修正主义的产生和篡夺政权、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基础。只要国内共产主义还没有建成，只要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还没有消灭，这种基础就依然存在。因此，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中开展阶级斗争——反对对待劳动和对待社会主义财产的错误观点和态度，反对落后习俗，反对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和表现，反对宗教教义和宗教信仰，反对压制妇女和损害妇女人格的观念和习俗，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政权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必要条件，是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

在国外，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联修正主义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仍在激烈地进行着。这一斗争将一直进行到它们被彻底消灭为止。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革命的各个阶段开展了并正确地领导了反对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国内外敌人的阶级斗争，它作为工人阶级

的革命政党在这一斗争中经受了高度的锻炼。

(十二)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始终作为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支部队进行斗争和工作。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本国取得了革命胜利,并成功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这同时也就是履行了它对工人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的国际主义义务。

在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中,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从没有把自己同世界革命运动分割开来。相反,它始终感到需要世界革命运动的大力支持,它正确地评价了这种支持的重要性,无论是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始终依靠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的援助,首先是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了党员和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人民来说始终是亲切的和珍贵的。十月革命的丰富经验以及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富经验具有普遍意义。十月革命的不朽学说,总的来说,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人民照亮了道路,鼓舞了他们为争取自由、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党员和全体人民心中培养了对全世界无产者、人民和革命力量真诚地热爱的感情。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人民对在十月革命中诞生的、由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怀着无限的热爱和忠诚。这种热爱和忠诚始终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当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中出现了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立即把苏

联人民同苏联修正主义领导区别开来。它奋起捍卫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光荣道路，捍卫斯大林和被修正主义者践踏了的十月革命的学说，把这看作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把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看作是继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国际工人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伟大的胜利。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中诞生了社会主义的堡垒、世界革命的强大根据地——中华人民共和国。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劳动人民一贯把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和革命力量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奉行的政策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并加强真诚合作和相互援助的兄弟关系。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贯声援为争取自由、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各国革命人民和革命力量。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解放斗争。它还支持国际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斗争。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原则性斗争，这也是履行一项重大的国际主义义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通过这一斗争努力捍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消灭它们的企图；维护并加强这一阵营和运动的团结；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制造分裂以后，在反对修正主义者和叛徒的坚决斗争中，在排除修正主义者和叛徒的条件下，在革命的基础上重新确立这一团结。

同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奉行阿尔巴尼亚新国家同非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政治和社会制度如何）合作和互利的政策。

在同一切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执行平等和尊重国家主权的革命原则，不允许对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内部事务进行任何外来干涉。

（十三）忠实地和以革命的方式执行建设新型政党的基本原则和组织问题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准则，对贯彻党的总路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健全的组织，构成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始终是民主集中制。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内部生活特点是，对全体党员统一的钢铁般的纪律、原则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努力使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武器，使他们不犯错误，并使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

党的决议、方针和指示是从最高机关直至基层组织集体领导的成果。

党的力量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严格地执行吸收党员的列宁主义准则。在壮大党的队伍方面，党一贯重视质量而不是追求数量。对新党员的主要要求是：忠于人民和共产主义事业，在各方面都能够起先锋战士的模范作用，家庭出身和社会成分主要是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和合作社农民。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贯要求党员要象彻底的和坚定的革命者一样思考、工作和生活。

（十四）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它在组织和思想上的磐石般的团结。

党在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同派别活动和党内一切敌人进

行不可调和的原则性斗争中锤炼和维护了这一团结。

党在成立以后的几个月内就粉碎了取消派的托洛茨基主义思潮，以后反党集团和反党分子的观点和行动在党内再也未能形成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是由于对它们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和斗争，由于党员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

为了确保党的团结和确保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自成立以来，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这两条战线上进行了斗争。

一九四三年春天以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主要危险是宗派主义。这种危险的根源是：过去各共产主义小组活动中就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这些小组合并后又渗透到党内来；各共产主义小组的原有的一些成员对于党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总路线理解有困难。

从一九四三年春到战争结束以及在解放后的整个时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

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是：阵线外的反动资产阶级和阵线内的中产阶级对党的压力；企图阻止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取得胜利的英、美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压力。

解放后，机会主义的根源是：阵线外的被推翻的阶级的残余和富农对党的压力；阵线内的小资产阶级，首先是农民群众在党的某些农村经济政策问题上的压力；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为颠覆人民政权而施加的压力；资产阶级思想、具有反动内容的习俗和观念以及宗教偏见的压力；现代修正主义的压力。

自党成立以来，机会主义危险的另一个来源就是许多党员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一大批党员思想上的锻炼不够。

解放后，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虽然没有对党的路线构成什么大的威胁，但是，它们在党员处理各种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活动中仍

有所表现。如果低估这些表现,就会严重妨碍党的总路线的贯彻。

宗派主义表现的根源主要是一些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党员的思想狭隘和盛气凌人。

教条主义表现的根源是:不根据国内的条件和不以批判的眼光硬搬其他国家的经验;相当一批党员理论素养不够,文化水平低。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反对机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斗争,反对一切不良现象的斗争,以及同反党集团和反党分子所进行的斗争始终是具有高度的原则性的和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性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党对那些认识了自己错误的党员是关心的和慎重对待的。同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对变节分子和分裂团结的人则是严厉的和无情的。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贯把反对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和反对党内一切不良现象的斗争看作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和一种反映。党把在自己队伍里开展反对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特别是反对修正主义的不可调和的原则性斗争看作是维护它的无产阶级性质、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规律。在党存在的整个时期,这一斗争都将继续进行下去,因为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和只要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被消灭,在客观上就存在着产生修正主义的倾向和危险。

(十五)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以来对于自己的领导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一贯给予最大的重视,并把这一团结看作是保证全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团结、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和贯彻这一路线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阶级敌人为了消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或把它变成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党,总是从力图在党的领导中树立对立派别和制造分

裂开始他们的破坏活动。但是，由于党中央和全党进行了反对派别活动、反对调和对立观点、反对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始终不渝的原则性的斗争，所以这些企图最终都破产了。每当某些领导人破坏党的准则和原则的时候，党都耐心地帮助他们改正，使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每当证明这个或那个领导人在困难面前或者是在阶级敌人的压力面前屈膝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变为资产阶级、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代理人时，党就不管他过去的功劳多大，而毫不犹豫地把他开除出领导。

在通过决议时严格执行集体领导原则也保证了中央委员会的钢铁般的团结。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取得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些领导人来自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培养和锻炼成为政治领导者和群众的组织者。他们以智慧、忘我精神以及对人民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一贯忠诚，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帮助和支持下获得了崇高的威望，取得了政治领导的丰富经验，赢得了人民的热爱和尊敬。

恩维尔·霍查同志在领导人中占有卓越的地位。他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缔造者；从党成立的那一天起，在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他都领导着党。他在制定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方面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恩维尔·霍查同志以他的智慧、坚定性、远见和革命的魄力保证了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准则始终按革命的方式加以贯彻，在各种困难和复杂的形势下都从来没有使党陷于绝境，而是引导它取得了胜利。恩维尔·霍查同志在他的著作中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革命经验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总结，从而对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恩维尔·霍查同志是在道义和政治上钢铁般团结在党和党中

央周围的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最敬爱的导师和领袖。

*

*

*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历史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阿尔巴尼亚工人阶级政党和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这一实践中得到了丰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历史证明了当马克思列宁主义被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忠实地和创造性地贯彻时所具有的巨大鼓舞力量、推动力量和改造力量。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它光荣的道路上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它所受到的锻炼和它所达到的成熟地步，有助于它今后继续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革命路线，引导阿尔巴尼亚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

注 释

- 〔1〕 恩维尔·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党中央档案馆。——第4页。
- 〔2〕 见《季米特洛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二日）。党中央档案馆。——第21页。
- 〔3〕 阿里·凯尔曼第：《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党中央档案馆。——第24页。
- 〔4〕 同上。——第26页。
- 〔5〕 同上。——第36页。
- 〔6〕 《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载一九三八年九月《前进》杂志。党中央档案馆。——第41页。
- 〔7〕 《共产主义小组会议决议》（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一九六〇年地拉那出版，第1卷，第14页。——第50页。
- 〔8〕 恩维尔·霍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载《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一九五〇年地拉那出版，第59页。——第51页。
- 〔9〕 恩维尔·霍查：《在最高民族解放会议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会议记录》。党中央档案馆。——第59页。
- 〔10〕 同注〔7〕，第14—15页。——第60页。
- 〔11〕 《斯库台小组给该小组成员的指示》。党中央档案馆。——第60页。
- 〔12〕 同注〔7〕，第19页。——第63页。
- 〔13〕 同上，第20页。——第63页。
- 〔14〕 同上，第20页。——第65页。
- 〔15〕 同上，第22页。——第65页。
- 〔16〕 同上，第21页。——第66页。
- 〔17〕 同上，第22—23页。——第66页。
- 〔18〕 同上，第22页。——第67页。
- 〔19〕 **民族主义者**，一般是指那些热爱祖国，要求把祖国从外国占领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没有远大革命目标的爱国者。但是，地主、宗族首领和反动资产阶级中的假爱国者也称自己为**民族主义者**。因此，为了避免真正的爱国者同反动分子、卖国分子混淆，把真正的爱国者也称为

“正直的民族主义者”、“爱国的民族主义者”。——第 67 页。

- [20] 同注〔7〕,第 12 页。——第 67 页。
- [21] 同上,第 23 页。——第 68 页。
- [22]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个号召书》(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第 1 卷,第 27 页。——第 69 页。
- [23]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第 1 卷,第 29 页。——第 72 页。
- [24] 同注〔22〕,第 27—28 页。——第 73 页。
- [25] 同注〔23〕,第 39 页。——第 75 页。
- [26]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积极分子会议决议》(一九四二年四月八日),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第 1 卷,第 56—57 页。——第 78 页。
- [27] 同上,第 61 页。——第 78 页。
- [28] 同上,第 62 页。——第 79 页。
- [29]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党的非常代表会议惩处阿纳斯塔斯·卢拉和萨迪克·普莱姆特集团敌对活动的通知》(一九四二年七月),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第 1 卷,第 81 页。——第 82 页。
- [30] 《人民之声报》创刊号(一九四二年八月)。——第 85 页。
- [31] 《佩萨代表会议决议》(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六日),载《民族解放革命政权最高机关文件汇编》,一九六二年地拉那出版,第 12 页。——第 87 页。
- [32] 同上,第 13 页。——第 88 页。
- [33] 恩维尔·霍查:《给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科尔察州委会的信》(一九四三年一月),《霍查全集》,第 1 卷,一九六八年地拉那出版,第 167—171 页。——第 92 页。
- [34] 《列宁全集》,第 26 卷,中文版,第 100 页。——第 93 页。
- [35] 同注〔33〕,第 171 页。——第 94 页。
- [36] 同上,第 174 页。——第 95 页。
- [37] 恩维尔·霍查:《给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纪诺卡斯特州委会的信》(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霍查全集》,第 1 卷,第 198 页。——第 95 页。
- [38] 同上,第 199 页。——第 96 页。
- [39]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一九五二年地拉那出版,第 100 页。——第 97 页。
- [40]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秘密来往信件》,一九四六年巴黎出版,第 150 页。——第 98 页。
- [41] 议定书之所以这样称呼,因为它是意大利占领军总司令兰乔·达尔马

乔和“国民阵线”中央委员阿里·克尔楚拉签订的。——第99页。

- [42] 马里奇·布沙蒂。——第99页。
- [43]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第1卷，第113页。——第101页。
- [44] 同上，第111页。——第103页。
- [45] 同上，第104页。——第103页。
- [46] 恩维尔·霍查：《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民族解放战争》（一九四三年二月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霍查全集》，第1卷，第230页。——第104页。
- [47] 同注〔43〕，第114页。——第104页。
- [48] 同上，第117页。——第105页。
- [49]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记录》。党中央档案馆。——第106页。
- [50]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号召书》（一九四三年四月七日），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第1卷，第123页。——第107页。
- [51] 恩维尔·霍查：《法西斯及其走狗米哈伊洛维奇的暴行》（一九四三年三月），《霍查全集》，第1卷，第246—247页。——第107页。
- [52]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七日），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第1卷，第146页。——第109页。
- [53] 《命令》（一九四三年七月三十日），载《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和总指挥部文件汇编》，第1卷，一九六五年地拉那出版，第32页。——第111页。
- [54] 第九军司令部《月报》，第八期，一九四三年八月。——第111页。
- [55] 恩维尔·霍查：《给于麦尔·迪什尼察的信》（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霍查全集》，第1卷，第334页。——第118页。
- [56] 恩维尔·霍查：《给于麦尔·迪什尼察的信》（一九四三年八月九日），《霍查全集》，第1卷，第340页。——第118页。
- [57] 《第二次民族解放代表会议决议》（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载《民族解放革命政权最高机关文件汇编》，第58页。——第119页。
- [58]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示》（一九四三年九月十日），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第1卷，第161页。——第120页。
- [59]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号召书和传单》（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一九六二年地拉那出版，第310页。——第123页。

- [60] 《给培拉特州司令部的信》(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五日)。党中央档案馆。——第123页。
- [61]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第1卷,第177页。——第124页。
- [62]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三日),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第1卷,第200页。——第128页。
- [63] 同注[61],第170页。——第129页。
- [64]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三日),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第1卷,第199页。——第131页。
- [65] 《回答。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青年联盟传单》(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七日)。党中央档案馆。——第136页。
- [66] 恩维尔·霍查:《给纳科·斯皮洛同志的信》(一九四四年三月),《霍查全集》,第2卷,第115—116页。——第139页。
- [67] 指特种登陆部队。——第152页。
- [68] 米拉丁·波波维奇,一九四四年九月根据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命令离开阿尔巴尼亚,一九四五年三月在南斯拉夫特务机关策划的一次谋杀案中被害。——第155页。
- [69] 建立“巴尔干参谋部”是根据铁托的倡议进行的。南斯拉夫领导企图以此将希腊、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解放军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由于遭到巴尔干各国共产党和起义人民的抵制,建立“巴尔干参谋部”的企图没有得逞。——第156页。
- [70] 维里米尔·斯托依尼奇作为一个兄弟党代表被邀请参加了全会。他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的阴谋分子的支持下,粗暴地干涉内部事务,违背了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一切准则。——第159页。
- [71]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党中央档案馆。——第160页。
- [72] 恩维尔·霍查:《在祖国解放十五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地拉那出版,第9页。——第164页。
- [73] 恩维尔·霍查:《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第二次会议的历史性决议》(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霍查全集》,第2卷,第373页。——第167页。
- [74]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党中央档案馆。——第175页。
- [75] 恩维尔·霍查:《我国民族解放军》(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载《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和总指挥部文件汇编》,第二卷,一九六六年地

拉那出版,第339页。——第177页。

- [76]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第1卷,第254页。——第179页。
- [77]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七日《团结报》。——第180页。
- [78] 恩维尔·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党中央档案馆。——第189页。
- [79] 恩维尔·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党中央档案馆。——第196页。
- [80] 恩维尔·霍查:《向巴黎新闻界代表发表的声明》(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载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九日《团结报》。——第208页。
- [81]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示》(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七日),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第1卷,第362页。——第209页。
- [82] 同上,第364页。——第209页。
- [83] 克里斯多·赛梅尔科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背叛行径被完全揭露以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向党作了自我批评。——第219页。
- [84]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五日萨沃·兹拉迪奇向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关于阿尔巴尼亚并入南斯拉夫的提纲》。《谈话记录》。党中央档案馆。——第221页。
- [85] 《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给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一九四八年五月四日)。党中央档案馆。——第224页。
- [86]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报》(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党中央档案馆。——第224页。
- [87]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决议》,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第1卷,第397页。——第228页。
- [88] 同上,第397页。——第228页。
- [89]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第1卷,第454页。——第231页。
- [90] 同上,第456页。——第234页。
- [91] 同上,第459页。——第235页。
- [92] 同上,第463页。——第236页。
- [93] 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青年联盟在其一九四六年十月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人民青年联盟。——第238页。

- [94] 《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四日),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第2卷,第31页。——第251页。
- [95] 《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工作的决议》(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第2卷,第55页。——第255页。
- [96]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第2卷,第110页。——第257页。
- [97]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一九五二年四月),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第2卷,第149页。——第260页。
- [98] 恩维尔·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一九五二年地拉那出版,第42页。——第261页。
- [99] 同上,第41页。——第262页。
- [100] 同注[97],第135页。——第262页。
- [101] 同上,第141页。——第262页。
- [102] 同上,第154页。——第263页。
- [103] 《列宁全集》,第31卷,中文版,第450页。——第268页。
- [104]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一九五四年四月十八日),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第2卷,第326页。——第268页。
- [105]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七日),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第2卷,第419页。——第274页。
- [106]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的政治局报告》(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二日)。党中央档案馆。——第275页。
- [107]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党中央档案馆。——第277页。
- [108] 列宁:《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载《列宁全集》,第25卷,中文版,第72页。——第282页。
- [109]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给各级党组织的信》(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党中央档案馆。——第286页。
- [110]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文件汇编》,第2卷,第452页。——第287页。

- 〔111〕 同上,第 481 页。——第 288 页。
- 〔112〕 同上。——第 288 页。
- 〔113〕 同上,第 482 页。——第 288 页。
- 〔114〕 同上,第 478 页。——第 291 页。
- 〔115〕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二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党的总书记的职务由党中央第一书记代替。——第 291 页。
- 〔116〕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人民之声报》社论。——第 294 页。
- 〔117〕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日),载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人民之声报》。——第 294 页。
- 〔118〕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人民之声报》社论。——第 294 页。
- 〔119〕 恩维尔·霍查:《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日),载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九日《人民之声报》。——第 295 页。
- 〔120〕 恩维尔·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三日),一九五七年地拉那出版,第 37 页。——第 296 页。
- 〔121〕 同上,第 71 页。——第 296 页。
- 〔122〕 同上,第 50 页。——第 296 页。
- 〔123〕 同上,第 58 页。——第 297 页。
- 〔124〕 同上,第 60 页。——第 297 页。
- 〔125〕 同上,第 40—41 页。——第 298 页。
- 〔126〕 同上,第 43 页。——第 298 页。
- 〔127〕 恩维尔·霍查:《在莫斯科阿苏友好大会上的讲话》,载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七日《人民之声报》。——第 300 页。
- 〔128〕 恩维尔·霍查:《在地拉那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载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人民之声报》。——第 300 页。
- 〔129〕 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日)。党中央档案馆和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之声报》。——第 314 页。
- 〔130〕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之声报》文章:《必须对现代修正主义作无情的斗争,直到它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彻底破产为止》。——第 314 页。
- 〔131〕 恩维尔·霍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党中央档案馆。——第 321 页。
- 〔132〕 同上。——第 321 页。

- [133] 同上。——第 322 页。
- [134] 同上。——第 322 页。
- [135] 同上。——第 323 页。
- [136] 同上。——第 324 页。
- [137] 同上。——第 324 页。
- [138] 同上。——第 325 页。
- [139] 同上。——第 325 页。
- [140] 同上。——第 326 页。
- [141] 同上。——第 327 页。
- [142]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第 328 页。
- [143] 同上。——第 329 页。
- [144]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集》，一九六一年地拉那出版，第 298 页。——第 332 页。
- [145] 恩维尔·霍查：《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集》，第 146 页。——第 334 页。
- [146] 同注[144]，第 316 页。——第 339 页。
- [147] 同注[145]，第 155—156 页。——第 339 页。
- [148] 同上，第 17 页。——第 339 页。
- [149] 同上，第 162 页。——第 339 页。
- [150] 同上，第 159 页。——第 340 页。
- [151] 同注[144]，第 315 页。——第 340 页。
- [152]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党中央档案馆。——第 345 页。
- [153]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声明》(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日)，载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之声报》。——第 347 页。
- [154]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二日中央全会通过；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交苏联驻地拉那大使馆)。——第 349 页。
- [155] 恩维尔·霍查：《在庆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二十周年和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地拉那出版，第 79 页。——第 349 页。
- [156] 同注[153]。——第 349 页。

- [157] 同注[155]。——第 351 页。
- [158] 恩维尔·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七月）。党中央档案馆。——第 354 页。
- [159] 恩维尔·霍查：《关于农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及其进一步提高的措施》，一九六三年地拉那出版，第 8—9 页。——第 357 页。
- [160] 政治局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的报告：《关于进一步加强党》（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一九六三年地拉那出版，第 6 页。——第 360 页。
- [161] 见同上，第 7 页。——第 360 页。
- [162] 同上，第 11 页。——第 361 页。
- [163]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七月全体会议研究了关于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第 363 页。
- [164] 政治局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的报告：《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思想工作》（一九六四年七月），一九六四年地拉那出版，第 46 页。——第 365 页。
- [165] 同上，第 55 页。——第 366 页。
- [166] 恩维尔·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闭幕词》（一九六四年七月），一九六四年地拉那出版，第 9—10 页。——第 367 页。
- [167] 政治局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学艺术的作用》（一九六五年十月）。党中央档案馆。——第 368 页。
- [168] 恩维尔·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闭幕词》（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党中央档案馆。——第 369 页。
- [169]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三日《人民之声报》文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叛变》。——第 377 页。
- [170] 一九六三年二月七日《人民之声报》文章：《在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第 378 页。
- [171] 一九六三年十月四日《人民之声报》文章：《赫鲁晓夫公开打起了分裂主义和背叛的旗号》。——第 380 页。
- [172]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共产党党员的公开信》（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载一九六四年十月六日《人民之声报》。——第 380 页。
- [173] 恩维尔·霍查：《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二十年。在庆祝阿尔巴尼亚解

- 放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九六四年地拉那出版,第 47 页。——第 383 页。
- 〔174〕 同上,第 71 页。——第 384 页。
- 〔175〕 同上,第 48 页。——第 384 页。
- 〔176〕 恩维尔·霍查:《对选民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载一九六六年七月九日《人民之声报》。——第 388 页。
- 〔177〕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公开信》(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一九六六年地拉那出版,第 20 页。——第 395 页。
- 〔178〕 同上,第 14 页。——第 395 页。
- 〔179〕 同上,第 5 页。——第 395 页。
- 〔180〕 同上,第 36 页。——第 396 页。
- 〔181〕 恩维尔·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三日)。党中央档案馆。——第 399 页。
- 〔182〕 恩维尔·霍查:《关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文件集》,一九六七年地拉那出版,第 135 页。——第 400 页。
- 〔183〕 同上,第 134 页。——第 401 页。
- 〔184〕 同上,第 136 页。——第 401 页。
- 〔185〕 同上,第 134 页。——第 402 页。
- 〔186〕 同上,第 141—142 页。——第 403 页。
- 〔187〕 同上,第 142 页。——第 403 页。
- 〔188〕 同上,第 158 页。——第 405 页。
- 〔189〕 同上,第 145 页。——第 406 页。
- 〔190〕 同上,第 126 页。——第 407 页。
- 〔191〕 同上,第 52 页。——第 408 页。
- 〔192〕 同上,第 69 页。——第 408 页。
- 〔193〕 同上,第 76 页。——第 409 页。
- 〔194〕 同上,第 77 页。——第 409 页。
- 〔195〕 同上,第 94 页。——第 410 页。
- 〔196〕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章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修改通过)。——第 411 页。
- 〔197〕 同注〔182〕,第 137 页。——第 412 页。
- 〔198〕 同上,第 100—102 页。——第 413 页。
- 〔199〕 同上,第 23 页。——第 418 页。

- [200] 同上,第179页。——第419页。
- [201] 同上,第19页。——第419页。
- [202] 同上,第34页。——第420页。
- [203] 同上,第189页。——第420页。
- [204] 同上,第193—194页。——第421页。
- [205] 同上,第183—184页。——第421页。
- [206] 同上,第183页。——第421页。
- [207] 同上,第162页。——第422页。
- [208] 同上,第168页。——第422页。
- [209] 同上,第197页。——第422页。
- [210] 恩维尔·霍查:《党和政权的进一步革命化》(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一九六七年地拉那出版,第40—41页。——第425页。
- [211] 同上,第39—40页。——第426页。
- [212] 恩维尔·霍查:《在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在争取社会主义在阿尔巴尼亚完全胜利的斗争中的作用和任务的报告》(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一九六七年地拉那出版,第54页。——第437页。
- [213] 同注[210],第5页。——第437页。
- [214]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公告》(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第9页。——第439页。
- [215] 《政治局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的报告》(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一九六七年地拉那出版,第39页。——第440页。
- [216] 恩维尔·霍查:《关于我国学校的进一步革命化》(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一九六八年地拉那出版,第23—24页。——第445页。
- [217] 同上,第43页。——第445页。
- [218] 同上,第21页。——第446页。
- [219] 同上,第23页。——第446页。
- [220] 同上,第24页。——第446页。
- [221] 同上,第44页。——第446页。
- [222] 同上,第47页。——第447页。
- [223] 同注[212],第36页。——第449页。
- [224] 同上,第33—34页。——第449页。
- [225] 同上,第77页。——第450页。